



奉天 承运

“一页页令人惊诧的真实记录…多不胜数的虎口脱险、
一幕幕惊险场面，扣人心弦犹胜于间谍故事。”

洛杉矶时报

安得烈弟兄，约翰、伊莉莎白·席勒夫妇

印刷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册

奉天承运

作者.. 安得烈弟兄，约翰、伊莉莎白·席勒夫妇

出版及发行.. 行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中央郵箱 873 号

电话..(852) 35250820 传真..(852) 35250827

版次: 2016 年 2 月 1 日

国际书号.. 978-988-14467-1-8

版权: ©行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God's Smuggler

Author Brother Andrew and John and Elizabeth Sherrill

Publisher: The Way Publishing Limited

Address: PO Box 873 , Shati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Kong

Tel: (852) 3525 0820 Fax: (852) 3525 0827

Edition: 1st February 2016

ISBN 978-988-14467-1-8

Copyright: © The Way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此中文版本由 Stichting C.P.Group 授权 行道出版社翻译发行

God's Smuggler

by Brother Andrew and John and Elizabeth Sherrill

Copyright© 1967 , 2001 Open Doors International and John and Elizabeth Sherril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Clay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內容

前言.....	6
序.....	9
第 1 章 :.....	11
烽烟与面包干.....	11
第 2 章 :.....	31
黄草帽.....	31
第 3 章 :.....	51
椰壳里的小石子.....	51
第 4 章 :.....	59
暴风雪之夜.....	59
第 5 章 :.....	73
完全顺服的一步.....	73
第 6 章 :.....	104
君尊的手法.....	104
第 7 章 :.....	135
铁幕后.....	135
第 8 章 :.....	151
苦杯.....	151
第 9 章 :.....	168
整装待发.....	168
第 10 章 :.....	184
夜里明灯.....	184
第 11 章 :.....	202
三次祷告.....	202
第 12 章 :.....	229
假教会.....	229
第 13 章 :.....	245
绕圈子.....	245

第 14 章 :.....	260
巨人斗士.....	260
第 15 章 :.....	280
房子和菜园.....	280
第 16 章 :.....	297
新发展.....	297
第 17 章 :.....	323
初访俄罗斯.....	323
第 18 章 :.....	332
再访俄罗斯.....	332
第 19 章 :.....	350
俄文圣经.....	350
第 20 章.....	365
巨龙苏醒.....	365
第 21 章 :.....	385
十二位同工.....	385
第 22 章 :.....	412
后记:新禧年之旅	412

前言

家有贵客

这位身材高瘦、三十来岁的仁兄坐在我家客厅里，让我们为手上的著作向他问这问那，这时刚巧校车停在门前，我们的八岁女儿莉丝放学回来。我们访谈正问到关键处，讲到在苏菲亚遇见彼得的情节；不过每当小女或小儿回来，我们总是先给他们打招呼，也暂且放下面前这位安得烈弟兄。“莉丝！”小女每天放学这位弟兄都逗她说说话儿，“拼字课上得还好吧？”

安得烈弟兄说着自己先大笑起来，然后坚持暂停访谈，要和这个小朋友出去散步。对这位荷兰人来说，拼字竟然能成课，实在希奇得很。他跟孩子解释说，荷語，你能说就一定能拼，因为拼音和说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在他看来，英语拼字弄得那么难实在不可思议。

莉丝很同意他的说法——其实他说什么她都同意。小儿小女三人很喜欢安得烈弟兄，而弟兄因为想念自己的孩子，也总是尽可能花时间和我三个小孩玩。

散步回来，访谈继续，我们看他好像跟孩子依依不舍的。为什么我们竟对一个写作计划那么兴致勃勃，安得烈弟兄有点难以理解。

“我搞不懂你们为什么想写我，”我们第一次提案时他说，“谁会有兴趣读这些？我只是穷乡僻壤里铁匠的儿子，连高中也读不完。

我只是个平凡人啊。”

但这正是他的故事引人入胜之处，让人看见神怎样使用一个穷小子。他读书少，没有资助，没有基金，却能做连人脉广、恩赐大的人都说不可能的大事。对我们，还有其他平凡人而言，这正是安得烈弟兄事迹最吸引人的地方。

时光荏苒，和弟兄访谈、初次出版《奉天承运》，至今已三十五年。更奇妙的是，今天这本书已发行约一千万册，有三十五个译本。

“这还不止，”2001年安得烈弟兄来探望我，他说：“全球许多贫穷地方都有基督徒非正式复印这本书，达数十万册，然后把书送出去，鼓励弟兄姊妹。”他看了看我们，有点内疚：“是我让他们复印的，是不是违法了？”

是违法的，但我们高兴他这样做，我想神也是。

约翰、伊莉莎白·席勒夫妇

于纽约州查巴克

序

众所周知，俄罗斯和好几个共产国家在几年前变了天，变得更开放，更接受新想法，向游客也更开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虽然专家会提出种种政经大事作分析，却忽略了一个微小而重要的因素——这是一小撮平凡人极具创意工作之结果，而这一切，皆始于一个人，他们都有份改变历史。

第一次认识安得烈弟兄，我们就觉得，好想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乎目前工作的部分不能说，怕牵涉其中者有危险。就连已成过去的部分，也有若干情节要改写。其中大部分故事人物没用真名字，地点、时间也改写了，当然也隐去了《奉天承运》若干实际操作。

然而余下可说的故事都很特别，很有人情味，且都关乎我们将来，所以我们有感动将它写下来。安得烈弟兄在典型的荷兰小镇里成长，是穷铁匠的儿子。正如所有 50 後，他有感当代信徒面临最大挑战，是服侍共产主义下的第三世界。我们这一代都知道共产版图向西方封锁，何况安得烈弟兄身无分文又缺乏关系。他像你我一样，知道不可能就这样走

进俄罗斯、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传讲另一种生命之道；但也正从这里开始，安得烈弟兄的故事变得不平凡，有别于其他平凡人……

约翰、伊莉莎白·席勒

《路标》(Guideposts)

于纽约州加密市

第 1 章

烽烟与面包干

本人自幼好勇，常常幻想自己是敌后情报员独行奇事，时在敌人火网追踪下匍匐前进，穿越铁丝网，勇不可挡。小时候住在家乡——荷兰的韦堤，孩子们闲来没事就彼此对阵，互充假想敌，拿自己的木鞋当武器(译者注:荷兰人习惯穿木鞋，是用一整块木头挖凿出来的)。凡是被木鞋敲上的孩子们，就会被认为其人还不够老练。记得有一天在跟“敌人”克依斯作战，我把木鞋往他头上敲，竟然把鞋敲破了，打得他额上起了个大包。额头肿还不打紧，倒是敲坏鞋子事大，把我们吓坏了。两个人忙着修鞋子，早把战事忘得一乾二净。但是让小孩子来修鞋怎么行呢?只好那天晚上让我的铁匠爸爸权充一次补鞋匠。爸每天忙得很，大清早五点就起床打理园子，浇水、除草，种点东西帮补家计，因为家里有六个孩子要吃饭;然后骑自行车去四英里外阿克玛镇的一家铁铺做工。那天晚上他回来后，还得替我补鞋，在鞋面上挖条小槽，把铁线穿在两边，钉紧，完了後，又照样地修鞋跟。要不然，我上学就没鞋穿。“安得烈，你以后一定得小心一点儿!”爸的声音奇大。他耳朵聋，说话像吵架。他的意思我清楚得很，他不是叫你小心身体，乃是说，财物得来不易，应当小心为是。

那时候，特别有一家人一直都是我的假想敌；就是姓卫特斯脱拉的那家人。至于我为什么专要跟他们过不去，连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只记得那个时候是他们最先谈起我们快要跟德国人打仗的消息，村里的人都不怎么愿意提起打仗的事。还有，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口口声声的“神祝福你”、“主若愿意的话”，让我这个天字第一号特派员听起来，总觉得婆婆妈妈怪恶心的。所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把他们看成对头。

记得有一次经过他们家厨房窗口，正好卫太太在做饼干，把和好的面往烤箱里放。她的炉窑是烧柴的。一眼看到门口那边竖着一块新玻璃，是准备装窗用的，于是我的主意来了。心想他们夫妇一向都是笑口常开的，这下可要看看他们是否跟别的荷兰人一样，也是照样会发脾气的。偷偷捧起那块玻璃，不声不响地穿过防线，直趋敌人总部的后翼。他们家跟村里所有人家一样，外面有一座梯子可以上到屋顶。于是我脱了木鞋就往上爬，不声不响地把玻璃板往烟囱口上一盖；然后下来，跑到对街，躲在一辆贩鱼车的后面，等着看好戏。

果然不错，烟囱里的烟上不去，就往回冒，弄得整个厨房乌天黑地的，烟往窗外直冲。但见卫太太冲进厨房，尖叫一声，连忙打开烤箱，用她的围裙在那儿猛扇一阵。这边卫先生往外跑，抬头望望烟囱。如果

我当时存心等着要听那么一口的荷兰连珠炮的话，我一定会大失所望。不过他在上梯子的时候，脸上的那副表情倒是道地道地的凡人一个。于是，我军以寡敌众，打了场大胜仗。

哥哥便雅悯是我另一个好对头。他是个典型做哥哥的——精于以便宜货跟比他小的孩子们换好东西。我们的卧室在阁楼上。但见他的那角小天地里满了一大堆玩意儿，本来都不是他的，有些原来是我的，还有的是别的孩子们的；但是，谁也记不清他究竟是用什么东西来跟我们换的。他的那个宝贝小猪储蓄罐本来是妹妹玛芝的，他弄到手后就把平常赚来的小角不断地往里存。诸如替乡长跑腿啦，替我们的那位校长宓可儿小姐打理花园啦，正好当时报道德国的消息越来越多，我就把便雅悯想象成一个德国造军火的暴发户。趁着有一天他在外头大赚其洋钿的时候，我把他的“银行”从架上搬了下来；缝口朝下，弄把小刀往里拨，十五分钟过后我军大有斩获，收入将近荷币一大元。钱弄到手倒不难，难的是现在该怎么处理这笔横财。荷币一元相当美金两毛五，对我们乡下小地方的孩子们说来，是颇为可观的一笔财产；要是带到糖果店露一下的话，准会招疑！

有了! 怎么不说是我捡来的! 第二天到了学校, 跑去见老师, 把手一伸:“宓老师, 看看我捡到的什么。”宓小姐瞧了一眼, 慢慢地嘘了口气:“老天, 这么多的钱!”

“我拿了可以吗?”“你不知道这是谁丢的吗?”

真是! 即使你架上刑来, 也休想从我这儿逼出半点口供来。

“我不知道, 老师。是我在街上捡到的。”

“安得烈, 这么说来, 你一定得把钱交给警察局。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警察局! 这一招我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下午我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把钱带到执法机关大本营。当时即使那地方是纳粹秘密警察总部的话, 我的心情也不会比那更紧张。心里总觉得那些偷来的钱会向警察老爷丢眼色似的。但是警察局长居然信了

我的话，他把钱放进一个信封，写上我的姓名，说要是一年之内没人认领的话，钱就归我。

一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跑了趟糖果店。但是，扫兴的是，便雅悯根本一直就没有发现他的钱少了。本来是想尝一下骚扰敌后的那种好滋味，想不到如今这些糖果吃起来却硬是一种没出息的小偷味道。

我想我之所以不断地找刺激，日夜地胡思乱想，一半也是为了要躲掉我母亲的收音机节目。妈妈等于是半个废人，因为心脏衰弱，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坐在椅上。收音机就成了她的好朋友。但是她只收一个电台——阿姆斯特丹的福音电台。有时唱诗，有时讲道，在我听来，一样的无聊。让妈听来可就不然，宗教是她的命。即使在韦堤这个穷乡下，我们还是称得上是穷人家；我们的房子是全村最小的，但是却有川流不息的乞丐、游行传道人、吉普赛人上门造访，他们深知必蒙妈妈款待，上餐桌不成问题也，虽然这样一来奶酪要切得更薄，汤要加水，但是客人总归是来者不拒的。

在妈妈的宗教眼光中，“节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好客”。我四岁的时候就能削得一手好马铃薯，绝无连皮带肉的浪费作风。到了七岁的时候，我削马铃薯的功夫已经到家，就把那份差事移交给弟弟哥尼流，自

己则改任擦鞋要职。擦的不是木鞋，乃是皮鞋。皮鞋是专为星期天上教堂穿的。在我们家，要是一双皮鞋穿不上十五年的话，就被认为是家庭经济史上的一次大破产。母亲说，皮鞋务必亮到一种地步，要让牧师看了之后觉得头昏眼花才行。

因为母亲不能操劳，洗衣服的差事就由哥哥便雅悯担任。衣服是摆在桶里面洗的，放进拿出全部用手。不过洗的时候乃是用手来回推拉一根木柄，从而带动一排车叶，以臻搅打之功。这是我们家在技术创作上的一项辉煌成就，合第上下莫不引以为荣。每逢洗衣的时候，大家就帮便雅悯轮流操作，努力推拉，直弄到两边胳膊又酸又痛为止。

全家唯一不做事的人是大哥贝斯，他比便雅悯大两岁，比我大六岁。人家会的事情他都不会，整天就站在堤顶路边的一棵榆树下，看着大家忙。荷兰树木不多，我们韦堤的人颇以当地的榆树为荣。每家门口都有那么一棵，枝丫相连，在路边拱起一座绿棚。不知何故，大哥从来就不往我们自己的那棵树下站，总是在这边数下去第三棵的下面站岗；一呆就是整天，要到我们把他叫回去吃饭的时候才走。

我想当时我最爱的人除妈以外就是大哥了。村里的人经过那棵树下的时候，总喜欢招呼他一声：“啊，贝斯！”他总是笑笑。他笑起来很美，还

有点带羞。日子久了，这句话他听多了，也就慢慢地学会了，这是他唯一会说的一句话。

虽然贝斯不会说话，甚至连穿衣服都不会，但是奇怪得很，他很有音乐天赋。一九三零年代在荷兰多数的人家都有一架小风琴，我们的小客厅里也有一架。爸是家里唯一会看乐谱的人，到了晚上，他就往小长凳上一坐，用脚踩动踏板，照着一本老诗本弹起圣诗来，其余的人就跟着唱。

只有贝斯不同，音乐一来，他就爬到琴底下，蹲在一边，紧贴着琴身。爸弹起琴来错误百出，很不高明；这还不只是因为他耳朵聋，听不见音乐，而且也是因为多年打铁下来使得他的指头变得又粗又硬。有时候他弹错的音符几乎跟他弹对的音符一样的多。贝斯也不在乎这个，他只是紧靠着颤动的琴身，脸上满有喜乐。他在底下当然看不到爸爸在上面的动作，但是忽然间他会站起来，轻轻地靠着父亲的肩膀，嘴里说：“啊，贝斯。啊，贝斯。”爸就会站起来，让贝斯坐下。他就大模大样的，学爸的样子，先翻弄一阵琴谱，而且常常把书给摆倒了，然后又像爸那样瞄着谱，弹奏起来。他从头到尾所弹的都是爸那天晚上弹过的曲子，但可不是爸那种生硬、拖泥带水、满了不协和弦的弹法。他的手法真是棒极了，不但完全正确，而且美到令路人驻足。夏天晚上，我们把门打开，

琴声常常吸引一堆人在外面，很多人被感动得泪下如注，因为每当贝斯弹琴的时候，就会令人觉得好像是有一位天使坐在那儿司琴似的。

我们每周一次的大事，不用说，当然是做礼拜喽。韦堤位于荷兰的低洼地带——荷兰人世代用堤防围出来的海底地。处于这种地区的乡村都是沿堤而建的，韦堤也不例外。全村只有一条街，就是堤顶上那条南北向的路。每幢房子实际上都是个岛，分别建在一块特别高起来的地上；所有的房子与堤道之间都有座小桥相连，桥底下是排水道。村的南北两头各有一块最高最突出的地，其上各有一家教堂。

从西班牙占领时代直到如今，荷兰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一直都是那么格格不入。例如说，平时乡里一个卖鱼的和一個打铁的可以有说有笑，但是，一到了星期天，卖鱼的全家向北开步走、上天主教堂去，打铁的则合府朝南、赴基督教堂之会，双方在路上相遇的时候，竟视若无睹，连头都不点一下的就过去了。

至于我们家，则绝对以世代的基督教信仰为荣。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村子最靠北的那一头，我想我父亲对这点一定感到非常之满意，因为这么一来，我们上教堂的时候就要经过整个村子，可以趁此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走的是正派路线。

因为爸耳朵不灵，我们在教堂总是坐第一排。但是因为椅子不够长，坐不下我们全家，所以每次进去的时候我就故意落在后头，让爸妈和家里其余的孩子们先坐进去，然后我就要跑到后面“找位子”去。不过通常我找到的位子都是非常之“後”，后到出了教堂的大门。要是冬天，我就穿着木鞋在结了冰的渠道上大溜其冰。如果是夏天，我就一个人静坐在田野，动也不动，让野鸦停在我肩膀上，轻啄我的耳朵。

像是有一种本能似的，一到散会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数，時間算得奇準；待溜回教堂、往走道角上一站的时候，硬是及时赶上了头一批受足了罪的家伙们从里面走出来。然后我挨近牧师，站在那里收集情报，听别人跟他谈起刚才的那篇讲章，这么一来我就可以从中探悉他今天用的是什麼经文、信息的中心是什麼、甚至于说过些什麼喻道故事。每周如此，从无缺席。这一着非常要紧，否则的话，我每周一次开小差行乐的计划就有露马脚之虞。

荷兰人习惯于散会之后大家分别在朋友家聚聚。有三样事情是少不了的：喝咖啡，抽雪茄，再就是逐点讨论当天的讲台信息。村里的男士们平常抽不起那种黑颜色的长条雪茄烟，只能每周来那么一次。每逢星期天这个时候，这边太太们在烧着又浓又黑的咖啡，那边先生们就郑重其

事地掏出雪茄，点燃起来。直到现在，每当我闻到咖啡和雪茄味道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跳得特别快，因为这种味道让我联想到我当时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次不晓得能不能再瞒过爸妈，让他们相信我今天上午的确是坐在教堂里听道的。

“好像上个月牧师也是讲路加福音三章 16 节。”明知他没讲过，但是我故意来这么一下，好让人家晓得我知道今天讲的是什么。

再不就是：“说到政客的那段故事真不错。”把听来的一两句搬了出来。“我想乡长听了以后一定会老大的不高兴。”

这种办法非常成功。现在我一想起小时候那种情形，心里就觉得惭愧。而我们家人心地忠厚，从来也没有对我起过疑心，这叫我回想起来更是觉得难过。

卫家确是有先见之明，因为到了一九三九年，举国上下都知道德国人的侵略意向，他们是存心要拿荷兰的了。但是我们家正在忙着，顾不了这些个，因为贝斯病了，医生说是肺结核。爸妈把卧房让出来，俩人跑到客厅打地铺。一连几个月，贝斯躺在那小房间里不停地咳，直咳到周身皮包骨。他比普通的病人苦得多，因为他不会说话，没法把他的感觉说出来。

记得我刚过了十一岁的生日，有一天趁妈在厨房的时候，我偷偷地跑进了那间病房。因为是传染病，孩子们是绝对不许进去的。但是我就是存心要染上病的。心想要是贝斯死了的话，我也要跟着他一道死。我趴在他身上，亲他的嘴，亲了又亲。一九三九年七月，贝斯离世了；而我还是好好的，一点儿病也没有，我觉得好像神连着捉弄了我两次似的。

过了两个月，那年九月，我们的政府开始总动员。这一次妈终于把她的收音权让出来给大家听新闻。我们把声音扭到最大，爸还是听不见。小妹洁芝就坐镇收音机旁边，把重要的消息大声地向他喊：“爸，所有后备部队已经全部征召。”“所有私人车辆一律征用。”

夜幕低垂的时候，来往的车辆就开始多起来，在敌军犯境之前几个月里就一直是这样子。整个荷兰所有的汽车都上了路。你向南我往北，大家都在赶路，忙个不停。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哪里，反正是赶一站算一站。我呢，穿得垮垮的，天天站在以前贝斯站的那棵树下，看他们忙。大家都很少开腔。

好像只有卫先生敢面对现实地说几句我们大家一直闷在心里的话。我不懂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我对卫家开始有了好感。反正是我常常会不期然地走过他们的厨房窗下。

“你好，安得烈。”

“卫太太，你好。”

“出来替妈办事去么？先吃点饼干加点力气吧。”说罢，装出一盘饼干来到窗口。

卫先生坐在厨房桌子那边，抬起头来：“是不是小安得烈？赶先到外面看热闹去么？”

“是的，卫先生。”不知怎的，我把饼干放到背后去了。

“安得烈，你每晚一定得为国家祷告。我们前面的日子将不好过了。”

“是的。”

“用老爷鎗来打飞机坦克，怎么行？”

“是的。”

“安得烈。他们就要来了。戴着钢盔、迈着正步、加上怀着仇恨的心。我们所有的就剩下祷告了。”卫先生走到窗口，探身出来：“安得烈，你肯祷告吗？求神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直至应做的都做了，还能挺住。你肯吗？安得烈。”

“是的，卫先生。”

“好孩子。”他退身回去，“你去吧。”

但是当我转身朝街上走的时候，我听到卫先生在后头叫我：“你把那些饼干吃了吧。啊，我知道，我们的那个老爷窑有时候会冒烟冒得厉害。不过自从我装上新玻璃以后就没事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没法不想到卫先生。这么说来，原来他一直都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可是他没有告诉我父亲。要是别人的

话，怕早就沉不住气了。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我也不懂他为什么叫我祷告。祷告有什么用？神从来也不会听祷告的。果真德国人来的话，我准会让他们吃点苦头，哪能一味祷告的，便宜了他们。于是我呼呼入睡，做起梦来，梦到自己单鎗匹马敢作敢为的，在敌人前大显威风。

到了四月间，村里已经住满了难民，都是从东边那一带低地来的。原因是，政府为了要阻挠德军的进展，就故意把自己的堤防炸毁，让水淹掉过去辛辛苦苦从海里争来的地。除了我们的房子太小以外，每家都收容了一户无家可归的人；妈的汤锅更是昼夜不停地在熬。

但是，德国人不走陆地，他们从天上来。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夜里敌机首次飞越韦堤。那晚我们在客厅里拥成一团，整夜没睡。第二天整天，我们看到的是飞机，听到的是炸弹声，敌人正在轰炸四公里外的一个军事机场。那天是我十二岁生日，但是大家都忘了，连我在内。

后来，德国人轰炸鹿特丹。总动员以后，我们一直就是听的希威散地方电台的广播，当那位播音员在播这段消息的时候，他自己哭了。鹿特丹完了。只有一个小时，整个城被夷平。这就是闪电战，一种新战术。第二天，荷兰投降了。

几天过后，一个矮矮胖胖的德国中尉坐着指挥车来到韦堤，在乡长家里安顿下来。跟着他的那几个兵多半是上了年纪的，因为韦堤不是个什么军事要地，用不上好部队。

有一阵子，我确是将我的反抗思想付诸行动。常常在半夜三更，外面乡里大钟敲两下的时候，光着脚从阁楼上爬下楼梯。我知道母亲听到我在动，因为我经过他们房间的时候，她那均匀的鼾声忽然停了。但是她总是不动声色地让我去。第二天早晨她也没问我那些配给来的珍品白糖怎么忽然间少了。村里的人听到那个德国中尉的车常闹毛病，都觉得好笑。车子发不动啦，引擎突然死火啦；有人说车子油箱里有白糖，有人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食物越来越少，先是城里，再轮到乡下。我就将这种情势加以利用，加强我那孩子气的骚扰战。头一个夏天，有一次我装满了一篮子的包心菜和蕃茄，在一个大热天里跑了四英里路，来到阿克玛镇。那儿有一家铺子还有卖烟花鞭炮这类东西，是以前剩下来的。我知道那个老板很需要蔬菜。就趁势讨个好交易，装满了一篮子鞭炮，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花，这是我事先准备好带来的。老板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然后，像忽然间下了个决心似的，他伸手到柜台下抓上来个特大号响炮。

“我再也没有菜跟你换啦。”“趁还没有戒严，赶紧回家吧。”

那天夜里，我们家阁楼地板又在咕咕地响，妈的鼾声又停了。光着脚，我又往外溜了。街那头远远地有四个巡逻兵正在朝北走，边走边用手电筒一家家地照，看看快近我们的家了。我出了大门，把身子往侧边墙上一贴，听那靴步橐橐的越走越近。等那些兵一去，我就飞快地跑过小桥，上了街，向南往乡长家直奔。其实，我大可以趁那些巡逻兵还在村子另外一头的时候，跑到那个德国中尉的门口把那门响炮点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么做还不够紧张刺激。本来嘛，我在村子里是个首号飞毛腿，心想这下不妨逗逗这批拖着笨靴子的老爷兵，故意让他们来追我，追呀追的，那才够意思呢。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些兵最老的大概也不会超过五十岁，但是当时我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就觉得他们个个都像千年老古董似的。

因此，我就故意等到那四个阿兵哥走回来，快到他们总部的时候，才把引线点着了，然后就开始跑。

“不要动！”一支手电筒照到了我，接着我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鎗！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来的！我在街上迂回飞奔，就在这个时候那门响炮炸

了，轰然一声把追兵的注意力暂时分散了一下。我一看见有道住宅桥就往上冲，进了一个菜园，马上往包心菜堆里钻。他们找了我将近一个钟头，操着德语在那里粗声穷嚷的，结果还是找不到。

自从这次得手之后，我更是得意非凡，甚至在大白天也向他们放炮捣乱。有一天我躲在一个地方，刚一出来就碰上了一个兵。跑嘛，明明是做贼心虚。不跑嘛，一手鞭炮、一手火柴的，证据十足。

“你给我过来！”一口德国语。我把东西紧捏在手里，不敢往大衣口袋里放，他一定会先搜口袋的。“急急忙忙的，是不是赶着耍鞭炮去了？”“鞭炮？啊，没有，没有。”

我用捏紧着的两只手拉开大衣两边，摊得大大的让他搜。他从裤子搜到帽子，搜来搜去毫无所得，只好悻悻然而去。待他走后，我才发现手里的鞭炮已经湿漉漉的让汗给泡透了。

后来时间久了，我对这种玩法也失去了兴趣。况且民间抗战的工作渐渐加强，以致邻村常有人质被德军集体鎗杀以及房子被烧的情形。跟德国人开玩笑可没那么轻松愉快了。

全国到处有所谓的“潜伏者”，就是那些躲起来的大人和少年们，免得被送进德国境内的劳工营做苦工。开始打仗的时候，哥哥便雅悯十六岁；头一个月他躲在艾美罗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后来有五年之久我们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在伪政权下，私藏收音机是犯法的。我们把妈的那架藏在屋顶底下的那一个小角落里。大家可以轮着上去，蹲在那里收听英国来的荷语广播。后来，到了荷兰铁路罢工的时候，我们甚至把铁路工人也往那块小空间里塞。当然，还有的就是那些往海边逃的犹太人，常常在路过的时候在我们家躲上一夜。

后来德国开始闹人力荒，驻韦堤的那支小部队调走了。接着就是到处拉壮丁，令人心惊胆颤。白天夜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批大卡车，先将堤道两头把住，然后派兵逐家逐户地抄抓壮丁。那个时候我还不到十四岁，每次一有风声就与其他大人小孩一齐跑到沼地去。我们快跑穿过田野，跳过水渠，目的地是铁路那边的沼地。铁路堤太高，爬起来准会让他们看到，我们就从铁路桥底下的渠道里泅水过去，浑身湿透，上来直打哆嗦，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后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甚至连小弟哥尼流和父亲都得来参加我们的越野赛跑。

在那种情形之下，生命真是一场求生存的大挣扎。电是留给德国人用的。乡里的抽水机没电发不动，只有让雨水越积越深，低地尽成死水塘。大家点的是油灯，是自己用包心菜籽榨的油。没有煤，只好把那些榆树砍下来当柴烧。贝斯以前站的那一棵在第一个冬天被砍掉了。

但是，最糟糕的还不是冷，也不是兵。最糟糕的是饿，经常的饿、不停的饿。所有的农作物只要一收成就马上被军方征用。爸还是像以往那样，细心照顾他的菜园，但是种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让德国人收去了。几年来，我们家六个人吃的口粮就只够两个人吃。

起初我们园里还有些萝卜可以挖出来凑着吃，但是后来慢慢地也吃光了。我多次看到妈把她自己的那一小份分到别人的盘子里面去，而她自己还装着在吃。她唯一的安慰是，亏得贝斯已经看不到这段日子。否则的话，他会永远想不通为什么肚子要捱饿、壁炉怎么会没有火、还有那没有树的街。

终于，妈病到下不了床。要是再不早点胜利的话，我们知道她会活不了的。

一九四五年春天，德国人走了，由加拿大军队进驻。老百姓站在街上，欢喜得哭了出来，但是当时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跑到五英里路外的加拿大军营，一路跑步去的，向驻军要了一小袋的面包干。

面包! 名副其实的生命之粮!

我把面包干带回家去，一进门就嚷：“吃的来啦! 吃的来啦! 吃的来啦!”

妈边嚼面包干边流眼泪。泪珠沿着她脸上深深的皱纹滚了下来，是感激神的泪。

仗打完了。

第2章

黄草帽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光复后几个月，有一天下午我刚回家，小妹洁芝就对我说爸要见我。

“他在菜园。”她说。

我穿过黝黑的厨房，来到包心菜园。太阳亮得我直眨眼。爸穿着木鞋，弯着腰，正在那儿耐心地细心锄草。我绕到他前面，大声喊：“爸，你找我？”

爸慢慢直起身子：“安得烈，你已经十七岁了。”我一听，马上知道这话是往哪儿说的。

“是的，爸。”“你对你的将来有什么计划没有？”

我真希望他的嗓子可以放小一点儿，也恨不得我回话的声音不需要那么大。“爸爸，我不知道。”

这下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不喜欢打铁。果然不出我所料。还有，德国占领期间我曾经学过一阵子的机器安装。为什么你不继续学下去呢？又猜对了，他真是这么问的，我一路闪烁其词的在那儿穷应付。一问一答，声音之大可以让全村的人都听到。

“安得烈，是时候了，你也该选个行业了。我要你在秋天之前做个决定。”

爸又自顾弯腰锄他的草去了，我知道这番谈话算是到此为止。再有两个月左右，我就得决定我的终身职业了。啊，我知道了，我要换个新环境，我要离开韦堤，摆脱那老旧落伍、定了型的思想，我要到外面打天下去。

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抱太高的希望。我念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德国人就来了。他们占用了学校的房子，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念下去。

我唯一的能耐只是善于跑步。那天下午，我光着脚，沿着田野间的阡陌不住地跑，一跑就是五英里路，蛮不在乎。我穿过以前买鞭炮的那

个小镇，来到通我们家的那条堤底下。我一路往上爬，脑筋非常之清醒，好像是越爬越接近我的决定似的。报纸上一直在登荷兰殖民地到处在闹革命的事。荷兰东印度群岛最近刚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那儿也在嚷着要独立。我们每天都听见说，三百五十年来这些殖民地一直都是荷兰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就不能把这些地方收回给皇室呢？

于是，那天晚上我就向全家宣布说，我已经决定了要做什么。“是什么？安得烈，”玛芝问。

“从军去。”

“嘎，安得烈！”妈倒抽了一口气。军队，她看得够了。“难道我们一天到晚就非要动刀兵不可？”

但是爸和哥哥弟弟们的想法不同。于是，第二个礼拜我就借了爸的自行车跑到阿姆斯特丹的征兵处，想要报名。当天傍晚，我垂头丧气的回来了，原来他们收是收十七岁的，但是一定要在当年满十七岁的才可以；而我是明年五月才满十七岁！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又去了，这次他们收了我。没多久，我就穿上了新军装，大模大样地招摇过市。虽说是裤子小了一点、上衣又太大，一副头重脚轻的样子，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岂不知本人马上就要踏上征途、为女皇效命，不但要收回失地，而且说不定还会干掉几个混账的革命分子——人家都说那些家伙全是共产党和流氓。

只有卫家的反应并不热烈。我穿得上重下轻的，走过他们家。“安得烈。”

“卫先生你早。”

“你爸爸妈妈都好？”

难道他真的没看到我身上穿的制服？我故意动了那么几下，让裤带上那块发亮的铜环迎着太阳闪闪放光。终于我忍不住了：“我从军了，要到东印度群岛去。”

卫先生后靠了一下，好像要把我看得清楚一点。“是的，我知道。你要到外头创业去了。我会替你祷告的，安得烈。为你祈求，愿你的前途能够使你满足。”

我盯住他看，不懂。满足，能够使我满足的前途，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管他的。我放眼环顾那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平野，心想，无论我干什么，都比待在这个死沉沉的乡下小地方来得高明。

于是我离开了家乡，身和心都离开了家乡。入伍训练的时候我非常认真，觉得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随自己的心愿行事。

我好喜欢人家把我当大人看。当时，入伍训练有一部分是在高克安镇。那阵子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不是因为我对聚会有兴趣，而是志在会后的那些“来我们家便饭吧”。做客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告诉主人家说，军方已经决定选派我去印度尼西亚受突击兵种的特种训练。

“再过几个礼拜，”我边说边把座椅朝后微挪，同时吸了一大口“星期天饭后雪茄烟”，极尽做作之能事，“我就要跟敌人打肉搏战了。”

然后，又神气十足煞有介事地问主人家愿不愿意将来跟我通讯。当然，他们总是一口答应了。

后来，到我离开荷兰的时候，我的这种通信地址就足足有七十多个。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也是我在星期天聚完会以后碰到的——那次是在一间改革宗基督教会。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跟我一般上下的年纪，苗条到极的身材，乌黑的头发，黑到乌中带蓝。但是，最令我叹为观止的还是她的皮肤。虽然，我在故事小说里看到过有所谓雪白的皮肤，但是，亲眼目击，这还是头一次。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我在教堂里，便觉精神抖擞，马上去博取人的邀请。果然不错，我算准出来的时间，不迟不早的，刚好碰到白雪公主站在门口。

“我叫蒂丽。”她先自我介绍。

“我叫安得烈。”“家母想请你来我们家便饭，不晓得你肯不肯赏光？”
“当然当然。”

于是乎，在佳人陪同之下，我离开了教堂。

她父亲是卖鱼的。家在高克市镇河边，楼下开鱼铺，楼上住家。吃饭的时候，除了桌子上火腿包心菜的味道而外，还可以闻到码头水边的那股味儿。饭后移座客厅小憩。

“安得烈，来一根雪茄吧？”她父亲说。

“谢谢。”我若有其事地选了一支，然后用指尖轻轻地转它那么几下；这种手法是我从韦堤那些大人那里看来的。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雪茄的味道，只是为了想充大人才抽的。只要能够过大人瘾，我想即使是根粗麻绳我也照样会上口的。我们边喝咖啡边抽烟。蒂丽一直背着窗坐，她的秀发在午后的艳阳里更显得发蓝。她很少说话，但是我已经预感到这位年青的女孩子将来一定是会跟我通信的，而且说不定还会……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号是我离家的日子。我已经跟蒂丽还有高克安镇那些人家辞过行。最后就是向我自己的家人告别了。

妈跟我拥别。要是我当时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话，我的动作就绝不会那么壮士长征兮的豪放利落。我觉得自己看起来蛮帅的：平頭、軍服(总算是弄到了一套合身的)、体格又棒。

快要走的时候，妈从围裙里掏了一本小书；我马上知道那是什么：她的圣经。

“安得烈，你把这个带去好不好？”我说：“是的。”——当然喽。“你常拿来看好吗？安得烈。”

你能对自己的母亲说不吗？你背地里不一定要照办，但是口头上可不能不答应。我把圣经往帆布袋里一放，让它掉到底底的，就此一股脑把它忘了。

我们坐的是运输舰“锡巴渣”号，于一九四六年圣诞前夕安抵印度尼西亚。闻到那浓厚的热带气息，搬夫们打着赤膊正在上上下下地忙个不停，码头上的小贩在兜生意、叫叫嚷嚷，我心里好不兴奋，于是扛起帆布袋挤下船去了。烈日当空，晒得码头热烘烘的。周围挤满了人，当时我真没想到再过几个礼拜我竟然会向这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鎗。

有几个小贩是卖猴子的，猴子都用小链条拴住，有的还会耍几招把戏。一张张小脸，带着木然的神情。我觉这些小东西们好好玩，就蹲下去把其中一只端详了一番。

“别碰牠。”我直起身来，看到有一位官长站在前面。

“同志，牠们会咬人的，”他笑着，但是说得很认真，“这些东西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狂犬症的。”

官长走了。我也就罢手而去。那个卖猴子的小男孩气那位官长把他的生意说掉了，就跟在他后面大骂。我回到码头上自己的部队，心里打定主意，将来一定要养只猴子。

我们中间被选上当突击兵的都给送到附近的一个岛上受训。其中有障碍训练，虽然苦，但是很合我的胃口，诸如攀墙越壁、飞藤过河、遁圆渠、火网下匍匐前进等等。我更喜欢肉搏战训练——刺刀、匕首、徒手搏。劈刺、闪身，嗨嗨有声，运足手劲，白刃戮敌。当时我压根儿就没想到我是在学杀人。

此外，他们还要训练你的自信心，这对我说来简直是多余。因为我从小就自信得一塌糊涂，自以为凡事都能。

就拿驾驶轻机鎗战车来说吧。这是一种有轮带的重型车辆，开起来颇不简单，即使让一个会开汽车的人来试，也会感到棘手，何况我连普通汽车都不会开。但是因为每天外出操练的时候都是坐这种车，我天天看司机在那儿搞，看多了，也就自以为会开了。

想不到有一天刚从连部出来就碰上一位官长问我：“同志，你会不会开机鎗车？”

我一面敬礼，一面脱口而出：“是的，我会。”“好，请你把那一辆开到车库去。”

那部车子就停在我们前面路边。再过三百码就是车库。我跳上驾驶座，动作轻松利落。那个官长跟着爬上来，坐在旁边。我望了下仪表盘，看到前面插了根钥匙。记得那个司机在每次发动之前总是要把那根钥匙用力扭它那么一下。于是乎来个如法炮制，果然不错，引擎哼了一声，让我打着了。再就是，底下的那些个踏板，到底哪一个是离合器？瞎踩一个吧。一脚踩到底，哈，运气真不错，又对了。连忙上档，把脚一松，直蹬得车子跳到半天高。那位官长看了我一眼，但是没吭气：本来嘛，这种车子发动起来总归是比较猛的。等到我开足马力在军区路上风驰电掣的时候，他这才开始手脚并用，在那儿又扶又撑的忙得不得了。

三百码下来，倒也没什么，只不过是让路上的一位班长发挥了他的高速逃亡潜力而已。

终点在望，我忽然发现事情不妙——我不知道刹车在哪里！手忙脚乱中，把所有可按可拉可踩的玩意儿统统试过，包括油门在内，心里发急，一眼看见前面路边停了一连串七部这型的车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上靠，砰砰嘭嘭，一部撞一部的，硬是把我们的车子挡住了，引擎唏嘘冒气一阵，终于死了火。

我看看他，只见他呆呆的，两眼发直，双颊汗下如雨。他下了车，在胸口划了下十字，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先前那个班长赶过来，把我从车里拉了出来。

“你究竟是怎么搞的？”

“报告班长，他只问我会不会开这种车子，可没问我会不会刹车！”

幸亏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执行首次作战任务。据说是因为有一连突击队伤亡惨重，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兵力，所以派我们去增援。

我们一大早飞到前线。我马上发现我以前的想法错了。我当初从军本来是为了要找刺激，我一向是喜欢冒险的。但是，结果我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冒险，而是纯粹的杀人。以前受训的时候打的是纸靶，而今打的是人家的父兄骨肉，甚至常常向平民开火。

我这究竟是在做什么？我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啦？我恨透了我自己，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这么的恨我自己。

后来有一天出了一件事情，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话说，我们平常最怕的是那种杀伤地雷，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生怕惹上这玩意儿，以致招来终生残废。那次我们一连打了三个多礼拜的仗，弄得大家神经紧张兮兮的。刚好碰到要穿过一个村庄，因为见到里面还住有一部分人，就大大放心，满以为共产党不会在有人住的地方埋地雷。谁知刚走了一半，就踩上了雷网，登时大家光起火来，也不管有没有命令，不问情由拿起鎗来就打，见什么打什么，等到定下来后，才发现整个村子已成死邑。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清巡雷区和废墟的时候，我在村子外面看到一个年青的印度尼西亚女人倒在血泊里，还有一个男婴在她怀里，是同一颗子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我看了后，心里几乎发疯。

就那以后，我一直在想毁灭我自己。过后两年中，我在战场上行动疯狂勇猛，在驻印度尼西亚的荷军里出了名。我买了一顶颜色鲜明的黄草帽，戴了它上阵。这种大胆作风等于是向敌人打招呼说：“本人在此。你打吧！”日子久了，我居然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跟班。我们合创了一句座右铭，把它贴在营房的布告板上：“要帅，不要脑袋。”

那两年里，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别的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多是走极端的。打仗的时候，我们个个猛干，像是发疯似的。喝酒的时候，总是喝到神智不清。大伙儿从一家酒吧喝到另一家，沿途顺手把空酒瓶往商店的橱窗里摔。

每当我从疯癫里醒来的时候，心里总是奇怪为什么我会那样做。可是，就一直找不到答案。有一次我忽然想到，也许那军中牧师能够帮我一点忙吧。人家告诉我说，他正在官长专用酒吧里。我去了，发现他在那儿，跟大伙一样，喝得迷迷糊糊的，他出来见我，听我说明来意后，竟然笑了起来，说我这过一阵子就会好的，又说：“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下次上阵之前不妨来参加几次聚会，好让你在杀人的时候能够保持一股心平气和的感觉。”他自以为这个笑话很绝，忙着跑回去说给别人听。

在无可奈何中，我想起我的笔友来。我跟以前那些约好通讯的朋友们还经常保持联络，如今正可以找几个来诉诉苦。可是，他们回信上说的，大致上都是千篇一律的：“安得烈，你是替你自己的国家打仗，至于别的都是小事，根本算不得什么，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其中只有一位有她独到的见解。那就是蒂丽。她信里提到罪的问题。这可说中了我的内疚！她接着谈到饶恕的道理，关于这一点，我倒让她给搞胡涂了。因为我觉得我那种亏心的感觉已经把我团团链住，任凭我怎么弄都弄不掉它；喝酒也好，打仗也好，统统无济于事；写信、读信，也都帮不了忙。

后来有一天我休假外出，跑到雅加达。经过市场的时候，看到一根高柱子上拴着一只小长臂猿，坐在那儿吃水果。正当我打底下经过的时候，牠跳到我的肩膀上，递给我一瓣橘子。我笑了，就这么一下，那个做买卖的印度尼西亚人早已眼明脚快地跑了过来。

“先生，那猴子好喜欢你哟！”我又笑了。那小猿猴故意向我眨了两下眼，然后又朝我露齿，大概是笑吧。“多少钱？”

就这么成了。我把猴子带回去，逗得大伙儿好开心。

“牠会不会咬人?”

“只咬骗子小偷之类的坏蛋。”我说这句话本是无心，但是话刚说完，那只猴子就从我怀里跳开，先在房顶横梁间荡来荡去，然后落下来。亏牠什么地方不好落，偏偏要落在一个大个子的头上，而此君每逢赌扑克牌的时候总是赢的多输的少，有点离奇。但见他东倒西歪，舞手挥臂的，想把猴子赶走，引得全体哄堂大笑。

“快把牠弄下来，快点!”史华真大叫。

我一伸手，猴子就跑过来了。

老史一面弄头发一面塞他的衬衫。“总有一天我会杀了牠的。”他眼露凶光，说得阴狠狠的。

于是，在同一天里，我找到了一个伙伴，也失去了一位朋友。

猴子买来还不到几个礼拜，我就发现牠的肚子好像很不舒服。有一天我抱着牠的时候，觉得牠腰上似乎有一条什么东西在那儿，就把牠放在床上，叫牠安静地躺着。我小心地把牠身上的毛拨开，一看原来是一根铁丝。一定是牠还小的时候有人给牠扎上一条铁丝，后来没拿掉，到牠长大的时候就陷到肉里去了，这些日子里牠一定痛得厉害。

那天晚上我连忙给牠动手术。用我的剃刀把铁丝周围的毛剃掉三吋宽，露出来的肌肉又红又肿。在兵营中战友注视下，我很小心地用力切进去，露出铁丝。牠躺在那儿，非常忍耐。甚至当我割痛了牠的时候，牠还是安静地望着我，好像在说：“没关系，我知道。”终于我把铁丝拉掉了。牠马上跳了起来，先打了几个纺车轮儿，再跑到我肩膀上跳来跳去，弄我的头发。大家在旁边看着都很高兴，惟有老史例外。

从此以后，我跟牠更加是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牠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牠。虽然牠已经脱离了那根铁丝的捆绑，可是，我呢？罪在我身上的捆绑还是那么的紧。真巴不得我也能够得到解脱。每当我白天没有任务的时候，我就带着牠逛森林去。牠跟在我后面跑，跑累了就往我身上跳，抓住我的短裤不放，要弄到我把牠抱起来放肩膀上才罢休。我们常常一跑就是十英里十五英里的，跑到后来就往地上一躺，呼呼大睡。几乎每次在我们头顶的树里都会有一些猴子，我的那只就会跑上去跟牠们

聊聊天、玩玩。最初那一次，我还以为牠就这么跑掉不回来了。但是，我刚站起来要往回走的时候，就听到头顶树枝间吱的一声，树叶一阵窸窣，然后噗的一下，牠又回到了我的肩膀上。

有一天，我扛着牠又笑又倦的回到营房，看到哥哥便雅悯的一封信。信里一直在那儿说到一个丧礼的情形。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原来那是母亲的丧礼。一定是他先给了我一封电报，但是遗失了。

我想大哭一场。先给了点水让猴子喝；趁牠在喝的时候，我一个人溜了出去。此刻我连猴子都不要了。我拼命地跑，直跑到胸部作痛。突然间我体会到她已经不在了，从此以后我会感到好孤单的。就在那个星期，有一天傍晚，我刚当值完毕回来，人家对我说：“安得烈，那只猴子死了。”“死了？怎么会？”“有人抓住牠的尾巴猛把牠往墙上摔。”“是不是老史？”对方不答腔。“现在猴子在哪儿？”“在外面树林中。”

我找到了牠——挂在树枝上。最要命的是，牠还没有断气。我把牠抱回来。下颚骨已经断了。想给牠水喝，可是喉咙上裂了个大洞，水一灌进去，马上又流出来。老史在旁边看着，准备好，心想这下我一定会跟他大打出手。可是我没有，这些日子受到一连串的攻击，我已经麻木了。

一连十天，我日夜照顾牠。把牠喉头的那道裂口缝上，给牠糖水喝，替牠按摩，不让牠受凉，时时对牠讲话表示关切。上次我既曾释放了牠的捆绑，这次更要尽可能地把牠救活。

慢慢，慢慢地，牠开始能吃东西了，接着会在床上爬几下。终于牠能够坐起来了。要是过了时间我还没有给牠吃的话，牠还会向我吱吱叫的。两个月过后，我们在森林里又跑起来了。

可是，从此以后牠一见到人就怕。视营地如虎口。旁边有人的时候，牠就全身缠在我的胳膊上，把头埋在我的胸前，否则的话，就会吓得浑身哆嗦。

后来我们的部队奉令开拔，要参加一个新攻势。我问大家有谁会开车的，能不能借一部吉普车送我和我的猴子到深山里去一趟。“我决定把牠放走，然后我们马上开车回来。有没有人愿意送我去的？”“我送你去。”

我一看，原来是老史。我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觉得他的态度倒是很认真的。

“好吧。”我说。

一路上我向猴子解释为什么我没法再留牠。终于我们停下了。我把牠放到地上。牠的一双小眼睛直瞪住我，好像是懂得我的意思，也没有想要跳回来。牠坐在那儿，一直看我们开走，消失在远方。

第二天清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号，我们出发了。

还好我把牠放走，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永远离开了我的部队。

在这次任务里，我还是照样的勇不可挡。和以往一样，戴上黄草帽，打起来大嚷大骂的，我这样随军推进，日复一日的，存心藉战驱愁，却落得個愁更愁。

终于，有一天早晨，一颗子弹穿过了我的脚踝，把我打下了战场。那次我们中了埋伏，三面受敌，他们的兵力多过我们好几倍。起先我不觉得痛，突如其来的，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是，我正在冲的时候，忽然栽了下去，明知没有绊到什么，却硬是爬不起来。至于为

什么我只是脚踝给打中，而戴了黄草帽的头倒没事，我不得而知。总之，等我定下来后，才发现右脚军鞋上多了两个洞，鲜血朝外直冒。

“我受伤了。”我告诉他们，说得很镇静。平铺直叙，仅此而已。

一位战友把我往战壕里推，我就躲在那儿。终于担架队来了，冒着战火顺着壕沟把我抬走。我还戴着那顶黄草帽子，硬是不肯脱下来。虽是目标显著，甚至有一次一颗子弹穿过了帽顶，我还是不管。

几个钟头过后，我躺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帽子还在头上。听到几个医生在那儿商量是否须把脚锯掉。结果是，动了两个半钟头的手术，才把脚缝好。本来护士要我把帽子拿掉，可是我不答应。医生对护士说：“你不知道呀？这是他们的招牌。他们的口号是：‘要帅——不要脑袋。’”

可是我发现我这种做法并不高明。原先只是拼命地想毁掉自己，没想到结果是脑袋依然健在，只是伤了只脚，落得个不三不四的。我素来目空一切、自视不凡；如今若是让我跛着脚活下去，这样的命运岂不是惨透了！我失败了。更要命的是，才二十岁，我就已经感觉到这世界上实在没有什么是真可以值得一试的。

第 3 章

椰壳里的小石子

躺在医院病床上，右腿上了石膏，动弹不得。

起先还有些自己部队里的人看我。可是，日子久了，那些人自己也伤的伤、死的死；人事多变，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医生告诉我，将来走路非得用拐杖不可。唉，像这种事还是不去想的好。慢慢地，老朋友们都不来了。不过，在这之前他们倒替我办了两件事，以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头一件事是，有人替我寄了封信。那信本来是根本不预备寄的。是写给蒂丽的。我那时候有个怪习惯，就是，常常在深夜里从城里胡搞完回来，或是刚打完了一场仗，良心上觉得特别难过的时候，就提起笔来给蒂丽写信。把我所做的那些难以告人的坏事统统写下，然后把信烧掉。

就在最后那一役之前，我给她写了这么一封信，没写完，就搁在行军袋里。到我受伤以后，一位好心的伙伴把我那袋子里的东西检点了一

下，准备交待。他向来办事周到，竟然在我那本通讯簿上找到了她的地址，把那封信寄了。当然喽，在他看来，这下算是做了件好事，周到极了。

“乖乖！”他到医院来看我的时候。跟我开玩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通讯地址！怎么啦，是不是跟荷兰所有的玉女之家都打上了交道？花了我半个钟头才找到那位小姐的地址。好小子，我看你还是小心为妙，免得惹出一场脂粉战。”

我一听之下，急得脸色大变。他还以为我身体不舒服，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哎呀，安得烈，我不知道你还痛得这么厉害，还在这儿跟你乱开玩笑。我走了，等你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看你。”

此后一连好几天，我就尽在那儿挖空心思地追忆那封信的内容。就记忆所及，大致是这样的：

“最亲爱的蒂丽：

今天晚上我觉得好孤单。真巴不得你能够在身边，让我深深地看进你的眼睛，向你倾诉。我好想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至少，不会把我看得很坏。

你以前有一次来信劝我祷告。可是，我不但没有祷告，反而咒诅。我用的那些字眼甚至在荷兰的时候连听都没听过。我还会说些低级笑话；越说我笑得越厉害。我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我。从前打起仗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我们不只是杀对方的那些军人，就连一般老百姓遇到我们也会遭殃。我对神没有兴趣。也不想祷告。教堂没去，酒吧倒是常跑，而且总要喝到醉为止……”

后头还有，还有更不象话的，躺在病房里好难过，就是那么想啊想的，苦思那次在醉中写了些什么话，她是最知心的人，我已经不能没有她。

在床上辗转，不敢想象她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会有什么感想。

偶然间一挥手，碰到了一本书。这就是那些朋友们替我做的第二件事。他们在我的帆布袋找到了我母亲的那本圣经。史华真把它带来给

我。临走前放在床边桌上，有点不好意思地。“这本书是你的，不知道你要不要，顺便带了来。”

我谢了他，可是一直就没去碰那本书。要不是因为后来那些修女的话，我恐怕根本就不会去碰它。我住的那家医院是由几位修女主持的。她们个个都很好。从早到晚就在病房里忙，清洁、敷伤、替病人写信、说说笑笑、唱唱歌。就从来没听到她们嘀咕过半句。

有一天我问一位来替我擦身的修女，为什么她们一直都是那么开心。“怎么啦，安得烈，像你这么一位荷兰好青年，总不该会不知道的。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基督的爱。”她说的时候眼睛发亮。我认定这的确是她全部的答案。即使她谈上整个下午，也还是出不了这句话。“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她边说边拍着我床边桌上的那本旧圣经，“答案在这儿了嘛。”

所以，后来当我的手无意间碰到了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就顺手拿来看看。母亲给了我这本圣经。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我始终就没有翻过一次。可是现在我想到那些修女，她们的喜乐，她们的安静，还有那句话：“答案就在这儿了嘛。”于是把圣经放在胸口，随便从后头倒翻上去，直翻到创世记第一章第 1 节。

我读到神怎么创造了天地，然后罪怎么入了世界。想当年做小学生的时候，老师每天下午要读一章圣经给我们听；我总是心不在焉，等不及要跑到外面小河里玩去。可是现在读起来就有点不同了。我继续看下去，专挑那些故事来看。过了好些日子以后，我终于开始看新约了。脚上打着石膏，躺在床上，一路把福音书从头看到尾。脑子里总算是有点轮廓。问题是，这里面说的到底是不是都是真的？

正在读约翰福音，读到一半的时候，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看起来好熟。是她，蒂丽！心里好紧张，一面把信拆开。

“最亲爱的安得烈！”最亲爱的——我没看错吧！我自己每次给她写那些假想的时候，也都是这么叫她的。“最亲爱的安得烈：我收到一个男孩子给我的信。他自己觉得他的心变硬了。其实，他已经稍微向我吐露了些破碎的心事，我知道，他的心不是硬而是碎了。他肯这样地向我表白，我反而替他高兴。”接着的是一段读经纲要。她告诉我，只有藉着圣经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惟有神的爱能够软化人心。

接着好几个礼拜，我们一起读经，异地同心的，实在甘甜。我有许多的疑问，写了一页又一页。她就尽她所知的回答我。要不然，就跑去问她的牧师，或是在参考书里去找答案。

可是，过了几个月，石膏拆掉了以后，看到那条腿干瘪瘪的，好难看，心想以后再也不能那样随心所欲地蹦呀跳的，不由得我怨恨填胸。什么灵里面的喜乐，那更不用谈了，那只是蒂丽说的，还有那些修女们。

后来一到我能够走动的时候，就在每天晚饭后，忍着痛，一拐一拐的，找个最近的酒吧，喝他个烂醉。那些修女们也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向我当面提起这件事。一直到我启航回国的前一天，那位跟我很熟的修女，蓓楚莉丝，跑到我床边，拉了一张椅子坐下。

“安得烈，想跟你聊聊天。对了，你晓不晓得这里的本地人是怎么抓野猴子的？”

一听说猴子，我的兴趣倒来了。“不晓得呀，你说说看吧。”

“你知道，猴子如果想要一件什么东西，就一把抓住，死也不肯放手。这里的人就看准了这一点，弄个椰子，在上头打个洞，仅仅够猴子伸手进去。把里面挖空，剩下一个壳，然后丢块石子进去。把椰壳放在深山地上，人就带着网躲在附近等着。

迟早总会有那么只好奇的猴子跑来，拿起椰壳，先把玩摇晃一番，再就着洞眼朝里面张望，终于伸手进去，摸索一阵，抓到了那块石子。可是到牠想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拳头太大出不来。而牠始终以为那块东西是什么宝贝，死也不肯松手。你说，要抓这种猴子，还不容易？”

说罢，她站起来，把椅子放回桌边。略为顿了一下，盯住我说：“安得烈，你是否也紧抓住了一样什么东西，害得你身心不得自由？”

说完，她就走开了。我明白她的意思。可是，我知道她这一套说教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明天是个大日子。一来，是我的二十晋一大寿，二来，刚好也是我们那条救伤船启程回国的日子。我已经计划好，要好好地庆祝它一下。我把三年前同一个连部来印度尼西亚的那些老朋友们，只要还活着、能走动的，都请了来。我们一伙八个难兄难弟聚在一起，大闹大叫，个个喝得烂醉，尽情地庆祝一番。

第4章

暴风雪之夜

“安得烈!”妹妹洁芝穿过小桥飞跑过来，抱得我紧紧的。一面回头大喊：“玛芝! 快去找爸爸! 告诉他安哥回来了!”才一会儿，门口的那块小花园就挤满了人。玛芝先跑过来亲我，然后赶紧跑回去叫父亲。便雅悯哥也在，还有他的未婚妻。他们说，为了要让我能够参加他们的婚礼，所以一直在等着我回来以后才结婚。还有，洁芝的新婚丈夫阿里也在。小弟哥尼流跟我握手，像是有心事似的;看他一直在注意我的那根手杖，我知道他一定是在担心我的伤势究竟如何。正当一阵拥抱亲热的时候，那边爸蹒跚地走了出来，他自己的腿也有点瘸。他的眼眶湿了。“安得烈! 孩子，你回来了! 真好!”爸的嗓子还是那么大。

初叙过后，玛芝对我说：“安得烈，什么时候如果你想去探一下妈的墓的话，我可以带你去。”

我说，我这就想去。墓地离家只有五百码远，可是我还是要借用爸的自行车，吊着半边腿，半骑半推着走。

“伤得很厉害吗?”玛芝说。“医生认为我将来走路很难恢复正常。”

坟头的新土还不怎么结实。泥里还有一只红颜色的花瓶，插着鲜花。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跟大家说我想出去散散步，虽然外面的天已经黑了。没人说要跟我一道去，大家心里明白我这是要干嘛的。我又上了自行车，出去了。月色通明，我很容易就在公墓里找到了妈的那块地。我坐在地上，向她倾吐了最后的几句话。

“妈，我回来了。”像面对面似的，我说得很自然。“妈，你的那本圣经，我起先没去念它，但是我终于还是看了。”停了很久。“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条腿走不上一百码就会痛得不能动。至于打铁，我是不行的，这你也知道。医院里有个习艺所，可是我从那里能够学到些什么呢？妈，我觉得我是废人。过去几年在外头所做的，更让我的良心受责备。妈，你说话吧。”

没有声音。惟有冷月漫过我身，照遍整个墓园，全是死的，还有一个半死不活的。

半个钟头过后，我终于从回忆里走了出来，骑上铁马回家去。洁芝在厨房桌子上做衣服。“安得烈，我们谈到你睡的地方。”她说着，没抬头。“你想你能不能上下那座梯子？”

我看了看房顶上的那个梯位，就开始试着步步地往上爬，先上好腿，再收坏腿。一路痛得我额头直冒汗；我把脸背着家人，不让他们看到。终于到了上头，又看到了以前睡惯了的那张床，铺得干干净净的。我躺下，两眼直瞪着屋顶斜飞的天花板，很久很久。想到自己当初一片雄心，如今竟落到这下场，我几乎泪下。我说几乎，但是对一个二十一岁的男人来说，这已经是够伤心的了。终于，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支着手杖，到村里到处看看。大家对我，都很和气，但似乎又有点窘。他们看到我身上的军服，又看到我的脚，显得很不自在，说：“你受伤了。是不是在东印度群岛，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不用说，举国上下都不大愿意提到对印度尼西亚的那场仗。我想，人吃了败仗，总是不喜欢多说的。事实还在那里，印度尼西亚马上就要独立了。所以倒不如趁势说，我们本来就是准备要让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好让自己下得了台。而这些撤回来的军人又弄得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我径自跑去见卫家。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懂。他们在家，请我进去坐坐。卫先生问了我一些问题，苏加诺啦、共产党啦，终于他问了个关于我个人的问题：“安得烈，以前你说要到外头看看，不知道你可找到了你所要的没有？”

“没有。”我低头，直望地板。

“唔，那末我们还得继续祷告下去。”

“为我？为我的前途？”我顿觉一阵无名火起，气得脖子通红。“嘿，我现在老到得多了，只要机会一上门，还怕我不会马上拐出去显一番身手？”话刚出口，又觉得自己太冒失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人家说话？

告辞的时候，我深感冒犯了一位朋友，心里很难过。

还有一个人我很想见的，就是克依斯。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埋头苦读。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局促。后来我看见他桌子上堆满了书，就顺手拿起一本来，发现那竟然是部神学方面的书。

“这是怎么的啦?”我问他。克依斯把书接过去，说：“我已经决定了将来要做什么。”

“那太好了。你要干哪一行?”我虽然心里已经有数，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我已经决定去做传道人的工作。范得福牧师正在帮我准备。”

我听了浑身不自在，尽快找个理由向他告辞。

多恩的那家军医院规模很大，治疗、病房、宿舍、习艺所，应有尽有。还有一样最出色的，要算是它里头的那种单调乏味、无聊透顶的生活。健身操、习艺所，没有一样是我喜欢的。我最讨厌那种所谓的职业治疗。就说用泥巴做花瓶吧。把一团又软又黏的泥巴放在一个轮盘的正中央，然后一边转一边用手捏出个形儿来。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老是找不准中心，怎么也摸不着窍门。气得我好几次把泥巴往墙上摔。

第一次週末外出，就去高克安镇找蒂丽。在车上的时候，我一直在希望她不会还像以前那么漂亮。终于，我一拐一拐的进了她父亲的铺

子，见到了她。她的眸子显得比以前更黑，她的皮肤依然是举世无双。我们握了手。她的父亲也在那里，可是我们的握手还是超了时。

“安得烈，欢迎你回来。”她父亲从柜台后面绕了出来，一面把手上的鱼鳞往围裙上擦。他跟我热烈地握了手。“印度尼西亚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谈了一阵，然后我尽快作了个结束，带着蒂丽往外跑。我们坐在码头边的一个大铁墩上谈了一个下午。我告诉她我回来以后的情形，谈到洁芝的丈夫，便雅悯的婚期；还有习艺所的情形，讨厌的泥巴；我告诉她，关于信教的事我已经到了完全罢手的地步，虽然明知这样说是会叫她失望的。

她定睛远眺海港的那方。“可是，”她说，轻轻地，“神是不会罢手的。”突然间，她笑了：“安得烈，我觉得你就像你说的那团泥一样。神在你身上有祂的计划，祂想把你放在转盘的中心，可是你就一直地在往外溜。”

她转过来，看着我，好黑好亮的眼睛。“谁知道，也许祂有意思要把你做成一样好东西。”

我正在把香烟头往铁墩上一阵猛捺，低下头来，装做心不在焉的样子。“什么好东西?”我问。

她瞟了下满地的烟头，全是我扔的。“也许是烟灰缸吧，”她说，有点冷冷的。“安得烈，你一天要抽多少烟?”

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已经到了一天三包的地步。

“看你一直在咳的，这样再抽下去会把身体搞坏的。”“你倒很会替我着想嘛。”我并没有存心要这么说的。

为什么我老是会把话说岔了?其实是因为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好孤单，没人能了解我，连她都不能体会我的心情。当腿痛得厉害的时候，你死命咬紧嘴唇，惟恐忍不住当众喊了出来。她可知道这种味道?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女人站起来让位给你，你的感觉如何?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天我说的尽是违心之言，而真心话偏又没说。

从此有两个月没人跟我谈起宗教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个上午，外面风很大。早操过后，大家坐在床上，有看信的，有写信的。忽然护士进来，说有客人来。我听了，也没放在心上，照样低着头做我的事。可是，过了一会儿，房里十几二十来个小伙子们忽然轻轻地响起了一阵口哨。我抬起头来，但见门口站着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她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高兴的样子。

“还不错嘛，”邻床的皮尔轻轻地评了一句。“我不想耽搁大家的时间，”她说，“特意来请各位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福音聚会。会后我们还准备点宵夜招待各位……”

“什么宵夜？”有人在喊。

“……我们有专车接送，七点钟离开此地。我希望各位都能来。”说完就走了。这边小伙子们一阵狂热鼓掌，一面穷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到了晚上七点钟，大家早已排队等在大厅。个个穿得毕挺，头发梳得光亮的。皮尔跟我排在顶前面。我们两个人非常开心。一来，今天晚上可以暂时离开医院，到外头舒畅舒畅。二来，我们带有自备宵夜，是皮尔早先溜到镇里带回来的。大家上了车。还在路上的时候，我跟他就已经把那瓶宵夜给报销了一半。聚会在户外的一个大帐幕里举行。我们坐在最后头，继续努力，把剩下的半瓶也解决了。于是乎，怪态开始出现。我们自己这一班人看在眼里觉得很滑稽。可是，主办奋兴布道会的那些人也看到了，他们的反应可不同。

终于，有一位仁兄上了讲台。此君长相甚为滑稽，脸部缺乏肌肉，配上一双深坑眼；这种人我一看了就觉得不顺眼。但见他做起报告来，说是听众里有两个人正受困于恶势力，不能自拔云云。然后，闭起眼睛来，开始长祷，言词迫切，充满情感，为我们不灭的灵魂祷告。我们拼命忍住笑，直忍得喉咙活受罪。可是，后来当他说到：“我们那两位深受邪灵影响的朋友”那一句的时候，其声调既虔且诚，如吟如诵，我们实在忍不住了。两个人放开喉咙，大喊大笑，闹个痛快。那个人看看实在没法再祷告下去了，就吩咐诗班长唱诗。他们选了一首诗歌，叫做《容我的百姓去》（译者注：见《出埃及记》耶和華藉摩西吩咐法老的话）。没多久，全体听众都跟着唱了起来：“容我的百姓去……”一而再，再而三，这句话充满了整个会场。

散会后，我随着原班人马列队上车，回医院去。可是，那阵歌声却依然在我脑子里萦回。“容他们去……容我去……”

那么简短的一首歌，我唱都没唱过，只是多听了几遍而已，竟会成了我的祷告？神竟然会垂听？这说起来未免太过了一点吧？

可是，奇怪得很，就在第二天上手工艺课的时候，我觉得跟往常有点不同。虽说当时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而且平时最怕这门课，可是这次玩起来却真个丝毫不差，有板有眼的。只见我坐定后，把一团灰黏土往轮盘上一丢，顺手把它推向中心，一面用脚徐踩踏板，一面手指捏捏，说也奇怪，居然让我捏出个花瓶来。

有点不相信。再来一团试试看。又是得心应手，做来毫不费功夫。后来还有更奇的。那天下午休息时间，我在那儿闲翻杂志，突然间，我会伸手到床边茶几上拿我的那本圣经。我回国后，就一直没去念它。只是摆在那儿，当作对母亲的一种纪念而已。可是，那天下午我忽然间会去翻它，而且更妙的是，我竟然看得懂。以往不明白的地方，如今豁然

贯通，一丝一缕配搭得天衣无缝。我这样一路看下去，差一点把下午茶给忘了，还得让人家叫了我两次。

我继续猛啃圣经。过了一个星期，院方通知我以后凡是遇到长周末可以回家住宿。在家的时候，我照样猛读，躺在阁楼床上，看个不停。妹妹洁芝每次把热汤端上来，让我喝，顺便看看我可好，然后悄悄地下楼去。

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再来，就是上教会了。最近几年来，我这个人是从不上教堂的。现在居然破了例，不但去，而且去得很勤。星期天上午不用说，连星期天晚上还有星期三晚上的聚会都参加了。无怪乎会引起全村人的注目。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正式退伍。领了一笔退役金。先买了一部崭新的流线型自行车。虽然我还是每走一步腿就痛，但是骑上了自行车就好多了。我光用好的那条腿踩，另一条腿只是顺势跟着动。有了车以后，我甚至连附近乡镇教堂的聚会都跑去参加。星期一参加阿克玛镇救世军的聚会。星期二则铁马长征阿姆斯特丹，参加那边一家浸信会的聚会。

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反正是天天晚上都有聚会。每次听的时候，总是把台上讲的小心笔记下来，第二天早上就打开圣经对照一番。

“安得烈!”玛芝给我端来一杯茶，小心翼翼地上了扶梯。“跟你说一句老实话好不好?”

“当然可以，玛芝。”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大家看你一个人尽躲在这里读圣经，加上天天晚上跑教会，难免替你担心，总觉得这有点不正常。你到底这是怎么的啦?安得烈。”

我笑了，说：“连我自己也搞不清!”

“安得烈，我们实在为你担心，爸也是。他说——”她停了一下，好像在考虑该怎么说好。“他说这是战后神经失常症。”这话说完，人也就赶紧下去了。

我把她的话想了一下。难道我真会变成个宗教狂人?听说有种人神经兮兮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见到人就把经句搬出来。我是不是也会变成那副样子?

不管怎么样，我里头的那股怪劲可真够强。我还是照样地骑着车上教堂，从这家跑到那家;照样地查经、听道、领受。这中间皮尔来过一封信，约我跟他聚一次，效当年雄风，痛饮一番。我没给他回信。其实，信是写了，可是忘了寄。过了几个礼拜才发现，原来让我给夹在那本《戴德生传》的后面了。

从这开始，我常跑去找克依斯，还有宓可儿小姐，就是我以前的那位小学老师，还有卫家夫妇，至于蒂丽那里，当然更不在话下。每个礼拜都要骑车上高克安镇找她去，把听过的道、读过的经说给她听，大家互相研讨。天气很冷，码头上已经待不住了;我们就索性留在鱼铺里，管他客人来来去去的，我们照样聊我们的。

她看到我这种情形，起先非常高兴;可是后来日子久了，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过去了，我还是照样地跑教会，一家轮一家的，起劲得很，她这倒有点担心起来了。“安得烈，慢慢地来吧，别一下子热心过度，反而不好。看点别的什么书吧。间中也不妨去看场电影吧。”

我才不管呢。我这像航海探险似的，兴头大极，别的事我一概没兴趣。不过，蒂丽倒常问起我找到了工作没有。说真的，工作这个问题倒是蛮现实的。我对她和我的将来虽然一直怀着绮思，可是我明知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这件事我根本连提都不能提。于是，我开始积极地找工作。

不过，在没找到工作之前，倒先来了一段小插曲，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一生，其影响，比一年前穿过我踝骨的那颗子弹更不知大了多少。是一九五零年的严冬。一个暴风雪的夜里。我躺在床上。大风夹着雪雨扫过平地——只有荷兰的一月中旬才会有。我把被往上拉，紧紧顶住下巴。风中我听到很多声音。有修女蓓楚丽丝的声音：“猴子死也不肯放手……”有大帐幕底下的歌声：“容我的百姓去……”

啊，我抓住了什么呢？我又让什么给缠住呢？是什么拦阻，使我得不到自由？

全家都睡了。只有我躺在床上，双手枕在头下，眼睛在漆黑中直瞪着天花板。似乎风中有声音说，聪明点吧。突然间，是那么静静地，我放手了。我把我的全人交托给神。我向祂祷告，虽然不算是个大有信心的祷告。我只是说：“主，如果祢肯指示我一条道路的话，我愿意跟随祢，阿们。”就是那么简单。

第 5 章

完全顺服的一步

那天夜里，在风雪怒号中，我睡着了。奇怪得很，当我把心理上的自卫完全解除了以后，反而有了一种安全感，是以前从没体会过的。

早晨醒来的时候，心里满有喜乐，逼得我非告诉人不可。可是我不能告诉我的家人，他们看到我这一向的情形，本来就够担心的了。此外，就只有卫家和克依斯了。

卫家夫妇一听之下马上会意。“赞美主！”卫腓力先生叫了起来。这句话虽让我听了有点不自在，可是他说的声调倒让我的心感到一阵温暖。他们并没有把我的经历当作怪事看。虽然，他们在话里夹了些什么“重生”之类的字眼，让我听起来觉得有点怪，不过倒让我知道我走的这一步路是很多人曾经走过的。

我也告诉了克依斯，他也是一听就懂。他坐在那儿，靠着书桌，四周全是书。他看了我一眼，十足的一副学者派头。“你那种情形神学上叫

做，”他边说边用手拍拍一本厚厚的什么书，“叫做‘悟危知皈’。真想看看你以后会不会有个‘深部响应’。”

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当我告诉蒂丽的时候，她的态度反倒不如别人那么兴奋。她说，就像有些人在大布道会里面会一时感情冲动起来，你这情形也还不是一样？

可怜的蒂丽，岂知好戏还在后头，还有更让她受不了的呢。原来——几个礼拜后，是一九五零年的初春，我和克依斯一道上阿姆斯特丹去听一位阿尼唐克牧师讲道。这人是荷兰有名的布道家。道讲了一大半，将近结束的时候，怎知道这位唐克牧师突然换了话题。“各位朋友，”他说，“今天晚上我一直有种感觉，总觉得在这个聚会里会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在座中间会有人奉献他自己，投身于海外宣教工作。”

耍噱头！我心里在想，准是他预先布好了人在听众中间，到时候起身一站、往前跑，给他这聚会制造一点感情气氛而已。可是，居然没有动静。唐克先生还在那儿观望。他的眼睛到处瞪，会场静得让我浑身不自在，克依斯也有同感。“我很讨厌这种做法，”他轻轻地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们沿着自己那排座位挤出去，都快到了走道，只是因为大家回头看得厉害，不好意思，又只好再坐下。

“唔，”唐克先生终于开腔了，“不过，神知道是谁。祂知道这个人，也知道他前面事奉的道路非常惊险，并不好走。我想可能是一位年青人吧，一位青年的弟兄。”

全场的人都在那儿张望，像是在找牧师所说的那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像是服了什么命令似的，我这一辈子都想不通，我和克依斯竟然双双站了起来。

“呀，对了，”牧师说，“就是你们。两位年青人！好极了！请你们两位到前面来好不好？”

叹了口气，克依斯跟我穿过长长的走道，来到讲台前面。我们一起跪下，像在做梦似的，听唐克先生在为我们祷告。当时我脑子里只想，过后蒂丽知道了会怎么说。“真的呀？安得烈！”她一定会吓了一跳，一肚子不高兴的，“你真会是那么胡里胡涂的？”

想不到，后头还有更糟糕的！祷告完之后，牧师说散会后要跟我们谈谈。散会以后，我们留下了，勉强得很，而且总在疑心这个人可能会玩催眠术。人走光以后，唐先生问了我们的姓名。

“安得烈、克依斯，”他重复了一遍。“对了，谅你们已经准备好开始你们头一次的任务了吧？”我们还来不及说不，他又接下去了。

“好极了，我要你们先回去，对了，你们从哪儿来的？”“韦堤。”

“你们都是韦堤来的？好极了！我要你们回到韦堤，在乡公所门口开一个露天布道会。照圣经上记载的方式，耶稣吩咐门徒传福音，先从耶路撒冷开始，也就是说，从自己的本家开始……”

每字每句像一颗颗迫击炮弹似的，在我脑子里猛开花。这家伙究竟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对了，我会陪着你们的。”唐克先生继续下去，“不要怕，这没什么的。慢慢习惯了以后就好了。而且我会在开场的时候先说几句话的……”

我心不在焉，只是在回想从前自己每逢看到街头布道那些人就讨厌。又有句话飘进来了。

“……让我们定个日期吧，这个星期六下午怎么样？”“好的。”我说，心里本来想说“不”的。“你呢？”他问克依斯。

“好。”

回家的时候，在长途汽车上，我们谁也没吭气，心里直在埋怨对方不好，才把事情给弄成这种地步。

终于，那一天来了。偏是全村总动员，人人到齐，连狗都跑来看热闹。小讲台是用木箱子钉凑成的，我们三个人站在上面，一眼望下去全是人，而且尽是些熟脸孔。有的忍住一半笑，有的索性笑开。只有少数人——像卫家夫妇、宓可儿小姐——不时点头，以示鼓励。

以后那半个钟头像是做了一场恶梦。先头唐克先生跟克依斯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我一概听不进去。只记得后来唐克先生转向我，等着。于是我向前走了几步，全场死寂以待。再跨一步，我就到了台边。亏得我

那条荷兰式长裤实在宽大，虽然里头膝盖直在跳战战舞，倒也还没有露出破绽来。

原先准备好的讲辞竟然忘得精光，一句也记不起来。只好随口说到自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怎样觉得自己污秽，心里受责备；怎么一路背着罪恶和世俗的重担，直到有一天，在一个暴风雪的夜里，我终于放下重担。从此之后，心里真个是轻松自由。谁知道后来又碰上了这位唐克先生，弄得我竟然自己说，要做个传教士。

“各位，”我对自己的同乡们说，“说不定我倒真会干点成绩出来让他瞧的……”

我好怕下次跟蒂丽的约会。想想看，一个女孩子，你希望她会嫁给你的，而你想告诉她你突然间决定要做个宣教士，这话好难说啊，可不是吗？以后她跟你过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工作苦，薪水低，说不定还要跑到又远又偏僻的地方去，一切都不习惯。除非她本人有同样的心志，否则我怎么能够向她开口？

于是，过了几天我就开始向她游说，我告诉她那次聚会的时候我的确有那感动，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觉得这是神的带领。

奇怪得很，她好像倒不觉得宣教士那种艰苦的生活会让她吃不消。最让她想不通的是，我居然会在众目昭昭之下跑到台前去。

“不过，有一点我倒是跟唐克先生的看法一样。”她说，“就是说，任何事奉的职事都是先从本地本家开始。我看你不如就在韦堤附近找个工作，先把那个地方当作你的工场，然后你很快就会知道自己是否真想做宣教士。”

她这倒说得有道理。韦堤附近最具规模的工业要算是阿克玛镇的一家大糖果厂——凌格巧克力糖厂。洁芝的丈夫阿里就在那儿工作。我向他打听，他说他会替我向人事室推荐。

在我骑自行车上阿克玛那家工厂面谈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好梦。我梦见工厂里头的人，个个都是愁眉苦脸的。他们一见到我就觉得我与众不同，于是把我团团围住，问我到底有些什么秘诀。经我一说，莫不恍然悟道。我们一起跪下……

可惜得很，就在这个时候，我醒了。我坐在凌格糖果厂人事室外面的长板凳上。空气里全是巧克力的味道，闻起来很不好受。“下一位！”

进门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的步伐显得轻快。我把拐杖留在家里。虽然现在走起路来脚还是会痛，不过——除非我很累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在走的时候把伤的那只脚踏在地上而不显得跛。人事主任在看我的申请表，皱着头。

“傷患退役，”他照读，很大声。同事把我打量一番，“你这情形是怎么的啦？”

“没什么，”我觉得自己气得脸通红，“只要是人家会做的我也会。”

“你性情暴躁，是不是？”

他还是雇了我。在包装间的尽头做点运货的工作，点完之后，再用推车把一盒盒的货推到发货间去。一个脸部没神没气的小伙子给我带路。走廊、扶梯、扶梯、走廊，像八卦阵似的，终于推开门进了一个大

包装间。里头全是女工，总共两百人左右，围着十来根运输带。他把我交给其中一个，然后介绍说：“妞儿们，这是安得烈，你们好好地玩吧。”

话才说完，马上哨声四起，不由得我心里一怔。然后她们开始大声交换意见。“喂，露茜，你觉得他怎样啦？”“哈，人不可貌相。”继之是一阵淫言猥语，让我这当过几年兵的人听起来都觉得刺耳。

后来我发现，那带头说脏笑话的是个叫做顾丽芝的女孩子。她最喜欢谈人兽恋，放开嗓门在那儿研究到底哪一种动物配我最合适。终于推车装满了货，我暗自庆幸，为的是这下可以暂时跑到发货间那边男人圣所里去避避难。

可是，还不到一会儿，货就卸光了；于是，我又得回到那边受罪去。大包装间的中央有那么一个小亭子间，坐着一位管记录的。我把卸货收条送过去，边走边想，我说：“主啊，这倒是个福音工场。可是我干不来。我真不知道怎么向这些女人传福音。我的话准会让她们给故意糟蹋一番……”突然间，我的思潮断了。透过那小房间的玻璃窗口，我遇见的一双眼睛是棕褐色的，不，是绿的。她很年轻。金发、苗条的身材。看她还不到二十，可是她的那份差事却是我们这部门里面最重要的：发工作单，同时经收完工收条。我把收条给她的时候，她的微笑化作噗哧。

“不要理她们，”她的声音很温和，“新来的人她们总要整几下。过一两天就会换人的。”

我心里好感激她。

她给了我一张新的运货单。我拿了，可是还站在那儿，盯着她看。这里的女人一律浓妆艳抹，像个戏班，只有这个女孩子竟然一点化妆都没有。她的眸子闪烁着青春的光彩。

我越看越觉得她面熟。只是没说出来。说了，人家也不过以为是客套而已。只好闷在心里走开了。

时间过得好慢。站了一整天，到后来每走一步脚踝子就痛得要命。结果撑不住了，只好跛着走。马上被顾丽芝看到了。

“你怎么啦，安得烈？”她叫了起来，“从床上掉了下来不成？”

“在东印度群岛打伤的。”我说。希望她不要再说些什么。

“姊妹们听着！原来我们这儿有位战斗英雄！安得烈，他们说的苏加诺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喜欢很年轻的？”她声音之大让整个厂房的人都听得到。

这下可糟透了。本来再过几天她们就会把我玩厌的，可是这一来，她们连着好多天问长问短的，想知道她们想象中的东方情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她们一天到晚聊的总是一套，听得我烦死了，几次想辞职不干，就只是舍不得玻璃后的那一双会笑的眼睛。甚至没有收条可交的时候，我也想法跑到她那边遛遛。有时候趁给她收条的时候，偷偷地夹上一张纸条：“今天你好漂亮。”或者是“刚才你不高兴，到底是怎么回事？”常在想，别的那些女人说的话，她听到了不知会作何感想。我不懂她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工作。而且老是觉得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似的。

过了一个月，我终于鼓足勇气跟她说：“我替你担心。像你这么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实在不应该跟这些人在一起做工。”

她仰天笑了。“怎么啦?爷!”她说，“你的头脑怎么这么旧!老实说，”她朝小窗口靠了过来，“这些人并不坏。她们就是想交朋友而已。至于交友之道，她们不懂别的，就会这一招。”

她看着我，好像在考虑是否该向我表白。“老实说，”她说得很轻柔，“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才跑到这种地方来。”

我愣住了。她竟然跟我抱着同一个目的。突然间我想起来了!军医院!那个来请我们听布道会的就是她!就在那个布道会里……

我结结巴巴地急着把后来的一切经过告诉了她。我说我来此地工作也是怀着跟她一样的心愿。她告诉我，她叫范可侣。从那天起，我们开始有配搭。因为一盒盒的货包装好了以后由我来收，所以我得在一排排的女工中间来回走动，要是我发现谁有什么心事什么烦恼的话，就把情形转告可侣。等到那个女工来窗口领工作单的时候，可侣就私下跟她谈。

慢慢地我们找到了几个同道的，正好那时候英国布道家悉尼·威尔逊在荷兰举办周末青年大会，我们就一齐去参加。

最早的时候，跟我们一道去的有一个瞎眼又瘸腿的女孩子。在工作上，她和顾丽芝是同组的。艾美会盲人字母。她有一块小小的打点板，可以用来打信，跟别的盲人通讯。她让我看她怎么用。我也买了一块，还有一份盲人字母。有时候我给艾美打一张便条，放在巧克力糖运输带上，让它带给她。

像这种事，顾丽芝当然不会放过。“艾美！”她调头，打老远叫过来，“他这次又献的什么殷勤？”

平时艾美对这种揶揄总是一笑置之。可是，有一天我从发货间回来，发现她的眼睑直在眨，像在整眼泪。

“我看，”顾丽芝正说着得意，“你这下大概上当了吧。”她一眼看见我，露个奸笑，嚷道：“一到夜里，男人总归是男人。”

对不对？艾美！”

我在门口站住了。我每天早上骑车上工的时候，总要有点祷告，求神让我知道那一天里该怎样对人说话。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也不例外。而现在我似乎有个特别的感动，很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几乎不敢相信，却又是那么清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喊了过去：“顾丽芝，我不许你再说，以后再也不许你这样说！”

她怔住了，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我自己也怔住了。可是我还是得接下去，免得失去了主动。

“顾丽芝，”我接着喊，“我要你星期六上午九点钟跟我们一齐乘车去参加青年大会。”

“好。”她居然马上答应了。

我等着，看她会不会又来几句开玩笑的，谁知这下竟然轮到她在眨眼皮，快要哭了。我自顾收我的货去。发现房间里的人静得出奇，刚才那阵子让大家都变正经了。

到了星期六，顾丽芝真来了。这倒让我暗自叫奇。不过她还是老样子，声言她不过是看看我们究竟是搞的什么名堂。

在会场里头，她也不爱理别人。开会的时候，人家在台上做见证，述说神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她却私下一直在那儿说人家这个那个的。到了休息的时间，她就看她的那本鸳鸯杂志。

星期天下午，车子把我们送回阿克玛镇。我的自行车就停在车站。顾丽芝住在韦堤前面一站。我在想不知道她肯不肯让我带她回家，要是可以的话，这倒是个大好机会，可以让她坐在我后面，专心地听我讲。

“顾丽芝，我带你回家好不好？也免得再花一程车费。”

她紧了紧嘴唇。我知道她正在衡量。是坐我的车听我的说教好呢？还是宁愿花钱买票，自己乘车回去。终于，她耸了耸肩，上了我那部自行车的后座。我推着车，向可侣扮了下脸，走了。

一到了郊外，我就准备跟她谈。她需要神，我要让她知道。可是奇怪得很，我忽然感到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不要谈信仰的问题。就欣赏风景好了。”

我几乎又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还是照办了。一路上我没提到半句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经过好些郁金香花圃，就拿那个来聊。她说她在抗战的时候也吃过郁金香花茎。快到她家的时候，她对着我笑了，是个衷心的微笑。

第二天在厂里见到可侣，她亮着眼睛问我：“你究竟跟顾丽芝说了些什么？她突然变了，变得厉害。”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也没说。”

她真的变了。整个上午她一句低级笑话也没说。艾美不小心把一盒巧克力打翻了，蹲下去替她捡的也是顾丽芝。吃中饭的时候，她把餐盘往我旁边一摆。“坐你这儿好不好？”

“当然可以。”我说。

“你知道我昨天怎么想的?”顾丽芝先开口,“我以为你会硬逼着我‘接受耶稣’,这句话我在那些聚会里常听他们说的。要是这样,我才不听你的呢。谁知你连提都不提。弄得我……我说了你不要笑好不好?”

“当然,我不会的。”

“我在想,是不是安得烈认为我这个人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干脆也就不说了。再想想,也许我真的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要是我现在悔改的话,神会不会听我的?那些青年人做见证,说神救了他们,让他们重新做人。神是不是也会给我个机会,让我重新做人?想来想去,我终于还是求告了祂。我不会用那些祷告辞令,可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后来,我哭了。我几乎哭了一整夜。到了今天早上,我的感觉不同了,里面既轻松又愉快。”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别人蒙恩得救。一夜之间,顾丽芝变了。虽然她的外型还是一样,还是个带头的,话照样说个不停,可是她里面那个人变了。她说话变规矩了,别的很多女工也受到了她的影响,我们在厂里开始了一个祷告会,由顾丽芝负责登记出席人数。还有,如果她知道谁的孩子病了,或是某人的丈夫失了业,你要是不往那顶帽子里放钱的话,那才有你瞧的呢。她完全变了,而且变定了。每天夜里,我临睡

之前总要感谢神让我在这件事情上有份。我工作的那个地方跟以前完全不同了，这是神的定意，加上人的顺服。

有一天，我骑着车经过工厂大门，碰到可侣，没想到，她对我说：“凌格先生想见你。”

“凌老板！”心想我这下完了。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我在利用工作时间传教吧。秘书小姐把经理室的门打开，让我进去。老板坐在大皮沙发上，挥手示意我坐下。我正襟危坐在另一张单人沙发的边边上。

“安得烈，”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大约两个礼拜前我们厂里做了一次心理测验？”

“是的，经理。”“测验的结果，我们发现你的智商相当的高。”

什么叫智商？我不懂。不过既然看他面带笑容的，我也就跟着作微笑状。

“我们决定让你进我们的管理人员训练班。你先花两个礼拜把厂里各部门从头到尾看一下，看你喜欢担任什么工作。然后你告诉我，我们就给你训练。”

我听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终于我说：“我已经知道我喜欢做什么。记得上次心理测验完了，最后有一个人跟我个别谈话。我喜欢做他那种工作。”

“职位分析员，”凌先生说。他的眼睛像是要看透了我似的，“我想，要是你将来跟人家讨论工作，提及宗教问题时你不会反对吧？”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对了，”他说，“我们知道你在厂里传教。其实，据我看，你这种工作倒真比做巧克力糖重要。”

他笑了下，因为看我本来一脸的紧张样子，现在经他这一说，全消了。“安得烈，这样做当然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你这样做既可以带领人进神的国，又可以帮我把这个厂弄得更好的话，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蒂丽听说我调了个新职，高兴得不得了。她希望我对这工作发生兴趣以后，会把宣教士的念头给忘掉。可是，我忘不掉。虽然我很喜欢这份新的工作，但是我越来越觉得神对我另有呼召。因为既接受了人家的训练，所以我得答应他们再做两年。到时候，我是决定不干的了。

蒂丽看我既然打定了主意，也就不再跟我争，反倒处处替我想办法。她自己的教会是荷兰改革宗教会，在国外有很多工作。她替我写信到处打听。可是，所有的回信都说要当宣教士必得先经过按牧才行。

我写信给荷兰改革宗的神学院。因为打仗的时候我被迫辍学，如果将来补完以后再念神学，一共要花上十二年。十二年！我听了后，心里一沉。不过，我还是马上参加了一些函授课。

买书是个大问题，因为我自己毫无积蓄。妹妹洁芝把家用外省下来的钱都给了我买书。厂里传福音的工作由顾丽芝负责，也省了我很多心事。

有一天晚上，我一边在想买书的问题。怎么办？有了。办法岂不就在我的指间？手里那根白色的又细又长的圆条儿正在升起缭绕的轻烟。我

每星期要在这上头花多少钱?算了一下，发现我每个礼拜抽烟的钱居然够我买一本书。目前，为了要看某些书，我得常跑书店，每次站在角落上白看它几页。

荷兰人喜欢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我也不例外，要戒可不容易。可是，我终于还是戒了。我跟哥尼流的床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上面的书慢慢地多起来了。诸如德文文法、英文文法、教会历史、圣经注释等等。原来，我们家里除了圣经和诗歌以外，就从来没有人买过书。我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一有时间就看书，足足啃了两年。

宓可儿小姐听说我这样做法，就自动说要教我英文。我当然是感激不尽。她对我真好，每当我念得心灰意冷的时候，总是用好言安慰我，鼓励我。如果碰到她的英文发音跟我偶尔从妈那架收音机听到的有点出入的时候，我总是认定那是因为收音机有毛病，或者是电台的播音技术有问题。总之，她怎么发音，我也就跟着怎么发音，学得很认真。

宓小姐看我肯在基本学业上下功夫补修，颇为赞许。可是对于我将来进神学院的这个计划倒并不热衷。她常说：“你真觉得你非经过按立就不能做神的工作?你今年二十四岁。照这样子一直读下去，到你神学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已经三十几快四十了。我看国外宣教工作很多，平

信徒能做的，也总该会有的吧？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安得烈。我不过是这么替你想而已。”

当然，我何尝不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次周末，我跟悉尼·威尔逊谈起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厂里每逢周末去参加他那个聚会的人已经很多，所以我们自己另外包了一场。我对他说，现在要我按部就班地补念，未免太死板，而且费时间。他听了后，大笑，说：“你的看法跟环球福音会那些人一样。”

“环球福音会？”“这是个英国机构，专门训练宣教人才，然后派他们到海外还没有教会工作的地方。这个机构跟你一样的看法，也是不作兴等的。”

他接着向我解释。说是，一般差会的工作都是按着经济预算进行的。要派一个人出去，得先有了钱才行，至少也得等到将来这笔钱的来源有了着落以后才能够差派。可是，环球福音会不是这样做。如果他们觉得神在某一地方需要某一个人的话，他们就把他送去；至于详细的办法，他们一概交托予神，让祂去安排。

“至于人才的本身，”威尔逊先生继续说下去，“他们认为只要那个人所感受到的呼召是真的，而且献身够专心的话，那末他有学位也好，没有学位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自己有间学校，经过两年训练以后，就可以差派。”

这对我说，正合适。可是，我倒有点担心他们的经济政策。因为我认识一些所谓凭信心的传道人，其中大部分就像乞丐似的。虽是没有明着向人家要钱，可是他们暗示你掏腰包。韦堤一带的人叫他们做“暗示型传道人”。这些人不是靠信心生活，乃是靠自己的“触须”，到处去碰去试。我觉得这样做法实在差劲、丢人。若说基督是王，而这些人如果称得上是祂的使者的话，那末，照这情形看来，祂的国库岂不是穷得可怜!?

我把威尔逊先生的话告诉了克依斯。想不到他的反应倒很热烈。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读神学，准备将来被按立。“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他引了圣经，“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想多知道点环球福音会的情形。”

过了几个月，机会来了。有一天，威尔逊先生打电话到家里找我，说，环球福音会总会来了一个人，目前在哈林市。

“他叫琼森。趁他在这里，你不妨去见他一下。”周末我骑车去哈林见这位先生。果不出我所料，他的形容枯槁，衣着不华，一副传道人的穷酸劳碌相。

可是，当他谈起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工作情形的时候，他兴奋得眉飞色舞，脸上的菜色一扫而光。言谈间，他把这一切成就归功于他们那间学校和里头的教职员。校址在苏格兰的格拉斯高市。大部分的教员都是志愿授课，不受薪的。其中有神学博士、解经专家，等等，而且还有泥水工头、水管工、电气工，为了要训练学生在一无所有的情形下能够自己动手操作。

不过，说这还不是训练的重点。至终的目标说来很简单：尽量让学生们成为最优秀的基督徒。

我回来以后马上去见克依斯。我们骑着车穿过平野，边走边谈。他向我打听那间学校的情形。问得详细，就好像是他已经决定放下一切，准备立刻注册似的。学费多少？下学期什么时候开始？须要有哪些语文的根基？当我去见那个人时，还没想要问他这么多。我把环球福音会伦敦

总会的地址给了克依斯，等着听他的消息。果然，几天后他告诉我他已经申请了那间学校。

因为他有学历，所以一下子就准了。他去了格拉斯高以后，经常来信长谈，告诉我他在那边的生活情况，选课的情形，灵性上的心得等等，道来津津有味。这个时候，我在那个职位上已经超过了原定的两年。看来，环球福音会对我来说也是个好去处。

可是，我始终迟疑不决。总觉得自己的条件太差。学历差，比不上克依斯。加上一边跛脚踝子，即使瞒过人家，又怎么样？走不上五分钟就作痛，这还做什么宣教士！？

我到底有没有意思要做宣教士？莫非这只是我在编织美梦，自我陶醉？常听悉尼·威尔逊讲到“祷告透”。就是说，一直为某件事情祷告到神答应了或者是清楚明白了神的旨意为止。事到如今，我决定试一下。一九五二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独自跑到野外没人的地方，准备好好地祷告一下。坐在一条渠道的边上，开始向神交通。可是，从午后一直祷告到天黑，我还是看不清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

“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什么保留？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有什么借口不服侍你呢？”

忽然间，我的眼睛亮了。我看到了我以往对神说的“我愿意”一直都有个“可是”跟在后面——“我愿意，可是……”我愿意，可是我的教育程度太底。我愿意，可是我的脚有毛病。

蒙了光照，我马上再对神说：“我愿意。”这次我说得斩钉截铁，和以往大不相同。我说：“主啊，我去。将来正式念神学也好，接受环球福音会的训练也好，继续在这家工厂工作也好，无论何时何事，只要是祢的旨意，我一概听命。我说的话从现在开始算。主，我现在要站起来向前走。好不好请祢把我迈出去的第一步看作我决心完全顺服，走祢自己道路的表现？我要把这一步叫做‘完全顺服的一步’。”

于是，我站起来，向前迈了一步。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那只受过伤脚猛然扭了一下。吃了一惊，以为是自己大意，把脚给扭了。小心翼翼地把那只脚往上踩，站住，居然好好的，一点也不痛。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慢慢地走走看吧。于是我非常小心地一步步往家里走。正走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一节圣经：“他们去的时候就好了。”一路上这句话在我里头没停过。

起先我想不起来这句圣经的出处。往后我记起来了。是那十个长大麻疯的，耶稣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就在他们去的时候，神迹出现了：“他们去的时候就好了。”

会吗？难道会是我的脚也好了？当天晚上邻村教会有个聚会，离我们有六公里路。平常我是要骑车去的。可是，今天晚上不同，我决定走去。我真的走去了。散会以后，一位朋友说要带我回去。他有辆小摩托。“谢了。今儿晚上我想走回去。”

他听了，不相信。后来，回到家里，告诉家人我已经去了那个教会。他们也是不信，因为看我的自行车靠着墙，一直在那儿，还以为我临时决定不去了。

第二天回到厂里。以往我在工作上跟约定的员工谈完了以后，就让人家走了，自己坐在椅子上不动。这天早上我一反惯例，个别谈话完了之后，来个起身送客，直送到他们自己的位子上。上午才过了一半，我脚踝上的刀疤竟然开始发痒。用手揉它的时候，有两道手术后缝的线从

表皮底下露了出来。原来那道刀口一直都没好过。过了五六天，终于收了口。

我马上开始申请进环球福音会的宣教人员训练学院，一个月后，他们给我来信，说再过几个月男生宿舍会有空额，如果到时候没问题的话，那么一九五三年五月我就可以入学。

我终于把工作辞掉。离职那一天，可侣告诉我也准备辞职，念护士去。她说得很起劲。我盯着她那发亮的眸子，是棕黄色的。我想我这次没看错。握了下手，我就走了。

下一步我最怕：告诉蒂丽我已经决定进那间学校。因为那所学院没有教会背景，经济上也没有后台，既没名气，又不正规，而她这个人是最讲究这方面的。

是个春日的午后，高克安镇的港边。天气很美，我们的心却是满了阴霾。走着，走着，她很少说话。我原先准备了很多理由，可是她非但没跟我争，而且越来越沉默。我提到了我的脚。我说我的脚能好，实在是个神迹。也许我不该对她这么说吧，惟有这一次她光火了：“安得烈，你

这未免说得太过分了一点吧?人家受了伤，慢慢好转，终归复原的多了是，可很少像你这样的凭空附会，到处宣传。”

那天晚上我没在她家吃饭。我心里想，这一个决定他们刚知道，难免在心理上不能马上适应，过一阵子就会好的。蒂丽就是需要有点时间想想，迟早会同意的。

这边我开始筹款。把唯一的几样东西卖掉——自行车，加上那些宝贝书——买了一张去伦敦的单程票。我要先到伦敦见过环球福音会那几位负责人以后，再去格拉斯高市。买完票，剩下了三十英磅多一点，刚够我头一学期的学杂费。

预定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号动身。可是，就在这之前不久，我一连受到三次打击，震得我摇摇欲坠。

先是蒂丽来了一封信，说她已经给她自己教会的差传部去过信，问他们对格拉斯高那间学校的看法如何。回信说那间学校没有立案、没有背景，在与改革宗教会有关联的宣教界里毫无声誉。

所以，她接下去说，如果我真要去的话，她就情愿跟我断绝关系。短短的一封信，末了署名蒂丽。不是:爱你的蒂丽。只是:蒂丽。

手里拿着这封信，站在门口，不敢又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有个人步过小桥，来到我们家。是宓可儿小姐。

“安得烈，”她说，“我心里一直有话想跟你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一鼓作气下去：“老实跟你说，安得烈，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说英文。”她忙着补充，“不过英文书我倒看过不少。而且我跟英国一位朋友有书信来往，她说我的文法全对。”她停了一下，尴尬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说罢一溜烟似地走了。

这两件事我还没想过来，过了两天，伦敦又来了一封电报：“预计学额未能如期产生，入学申请恕难核准。可于一九五四年重新申请。”

一连三次打击:学校没有名额，语言可能成问题，加上女朋友的问题:我走，就会失掉她，要她，就不能走。

照理，无论怎么看，这条路是不该走的了。可是，在我心里的深处有个微小的声音，是往日在风中向我呼召的那个声音，是从前在工厂里吩咐我开口的那个声音，是情理上讲不通的一个声音，我深深感觉到它似乎在对我说：“去吧。”

第二天，我向玛芝、洁芝、父亲、哥尼流一一道别，离家上路，搭长途汽车去。从此踏上了我的旅程，直走到如今。

第 6 章

君尊的手法

在伦敦下了火车。手里拿着一张纸，上头有我自己写的环球福音会总会的地址。

火车站外面，高高的、红颜色的公共汽车，夹着黑色的出租车，往来穿梭；在我看来是走错了边——靠左走。那边有个警察，于是过去向他问路。他看了我纸头上的那个地址，点点头，伸出手臂开始讲解方向，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有好几分钟。我对着他，整个人给弄迷糊了——一句都听不懂。只好尴尬地把地址拿过来，说声

“Dank ou”(译注:谢谢你。应读 Thank you。), 朝着他最先指出去的那个方向走去。

接着又试了好几个警察，还是一样，不懂。最后弄得我毫无办法，只好忍痛破钞，叫了一部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闭起眼睛，任他一路靠左，疾驶而去。终于车停住了，他指了一下我那张纸头，再朝一幢油漆斑驳的大房子指指。

提着箱子，拾级而上，按过门铃，开门的是个女人。我尽我所能，向她表明身份和来意。她只是望着我，茫茫然的。我知道，我这说了半天，她是连个边都摸不着。她打手势叫我进去，然后指了一下厅里的一张长凳子，走掉了。过了一会儿，她带了一位男士出来。这人会一点荷语。我再次表明身份和来意。

“啊，是的。可是，三天前我们给你发了一封电报，你没收到？”

“因为目前我们这里还没有空额。”“那封电报我收到了。”“可是，你还是来了？”

我看到他脸上的微笑，心里宽慰了不少。“我知道迟早准会有名额的，”我说，“所以就先来了再说。就近等总比较方便一点。”

那个人又笑了，叫我等一下，他进去。出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正是我所期望的。他说，如果我愿意在总会帮点忙的话，可以暂时在这里住下。

于是开始了我一生中很少有过的那么艰苦的两个月。

他们让我把环球福音总会的房子重新油漆一番。这个工作倒不难。梯子爬惯了之后，我越做越起劲。甚至在女王伊莉莎白加冕那天，大家都放假，就只有我情愿照常工作。他们一直在底下喊我下去看电视上的特别报道，可是我就宁愿待在上头，俯视脚下的街道和那四周屋顶上飘扬的国旗，还可以欣赏编队飞行掠空而过的机群。

那两个月之所以苦，是苦在学英文。我拼得太厉害，弄得常常会头痛。环球福音会的同工们一律守晨更，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读经祷告。我对这马上感兴趣。早上鸟一叫我就起床穿衣，拿起两本书往外面花园跑。一本是英文圣经，还有一本是字典。方法是绝对没错，只是我学而致用得过分，闹出个张冠李戴，弄得我那阵子说英文的时候，满口的 *thee, thou, verily*。(译注:旧译英文圣经所用古体英文中“你”的受格，“你”的主格，“实实在在地”，不适用于现代日常英语会话。)有一次进餐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要我们给他递牛油。我就把话传下去，说：“*Thus sayeth the neighbor of Andrew, that thou wouldst be pleased to pass the butter.*”(译注:古体英文，直译:安得烈的邻舍如此说，请你把牛油传一下。)

不过话得说回来，苦学如斯，进步总还是有的。到了英国六个礼拜以后，会长请我主领晚上的同工灵修会。讲了七分钟之后，我把肚子里

的英文生字通通用光了，只好坐下。过了两个礼拜，他们请我再领一次。这次，我的讲题是：“你的信救了你。”(译注:英文是，Thy faith hath saved thee)是耶稣在耶利哥路上对那个瞎子说的话。我也真够傻，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因为荷兰人碰到英文里面那个 th 音，就如遇上瘟神一般。

“Dy fade had saved dee.”我宣布讲题。(译注:你的信救了你。他把所有 th 音发错，发 d 音。)然后花了十四分钟加以讲解，听得大家好笑。

短讲完了之后，大家过来围着我，兴高采烈地拍拍我的背，说：“安得烈，你进步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听得懂你说的什么。而且你讲了十四分钟!比上次的七分钟好了两倍!”“原来这位就是我们的荷兰朋友……我认为他讲得非常精彩。”

声音从后头传过来。中年、秃头、胖胖的、红光满面、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我以前没见过。他的眼睛是眯的，像是一直在想搞什么恶作剧似的。眼睛虽眯，却是有光采，马上把我吸住了。

“安得烈，我想你没会过威廉霍浦金先生。”会长替我介绍。我过去跟他握手，他的一双大手握住我的手，亲切之至。

“他看起来很健康，”霍浦金先生对他们说，“如果我们能替他办到工作许可证的话，我想别的不会成问题。”

会长看出我摸不出究竟，就向我解释。原来有一位宣教士要回来，住在总会，而且我那份油漆工作已经做完，所以我得搬出去。不过，假如霍浦金先生能替我申请到工作许可证的话，我就可以在伦敦找一个工作，积点钱，准备将来念书用。后来他们告诉我，一遇到有这一类事情，他们总是找霍浦金先生去。

“安得烈，你去整理一下东西，”霍浦金先生说，“先到我家住几天再说，一方面我们设法解决工作的问题。”

我只有一箱行李，两下子就收拾停当。趁我在收盥洗用具的时候，一位同工告诉了我一点霍浦金先生的情形。他是个包商，生意很好。只是他生活清朴，因为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九都捐给布道机构。环球福音会只是其中之一。

不多一会儿工夫，我已经站在前门跟大家说再见。“这幢房子现在好看得多了，安得烈。”会长说着跟我握手。“Dank ou.”(谢谢你。)

“试试看那个 th 音。”

“Thee-ank ee-ou.”

大家都笑了。在笑声中，我和霍浦金先生下了台阶，走向他那辆自备货车。他家在泰晤士河边，几乎正是我所理想的：简朴、温暖、亲切。

霍浦金太太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可是她对我照样欢迎：“你在我家不用客气。要吃什么、喝什么，尽管自己拿好了。还有，我们家经常有客人，你住后会知道的。”她转向她丈夫，她的眸子里有和他一样的光辉。“万一你晚上回来，发现有流浪汉之类的人睡在你床上，不要觉得奇怪。这种事情以前有过。我们会把毯子和枕头放在客厅里，你自己可以在壁炉边打个地铺。”

才过不了几天，我就发现她说的都是真的。那个时候，我每次出去办工作证总是等了半天而又没有结果。那一天又是这样，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发现他们夫妇俩坐在客厅里。

“安得烈，你不必上你的房间去了。有个醉汉在你床上。给你留了茶点，我们已经吃过了。”霍浦金太太说。

我靠着壁炉坐，边吃边听她讲。原来霍浦金先生在自己公司附设了一个小小的布道所。那天那个人跑了进去，主要是为了躲雨。霍浦金先生就把他带回来。“等他醒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吃的，还有穿的。至于这些东西会从哪儿来，我不知道。到时候神会预备的。”

后来，神真的预备了。我住在他们家那阵子，就亲眼看到过不知道多少次神在这一类事情上奇妙的供应。凡是他们收留过的人，就从来没有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霍浦金先生开营造厂赚来的钱，除了最起码的家用以外，一概奉献给神。所以，他经常暂时收留的那些人——诸如我自己以及讨饭的、流浪的、醉酒的，都得另外从神那里得供应。神每次都有祂的办法。有时候是邻居端来一碗菜，说：“多煮一点，让你们尝尝。”或者是，突然收到别人还来的一笔旧债。再不就是，一个曾经受过惠的人跑回来，看看他能帮上个什么忙。他们夫妇说：“好呀，刚好今天有个老人住在我们楼上，他没有鞋穿。你能不能替他弄到一双？我们可以把他的尺寸量给你。”

我本来只打算在他们家住一两天，等我拿到工作证找到工作以后，立刻就搬。想不到我们一次再次的，跑了不知道多少次劳工部，就始终申请不到那张工作许可证。

亏得他们一开始就有意思要留我住下。原因是这样的:我刚刚到他们家的头一天早上，霍浦金先生一早上班去了，他太太身体不舒服，没下来，剩下我一个人。于是我找了一支拖把，把厨房的地板给拖干净了。接着拖洗澡间，看到一堆脏衣服，顺手给洗了。下午衣服干了后，我又给熨了。最后，趁霍浦金先生还没回来之前，把晚饭煮好。像这一类事情，我是以前在家里做惯了的。我们家里无论男女都会家务。可是，想不到我这一做，让他们夫妇知道了，竟然看成是天大了不起的一件事。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荷兰人的这种踏实作风，也可能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上很少会有人来照顾他们。总之，他们觉得我很能干，当下就要我在他们家暂住下去。

于是我就留下来了。在他们家掌大厨，兼任洗碗打杂。他们夫妇也就成了我在英国的谊父母。没多久，我也就随着大伙儿称他俩作霍叔、霍妈妈。霍妈妈有很多地方像我自己的母亲。就如，在病痛中从不诉苦；对需要帮助的人从不享以闭门羹。

至于霍叔，这个人很妙。不修边幅，没有半点架子。有时候他开车带我到周围各个工地视察，身为自己公司的老板，却是穿得一副垮相，连我看了都替他不好意思。央他至少也该打条领带，那件大衣破破烂烂，也该买一件象样一点的。可是，霍叔听了只是笑哈哈的，说：“何必呢？反正这些人都不认识我。”

平常到附近地方去也是一样。有时候在门口看到他准备上教堂，脚上一双工地穿的靴子！胡子总两天没刮。我正待要开口，他已经先瞪了我一眼，说：“安得烈，你又来了！这附近的人我都认识，反正大家不是外人，有什么关系？”

霍叔的那间布道所也特别。门是一天到晚开着的。偶尔进去个游民，只是为了要借个地方打瞌睡，或者是外面天气太冷，跑进来取取暖。这个布道所也有一定的聚会时间，可是通常到时候里面多是空空的。霍叔也不管有人没人，照样开他的会。记得有一次我听他对着一排排的空位子讲了一整篇道。

“你们错过了这一次聚会，”他对着空位子上那些该来而没来的人说，“可是以后我们会在街上碰面的。到时候我会认得出你的。好了，现在且听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

等他讲完了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你这种做法未免太玄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出来讲道的话，我才不要这样做呢。”

霍叔只是笑哈哈的：“你等着瞧吧。一会儿我们回家的时候，会在路上碰到本来该坐在那个位子上的那个人的。到时候他们的心会是已经预备好的。安得烈，我们受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可是我们不能让神也受同样的限制。”

可不是吗，后来就在我们走路回家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兜生意的神女。霍叔马上把刚才那篇信息里的结论搬出来，讲给她听，就好像她已经在先前的那个聚会里听了开头的四十分钟，心里很受感动似的。结果那天晚上我又得在客厅里打地铺。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位一心为主的包商和他的太太又看到了一个人归入基督。终于有一天收到了格拉斯高来的一封信。等了很久的学额终于有了。他们要我秋季入学。

霍叔、我、还有一个流浪汉，绕着霍妈妈的床，兴高彩烈地表演正步走。突然间，大家黯然，才记得我这是来说再见的。一九五三年九月我离开伦敦。

这一次我找地方可不像上次那么麻烦了。提着箱子，沿着山坡上到埃布尔王子道十号。是一幢高高的两层楼，在拐角上。四周围上一道矮矮的石墙，顶上间隔地嵌着断了的铁条，一看就知道是以前的铁栏杆在大战的时候给砍去炼钢。进口头上一道木拱，标着几个字：

“信靠神。”我知道这就是此地两年制教育的主要目的：让学生尽可能地对信心这两个字有认识。从书本里头，从别人那里，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信心的功课。

怀着兴奋的心情进了校门。踏上白色的鹅卵石径，一路来到门口。叩过门，出来的是克依斯。异地重逢知己，且是个地道的荷兰同胞，相见之下好不开心！频频拍肩数回合之后，他一把抓住我的行李，带我上楼。到了我的房间，给我介绍了我的三个同房。又带我看了防火梯在什么地方。宿舍和教室、办公厅是通的，男生一幢，女生一幢，总共有四十五位年青人。“男生和女生是不准来往的，”克依斯说，“我们平常没事是不准找她们讲话的。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得到她们。”

会见校长的时候，克依斯一直在座陪着我。校长是史都华·丁南先生。他对我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学生信靠神，相信祂必成就祂在圣

经里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将来毕业差派的时候，已经有差会工作的地方我们不予考虑，只着重新地区的垦荒工作，所以学生在外多是单枪匹马的，心里不能怕，对神在圣经里说的话不容有丝毫怀疑，否则的话，神的工作就要受亏损。因此，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生在仰望神这个功课上有实际的操练和体验，而不是仅仅给他们灌输一套理论一些观念而已。我希望你的看法跟我们一样。”

“是的，校长，完全一样。”

“至于费用方面，当然，你知道我们是不收学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教职员都是不受薪的。全年的食宿加上杂费只收九十镑，相当于两百五十多块美金。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低的一个开销，是因为所有厨务、清洁等等一概由学生自己动手。按规定，这笔钱是要先缴的。不过你曾经表示过你目前有困难。”

“是的，校长。”“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以让你分期付款。每一学期开学的时候付

三十镑。可是一定得按期付清，这对你自己、对校方，都有好处。”“是的，校长，我完全同意。”

当时我心里的确是同意那种按期付款不得拖欠的办法。因为这正好可以当作我学习信靠神的第一课，在物质生活上仰望祂的供应。我从荷兰带来的三十镑刚够缴头一个学期的费用。往后，我就真的要看看神的办法了。

可是，就在学期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我老是听到同一类的事情，弄得心里一直地不舒服。就是，在用饭的时候，要祷告了一整夜，结果神只给了一半，或者是只给了四分之三。又如，学生们经常去一家老人院领会，碰到那里需要十条毛毯，结果学生们向神求到的钱也许只够买六条。圣经说，我们是神自己葡萄园里的工人。我心里想，难道我们这位葡萄园的主给工钱是这么给法吗？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出去散步，走得很远。同学们曾经好几次在言谈中提醒我不要跑到派楚利克去。派楚利克是个贫民区，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山脚。他们说那里是莠民的大本营，酒鬼、吸毒的、小偷、扒手，甚至连杀人犯都有，走在那个地区的街上相当的不安全。可是，那天晚上那个地方一直在向我招手，好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似的。

一片灰色，一片脏，是派楚利克的街道在我的四周。风在铺石的路面上游荡，刮得垃圾到处飞扬。九月的空气已经让人感到寒意。才过了不到五六个街口，就已经先后遇上了两个伸手要钱的乞丐。我尽口袋里所有的统统给了他们，眼看他们拿了钱就往附近的酒吧跑，大大方方地，明着来。这些在格拉斯高市贫民区街上讨钱的乞丐，我知道他们的收入比山上那些正在受训的未来宣教士们还要好。

我不懂为什么我最近老把钱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是我贪财？不会的。我们家一向很穷，可是我从来就不在乎这个。那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上坡往回走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

其实这完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以前在巧克力糖厂工作的时候，我信得过老板，知道他会按时候发足薪水给我。我想，既然连普通一家工厂的工人在收入上都有保障，更何况身为神的一个工人。

进校门的时候，又看到了头顶的那几个字——信靠神。对了，关键就在这儿。我所需要的并不是稳定的收入，而是一个稳定的关系。

整个学校都在睡，静悄悄的。只有脚下的石径被我踩得咯咯作响。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在我里面高涨。蹑手蹑脚上了楼梯，进了自己的卧房，靠窗口坐下，格拉斯高市就在眼底。我既准备奉献一生，事奉一位君王，那末我对祂得先有认识才行。祂是个什么样子？我信得过祂吗？怎么个信法？就像信奉一套死的法规、呆的定律？还是打心里信祂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牧者、一位率战的统帅？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如果祂只不过是个挂名的君王的话，那我就宁愿打道回府，继续在那家巧克力糖厂干下去。虽然我还会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会觉得基督教不过是一套尽善尽美的道理，我们理应奉行，却是无须大发热心。

反过来说，如果我发现我所信的神的确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与我们有交通、关心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那么情形可就不同了。像这样的一位君王，在任何战况下，我都会跟随祂的。

我心里有一种感觉，知道我会从钱这个问题开始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就在那个有月亮的九月的夜里，我就着窗口跪下，与祂立了一个约。我说：“主啊，我需要知道，在各种现实的问题上祢能不能让我信靠得祢。我感谢祢以前让我赚够头一个学期的费用。现在我求祢供给我以后费用。假如将来缴费的时候我没法如期付款，即或是只迟了一天，也都表示我应该回去，继续我以前的那种工作。”

那是个幼稚的祷告，既冲动又不讲理。因为当时我在灵里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后来神居然还是答应了我的祷告。只不过是先藉了些事情，稍稍地考验了一下我的信心。

第一学期过得很快。上午在教室里上课，诸如系统神学、讲道术、比较宗教、语言等等，相当于一般神学院里的课程。下午是各种实用技能：砌砖、铅工、木工、急救、热带卫生以及汽车修理。中间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大伙儿不分男女一齐到伦敦的福特汽车厂，学习汽车装配。此外，我们还得学会用棕树叶盖小房子，用泥巴做水罐。

厨房、洗衣服、照顾花园，这些工作一律由大家轮流担任，每个人都要做。有个德国女同学，本来是个医生，我每次看她洗垃圾桶像是在布置手术室准备开刀似的。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得很快。转眼我们就要出发，开始第一次的旅行布道；这也是操练的一部分。“到时候你会觉得这很有意思的，安得烈。”校长跟我说，“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办法很简单，每一队有几个学生，每个学生只准携款一英镑，由学校先给。在苏格兰各地旅行布道期间，一切旅费、吃住、宣传费、会场租金、茶点费等等全部由你们自己负责。”

“一英镑要办这么多事？”

“还有呢？四个礼拜过后，你们回来的时候，还得把那一英镑还给学校呢！”

我笑了。“看样子我们一路得不停地在那儿传奉献袋才行。”

“不，我们不准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收奉献！绝对不行！聚会的时候，你们绝不能提到钱。任何需用都不能靠你们自己动脑筋去解决。要不然，这次操练就算是失败了。”

我那队一共有五个人，都是男同学。过后我回想了一下那四个礼拜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如果要我细细说来，可也不简单。就好像是每次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似的。有时候是我们当中一个人收到一封家信，里面附了一点钱。有时候是我们早几天或是早几个礼拜去过的一家教会寄来了一张支票。像这一类的奉献，他们信上的话多数很有意思。有人会这样写：“我知道你们不需要钱，否则的话你们一定会提起的。可是，今天晚上我老是睡不着；总觉得神在催促我，叫我非得把这一点点奉献放在信封里寄给你们不可。”

也常常有人奉献宝物。我们到过苏格兰高原上一个小地方，那里有人送了我们六百个鸡蛋。于是，我们开始吃蛋：早餐吃蛋、午餐吃蛋，晚上比较丰富，是个全餐，主菜加上头尾两道小点，统统是蛋。吃得我们后来有好几个礼拜一看到鸡就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不管人家给的是钱还是实物，我们绝对坚持两个原则：第一，绝不开口向人家要；第二，收到奉献后尽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其中的十分之一送出去，当作我们的什一奉献。

另外一队在什一奉献上没我们这么严格。虽然他们也抽出了十分之一，但是没马上给出去，说是：“先留着，以防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救

急。”当然，他们有紧急的时候，可是我们也有，而且每天都有。结果，一个月下来，他们在苏格兰各地欠了一大堆债——旅馆、场地租金、买东西……而我们这一队回来的时候，还多出了将近十镑。我们给钱给得快，而神给得更快。结果，我们还有多余的钱奉献作环球福音会海外工作的开销。

不过，我们也的确有过几次惊险镜头。有一次是个周末，我们在爱丁堡有聚会。头一天的聚会到了一大批青年人。我们正在心里盘算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明天再来。忽然间我们队里的一位弟兄，也没和其他的人先商量好，就站了起来说：“明儿晚上聚会之前，我们想请各位来参加一个茶会。下午四点钟开始。想知道一下有多少人能来？”

有几十个人举手。茶会是开定了。这可把我们其余这几个人吓坏了。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茶叶、没有蛋糕、没有面包、没有牛油，只有五只茶杯，最要命的是没有钞票。这次租场地把钱统统用光，现在可真要看神怎么照顾了。

起先，看起来好像祂要藉着那些年青人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会后他们有好几位跑来，说要帮忙。有一位愿意负责牛奶；另一位出半磅茶叶；还有一个出白糖；并且还有一个女孩子说她要负责杯盘。这么

一来，这个茶会似乎有了着落。只是还差了一样——蛋糕。在苏格兰人看来，没有蛋糕的茶会，简直就不算是茶会。

于是，晚祷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摆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现在进退两难，弄得非有一块大蛋糕不可，请祢帮帮忙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会场打地铺。临睡前大家在那儿猜着好玩，猜神究竟会怎么替我们预备蛋糕，所有可能的办法我们几乎都想过了。

天亮了。半期望着天遣一位蛋糕使者，登門造訪；没有。邮差来了，忙着把两封信拆开，希望里头有钱；没有。附近教会的一位姊妹过来，想看看能帮些什么忙。“蛋糕”，个个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只是摇摇头，对她说：“这一切神会预备的。”说得很有把握。

讲好下午四点钟开始茶会。三点钟的时候，桌子已经摆好了，只是还没有蛋糕。三点半了，开始烧水。三点四十五分了，就在这个时候，門鈴響了。

大伙儿一窝蜂涌出去。大门口站着个邮差，手里捧着一大盒东西。

“嗨，各位小老弟。给你们送来一盒东西，像是吃的。”说着，他把盒子交给我们其中一个。“本来，今天送包裹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我怕是吃的，容易坏，所以提早给送来了，免得留在局里多过一夜。”

我们向他谢了又谢。他走了以后，那位弟兄郑重地把那盒东西交给我：“是你的，安得烈。是伦敦一位威廉霍浦金太太寄来的。”

我接过来，慢慢地把它打开。先拆绳子，再去掉外面一层牛皮纸。里头是个白纸盒。到了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有数，反倒不忙，慢条斯理地把盖子抓开。可不是吗，一只大蛋糕！完完整整的一只巧克力蛋糕，既新鲜又夺目！看得我们五个人个个瞪大眼睛。

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到一封信，是卫家寄来的。里头有一张支票，刚够我第二学期的学杂费！

第二学期好像比第一学期过得更快。有好多东西可以让你学让你想的。学期还没完，就已经收到了第三学期的钱。真没想到，是军医院里几位朋友寄来的。就像这样子，第二年也过了。

我从来不把我的需要告诉别人，可是每次到时候就是会有人寄钱来，而且数目总是不多不少，刚好够我缴费。那些帮助我的人彼此都不认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同时寄钱来，时间上总是错开的。

我不断地体验到神的信实，甚至发现祂也有幽默感。那次跟祂讲好是学校方面的食宿费杂费，可没有说到洗衣粉、牙膏、刀片等等。有一天早上我发现我的洗衣粉用光了。我的钱放在抽屉里面。打开一看，只剩下了六个便士，买洗衣粉要八个便士。“神啊，祢知道衣服是要洗的。还差两个便士，请祢想想办法好不好？”于是，袋着六个便士，先上了街再说。到了卖东西的地方，果然一眼就让我看到了一张广告：“浪花牌洗衣粉大减价！七五折优惠！欲购从速！”进去买了一盒。心情轻松愉快，吹着口哨，上山去也。一盒洗衣粉相当的多，省一点的话，够我用到毕业的。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我洗衬衫的时候，让一位同学看到了。“喂！安得烈，借用一点洗衣粉好不好？我用光了。”

当然，我让他用了。什么也没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在倒浪花，我那宝贵的浪花。他这一借准是没还的，我知道。

后来他每“借”一次，我就得把自己的用量紧缩一次。后来轮到牙膏了，一支牙膏用光了。挤呀扭的，最后把管子撕开，用刮的。没有了，硬是没有了。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是可以用盐巴当牙膏。一试之下，果然不虚；只不过是日子久了以后，两片嘴唇总是皱巴巴的。

再就是刀片。幸亏我没有把用过的丢掉，因为后来终于又被我用上了。先施以妙手回春之术，每天先在自己的胳膊上来回地磨它个十分钟(因为我没有磨刀的设备)。胡子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不过代价可不轻。

这一路，我意会到神看顾我有祂自己的一套办法。也许是祂想要藉着这些经验让我知道，当我缺乏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我非得要有那一样东西不可。用牙膏刷牙，味道固然胜过盐巴；新刀片刮起来固然比旧的省事；可是，要是没有的话，也照样可以过得去。我深信如果一旦遇到急需的时候，神一定会供应的。

后来，果然有一次。

我在英国的签证快到期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到期，不申请延期的话，就得走。把表格证件挂号寄到伦敦，邮费要一先令，也就是十二便士。偏逢我当时周身一文不名，眼看着十二月一天天地过去了。可是我就不信神会任我为了付不起一个先令而被迫辍学。

于是乎，局势开始转紧，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神的下一步是什么？我拭目以待。对了，我现在知道这叫什么，我叫它做君尊的手法。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神要是给钱的话，祂会给得利利落落、大大方方的，绝不会用上什么不伦不类的办法。

为了那封挂号信，我还差一点走岔了路，先后有三次之多。那一年我是学生会的主席，同时负责保管买福音单张的专款。那一天我瞟了一下日历——十二月二十八号；偶然又看到了那一笔专款，有好几个英镑。先借用一先令，小数目，没有问题吧。

谁说的？我马上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十二月二十九，只剩下两天了。以往盐巴刷牙以及胳膊上磨刀片的滋味，我几乎都忘了，因为一先令这一幕实在是太紧张太刺激了。那天上午，我心里在想，说不定我会在地上捡到那十二个铜板。

我真的穿上了大衣往外跑。低着头，眼不离地，沿着马路边一路找下去。我这是在做什么？君尊的手法该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吧！我挺直身子，当着闹市，哈哈大笑。回去的时候，我走得挺胸抬头，可是没钱还是没钱，问题丝毫没有解决。

最后一个回合最精彩。已经十二月三十号了，寄伦敦的信至少要一天，三十号再不寄就太晚了。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一位同学在楼下喊我，说是有人找我。连忙冲下楼梯，满以为送财天使驾到也。岂知相见之下，我的心当堂凉了大半截。来人非但没有钱给我，反而是来问我要钱的。是个青年人，名叫利查，我几个月前在派楚利克贫民区认识的。他偶尔需要钞票的时候，就来我们学校走走。

我没精打彩地往外走。他站在那条铺白石的小路上，双手插袋，两眼低垂。“安得烈你手头方不方便?我实在饿得厉害。”

我听了哈哈笑，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他。我说我连买洗衣粉、添新刀片这些都有问题。正说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脚边鹅卵石间有一样什么东西在闪呀闪的。那太阳反光的角度的，刚好是可以让我看得到，而他看不见。是一枚银币!我一看那东西的大小颜色，就知道是个先令。当下本能地一脚踏过去，把它遮住。然后，一面聊天一面弯身下去，连石子带钱一把抓上来，动作轻松自然，不露痕迹。然后，再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把石子一粒粒地往地上抛。最后只剩下了那一个先令藏在我的手心。但是，就在我把钱放进口袋的时候，我里头的争战开始了:这一个先令关系着我的整个学业，我可不能给他。好人也不是这么做的，我给了他，他也是拿去喝酒，过一阵酒瘾而已。

我在那儿想理由，想了一大堆。理由虽然充分，可是心里头总是觉得不对劲。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别人，我怎么能够论断他。而且，神给我钱也不会是这样给法的!我既是基督的使者，又怎能自己霸住这点钱，眼看着另外一个人在饿肚皮。我伸手从口袋里把那一枚银币取出来。

我说：“咯，利查，我只有这么一点。对你有没有用？”

他的眼睛发亮了。“好极了，老兄。”拿过钱就往山下跑。

我心情轻松，知道自己做的没错。转身往回走，还没到门口，后面老远地邮差来了。

有我的一封信。当然喽，这还用说？一看信封上顾丽芝的字，就知道是厂里祷告会他们寄来的，里头准有钱。果然不错。足足有一镑半，也就是三十先令。这下子，我可以寄我的挂号信，买它一大盒洗衣粉，享受享受自己喜欢的那种牙膏，再添一些新刀片——吉利牌，还要是超特级的。三十先令不但够，而且是绰绰有余。

两年终于下来了，一切平安顺利，王的手法确是不凡。

一九五五年春，我就快毕业了，心里急着要开始工作。克依斯早我一年毕业，去了韩国。信里说那边的需要大，工作机会多，校长让我考虑要不要到那边去。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一本杂志。拿起来随便翻翻。这一翻，竟然翻出了我生命里崭新的一页。神在人身上安排的转折点常是来得静悄悄的，我这就是。

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我跑到地下室取我的皮箱。看到一个旧纸盒上头摆着一本杂志。我自己从来没见过这种杂志，后来问其他的人，他们也说是没见过。这本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始终不知道。我拿起来随便翻翻，是本很漂亮的杂志，用的光面纸，里面有五彩的插图。大部分是北京、华沙、布拉格，各地青年群众列队游行的照片。看起来倒是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的。里头的字是用的英文。说是这些青年人属于世界各地九千六百多万青年大团结的一部分。文字里面看不到“共产党”这个字眼，只是间中提到“社会主义”什么的。里头说的尽是一些理想的世界、光明的前途这类的话。翻到末了，我看到一段广告，说是本年七月在华沙要举行一个青年大会，欢迎任何人参加。

任何人？

我夹着那本杂志，提着箱子，回我的房间去。当天晚上，我照着那上头华沙的地址，给他去了一封短信。根本就不晓得将来会有什么下文。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是读神学的，毕业以后准备做基督教海外宣教的工作。我说我很想参加这次的青年大会，跟大家有点思想上的交流：我谈我的耶稣基督，他们可以谈社会主义。我问他们，在这种条件下，是否还欢迎我参加？信发出去以后，居然有回音，说是不胜欢迎。有一列专车从阿姆斯特丹开华沙。我是学生，还可以有折扣。信里附了一张入会证，说是希望在华沙见面。

这件事情除了霍叔以外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他回信上说：“安得烈，我想你应该去。随信附上五十英镑作为你的开销。”

从那个时候开始——正当我要离开苏格兰，回荷兰的时候——一幅图画慢慢地成形。当初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点线索，只是并不具体，隐隐约约地浮沉于我的脑海，心里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时我们厂里有个女工，是个十足的共产党，矮矮胖胖的个子，满头灰发，短短硬硬的像把刷子。她对什么都有她的一套看法——下自我们的工钱(资本家的奴役制度)，上至荷兰女王(欺压人民的统治者)。后来她发现我在厂里传道，于是像按了钮似的马上向我集中火力：“神的观念是

剥削阶级想出来的一种手段”等等。因为她这个人完全没有幽默细胞，所以虽然人家都在笑她，她还不知道。她在厂里做了二十年，可是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受她的影响，信了共产主义。

我没有笑她，只是觉得她很可怜。中午在餐厅里，看她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常跑过去跟她做做伴。临走的那一天，我经过她的位子，跟她说再见。

“这下我走了，你总该高兴了吧！”我幽她一默，希望最低限度大家能散得嘻嘻哈哈的。

“你人走了，你说过的那些假话可带不走！”她可是当真的，“什么救恩，什么盼望，梦话连篇，把这些人的心都迷住了……”

我叹了一口气，准备领教她那一套“人民的鸦片烟”理论。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的火药气退了。

“当然喽，她们会信你的，”她的语气转了，“她们没受过训练，没学过逻辑辩证。她们要怎样想就可以怎样想。”

“况且，”她的声音低到我几乎听不见，“如果能由得你自己做主的话，谁不愿意有个神呀什么的。”

我很快地看了她一眼。真是不可思议，我想我看到了什么。我想我看到了她眼眶里有泪水！

第7章

铁幕后

去了两年英国，回到了老家韦堤，又感觉了一次从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记得我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时候，觉得家乡的景物就跟我离开的时候完全一样。这一次也是如此，就好像完全没有了中间的那段时间似的，让我开始的时候有种怪怪的感觉。那是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个上午，天气很热。步上了小桥，往自己的家园走，看到洁芝正在园子里晒衣服。景物依旧，只是门口多了一个小男孩在玩——是洁芝的儿子。

“嗨！”我喊了他一下。再冲着里面叫：“有人在家吗？是安得烈！”

又一次的，突然间个个都出现了。于是喊呀抱的，问这个问那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免不了要讨论的：安叔回来以后，大家睡的地方要怎样调度。

头几天，我到处看朋友。到厂里拜访了凌格先生。见了宓可儿小姐，她对我的英文大为惊叹。又看了克依斯家里的人。拜访了卫家夫妇，没想到他们就快要搬到阿姆斯特丹去了。他们做出口花的生意，做得还不错。那边有几家大的货运公司，就近比较方便。

最后我跑到艾美罗看便雅悯哥嫂。言谈间，我顺便问他有没有听到蒂丽的消息。

“啊，去年在报纸上看到她结婚的消息。好像是个面包师吧。”他轻描淡写了一句。

因为这件事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就不往下说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号，我搭上开往华沙的火车，离开阿姆斯特丹。车站里熙熙攘攘，赴会的青年学生总有好几百人，真没想到有这么多。

我的箱子重得很。衣服倒不多，另外加上几条被单几双袜子而已。箱子里大部分装的是一种三十一页的小册子，叫做“救世之道”。我想，共产党既然能利用文字来吸引我们到他们的国家去，那我也要把福音的文字带给他们。马克思说过：“给我二十六个铅兵，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当然喽，二十六个铅兵的意思就是指二十六个铅字母说的。好哇，咱们来

个礼尚往来吧。我这次就要把这本厉害的小册子带到波兰去，这里面包括了欧洲各国不同文字的版本，重得几乎把提手都坠断了。

坐了几个钟头的车，终于到了华沙总站。在站里等着他们替我安排旅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波兰我一个熟人都没有，而且话又不通。想到这次世界各地有成千成万的青年人赶到华沙开会，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我有我的目的，而我的目的跟他们的正好相反。我不禁低头默祷，我想，在这么多人当中，也许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祷告吧。

所谓的旅馆，实际上只是一间学校，他们临时用它来做这次大会的宿舍。我那房间有三十张床，本来是间数学教室。一切安顿好了之后，我立刻上街，可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漫无目的，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路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我知道波兰有一小部分的人是讲德语的，而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学了一点德语。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地用德语说：“我是荷兰来的一个基督徒。”邻近的人，本来有的在讲话，我这一叫，他们都停住了，弄得我很窘。我继续下去：“我想认识一些波兰的基督徒。希望有哪一位给我指点一下。”没有反应。直到后来，有一个胖胖的女人起身，准备下车，顺势把头靠过来，悄悄地操着德语，告诉了我一个地址，然后她说：“基督教书店。”

我心一阵激动。基督教书店?一个共产国家里有基督教书店?后来找到了那个地方。果然是一间基督教书店。摆明的，一点儿也不假。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圣经，有红字圣言版，各种文字的译本，袖珍型新约等等。可是它不开门。前面一排铁栅，锁得紧紧的。门口贴了一张告白。我看不懂，只好一个字一个字照抄下来，带回“旅館”请教别人。

我那小组的负责人看了后，笑着说：“这上头说：‘休假期间，暂停营业。七月二十一日起恢复交易。’”既然如此，我只好等了。

大会三个星期的时间表早就定了。上午是集体观光，下午和晚上要听演讲。

头几天我跟着大家一道跑，明明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华沙的一面，美化过的那一面：新建的学校，蓬勃的工厂，高耸的公寓，挤得水泄不通的商店。看起来，的确是不错。但是，我心里想，要是能让我一个人随便跑的话，我真不知道我会看到些什么。

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决定试一下。那天我起得很早。趁大家还没下楼用早餐之前，自个儿溜了出去。

好家伙，那天我看到的可多了。华沙的大街小巷任我逛个痛快。到处是战争的痕迹，令你触目神伤。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被炸毁。以前集体观光的时候，可没来过这种地方。贫民窟比比皆是。男女衣衫褴褛。那些小店破破烂烂的，买的人还得排长龙。有一幕我最记得，有一区的房子统统炸光了，可是仍然是住满了一家的人，像野兔子窝似的。原来这些人把残存的地窖清一清，就住进去了。看到一个小女孩光着脚在废墟里玩。给了她一本波兰文的福音小册，又赠送她一张小额钞票。她拿了，看我，觉得很奇怪。骤然冲上残屯，跑掉了。过了一会儿，那边地下钻出个女人来，手里拿着我刚才给那小女孩的两样东西。她走过来，步伐蹒跚，后面跟着个男人。

两个人穿得很邋遢，而且都是醉醺醺的。

用尽了德语、英语甚至荷兰话，想跟他们谈谈。无奈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不懂。再用手势示意他们读那本小册子。可是看了他们拿书的样子，我才知道他们是文盲。从头到尾，两个人只是一直地在那儿摇头。最后，我只好笑笑，还之以摇头，走了。

星期天到了。在大会时间表上，这是个大日子。排好了要去体育场参加一个示威大会。我不管它，跑去做礼拜去了。

荷兰的报纸经常提到波兰的教会首领被捕，神学院被封，给我的印象是任何宗教在波兰都不能公开露面。可是，现在看来又不尽然。明明还有基督教书店。我走过的那些天主教堂，依然是门户敞开的。心里想，就不知道基督教会的情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没在宿舍里问人家怎么去教堂，因为按规定大家是要去开会的。所以，我就一个人溜了出来，上了一部出租车。“你好。”我说的波兰话。司机报以微笑，然后噤里啪啦的回了一句。可怜我就会那么一句“你好”。只好用德语请他送我上教堂。他听了后，木然不知所云。再试英文，更加没表情。

我使出最后一招。合双掌，作祈祷状。再摊开手，作读经状。然后，当胸划了一个十字，摇摇头。意思说，非天主教堂也。末了，再示以读经状。这一来，他笑了。行行复行行，终于来到了一座红砖头带双尖顶的房子门口。他确是懂了我的意思。十分钟后，我已然置身于铁幕后一家改革宗的教堂里。

没想到，做礼拜的人有那么多，而且有不少的青年人。整个教堂坐满了七八成。唱诗唱得很起劲。牧师讲道的时候还不停地在引用他那本圣经。散会后，我留在后头，想找一个话讲得通的人谈谈。一定是我穿的衣服不像波兰人吧，因为我还没站多久，就听到了一声“欢迎”。说的是英文。转身一看，原来是那位牧师。“你能不能等一等？”他说，“想跟你谈谈。”

他想跟我谈一谈！

没多久，大部分人都走光了，只剩下牧师和几个青年人。他们表示，假如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很愿意答复。

是的，他们说，他们可以公开聚会，而且有相当的自由，只要不批评政府就好。教友里头有没有共产党员？有。国家待我们已经不薄，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们最好不必过于计较。“迁就迁就吧，”牧师耸耸肩，“此外还有什么办法？”

“你在荷兰去什么教会？”一口好英语，是个年青人。“浸信会。”

“你想不想去这儿的浸信会看看?”

“好呀。”

他马上写了一个地址给我，说：“今天晚上那边有个聚会。”

那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一些荷兰同胞们在谈，才知道他们白天在体育场听了一天的训，烦死了。我又上了出租车，这次我有了个地址。

去到的时候，聚会已经开始。人没有上午那间的多。穿的衣服也没那么考究。年青人几乎是一个都没有。我进去以后，没想到话传到牧师那里，说是会众里来了一个外国人。他听了，马上邀请我上台对大家说几句话。我吓了一跳。心里想，难道他们真的这么自由，这么没有顾忌?

“有没有哪一位会说德语的?或者是英文?”我问。当时没想到我以后会常用到这种方法。正好那天晚上他们中间有一个会德语的女人。于是，由她替我传译，我传了一点信息。我在铁幕后讲道，这算是第一次。我的信息很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只是有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来自铁幕的另一边，如今在一个共产国家里头，站在讲台上，传神的话语。

我讲完了之后，牧师说了几句非常值得玩味的話。他说：“我们多谢你来到我们这儿。即使你今天晚上一句话都没说，光是看到你，我们会觉得是够宝贵的了。我们这是一场争战。在这场争战里，我们常有一种孤单的感觉。”

那天晚上，躺在帆布床上，我不由地想到了那两间教会的差别。一间，很明显地在走妥协的路线，跟政府妥协。因此，聚会的人很多，也适合一般青年人的口味。另外一家，在我看来，比较孤单。我曾经问过，他们教会里有没有共产党员。回答说：“就我们所知道的，是没有。”短时间内有这么多的见闻，弄得我很难一下子领会出一个所以然来。

在波兰快一个礼拜了。七月二十一号，那家基督教书店恢复营业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早离开“旅館”，街上还是冷冷清清的。沿路走到新世界街的那家书店。

九点还差几分，看到一个人快步来到书店门口。他掏出钥匙，欠着身，在那儿开门。

“早。”我隔那么几步路，用波兰话向他打招呼。他站直，朝着我回了一声早。

“请问你会不会说英文，或者是德语？”我用英文问他。“我会英文，”他说，“你进来吧。”

趁他在开灯、拉窗帘的时候，我向他自我介绍。这位店东边听边做，不时应以唔哦之声。完了后，轮到他了。他让我参观他的铺子，各种各样的圣经，价钱有贵有便宜的。他跟我聊天。可是，言谈间总是在那儿探我的底细，想弄清楚我究竟是个何许人。

“你为什么来波兰？”他陡然问这么一句。

“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引了哥林多前书。

他凝了我一眼。“我们压根儿就没说到有什么苦的，”他说，“而且我还告诉了你，我们无论是印圣经也好卖圣经也好，都不成问题。”他又说，甚至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还对这间书店的工作颌首微笑过。这正足以表明此地基督徒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好。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铺子里来了两个政府官员，递给他一份公令。略谓：兹为表示庆祝斯大林生日起见，各商户必须在该店橱窗内陈列此公肖像，还要选几样最好的货色作陪衬。

“当然喽，”店东对我说，“我是太愿意合作了。当天就上街物色到一幅，正合我的意思。很大的一张斯大林五彩像，双臂交叉，两眼下望，嘴角上挂着亲切的微笑。我把它挂在橱窗里，然后打开一本最名贵的圣经放在底下。耶稣说的一段话，印着红字，正对着斯大林称意的目光。没多大工夫，窗口已经围上了一大堆人，个个作会心的微笑，在欣赏我的杰作。终于，人民警察来了，命令我说：‘把这幅像除下来！’我说：‘哎呀，这怎么行。你看，这儿是政府给我的指令，上头说得清清楚楚的。’”

我听了大笑。可是，他没笑。他的表情严肃得很。像这种带着痛苦的幽默，是铁幕后信徒们常有的经验。我这是头一次领教。我连忙把我的表情改过来，配合他的严肃。

这当中，进来过好几个顾客。我心里在想，这家小书店的生意倒不错。等到没人的时候，我们又继续聊天。我问他别的共产国家有没有基督教书店。“有的有，有的没有。”他开始沿着书架掸灰。“据我知道的，

圣经在俄罗斯非常之少。据说因此有人趁机发了圣经财。说是有一人偷带了十本圣经进俄罗斯，把这些圣经卖掉，赚到的钱居然够买一部机车。把这部机车开回波兰、南斯拉夫，或者是东德这些地方，一转手，又赚它一大笔。再买多一点圣经，再去。当然，这只是人家这么说的。”

跟这位老板谈了一个上午，别时我心不胜依依。回去的时候，我一路上在想，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荷兰的时候，常听到这边的宗教界受逼迫，可是现在这儿明明有个公开卖圣经的地方，谁要买就可以买，看不出有什么逼迫的迹象。不过，刚才我们那位老板的言谈举止却又是那么小心翼翼的，像是在经营什么非法买卖似的。那种顾忌、紧张的气氛使我觉得此中必定另有文章。

先放下这个不谈。且说，我这次来波兰主要的那件事情还没办。我决定要公然地在街上派我那“二十六个铅兵”，看会有什么结果。

一连几天，我在街角、菜场、电车上，到处派我的小册子。

从来没见过电车有那么挤的。连车厢后头的平台里外都站满了人。记得有一次我挤在平台上，把我那些小册子高举过头，免得被压坏。邻

近一个乡下女人抬头看到了。她划了个十字，用德语说：“对，对。我们波兰就需要这个。”

发了几天小册子，情形很顺利。我大为兴奋，看来这个冷门工作还颇有希望。不过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里头还是有着很强的消极态度。我本来自以为什么场合之下，我都发过了。但是，有一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想到了街那头离我们住处不远的的一个军营。我以前不但是从来没想到过要给他们些什么福音文字，反而是一看到了那些军装人物就惟恐避之不及。

我也真莫名奇妙！军装不军装跟人有什么关系？就在大会结束前一天，我上他们那边去了。门口站着六个红军卫兵。给了他们一人一本福音小册。他们看了一看书，再看看我，然后你看我、我看你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从荷兰来的。刚好其中有一个会说德语的。

“你们一定是恨透了美国占领吧。”其中一个这么说。“什么？”

“我说的是美国空军占据荷兰。”

我正在向他们解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那知他们个个突然间噼里啪啦地立起正来。来者是个官长，操着波蘭話，大声地朝着他们下命令。六个兵马上一转身，大踏步走掉了。不过还好，我给他们的这本小册子他们倒是随身带走了。

“你给了他们什么？”这个官长会德语。

“是这个，官長。”我给了他一本。他相当仔细地翻了一遍。跟他谈了两个钟头。后来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走，还有一大堆出入境表格没填，只好提早告辞。走的时候，那个出身俄罗斯东正教家庭的官长还很客气地祝我一路顺风。

第二天是我们在华沙的最后一天。我比平常起得更早。太阳才出来，我已经到了街上。在马路旁找条长凳，擦干露水，坐下看我的那本小圣经。我这次来波兰，前后遇到的人不少。我这么一大早跑出来，主要是想为他们个别祷告。于是，我有个相当长的祷告，凡是我去过的地方，遇见过的人，我都一一地记念到了。前后三个星期天，我去过长老会、浸信会、天主教堂、东正教堂、归正会，还有卫理公会。其中有五次，他们请我向大家说几句话。还有那家基督教书店、那几个兵、那个官长、在街头以及车上接触过的那些人，我都一一地为他们代祷。

正祷告的时候，听到马路那头有军乐和合唱的声音，越来越近。我看到了，原来就是这次大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胜利大游行。

这是现实的另一面。比起我见过的那家小书店，还有少数的几个基督徒，这是一股庞大的力量：当权者的逆势力。

他们来了，年青的社会主义信徒。八个人一排，整齐焕发，边走边唱，其声有如呐喊，看样子倒确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迈进。十分钟，十五分钟……一排又一排的青年男女，不停地从我面前走过。

声势赫赫的，这批人是现世纪里另一类的布道家。他们有他们心目中的“福音”，为了自己的信仰奔走疾呼。他们说，传统上由于人对神的那套观念所产生的迷信宗教是人类思想上的一种桎梏，是一种落伍的东西。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宰，我们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

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从我面前走过，时而高歌，时而按着节奏击掌如雷。我们自由世界里的人该怎么对他们？把他们统统杀光？这是纳粹的作

风，要不得。袖手旁观，让他们去?就说我所敬爱的环球福音会吧，就从来没有派人到铁幕国家去过。

那末，我们该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摊开在膝盖上的圣经在晨风中漫舞。伸手把它压住的时候，发现指尖正对着启示录里的一节经文：“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我猛然发觉自己是在泪光朦胧中看着这节圣经。铁幕后剩余的教会正在挣扎求生。会不会是神在藉着这一节圣经指示我一生工作的方向，让我在铁幕国家里工作，在坚固余民的事奉上有份?

但是，这怎么可能?这简直是想入非非!就我所知道的，当时(一九五五年)根本就没有人进到铁幕后这片大工场工作的。我一个人，既没钱，又没背景，单鎗匹马的，怎么能敌得过这一股无神论的大势力?

第 8 章

苦杯

专车按时回到阿姆斯特丹。回来的时候，箱子比去的时候轻多了。

回韦堤之前，先去拜访了卫家夫妇。他们的新家很漂亮。是幢砌棕色砖的房子，靠近河边。路两旁都是树，很美。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浅蓝色福士轿车，以前卫先生在信上提到过的。我放下箱子，站在车旁欣赏了一番。

“你看这部车怎么样？”回头看，原来是卫先生站在那儿，对着我微笑。他让我上车，带我到河边附近兜了一圈。“尽在夸自己的，”他说，“也该轮到你来报道一下游波兰的情形了。”于是，我把旅行的观感向他们说了一遍。也提到了那节来得神奇的经文。“可是，你叫我怎么个坚固法？”我说，“我一个人会有多大的能耐？”

卫先生摇摇头。他同意我的看法。我所形容的那种需要，岂是一个单鎗匹马的荷兰人所能应付得了的？惟有卫太太独具慧眼。

“你不用操心!”她说得很轻松,“我们越是软弱,神就越能用我们。这你难道不知道?说不定这是圣灵自己的计划。你说你一个人……”

回到韦堤那天晚上,左右四邻来得个络绎不绝,问的问题大致不外是那些个。当时(一九五五年)铁幕刚开始,对外旅行有限度的开放,共产世界在外人心目中依然是相当的神秘。

终于,客人走光了。是睡觉的时候了。我伸个懒腰,拿起箱子,跟在哥尼流后面,上楼梯,准备进阁楼休息。

“安得烈,你等一下。”洁芝在后头把我叫住。“你来,让你看一个地方。”她说。

我下了楼梯,跟着她走进客厅隔壁的那个房间,是从前爸妈的卧房。这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往事:毛毯下贝斯枯槁的形体;大战结束前那几个月里,母亲病到连头都抬不离枕头……

“最近在凉台上加盖了一个房间给爸住,”洁芝说,“我们觉得你可以住这个房间,比较宽敞。”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也真难为了阿里和洁芝，房子已经够小的了，还特意为我腾出个房间来。

“住到你结婚的时候再说吧！”爸从客厅那头冲着这边嚷。爸最近开始在替他这个二十七岁的光棍儿子操心了。“就住到那个时候再说吧！”他又加了一句。

我结结巴巴的，几乎不知道该怎么谢他们才好。那天夜里，等大家都上了床之后，我关上门，在房间里踱踱一番，摸摸这个，碰碰那个。

我说：“主啊，我为这张椅子感谢祢。还有这个衣柜……”

对了，那头可以摆张桌子，改天自己动手做一张吧。我要好好地利用这个房间，读点书、办点事，还要计划一下将来的工作。

回来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些人来请我去给他们演讲报道。教会啦、社团啦，以及学校等等。大家都想知道铁幕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是来者不拒，一概答应下来。固然是因为自己经济上实在有需要，但是主要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因为我有个感觉，总觉得神会藉着这个机会让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果然不错。事情是这样的：

哈林有家教会请我去，事先在城里到处张贴宣传，还替我安了个题目：“鐵幕後基督徒實況報道”。像我这才去了一个地方，而又只待了三个礼拜，这样个题目未免是太过了一点。但是，这标题的确有号召力。那天不但是全场爆满，甚至连共产党那些人也来了。

我一眼就认出他们，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上次也去了华沙。心里想，这下子不晓得他们会耍些什么花样。我开始讲我的。完了之后，还有一段时间让听众发问。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自始至终不动声色，居然没找我的麻烦。只是，会后有个女人走过来。上次参加华沙大会，她是我们荷兰代表团负责人之一。

“你刚才说的，我实在不敢恭维。”她说。

“那太可惜了。不过我也早就料到你不会怎么欣赏的。”

“你那只是个片面的报道，”她说，“你观察得还不够。你需要多跑些地方；跟他们的领导阶层多有点接触。”

我没吭气。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再出去跑一趟。”

我屏息以待。

“目前我在负责组织一个捷克访问团。预计去四个礼拜。有十五个名额，包括学生、教授以及新闻界人士。我们也希望教会方面有人参加。你来一个怎么样？”

难道这是神的带领？是祂给我安排的下一步？可是，钱在哪儿？这件事我得跟神商量。这次又是个钱的问题。“主啊，假如祢要我去的话，”我默祷，“祢就得在经济上替我想办法。”

“谢了，”我高声说，“非常抱歉，我实在付不起那笔费用。”说罢，自顾忙着收整我带来的那些照片，全是华沙的。

她还在那儿，我意识到她的目光紧随着我。“这个我们可以替你想办法。”她终于开口了。

我抬起头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关于费用方面，你可以免费参加。”

于是，我再度进入铁幕。情形跟去波兰那次大致上没什么两样。只是，这次人少，想要单独开溜可就难多了。眼看四个礼拜就快完了，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我来这么一趟。可是到了后来，我懂了。

共产政权下，人人有宗教自由——来了这么多天，这种话我听得多了。后来，我们的向导还加以补充，说是，捷克政府还特地礼聘了一批圣经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最近刚完成了一部圣经新译本。目前正在进行编圣经辞典的工作。

“有机会的话，倒很想见见这些人。”我说。

想不到，那天下午他们真的带我去了。教联大厦在布拉格市中心。进去以后，我头一个印象就是：没想到教会机关，居然会有这么大的门面。来到个地方，一间接一间的办公室，桌上文件数据堆积如山。里头坐着的尽是一些学者风度十足的黑衣绅士。据告，翻译圣经的就是这些人。蛮象样的嘛，我心里这么想。介绍过后，我们谈起来了。可是，慢慢地我发现事情有点蹊跷。我问他们要一本新译圣经看看，结果搬出来的只是一部又厚又旧的原稿。

“这译本还没出版呀？”我说。

“唔，还没有，”其中有一位这么说，苦着个脸，“其实，这东西在大战结束那个时候就已经翻好了。不过……”他瞟了我们那位领队一眼，把话吞回去了。

“那末，那本圣经辞典编得怎么样了？”

“快了。”

“可是，你们总不会光出圣经辞典而不印圣经吧？是否目前你们在用别的译本？”

这位学者又看了看我们领队的脸色。“没有，”他终于下定决心，冲口而出，“这些年来，我们这儿很……很缺圣经。”

领队眼看情势不妙，马上收场告辞，不让我有机会再问下去。可是，太晚了。我已经意味到个中的阴谋。共产新政权一心要逼害宗教；可是，捷克原是个宗教气氛很浓的国家，因此，政府避免采取强硬的手段，而代之以慢性的扼杀。说是重翻圣经，可是怎么也不见它出版。编圣经辞典，编了辞典却没有圣经。

第二天，我请我们的向导带我到杨曼露华街九号那家基督教书店逛逛。拿定主意，要看看买圣经究竟有多难。店里摆满了文具用品、唱片、乐谱、画像、塑像、十字架，以及各种与宗教有关的书籍。要是在荷兰的话，像这类的书店里头，定规有一摊地方是专摆圣经的。可是，它这儿没有。

“我想要一本红字圣言版的圣经。”我找女店员。英文或是德文，在布拉格还蛮好用。

她摇摇头：“对不起，先生。这种的卖光了。”“那么，就要一本普通的好了。”

但是，看她那样子，似乎是连这个也没有了。

我说：“小姐，我老远从荷兰跑来，为要考察贵国教会的情形。如今我来到这号称全国最大的基督教书局，竟连一本圣经都买不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叫我等一下。转过身，进到后面去了。幕后传来一阵紧急的磋商，接着是用纸包东西的沙沙声。然后，经理先生亲自出现，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有了，先生，”他把货交给我，“目前我们几乎没有货，因为所有的圣经都不印了，只在等那个新的译本出来。”

就剩最后一天了，节目排得很紧。白天要到布拉格郊外参观一个模范住宅区。完了后，回来吃晚饭。饭后有个记者招待会，最后是惜别会。

要是平常的话，为了礼貌起见，我还可以勉强跟着大家一齐跑。可是，那天偏偏是个星期天。我早就有意思摆脱“向导”，单独地去做一次礼拜，现在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为了要开这个小差，已经计划了好几天了。先前发现我们那辆专车后门上的弹簧有毛病，以致门关不紧，旁边留出一道尺来宽的空隙。要是挤一挤的话……

那天早上我们从旅馆上车；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每次经过红绿灯的时候，心里总是盘算，想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从后门溜走。无奈那些人观光兴致颇高，东张西望的，令我一时无法脱身。后来，终于机会来了。前面来了座铜像，是个什么人的马上雄姿。究竟是何许人物，我不得而知，因为正当领队开始讲解，大伙儿伸长脖子向前看的时候，我趁机收个小腹，打门缝那儿挤出去了。嘘嘘复隆隆，是放刹车而后上油门的声音。专车去矣，留下我一个人逍遥街头，好不开心。

上次集体在城里观光的时候，就让我认住了一家教堂，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去一趟的。半个钟点过后，我终于进了这家教堂。站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先对那些进来的人加以观察。我最急着要看看教会没了圣经究竟是怎么过的。很少人带圣经，带诗歌的倒还有几个，可是也不多。奇怪的是，我看见很多人手里拿着一本活页的笔记簿，让我一时猜不透它的用途。

进了会堂，在后面找个位子坐下。聚会开始了。先是唱诗。这一来，怪事出现了。大部分的人似乎都有远视的毛病！手里捧着圣诗的人，个个把胳膊撑得又高又直。那些拿笔记本的也是这副姿势。我稍一留意，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这么做是要让附近那些没有诗本的人一齐看。而那些笔记本原来都是些手抄的圣诗。

读经的时候，也是如此。有圣经的人先找出经文，然后高高举起，与邻近的人共睹。大家挺费劲地在那儿“亲近”神的话语。目睹这种光景，我不由己地伸手紧扣住自己外套里的那本荷文圣经。我永远忘不了前排的那位老太太——翘首企足，眯着眼，吃力费神的，为要看清楚她儿子手上摊开的经文。

会后，我向牧师自我介绍。我说我从荷兰来，主要的就是为了要跟此地的信徒们有点交通。他听我这么说，兴奋极了。

“以前就听说我们政府正准备放宽入境，只是没把它当真的。不瞒你说……”他环顾左右，“战后这些年来，我们简直是在坐牢。你一定要来我家，我们好好地谈谈。”

他带我上他住的地方去，是间公寓。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这么做，对他自己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他告诉我说，捷克政府正在对教会进行全面控制。例如，你想念神学，得先经过政府核准。如果他们觉得你有问题，你就别想念。牧师每隔两个月得换一次执照。最近他有一位朋友就没获批准。根据什么理由？官方不予解释。每次讲道之前，得先把讲章呈送当局审核批准。各个教会必须将各部门的负责人姓名报呈政府备案。当时，布鲁诺有五位主里弟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上了法庭，因为他们的教会在信仰上不赞成对带领的同工予以指名。

后来，他们教会第二堂礼拜的时候快到了。

“你来向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好不好？”他突然这么问。“方便吗？我是说，我在你们这儿讲道，不会有问题？”“我可没说‘讲道’这两个字。我们在

用字上得有考究。你是个外国人，按规定是不许讲道的。不过，你可以代表荷兰的信徒向我们‘问候’。而且，”他笑了笑，“如果你觉得从上那里有领受的话，也不妨替祂向我们‘致意致意’。”

我去了，替我传译的是个医科学生，名叫安通宁。我先用上几分钟的时间，代表荷兰的信徒向他们问候。然后，再花上半个钟头替耶稣向他们“致意”。结果非常好，安通宁提议我们可以再上别的教会去，如法炮制。结果那天我前后跑了五个教会，讲了四次道。每个教会都有它值得回味的地方，尤其是最后去的那家，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我在那儿得了个“苦杯”。事情是这样的：

几个地方跑下来之后，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当时十一月的天已经黑了，心想也该回去了，免得访问团那些人老在为我担心。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安通宁问我能不能再多去一个教会。“我觉得他们那里的人最需要见见外来的人。”他说。

于是，又上路了。行行复行行，终于来到郊外一间小小的莫拉维弟兄会。教会虽小，人却是多，尤其是年青人。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有四十人上下。“致意”过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荷兰的基督

徒能不能找到好的职业?你上教堂，会不会有人向政府告密?去了教会之后，还能不能进好的大学?

安通宁加以解释：“这些年来，政府硬是把基督徒当作问题人物看待，以致很多人在工作上、学业上吃了大亏。所以，”说着，从他身边一位年青人手里接过一盒子。“他们希望你把这个收下，留做纪念。”

接着，那位年青人操着捷语，很恳切地向我说了几句话。

“请你把这个带回去，”安通宁替他传译，“遇到有人问起的时候，你可以把我们的苦情告诉他们，请他们记念我们也是主身体的一部分。”

我打开盒子。里头是一枚小小的银杯状胸饰。先前就看到好些个青年人戴着这种东西，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安通宁替我别上，说：“这是我们捷克教会的标记。我们叫它做‘苦杯’。”

安通宁送我回旅馆。他走了之后，我又想起刚才的那一幕。我体会到荷兰信徒与捷克信徒之间，自由世界教会与共产世界教会之间竟有这么大的隔膜。“苦杯”所象征的那个现实，是我们所有信徒所应该面对的。

说到面对现实，我眼前就有一个问题得先解决。原来，访问团的那批人不在旅馆里面，也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有一家餐馆我们常光顾，不妨去看看。到了那里，他们告诉我：“荷兰来的那几个客人今天晚上没来过。”

“哦。我想要一客三文治。你们还没这么快打烊吧？”“没问题，先生。”

刚咬了一口三文治，那头大门开处进来了一个人，正是我们那位女领队。她放眼四顾，终于看到了我。先是松了口气，继而怒容满面，三步当两步跑过来。截住伙记，霍地抽出一张钞票，替我付了账。然后狠狠地晃了晃头，示意我出去，气得连话都说不出。

门口停着一辆黑黑的公家轿车，引擎一直是开着的。司机出来替我们开车门，那张脸臭得无以复加。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想起好莱坞的那些绑架镜头，我马上开始认路线。

说来好笑，紧张了半天，才发现他们不过是我带回旅馆去。

快到旅馆的时候，领队这才开口：“你误了我们大家半天的时间。所有的医院、警察局，我们都问尽了。最后连殡仪馆都问了。很可惜，你不在殡仪馆！你究竟上哪儿去了？”

“哦，”我说，“我走丢了。只好随便到处逛逛。实在抱歉，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

“唔，”她说，“我站在官方的立场正式告诉你，我们以后不欢迎你来捷克。不信的话，你将来不妨试试看。”

一年后，我再度申请去捷克，没批准。再过两年，我又申请，还是不准。一直到第三次才准了。那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这期间，我又去

过别的共产地区，见过更厉害的逼迫。比较起来，捷克的情形还算是好的了。

第9章

整装待发

访问波兰和捷克那两次，因为是随着团体去的，所以在申请手续方面非常顺利。可是，往后那几个月里，我想自己再去一趟这两个地方，并且试试别的铁幕国家的时候，情形就迥然不同了。一连几个月的公文手续——填表、调查、积压拖延，结果总是拿不到签证。弄得我情绪奇低。

甚至连我自己那个小房间都要跟我过不去。记得在捷克的时候，常想念到家里自己的那间斗室，归心颇切。谁知，回来以后竟又发现这里头有点美中不足。也许就是因为它太温暖太舒服了吧，反倒令我有所感触，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

经常独坐房中给各国领事馆写信的时候，常想到若是能有一位妻子在身边，而她对铁幕后的圣工也有着同一个异象的话，那该多好。可是，对女孩子说，一般宣教士的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何况是我心目中的这个新工场？生活不安定，又没保障，常别离，而且行动诸多顾忌，能保得住没有什么三长两短已经算是好的了。像这些个条件，让女孩子知道了，你想她会怎么说？按理说，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我理想中的是

个秀外而又慧中的女孩子，既是慧中，那末她应该是会谅解的吧。心情比较好的时候，这么想想，自己也觉得好笑。

另一个是钱的问题，家里的开销，虽然洁芝和阿里没提起过，我总觉得自已该负起一部分责任。上次刚从波兰回来不久，就有一家“至高者的能力”杂志社请我就铁幕后的见闻给他们写几篇稿。当时认为自己对写文章是外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表示。可是，现在好像听到神在对我说：“你给他们写几篇稿吧。”

心里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桌上的那个钱包经常是空空如也的，我也为了这件事情不断地在祷告神，可是我明知那份杂志是没有稿酬的。所以，看来这感动似乎跟钱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心里头的确有那个感动。惟有顺服，坐下来写我的观感。不只是波兰，还加上捷克的。第二天就把文章连同一些照片寄出去了。编辑收到后，来信道谢，并没有提到钱。采用原是意料中啊，过后我也就把它忘了。

可是，后来有一天，那家杂志社来了一封信。原来，有件事很妙。虽然我在文章里根本没谈到自己经济上的需要，也没表示过要考虑重访铁幕，然而却有不少的读者从荷兰各地寄钱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所以编辑来信问我要怎么处置。

供应就这么开始了，往后精彩的还多着呢。起先，各地的捐款没太多，而我的开销也不大。除了分担家用之外，其他的就如：外套太破了，需要换新的。答应过安通宁，要设法给他寄一本捷文圣经。读者们的零星捐献正好可以应付这些小开支。往后，我的工作有了开展，需要也增加了，读者们的捐献也就随着多起来。直到后来——几年后——碰到需要大笔经费的时候，神才转用别的办法。

但是，这次投稿对我个人的影响，主要的还不是钱。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上午我收到一封信，是阿穆尔斯福乡一个祷告会的负责人写来的。信上说：他们读过我的文章，最近圣灵感动他们，要他们跟我联络。究竟是为了什么？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只是问我能不能到他们那儿去一趟。

这倒很有意思，如果圣灵在人身上的带领真是这么准确细腻的话，那我倒需要在这方面多有点认识。

我去了，聚会的地方在一位堤防营造商卡尔·迪古拉夫先生的家里，一共有十来个人。

他们这祷告会跟人家的不同。我从前参加过的那些祷告会在程序上大致都是安排好了的，由某一个人主领，或者再加上一段查经。可是，这些人不然。大部分时间是静的，像在聆听什么似的。偶尔有人随着感动，开声祷告，也是赞美的成份居多，是爱的流露，而不只是构思过的祈求。好像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觉得神是那么的亲近。因着祂的同在，心里满了喜悦，别无所需，别无所求，只有感谢与赞美。

在静静的思聆等候中，间亦有人感受到某种特别的指示，就把他的感动说了出来。“余思德的母亲在美国，今天晚上我们需要为她祷告。”“主啊，感谢祢。我觉得祂已经答应了我们以前为史提夫的祈求。”

像这种方式的祷告，我还是初次领略，觉得非常亲切自然，无形中时间也就好像过得特别快。待散会后，回房就寝，看到桌上的钟指着清晨四点半，还真不敢相信呢。

回来没多久。有一天正在房间里替那家杂志写稿，听到洁芝在叩门。“安得烈，有人找你。那个人我不认识。”

跑到大门一看，原来是迪古拉夫先生。“嗨！”我没想到是他。“嗨，安得烈。你会不会开车？”“开车？”

“开汽车。”

“不会呀。”我莫名奇妙。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得到神的指示，说：会开车对你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为什么？”我说，“将来我自己又不会有车。”

“安得烈，”他说，像在指点一个笨学生。“我不是在讲理，我只不过是个带口信的。”说罢，开着车走了。

实在看不出学开车对我有什么用，听了也就算了。可是，过了一个礼拜，这位堤防营造商又上门了。

“你开始学开车没有？”

“哦，还没有。”“神的旨意你得听呀。看样子得让我来教你了。来，上车吧。”

自从十一年前那天上午，我发动那部机鎗车在营里风驰电掣，几乎闯大祸之后，这还是头一次上驾驶座。

此后他常来教我，教得很得法。还没有几个礼拜，我就跑去考驾驶执照。一考就考取了，在荷兰考执照很难，能够一次通过的人并不多。执照是拿到了，但是拿了有什么用？我还是想不通。像我这连部自行车都没有的人，难道会有汽车？迪古拉夫先生认为不必去问它为什么。“先顺服了再说，然后静待下回分解，这才够意思。”他说，“神的用意你往后定会知道的。”

一九五六年秋，匈牙利革命爆发。荷兰举国瞩目。在惊惶动乱中，成千成万的难民从铁幕后逃了出来。不只是匈牙利，还有南斯拉夫、东德，以及其他的共产地区。邻近的那些自由国家边境上尽是些难民营。营地的情形据说是糟得一塌糊涂。乡公所门口有人在征求志愿人员，前往协助难民营的工作。我参加了，搭上第一部专车离开荷兰。

客车前面坐人，后面装满了救济品，吃的、穿的，还有医药用品。西德和奥国边境上的那些大难民营正在等着配给。

百闻不如一见，看到的情形比听说的还要糟。一个房间住上十家难民，是件很平常的事。到了白天，有的人把铺盖挂起来当墙，聊以保持一点家庭气氛。

要做的事情太多，感觉上宛若浮游于汪洋大海之滨，一望无际。分发衣物、药品、写信、代人寻亲、代办签证……忙得不亦乐乎。此外，只要有时间，我就邀请大家来参加祷告读经的聚会。我发现大部分人对圣经一无所知，老一代的多半是文盲，年青的一代受的是共产教育，更不必谈了。

在营里分区主持了几个小组查经班，讲解圣经里的基要真理。多数是请大家替我传译。虽然参加的人毫无基督教背景，然而神的话语在他们身上大有功效，这是我意料不到的。灰心丧志的因信得力，也成为别人的帮助。怨郁的有了盼望，自惭形秽的有了光彩。

记得有一对老夫妇，从南斯拉夫逃出来。女的很胖，浑身怪味，下巴上的汗毛足有一寸长。男的农家出身，在南斯拉夫有个祖传的农场。太太每天倒还做一点事，把他们自己铺位那块地方整理得蛮干净的。只是先生感于离家别井前途茫茫，终日就那么坐在帆布床边晃呀晃的，在那儿发呆。

后来，他们参加了查经班。神的话大大地感动了他们。老先生一边听一边在流眼泪。过了几天，我发现老太太下巴的汗毛不见了，老先生也开始注意刮胡子了。他们终于悔改蒙恩，成为神的儿女。

有一次会后，老先生对我这么说：“要是我——”他略为顿了一下。“要是什么？”传译的追问一句。“要是我早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就有福音听，那该多好。”

是的，我也这么想，这么愿望。

带来的救济品早就发光了。于是我们又回荷兰去办补给。趁在家的時候，我去了一趟南斯拉夫领事馆，再度申请入境签证。过去曾经申请过，但是没下文。

又是填表、贴照片的(我现在有经验了，照片一洗就是几打)。

什么时候有消息?还是那句老话:“这需要有一段时间。”

填表的时候，我又碰到了“職業”那一栏;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我略为犹豫。因为我怀疑以往申请之所以没有成功，很可能与我填的那个职业有关系。但是我也想到基督徒做事理应坦荡无私、光明正大。于是，跟以往一样，我填上了“宣教士”三个字。

车子又装满了救济品——毛毯、衣服、奶粉、咖啡、巧克力……我们又回难民营去了。

正在西柏林做救济工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电报。父亲遽然离世，是在菜园里倒下去的。

马上搭火车赶回去，葬礼很简单。依照荷兰的惯例，将母亲原有的墓穴松开，然后把父亲的柩木搁在她的上头。因为荷兰的地很有限，以致于有这种习俗。

家，而今显得那么空寂。再也听不到那惊天动地的嗓子。见不到那魁梧的身形欠躬垂注于青圃丛中。他就喜欢种菜，乐在其中……

事过后，我回西德继续做救济的工作，把全副的精力都放上去了。西柏林的这些难民营，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有了，专为收容战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后来日子久了，人也把它忘了。到了最近匈牙利事变来了一批新难民，这才又受人注意。我觉得这些难民最可怜，尤其是小孩子们。有些十一、二岁的孩子，连普通象样一点的房子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住的地方以及配给的衣服，两个单身的合起来要比一对夫妇的多。因此，很少人结婚。孩子们大部分是私生的。荷兰方面，我认识好些个家庭愿意收养。洁芝和玛芝她们也想要。连着几个月在那儿替她们办收养手续。可是，每次到了体格检查的时候，那些孩子们总是通不过。那些营区既冷而又潮湿。里头的人，十个有九个身体有病，而且肺病特别多。墙上常有公告，给青年人机会去瑞典或者美国找出路，但是要身体好、没病的。看起来像是故意在跟那些人开玩笑，吊他们胃口似的。

日复一日就这么忙着，在那种令人心酸的环境里忙着。有一天晨更的时候，我忽然心有所感，就像是听到一个声音似的，说：“你今天可以拿到南斯拉夫的入境签证。”我不怎么敢相信。一天到晚忙着难民营的工作，几乎忘了自己正在等签证。到时候，我静静地望着窗外，在宿舍里等着上午的那封信。送信的来了，我赶紧跑下去。“有你的一封信，荷兰来的。”她说，伸手到邮袋里找。

我接过信来，谢了她。看封面，是海牙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来信，寄到家里。洁芝把地址改一改，原封转给我。就地拆开，阅罢，大惑不解，因为信上说，申请入境碍难批准。短短的几个字，也不说明拒绝的原因。

这是什么意思？我明明预感到今天会拿到签证的嘛。对了，难道是要我换个地方，到柏林的南斯拉夫领事馆再申请一次？事不宜迟，马上回房，抓了几张照片就往电车站跑。不消一刻钟，我又开始在那儿填表了。填呀填的，又填到了“职业”那一栏。唔，多次碰钉子，毛病准是出在这上头。

“主啊，”我心里这么叫，“这一项我到底该怎么填呀？”

忽然间，我想起了主耶稣交托门徒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既说教训，那我岂不是个教师？于是，我就这么填了，最后把表交给办事员。

“你坐一会儿，我这就替你办。”他拿着我的申请表，往另外一个房间跑。

我等着，等着，担心死了。甚至于疑心自己听到了发报机的的答答的声音。事实证明我太多心。因为，二十分钟过后，他出来了，满面笑容地祝我一路顺风。

急着要与人分享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家人？可惜他们没电话。用邻居的又不方便。卫家？对了！他们有。

拨了个长途电话，那头接话的是卫先生。

“卫先生，我是安得烈。难得你白天在家。”

“我以为你还在柏林。”

“我是在柏林。”“啊。前些日子听到令尊过世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

“谢谢你们。可是这一次我有个好消息，非告诉你们不可。我拿到南斯拉夫的签证了。先是向海牙的大使馆申请，他们不给。后来我又跑到这儿的领事馆，居然办通了，这下我可真是要进铁幕传福音去了。”

“好极了，安得烈。你最好早点回来拿你的钥匙。”

“对不起，这电话不太清楚，我好像听你在说钥匙还是什么的。”

“是的。我是说我们那部汽车的钥匙，这车是你的了。现在，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你千万别跟我们客气。早几个月我们就决定好了，只要你拿到签证，我们就把这部车子送给你，现在就等着你回来拿车了。”

这份礼太大，我实在不敢收。阿姆斯特丹见面以后，我认真地婉拒了一番。

“你们自己办事没车怎么行?”我说。“我们自己?”卫先生有点急了，“安得烈，你这是替大君王办差事呀!我们这算什么?这件事我俩早就祷告过了。你不要再说了。”

于是，当天下午，在兴奋而又腼腆的情绪下，跟卫先生一道去办了过户手续。一部漂亮的蓝色福士轿车，几乎是全新的，就这么成了我的。

什么都好，就是进韦堤的时候有点不自在。原来是想悄悄地把车子开回家去，无奈像我们韦堤这种小地方，你开了一部漂亮的私家汽车，是怎么也逃不过人家的耳目的。登时整个村子的人知道了。

大家围过来，想知道这部车究竟是谁的。我说是我的。果然不出所料，众人大不以为然，打铁师傅的儿子弄了这么一部车子做什么?

“看样子，干传道这一行倒挺不错的嘛!”有位仁兄扮了个怪脸，半开玩笑地这么说。

大家都笑了。虽然我再三声明这是卫老夫妇送的，他们还是不能谅解。总之，铁匠的儿子就是不应该有车。以往在难民营里工作的时候，本乡的人倒还经常零零星星地给我一点补贴。可是，从此以后，这笔财源就断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起了变化。

这且不管，我这头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计划行程、收购福音文字数据。为了要找适用于南斯拉夫的那几种语言，我几乎跑遍了整个阿姆斯特丹。买到以后，还要在车上动脑筋，研究障眼之道。至于这一路上的开销，神到底要怎么预备？这问题，我当然也想过。

预定三月底出发，动身之前，去看了一次迪古拉夫先生。他的信心终于得到了证实。我在想，当他看到我这部车子的时候，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急着要看看。

可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很好，”他说得若无其事，“我知道差不多这个时候你会有车的，因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神最近指示我们，说你今后的两个月里会有额外的开销。这笔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请你收下吧。”

他把信封交给我。我当下没拆开，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
里头的钱准是不多不少刚够我这一程用的。

于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亲友们告别，踏上征途，直驶铁幕后的
南斯拉夫。

第 10 章

夜里明灯

前面不远就是南斯拉夫。这还是我有史以来初次只身往共产国家跑。以往两次都是随着团体去的，而且都是政府主办的。

先在奥国边境上一个小村子的外头停了下来，把车里的东西整理一下。

那时候是一九五七年。外旅进入南斯拉夫规定只准携带随身用品。由于黑市盛行，任何新的或是量多一点的东西都会招疑。印刷品最容易被没收，即使量不多，也难过关。因为凡是进口的书刊，他们一律认为是外国的宣传品。像我这满车子的圣经加上单张，你叫我怎么带得过去？于是，我开始祷告。这是我初试“奉天承運”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要把车里这些圣经跟单张带进去给祢那边的儿女们。当祢在地上的时候，祢曾经开了瞎子的眼。如今，我求祢反过来使那些开眼的瞎了吧。那些检查员，祢有什么不想让他们看到的，就求祢障了他们的眼。”

于是，配备了这么一个祷告，我发动车子，直趋边关。两个检查员看到我来，既紧张又兴奋。大概是来往的人不多，闲着无聊吧。先让他们看证件，看他们的表情，很可能是从来没见过荷兰的护照。他们用德语对我说，再有些例行手续，完了后就可以让我过去。说罢，其中一个开始研究我的露营用具，在那东摸西敲的。而我一盒盒的单张就夹在睡袋和帐篷的折缝里。

“主啊，求祢蒙蔽了他的眼睛吧！”我暗自祷告。

“你有什么要报关的没有？”

“哦，除了随身的一点现款以外，还有一只手表，一架照相机……”

另一个兵朝我车里张望，叫我把一只箱子拿出来，我知道那里头又是一大堆单张混在衣服里面。

我把箱子提出来，放在地上，打开盖子让他查。他掀开上头的几件衬衫，底下一堆单张赫然在焉，上头印着南斯拉夫西北区的两种文字。像这种情况，可真要看神怎么处理了。

“天气还没热，就这么干燥！”我转过身去，跟另一个兵寒暄起来。我跟他谈起荷兰的情形。我说，那边的低地终年都是那么潮湿。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回头看了看。岂知原先查箱子的那个兵不但没在查，而且早已伫立一旁，在听我们聊天。我这一回头，才又提醒了他。

“对了，你还带了什么别的没有？”

“其余的都是些小东西。”我说。单张这东西是没多大嘛。

“那就算了。”他颌首示意，让我把箱子关上。然后摆摆手，致个意，把护照还了我。

第一站是扎古列(译注:约二十万人口)。我有当地一位基督教领袖的地址。是荷兰圣经公会给的，因为这人过去曾经大批地买过几次圣经。不过，自从一九四五年铁托做主席以后，就没了他的消息。十几年前的地址，他是否还住在那儿?谁也不敢说。没办法，只好试试看吧。于是，在离开荷兰之前，先给他去了一封信。我谨慎措词(告诉他三月底的时候可能会有个荷兰人到南斯拉夫走一趟)，这是前因。后来事情的经过非常奇妙。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那封信寄是寄到了，只是那位基督徒早已搬了家。他的名字，我在这儿姑且称之为贾秘。新房客没有他的地址，

就把信退回给邮局。两个礼拜后，邮局终于打听到了贾秘的新地址。就在我进入南斯拉夫那天，他同时收到了我的信。阅罢，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神秘的荷兰人究竟是谁？跟他联络会不会有危险？但是心里头总觉得不应该置之不理。就暂且回以前住的那家公寓看看吧。于是，坐上電車，就这么去了。

到了之后，先在路边站上一会儿，计划下一步该怎么进行。到底这荷兰人是否已经来找过我？要不然，是否该关照现住的那家人，告诉他们，说不定哪一天会有一个荷兰人跑来找我？这样做会不会启人疑窦？

就有那么巧，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车子来了。不但如此，我停车的位置其准无比，以至出来的时候，跟他面对面会个正着，彼此相距不及两尺。一看车牌，他就知道我是从荷兰来的，我们就这么碰头了。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高兴极了。就跟我以前在波兰的时候情形一样，他向我表示，在此地能够见到一个外国来的信徒，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他们实在是太孤单了。说到安排聚会的问题，他表示义不容辞，一切包在他身上。他说他认识一个人，替我做传译最合适，是个年青的

工科学生，名叫尼可拉。几天后，我开始工作，开着车子到处“致意”，由尼可拉当传译，兼充向导。

我的签证是五十天，在这七个礼拜里，我不停地工作。前后一共领了八十几次会。主日最多的时候一天讲六次道。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充沛的精力。大城市去过，小乡下也跑。在北部我可以公开讲道，在南方就没那么方便，因为那一带共产党控制得最严。

初看，南斯拉夫的教会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逼迫。虽然我每到一个新地区都得向警察局报到，但是我可以随意到信徒家里访问。而且教会是公开的，很多地方我可以明着讲道，不必以“致意”做掩护。除了某些禁区以外(大部分在边境上)，我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官方向导的监视。

情形似乎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可是，慢慢地我才发现南斯拉夫政府对付基督教是采取一种慢性消灭的政策。主要对象是年轻的一代。年纪大的，它不管你。最要紧的是让年青人与教会绝缘。

到过一个小乡下天主教堂，距离扎古列不远。发现整个会众里没有一个人是在二十岁以下的。我问尼可拉是什么原因，他介绍我认识一位乡下女人，她家里有个十岁大的儿子。

“你能不能告诉安得烈弟兄，为什么你家的约瑟没跟你一道来？”

“你问为什么我那小孩没跟我来？”她答得很伤痛，“唉，只恨我是个乡下女人，没念过书。他的老师告诉他说，这世界上没有神。我们的政府也是这么说。他们对我的孩子说：‘虽然你妈对你说有神，可是你得知道，她究竟是个没念过书的人。难道她懂得的比我们多？你不理她也就算了。’所以呢，他就不去教堂了。”

后来，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白天的时候，有机会到一位信徒家里访问。看到他们家的小孩正在屋子外头泥地上玩。就问道：“她怎么没上学？”

做母亲的加以解释。因为她女儿在家里有谢饭的习惯，所以到了中午在学校里吃饭的时候，她也照样很自然地先开声祷告，然后进餐。她的老师看到了很不高兴：“你吃的这些东西是打哪儿来的？是神给的吗？还是人民在伟大政府的领导下，以劳力换取的成果？你这样做法真要命，不但自己迷信，而且还会影响别人的思想。”

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她还是照样地谢饭，因为她实在是祷告惯了。就为了这件事情，她被迫退学了。

后来我到了马其顿省。南斯拉夫分六省，其中最穷的就是马其顿，共产党管得也最凶。当地人上教堂的时候，常战战兢兢的，心怀顾忌。记得我头一次的聚会，约好是在上午十点钟的，可是，当我们按时到达那间教堂的时候，发现里头空空如也，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不懂。”尼可拉把这个教会牧师给我们的信又看了一遍。“对嘛，就是这个地址。”

看看已经十一点了，再等下去也是没用，不如回去吧。就在我们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候，那头忽然来了一位村民，打我们身边经过，跟我热烈地握手，并祝福我一路平安，蒙神保佑。然后，若无其事地走掉了。等我这头正要转身去开车门的时候，咦，怎么又来了一个乡下人，跟先前的那个一样，过来跟我握手，问好。就这样一连四十五分钟，好像整个村子的人个个都在这个时候出来逛街似的，而且偏有那么巧，每个人都会从我这外国传道人的汽车旁边路过，得以跟我握手，向我问候。

后来我问尼可拉，他说他也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

这以后，到了马其顿省另一个地方。晚上八点钟有个聚会。教会的牧师请我们吃晚饭。饭后，差五分八点的时候，我提议说我们该去了。

“哦，还早呢。”那位牧师往窗外看了看。到了八点十五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你不怕人家都在等我们？”

他又往外看了看，告诉我还是太早。

又过了十五分钟，他这才起身到窗口观看天色，点点头说：“现在我们可以走了。这儿的人总要等到天黑了以后才到教堂来。当然，我们聚会又不是犯法，不过，小心点总是好的。”

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情形，是我后来在马其顿各地司空见惯的。入夜以后，乡野四周渐渐出现了闪烁游移的灯光。是三三两两的农民(至多不超过三人一组)，每人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漫步穿过阡陌，朝教堂的方

向走。镇里唯一的那条街，两旁小泥房子里出来了一些人，拿着燈，低低地，让人看不清他们的脸。

一旦到了教堂里头，大家就都无所谓了，让人家看到就看到吧，要是说危险的话，大家都一样。

墙上有好些排钩子，给挂灯的。灯光给会场平添了一股温暖舒适的感觉。我的主题是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我说，尼哥底母也是挑夜晚上来寻求主。其实，白天夜里都无所谓，只要有心，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寻求神。参加聚会的有两百多人。会后决志的有八十五位。他们立志走义路，虽然当今这一程显得黑暗重重，并不好走。

当初曾经向尼可拉表示过，希望他替我安排的行程上有大城市也有小地方，二者兼顾。若说小地方，落沙矾可真是个小地方。十足的穷乡僻壤，你想去一次都不容易。

前一阵子，半路上加了一位向导，专替我们在马其顿境内带路，是位非常好的基督徒，大家都叫他“小叔”。去落沙矾就是由小叔带的路。但见野地上有那么两道车轮印子，听他说了，才知道原来那就是去落沙矾

的“路”。走到后来，原来那两道车辙越模糊，我们车的轮子却是越陷越深。车底尽在刮烂泥。再开下去，车子竟然进了田，是块翻新待种的耕地。

“喂，小叔，你的那条路算是到此为止了吧？底下还有多远呀？”我说。

“多远？我们这已经到了嘛！”他指着远处有树的那个地方。

于是，下了车。好不容易走完了那块泥田，来到一落土舍的跟前。这就是所谓的落沙矶。略略走了一圈，没看到有什么教堂。经尼可拉问明之后，才知道这地方的确有那么个教会。只不过这教会小到不能再小，只有一个人，是个名叫安娜的寡妇，在她自己家里设了一个会所。地方是有了，只是没人肯来。

我们到了她家。她非常高兴，觉得乡下小地方能有外国传道人来到，是件很难得的事。

“其实，我一向都在祷告神，求祂顾念这个工作。所以你们这次能够来也并不是偶然的，”她说。

她让我们参观了她的会所。照政府规定，私人家里是不许有宗教集会的。她腾出个房间后，就在门口挂了个牌子，称之为“祷告室”。消息传出去以后，乡里的几个党员颇不以为然，不过也没有认真起来反对。觉得这迷信玩意儿，说她自己一个人在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就让她去吧。

可是，现在来了个外国传道人，村里的人素来独处一隅，不用说是个外国人，就连个外省人他们都没见过。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

是为了好奇，还是真有慕道的心，我不得而知。总之，那天入夜以后，田间像是跑出了什么火虫儿似的。大伙儿提着灯，一齐往安娜家里跑。开始的时候，先教他们唱一首诗。然后向他们讲解耶稣的生平，因为据安娜说，年轻的一代根本就没有听过福音。完了后，再唱一首诗。谁知正唱的时候，忽然间有人在外面大声敲门，大家都停下来了。

安娜跑出去，门开处，外头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进来以后，面对着我们站着，把我们打量了好一会儿。然后又走到边上，再看个清楚。最后掏出本子来记名字。记完名字，又问了几句关于我跟尼可拉的底细，然后匆匆地走掉了。

警察离开以后，有些人跟着就回家去了。留下的人继续聚会，然而心情不同了。唱诗也唱不起劲了。只是，后来当我邀请决志的时候，想不到居然还会有几个人举手。

我说：“刚才的情形各位都看到了。做基督徒并不容易。你们是否已经拿定了主意要跟随主耶稣？”

还是有人坚决要信。于是，一个小型教会就这么成立了。可是，过了不久就让政府给解散了。这是一年后尼可拉来信说的。“小叔”因参与我们的工作，被驱逐出境，目前定居美国加州。至于尼可拉他自己，也为了那天晚上的聚会，在扎古列上了法庭。法官予以斥责，并课以相当于五十美金的罚款，算是了结这一案。他信上说，可能因为他们看他是个学生，所以才予以从轻发落。

至于为什么政府在别的地方不闻不问，而偏要找那个小乡下聚会的麻烦，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要说一下我那部小福士。南斯拉夫的路最伤车子。崎岖不平，一会儿翻山越岭，一会儿落到谷底、涉涧而过。这还不打紧，最要命的是灰尘。土路上满满的一层灰，关了窗，灰尘还是照样地进来。这么大的灰，对机件会不会有影响？我真不愿意去想它。每天早祷的时候，我们都记念到那部车，说：“主啊，如果车子出了什么毛病的话，我们既没钱，也没时间去修。所以，只有求祢保守一切顺利。”

当时南斯拉夫公路上来往的车不多，外来的车辆尤其少。以至于两车对开在路上相遇的时候，双方每每会自动停车，下来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交换一下沿途的情况。有一次，在山路上遇到了一辆小货车。对方先停车，我们也跟着停了下来。

对方先打招呼：“请问您是不是荷兰来的那位牧师，今天晚上要在特尔纳讲道？”

“是的。”

“这就是您每天早晨为它祷告的那部车？”

“对。”我在先前的一个聚会里提到过这件事，想不到话已经传到这儿来了，我不禁莞尔。

“要不要我替您检查一下机件？我是修理汽车的。”“那太好了，谢谢你。”这车自从我到了南斯拉夫以后就一直没去理它。每次加满了汽油，就让它自己去跑。

这位朋友绕到汽车后头，打开引擎盖子，大略看了一遍。这一看，不由得他呆若木鸡。

“弟兄，”半晌后，他方才开口，“这下我真信了。照理说，这机器是动不了的。您看，这净气环，化油器，还有这些火花塞，全都该换该修理了。您这车居然还能跑，真是个神迹。”

“可不是吗。我们就这么已经开了好几千英里了。”

他只顾摇头，说：“弟兄，好不好让我们替您清一清引擎，换些零件。还有，机油也该换了。你总不能闭起眼睛，什么也不管，光靠神迹。”

怀着感激的心情，我们跟他上他住的那个村子去。离开特尔纳只有几英里路。到了以后，把车停在他家的小院子里。只见到处是猪呀鹅的，相当热闹。

那天晚上，我把车子留下，上特尔纳讲道去。第二天早晨我们要走之前，他把车交给我。经他悉心检修过后，已是里外焕然一新，神究竟是听了我们的祷告。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我们到了贝尔格莱德。刚好碰上了共产党的劳动节。全城旅馆爆满，连餐馆都座无虚席。幸亏请我到他教会讲道的那位牧师邀我们到他家住，否则的话，就只好睡在车里了。

那次聚会的经历对我后来事奉的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

到时候，整个会所满了人。挤到连黑板都摆不下，以至我没去用我的法兰绒图画教材。讲道讲到一半，忽然砰砰嘭嘭地有人在敲什么东西。一看，原来是他们忙着把会堂和诗班室间那扇门整个拆了下来，让

挤在那里头的人可以听得清楚一点。整个会众都是衣着颇为考究、受过相当教育的城里人。

讲完道以后，我请凡是信主、奉献，或是重新立志的人把手举起来。

所有的人都举手了。我心里想，他们一定是听错了。于是又加以解释，申明这是一桩严肃的事，尤其是在政府敌对态度下，做主的门徒并不简单。完了后，再度呼请会众表示心志。这次是请他们起立示意。

结果还是一样，全体起立！

这可把我愣住了，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我深深地受感动，又多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并且强调每日读经祷告的重要。我把规律性读经的方法加以说明。正讲的时候，忽然发觉底下的人面面相觑，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

我莫名奇妙，转身请教那位牧师。弄得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弟兄，你说我们要每天祷告，你说得对，我们也办得到。至于读经……老实说，我们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圣经。”我听了真不敢相信，这种情形在乡下教会里多得很，这我知道。

但是，像贝尔格莱德这么文明的一个大城市竟然也是如此？

我问大家：“你们有多少人拥有圣经？”

结果全体连牧师一共才只有七个人举手。这可把我怔住了。这次带来的那些圣经一路上早就已经给光了。而眼前这一批决志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甘冒试炼，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正需要神的话语做他们的路标，满足他们渴慕追求的心。

于是，我跟那位牧师研究出一种分享圣经的办法：除了集体小组查经以外，再加上个人间轮换读经，一本圣经由好些个人按时轮流传阅。

同时，就在那天晚上，我心里生了一个意念。这意念随着岁月的增长越来越强。我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志愿，要尽我所能，把圣经带到共产国家，让神的儿女们得到供应。至于经济的问题，输送方法，当时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只抱住一个决心，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去做。

第 11 章

三次祷告

回顾此行头尾七个多礼拜，跑了将近六千英里路，有过近百次的聚会，同时也替我将来的工作铺了一条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灵魂的得救。先后有好几百人归主。这些人在灵里是天国的新子民，但是肉身却仍然受困于无神主义的政权。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所受的压力，所付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我不得而知。总之，我放心不下。这是个晴朗的五月早晨。西欧的郊野随着车轮的转动不停地在往后飞逝。归途中，思潮起伏。也想到了将来供应圣经的计划。那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立下志愿是一回事，而实际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细细地想一想，就不难体会到个中的困难。一九五七年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国家都不准私人携带任何书刊入境。宗教方面的书更加不在话下。所以，进口首先就是个问题。运进去以后又怎么分发才不会出毛病？哪一个共产国家最需要圣经？该从哪一个国家先着手？一路上，这些问题尽在我脑子里打转。

说是回家去，其实，韦堤已经没有了我的家，所以也不急着要回去。一路上慢慢地开，常常停下来休息，对一对地图，或是找乡下人聊聊天。老实说，我非但是不急着要回去，而且是怕回去。怕回到自己的那个房间，孤伶伶地一个人，像以前一样。那个小房间原来是父亲住的，在工具室的楼上，他老人家过世之后，就由我住进去了。上下进出

另有单独的门路，不会影响到别人，可以说是非常方便。可是这样一来，就更显出我的孤单了。此外，不久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插曲，使得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恐怕会永远这么独身下去。

经过德国，途中休息的时候，拿出圣经，翻到最后一页，露出封底上我不久以前写的几行字。想起了在南斯拉夫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那孤单的感觉又来了。我说：“主啊，再过一年我就三十了，祢曾经为男人创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只是我如今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的那一位。主啊，今天晚上我要求祢一件事。我求祢赐给我一位妻子。”祷告完了，我把这件事情记在圣经后头：“求妻。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于落沙矶。”并且在旁边留些空白，准备将来有答案的时候，可以写上去。过了五天，我灵修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认定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1 节就是神给我的答复。赶紧翻开圣经，在旧约里找到了这一节经文：“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孤单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读了又读，把它当做是对我说的，是神的旨意。尽量想用喜乐的心情去接受。我说我虽孤单，可是神会让我比肉身下做父亲的有更多的“儿女”——属灵的儿女。于是，我把圣经封底上那块空白填上了。

可是，此刻我又熬不住了。半途小憩，喝杯咖啡，面对着这一片春光明媚、花开遍野的景色，我的情绪又来了。属灵的儿女固然好，但究竟不能代替肉身的儿女。我要的是会跳会蹦，会吵会闹，又真又活的孩子。我实在需要一位终身的伴侣，一位温柔体贴的太太，与我共同编织那幅完美的画，使我的生命有所归依，不再像无根的萍，东飘西荡。

这样吧，不如让我现在再问祂一次。这次不妨改用瞎指法，另找一节圣经，作为祂旨意的真凭实据。老实说，我以前听到人家用这种方法，总是觉得非常可笑。可是，现在想想，说不定也有它的道理。常言岂不是说心诚则灵吗？于是，我闭起眼睛，將聖經隨便那麼一翻開，指头任意往上一落，结果你猜怎么的？说也没人相信。我指到的那节圣经不是别的，正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1 节：“……孤单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華说的。”

这怎么办？怎么会这样的？会不会是因为我最近常看这一段圣经，把这部分的书页翻松了，以至于趁势碰上的机会比较多？唉，不要找理由了，还是认了吧。我说：“主啊，祢说的也够明白了。虽然不是我所愿的，也只好听祢的了。”于是，我那本圣经的封底上又多了一次记录。问的同一件事情，答的也是同一节圣经。

休息够了。把咖啡壶、煤油炉收拾停当，继续赶路。行行复行行，终于回到了韦提，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小房间，回到了那种被关禁闭似的感觉。

当天晚上，全家聚在客厅里听我讲南斯拉夫的情形。讲到深夜，大家该休息了。不得已，只好回到自己的那个房间去。唉，怎么会这么潮湿。离开不到两个月，床单跟桌面就都长了霉。墙纸是最近才糊的，也已经开始掉了。其实，荷兰的低地一向都这么潮湿，我以前不是住得好好吗？怎么忽然间会觉得受不了？此后一连六个礼拜，我又讲又写，加上祷告，忙着为我下一步的计划作准备工作。拜访过卫家，再次为那部下汗马功劳的福士小轿车向他们致谢；又替那家杂志写了几篇稿子；还有迪古拉夫先生，以及那个祷告会，我也拜访了。总之，我相当忙，尽量不让自己闲下来想心事。

可是到了七月，我实在不行了。有一天早晨，我坐在床沿。我说：“主啊，这件事我非得再向祢求一次不可。不错，祢应许把属灵的儿女赐给孤单的人。但是，祢也说过祢要让孤单的人有家嘛。”像是要提醒祂似的，我忙着打开诗篇六十八篇，找到了那节圣经。“这儿说：‘上帝叫孤独的有家。’若是说住的地方，这个房间给我已经够了。虽是潮湿了一点，光线也比较差，但是这些都无所谓，我还是感谢祢的。问题是，这究竟还

不是一个家呀。亲爱的神，我要的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家。主啊，保罗三次求祢除去他身上的那根刺。祢没有答应他。我为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已经求了祢两次。现在我想再求祢一次。如果这第三次祢再拒绝我的话，那我以后就永远不再提这件事了。”说罢，打开圣经，在封底上写上最后一次：“第三次求妻。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于韦堤。”我说：“主啊，别人也许有独身的恩赐，我可没有。所以求祢千万不要让我独身。”

事过后，头两个月毫无动静。一直到了九月，有一天晨更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张秀脸。金色的长发，爽朗的笑容，还有那一双变色钻似的眼眸。

可侣。

范可侣。

这突如其来的一现，好比天外飞来，与我原先的思路完全无关。当下心中不由一动。难道这是神的启示？是祂听了我的祷告，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复？

但是，这怎么会呢？我跟她过去虽是同工，也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当时她年纪轻轻的还不到二十。我一直把她当小孩看，从来没想到别的。

不过，那已经是好几年前了。我离办厂去英国以后，接着她也辞了职去念护士。算一算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照理她应该已经毕业了。说不定已经结了婚。要不然，目前在追她的人一定不少。

事不宜迟，立即采取行动。不消一刻钟，我已经来到阿克玛镇。目的地是以前她父母亲住的地方。过去，我们常在周末青年聚会散会以后到他们家坐坐。她母亲每次总会给我们预备些茶点。印象中，她父亲老是嘴里叼着个大烟斗，吞云吐雾，怡然自得。

一边开车一边在想，到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开门的若是她母亲，我该不该说：“伯母，你能不能把可偈的地址告诉我？”万一是可偈自己出来开

门又如何?能不能说:“嗨，可侣。你结了婚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请问你肯不肯嫁给我?”

还没想出个结果，车子已经来到那幢房子门口。一看情形，我说不必费心了。里头根本就没人住，前后左右关得紧紧的。怎么办?到厂里打听打听吧。心头怀着个疙瘩，也只好先去了再说。

找到了凌格先生。问他可知道范老夫妇的去向。他说不晓得。那么可侣呢?他说，他只知道她进了哈林市的圣伊莉萨白医院做护士，说不定现在还在那儿。至于结了婚没有，他倒没听说。像是猜透了我的心事似的，他的脸上闪烁着会意的神色。“我说，小安呀，谁要能娶到她的话，可真是有福气喽!”

哈林这地方突然间显得特别可爱。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在哈林还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办。那儿不是有几家基督教书局我一直想去看看吗?还有，当地的一些教会曾经请我去领会，也不应该置之不理呀!还有……

到了哈林。在附近一个加油站打了个电话到圣伊莉萨白医院。护校询问处的小姐说:“是有这个人。她是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她……”我在电话里

松了一口气，把她的话给打断了。“她今年不住医院宿舍，已经搬到外面去了。”

她把地址告诉了我。还告诉我说：那地方是全市最上等的住宅区。那幢房子是一位老太太的私人住宅。她很有钱。为了要得个护理上的照应，她把最顶一层免费让给可侣住。

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地方。是幢古堡式的房子。举目望去，但见高处屋檐下有一排窗子，还有一道门通到外头的一个平台，紧接着的是一座小小的塔楼。

把车停好。也不急着出去。先做上几场白日梦再说。她是古堡深宫里的一个皇后。我呢？当然是个身披盔甲英姿焕发的骑士啦。换一幕，当她是朱丽叶吧。只要她在平台上一出现……

可是，她始终没有出现。天已经黑了。她的房间却没有亮灯。算了，别再胡思乱想了。还是快点直截了当地跑去按门铃吧。开门的是个女佣人。她说，范小姐确是住在此地，不过，她目前暂时回阿克玛，住在自己家里。

“阿克玛?”我急了，“可是他们那头的房子根本就没人住!我是先去过以后才来的……”

我情急声扬，竟然惊动了里头一位白发老婆婆。她出来问明究竟，然后向我作了一番解释。原来可侣的父亲最近病重，需要她在家照顾。而他们自己的那幢房子因为要上下楼梯很不方便，所以就临时另租了一处公寓暂住。她把地址给了我。事情总算有了头绪。

急着要回阿克玛去。只因还有几个聚会已经跟人家约好，只好再待几天。那几天可真难捱，简直是度日如年。

说起她的父亲，亏得我从前去他家的时候，每次都找他聊上几句，所以彼此间也并不太陌生。如今他病了，我去看他，岂不是名正言顺?

于是，有一天晚上，我终于来到他们公寓的门口。

开门的正是可侣。她那金黄的发色在背光中越发显得灿烂。“听说你父亲病了，我特意来看看他。”我有点心虚。

明明是托故而来的嘛。怕不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她还是带我去。她父亲确是病得不轻，不过，见到有人来看他，倒也很高兴。我们谈了大约有一个钟头。我告诉他我在铁幕后的经历以及将来工作的计划。其间，可侣端着盘子，多次进出，送这样收那个的，勤于照料。她穿着白色的护士制服，比我梦寐中的她更显得圣洁高贵。

从此以后，我每两礼拜就去他们那儿一次。除了探病以外，当然就是可侣了。我们常站在门口聊天，把声音放得很低，免得干扰病人。在那种情形之下，两个礼拜去一次也差不多了。去多了恐怕会让人家受不了。

在家的時候，常常幻想向她求婚。但是，我知道我本身的條件實在太差，恐怕不會有什麼希望。不信的話，你且聽我怎樣對她說：“請你嫁給我吧。雖然有幾件事情我得先向你說明白。那就是：將來我大多數時間不會在家。而且也沒有地址可以讓你寫信。我那頭寄過來恐怕也不容易。這種宣教工作帶有高度保密性質，我去過的地方以及接觸過的人物，你一概不能對外透露。萬一哪一次我一去不回，說不定你一辈子都无法知

道究竟是出了什么事。至于收入，更是没有一定，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住的地方呢？工具室楼上的那个小房间是也。”你想，像可侣这么一位又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子，听了以后会答应吗？

十月二十号收到匈牙利领事馆的一封信。原来，我去年秋天向他们申请过签证，现在批下来了。

忽然间，我想到了一个求婚的办法。我准备立刻向她开口，但是我不要她很快就答复我，而是等到我从匈牙利回来以后再告诉我。如果她真有意考虑的话，正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先体会一点将来那种生活的滋味，然后再做决定。就这么办吧，我对自己说，好歹这一关总是要闯的了。

于是，拿定主意，怀着紧张期望的心情跳上汽车，飞也似地往她家开。

敲了半天门，她才出来。一看她的神色，我已经猜到了八成。“是你的父亲……”

她点点头，断断续续地说：“已经半个钟头了。医生还在这儿。”

于是，我满腔的热情只好暂且捺下，原封不动的带回家去了。此后，除了在参加葬礼的时候见过以外，一连有三个礼拜没看见她。我在这段时间里到处购买匈牙利文圣经，因为各地存货不多，得来颇费一番功夫。再加上一批匈牙利文的福音单张，又是几乎满满的一车。

终于，有那么一个晚上，是个很美，有月亮的晚上，我约了她出来兜风。车子沿着堤顶的一条大路先兜了一阵，然后顺着右边的一条小路溜下去，在一条小河的边上停了下。正是清流映月，波光人影，好一个良辰美景。时机到了，可不是吗？

什么都好，就是我的口才太差了。我说：“可侣，我要你嫁给我。请你先不要拒绝我。至少得先让我把话说明白了。我是说，将来的那种生活是艰苦的，尤其是对你来说。”于是，我把情形大略说了一遍。我说我下个月就要到匈牙利去，希望她能够等我回来以后再答复我。我说：“我将来就是这样子，在外头的时间多。要是有人肯跟我过这种日子，那才怪呢。不过，我倒真希望你肯！”我终于把话说完了。

她睁着一双大眼睛，正待要说什么，我早已轻轻地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在她家门口分别的时候，她答应等我回来以后再告诉我她的决定。

又上路了，以往每次离开荷兰的时候，心理上并没有什么依依的感觉。可是，这次不同了。本来只想到这次短别正可以考验一下可偈对我的感情。那晓得刚刚开始我自己倒已经尝到了离别的滋味。一英里又一英里，路随着车轮的转动不停地向后伸展。让我时刻想到我正在离开她，一英里又一英里，越离越远。

过关的时候，心情也跟以往不同，里头特别紧张。是因为怕有了麻烦以后不能按时回去见她呢？还是因为以前在难民营里工作的时候常听人家说起匈牙利的情形，叫我对这个国家特别怀有惧心？我也说不上来。

好在神再度使出障眼法，让我过了关。车子沿着多瑙河向东走。正如那首歌所形容的，多瑙河的确很美。只不过河水不是蓝色的，而是深咖啡色的。中午的时候，觉得有点饿了。于是，出了公路，沿着一条小泥沙路来到河边的一块空地上。下了车，把野餐用的东西搬出来。为了要取煤油炉，还得把几盒单张挪开。忙了好一阵以后，总算准备停当。

开了一罐青豆红萝卜。正要热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马达声，由远而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艘巡逻艇，卷起巨浪向我疾驶而来。船头站着个兵，手里提着一支机鎗。快艇到了岸边不远，霍地来个大转弯，敛住来势，往岸边轻轻地靠住了。我这才看到船上另外还有两个兵。船头的那个先跳了下来，后面又跟了一个。

“主啊，”我暗自祷告，“求祢加给我胆量。”

头一个兵站定以后，把机鎗对着我。另外那个朝我车那头跑。我只顾搅我锅里的青豆萝卜，听到他在开我的车门。我开始向旁边的那个兵打招呼。用的是荷兰话！就是故意要让他们听不懂。“同志。”我说，还在搅我的青豆红萝卜，“您好。难得你们打这儿经过。”他只是死盯住我，脸上毫无表情。

“对不起，”我又接下去，“我这儿正在准备吃的。”

听声音，我知道背后那个兵又在开另一扇车门。我又多拿了两个盘子出来，打个手势，说：“来一点怎样？”他摇摇头，冷冷地，大有吾不欲受賄之概。“区区青豆红萝卜，看不上眼是吗？”我心里这么想。

再听声音，后面那个兵正在那儿东搬西摸的。那些个盒子待会儿他看到了会不问才怪。

“好吧。你不介意的话，我这就趁热吃了。”说罢，我把热好的东西往盘子里装。就在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应不应该低头谢饭？以前在难民营听人家说，自从匈牙利革命以后，政府对基督徒特别注意，因为当初有很多重要的革命分子是基督徒。

然而，我岂可轻易畏缩，失去了对这三个兵做见证的好机会？于是，我低下头来，闭目合掌，开声祷告，大大方方地，一如往常。

奇怪得很，当我祷告的时候，背后查行李的声音没有了。祷告一完，就听到关车门的声音，接着一阵靴步橐橐由远而近。我拿起叉子，吃了一口豆子。发现那两个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不声不响地待了那么一下子，然后突然间一齐转身，头也不回地往岸边跑。看着他们上了船。快艇在马达怒吼声中扬起了一堆白浪，飞驰而去。

布达佩斯横跨多瑙河，实际上是两座古城布达与佩斯的统称，一在河东、一在河西。比起我去过的那些外国城市，我认为布达佩斯最漂

亮。只是当时匈牙利事变才过去没多久，城里依然疮痍满目：建筑物上弹痕累累，路边的树也遭了殃，弯弯扭扭的电车轨还没修复。

先去找一位 B 教授，是经人家介绍的。B 教授在当地一间很出名的大学里担任要职。见面以后，我问他愿不愿意尽可能做我的义务传译。“当然可以，弟兄，”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们是志同道合嘛。”当时我真没想到，他这一答应以后，对他个人所产生的后果会那么严重。为了这件事，他后来竟然丢了教席。

B 教授看到我带来那么多的匈牙利文圣经，高兴极了。据他说，圣经在匈牙利几乎是已经买不到了。教会倒还有不少是开的。如果我肯冒点险的话，倒不愁没有工作的机会。

“冒点险？”我说。

“这主要是因为去年的事变刚过去没多久，当局依然凡事戒备，处处提防。教会的活动也不例外。连信徒们在教会里聚个餐，他们都会起疑心，”他说，最苦的是牧师。布达佩斯大部分的牧师都让政府给找上了麻烦。其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监。牧师每两个月就要换一次新执照，弄得他们经常提心吊胆。

B 教授带我去见他的一位朋友。是个改革宗的牧师，住在一幢公寓里。我们到的时候，主人小心地把门打开，先将走道上的情形看个清楚，然后才让我们进去。到了里面，只见房间里到处摆满了灯罩。有的才糊了外面一层壳。有的上头画了一半街景图案，还没画好。也有的已经做好了。

原来，这位牧师的执照已经给吊销了。是什么理由，当局没有说明。于是，他只好靠画灯罩维持一家的生活。每天从清早画到夜里，才仅仅够糊口。

后来我问 B 教授，像他朋友那种情形多不多。

他说：“在那些不愿意走妥协路线的教会里，这种情形相当多。可惜有很多教会已经变了节。在政治立场上，以及基要信仰上，都已经走上了‘适应’政府的道路。所以实际上已经成为官方的工具。”

我请他有机会带我见识一下这种变节的教会。他说，当天下午某某公立学校有个大集会，请了一位这样的牧师参加典礼。不如一起去看看他。

到时候，果然看到那位牧师在典礼台上。典礼还没有开始，他下来跟我们打招呼。

他指着操场上某一队学生说：“那里面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我们教会的。”每个孩子都披着一条鲜红的领巾。据他说，这是好公民的表征，孩子们必须够得上某些条件才有资格戴这红领巾，其中有一项是：应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父母的宗教迷信。

“什么迷信？”我问。“哦，譬如说，神迹啦、神创造天地万物啦、原罪、堕落，诸如

此类的。”“那么，耶稣的神性呢？”“那更不用说了。”“那你自己的看法怎样？”

他两眼低垂，耸了下肩，说：“我又有什么办法？”

听到操场上孩子们正在鼓掌鼓得起劲。跟我以前在波兰和捷克看到的情形一样。开始的时候，只是随意鼓掌。但是还不到半分钟，就汇成了一股集体、合一、而有节奏的声浪，像打铁似的，越拍越大声，震得我几乎吃不消。我看那位牧师大概也有同感。他双掌略向上提，几乎在发抖，像是恨不得用手指塞住自己的耳朵似的。

典礼过后，那位牧师带我们去参观他的教堂。起先，他尽在介绍一些新增的设备：暖气啦、窗饰啦、后院最近又扩充啦。讲到一半，他突然间问我一句：“安得烈弟兄，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当时也没法说什么。像他这种情形，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实在很难说什么。我大可以说：“坚强一些！”可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别的不说，单他那张执照就无时无刻不操在政府手里。万一给吊销了，全家的生活马上成问题。

然而，我把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各地信徒的情形告诉了他。我说，他们的遭遇跟他差不多。这些信徒走在逼迫苦难中仍然尽力传扬主

耶稣的救恩。人接受了救恩以后，自然而然会明白圣经里其他方面的真理。

B 教授告诉我，很多取巧的办法，匈牙利的教会也在用。其中最妙的是藉着喜庆丧礼的机会向人传道。

有一天早上，他邀我去参加一个婚礼。

“你听着，到时候我想找个机会让你对大家说几句话。你要把握时机，简单地说过几句道喜的话以后，立刻来个借题发挥，使出雷霆万钧的解数，把神的救恩向在座的人说个明白。”

我报以微笑。

“我不是开玩笑。”B 教授说，“这些年来，大家都怕进教堂。偶尔去一次，也只不过是为了参加婚礼或是丧礼的缘故。我们就趁着这种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上个礼拜就有个政府里头的人对我这么说，他说：‘我看呀，你就巴不得你的朋友多死几个，好让你多有几回说教的机会。’”

我去了。依言而行，给了一篇信息。后来我告诉 B 教授我还有个办法，就是以前用过的那个“致意”的办法。他认为这的确是个好办法。马上拿起电话，到处联络。就在当天晚上，我们在市内一间大教堂里举行了一个聚会。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教会又有一次聚会。从那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每次，我们总是等到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才宣布下一次聚会的地点。可是，到时候来的人还是非常多，甚至要排队进教堂。为了避免太过引人注目，后来我们干脆连地点也不说了，只告诉大家第二天晚上还有聚会。到了第二天，各人再以电话询问通报，把消息传开。

每次聚会前，常看到台上的牧师们对着底下的人看个不停。

“他们在注意，看是否有秘密警察在场，”B 教授加以解释，“那些人的脸，有很多我们都认得。事变以后，任何民间集会都可能惹出麻烦。”

没多久，我自己也染上了那种紧张的心理，昼夜担心警察来找麻烦。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们来了。

我一看 B 教授的表情就知道事情不妙。

“他们来了，”他轻轻地告诉我。我心里有数，知道是谁来了。他打个手势，叫我跟他到后台去。两个便衣人员等在那儿。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最后给了我一张通告，让我第二天上午跟 B 教授一道去总局问话。

他们走了以后，B 教授告诉我说：“上一次也是这样。结果有两个人被抓走，关了很久才放出来。”

散会以后，牧师们聚在一起商讨对策。B 教授提议大家到他家里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家很大，而且相当考究。一个教授在东欧的社会里，身份特别高。难得他把神的工作看得比这些都重，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

这还是我头一次到他家。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儿子耶诺。是个年青有为的律师；刚结婚不久；跟他父亲一样，为了神的工作大发热心。

他一开始就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那天晚上，我们一共七个人在 B 教授家里，围着客厅中间一张圆桌子，跪下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迫切地祷告了一个钟头。到了最后，大家灵里豁然贯通，知道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起身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十一点三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跟 B 教授到了他们的总局。坐在那儿等的时候，B 教授低声告诉我说，这儿经办人的脾气他已经摸得很清楚。经办的这位组长态度最凶，对教会非常不客气。副的那个就比他好得多。可惜这回预定要见我们的是那个组长。

那晓得这一等就是一个上午。要说是官僚作风，我们也就不是没见过，可是这回实在是等得太久了一点。一直到快十二点的时候，才来了一个职员，带我们到里头去。我们跟在他后头，沿着走道一路向前走。眼看已经过了组长室，他还不停。B 教授面有喜色，向我扬了下眉。终于，我们在副组长室门口停了下来。据那位职员说，原来组长昨天夜里突然生病，今天没上班，所以改由副组长向我们问话。

二十分钟后，我们离开副组长办公室，什么事也没有。我当时很想去问那位职员，那个组长是昨天夜里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他真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是十一点三十五分。

由于政府干涉，布达佩斯的聚会只好作罢。由 B 教授另行替我在东部地区安排了十天的聚会。而且还替我找到了一位传译，跟我一道去。

去完东部回来，立刻找他们父子报告经过情形。发现大白天他们两个人都在家里，而那天又不是周末。他们也没说为什么。加上那种异乎寻常的气氛，让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我准备第二天动身回荷兰去。他们坚持要请我早上过来吃了早饭再去。

第二天早上我到他们家。发觉昨天的那种气氛还在。餐后，耶诺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包东西，对我说：“你冒了那么大的危险来到匈牙利传福音，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这儿有一件小小的东西，请你带回去，替我们送给你的女朋友。”

盒子里装着的是一枚古色古香镶红宝石的金别针。他继续说：“我们会替你祷告。希望她会答应你的求婚。”

回程中，在奥国路边宿营。半夜里被恶梦惊醒。梦到一队披着红领巾的警察在后头追我，一面追一面鼓掌。醒了以后，心里老是惦记着 B 教授。第二天马上去了一封信。

回到荷兰，首先的目的地就是哈林。医院里的人告诉我，可侣上的是夜班。下班的时候，我在医院大门口等她。

“可侣，我回来了，”我说，“我爱你。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总归是爱你的。”

她的金发在街灯下亮着清新的铜色。八个钟头下来，她看起来有点累了。“噢，小安，”她笑了，倦容一扫而光，“我也爱你。我心里想，反正你将来住在外头的时候，我总免不了会替你担心，替你祷告，整天挂着你的。所以，与其做你的朋友，倒不如干脆豁上了，做你的太太更好。”

过了几天，我们一起到哈林的一家珠宝店选购了两只戒指。然后回到她住的地方，把盒子打开，彼此将戒指戴在对方的左手无名指上。照荷兰的习惯，订婚的时候把戒指戴在左手上，到了结婚的时候，再把这只戒指调到右手上。

我说：“可侣，我们真不晓得前面的那条路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不论怎样，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吧。”她说。

没想到这几句话日后竟成了我们经常的鼓励。回到韦堤，见到了 B 教授的一封信。他再次向我致谢，说，我对匈牙利信徒的关心使那边的教会深受激励。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再去，并且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对这种工作有兴趣。

他接着说：“不过，有一件事我也不必瞒着你。只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因着你的缘故。这只是迟早的问题。我已经离开了那学校。是他们硬逼着我辞职的。你不要难过。很多人为主摆上的比我更多。”

“你要持守你的善工。让我们各人向主尽忠。虽然此后我们不会再给你去信，但是我们会每天为你祷告。这封信是托一位朋友带出国的。这里的信检查得很厉害。”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坚强起来。愿神继续带领你前面事奉的道路。”

第 12 章

假教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号，我和可侣在阿克玛结婚。参加婚礼的人包括我兄弟姐妹那边的人以及可侣的母亲、糖厂的凌格先生、顾丽芝以及一些旧同事、环球福音会总会的一部分人、难民营里的一些同工、哈林市圣伊莉萨白医院的一大批护士，还有，霍叔也来了，他太太身体不好，所以没来。可惜很多远邦的朋友们没法子来：捷克的安通宁、南斯拉夫的贾秘和尼可拉、B 教授和耶诺……

我们本来有意思开车到法国度蜜月的。迪古拉夫先生还好心把他的活动房屋连拖车借给我们用。那知道婚礼才过我们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原因是，可侣刚考完大考，而我在难民营里的工作也是够紧张的。订婚以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难民工作。

上路不久，在阿克玛附近路过一家餐馆，周围是一片树林。在荷兰，你很难得看到有树林。我们进去要了一杯咖啡。餐馆的老板夫妇对我们非常亲切，硬要留我们在他们那儿度蜜月。于是，我们把车开到林荫深处，就这么留下了。

工具室楼上那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间从此有了新的气氛。可侣给我带来了满室温暖的阳光。

虽然我们没有厨房，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加上屋顶漏水，今天漏这儿，明天漏那儿，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还计较那么多干嘛？

唯一比较伤脑筋的是人家寄来的那些旧衣服。因为我在荷兰每到一个教会就请大家捐点衣服救济难民，而我建议他们可以把东西寄到我家里，由我转交。结果他们真寄来了。一包一包地来个不停。头一年就收到了八千公斤，弄得存衣服成了个大问题。虽然玛芝已经结了婚，住在夫家，可是洁芝和阿里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此外，阁楼上还住着另一家人，是哥尼流和他的新婚太太。所以，除了我们自己的房间以外，简直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结果，房间里堆满了旧衣服，连走路都成问题。最头痛的是那些脏衣服。实在太脏的，只好拿到后院去洗。其余的用刷子刷一遍，再喷上杀菌剂，也就算了。结果呢，我们房间里还是有了跳蚤。

这么多旧衣服，要搬起来也不容易。每次上难民营去的时候，总是尽量把车子装得满满的。福士什么都好，就是太小了一点，当不了货车用。

我又要去了。这次很想带可侣一道去，让她看看难民营的情形。她经常在家清理那些旧衣服，又帮忙打包、装车，这次能够让她自己见见那些难民也好。况且那边也正需要护士人才。于是，我们在那年秋天的时候，带了满车的旧衣服，上西柏林去了。

先在费特营卸下一部分东西。这地方原是纳粹的一个军营，战后改充难民营。里头的情形让可侣看了以后倒足胃口，当天晚上连饭都吃不下。

伏玛突拉营的情形更糟，因此我留到第二天才带她去。这地方本来是间旧工厂，现在改作难民营，里头住的总共有五千人。为了生活的缘故，甚至有人在营里廉价卖笑。我们下了车，把带来的旧衣服抬到营里的配给站去。走在路上，冷不防楼上一群野孩子故意把一堆垃圾往我们身上倒。“算了，”我说，忙着替她弄掉风衣上的烂菜叶。“这些孩子们也怪可怜的。闷在这种地方，无所事事；好的不学，就喜欢调皮捣蛋。”

最后去的那个难民营用的是红十字会创办人的名字，叫做邓南营。里头用的专业人员最多，特别是教员。营里一般情形并不比别的地方

差，我是说物质方面。可是，这里的难民在生活习惯上比较固执，我行我素，不愿意跟工作人员合作，因此大大地减低了工作的果效。

那天下午我有事去找营主任。出来的时候，看到可侣在跟一个女人聊天。这女人的神态有点像宓可儿小姐，头发半白，德国人，名叫亨利泰。我们找到了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坐下来，谈了有一个钟头。她说她以前在东德撒逊尼教书，是个基督徒，属于信义会。

“我教的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正是政府要他们参加少年效忠礼的时候。问题就出在这上头。”

“什么叫少年效忠礼？”

“这得先从坚信礼说起。也许你们知道，德国的教会一向很注重坚信礼，让孩子们在神面前立志许愿，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且终生遵行祂的旨意。那天是孩子们的一个大日子。亲友们齐来观礼道贺，并且馈赠礼物。可是，现在政府把坚信礼取消了。另外设了一个少年效忠礼，以政府取代神的地位，让孩子们参加宣誓。官方对这个典礼非常重视，要求那几班的导师提前一年就要开始在学生身上做准备工作。”

这真是个打击教会的好办法。她还没说完，我就猜到了后来是怎么回事。我说：“你没理他们？”

“没有。”

“你真够勇气。”“哪里。我怎么能跟他们合作，故意不让孩子们认识神？”

官方的意思是希望所有及龄的学生都能够通过检定，让每个学生都来参加效忠礼。结果亨利泰那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参加。

于是政府开始向她施压力。每个礼拜派人来看她一次，希望她多多努力，在将来有好的表现。

可是，到了第二年，情形还是一样。这一来，事态严重了。本来是一个礼拜一次的登门造访，现在改作每天晚上都来。每次不同的人，一来就是几个钟头，不停向她施行疲劳轰炸。同时以违反国策、妨碍社会进步这些大罪名向她诸多威吓。弄得她夜里失眠，白天工作受影响，身

心疲惫，苦不堪言。同时他们又间接煽动那些没入选的学生，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因而时常向她提起这件事，更增加她的难堪。

“结果我实在受不了，只好逃了出来。”说到这里，她哭了。她说，营里还有很多从东德逃出来的教员，跟她的情形一样。“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撑得住，可是结果还是搞不过他们。”

从难民那儿听到了不少共产国家教会的情形，加上我个人以往的经验，让我对铁幕后教会的处境渐渐地有了个概念。照我看来，这些国家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以及东德，这些国家多少还有点宗教自由。第二类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俄罗斯，对宗教逼迫得非常厉害。第一类那些国家，除了东德以外，我统统去过了。所以我很想趁现在在西柏林的时候，申请去东德看看。我把这意思告诉了可倡，要她跟我一道去。

“噢，小安，”她说，“这怎么行？这儿该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又不够人手，你叫我怎么走得开？”

此地的工作也实在是太多。看她形容憔悴的样子，我心里在想，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让她来帮忙。营里的情形令人见了心酸。尤其是学护

士的人看了更加难过，因为药品器材不够，以至很多该做的都不能做。可侣整天跑来跑去，要同时照顾好几个营地。除了各种医疗护理之外，还要帮忙育儿班的工作，传染病预防的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压得她简直喘不过气来。

我怕她长此下去身体会吃不消，劝她不要再做了。可是她不肯。结果东德的签证很快就下来了。她说：“你去吧。我去了有什么用？我又不会讲道，又不懂德文，甚至连开车都不会。我在这儿至少还可以打打杂，帮上一点小忙。你去吧，回来以后再把那边的情形告诉我。”于是，我一个人去了。打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个站口进入了东柏林。这是我们婚后初次的离别。

车子一进到东柏林，你就会觉得那边跟西柏林不同。街上人的衣着一般都比较差。服装店橱窗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就拿那么几盆花来点缀一下。房屋、街道以及其他的建设，到处显得重建的工作进展得很慢。不过，这些都是我意料中的，也不觉得奇怪。

然而，有一个现象倒是我意想不到的。不晓得怎么搞的，街上的人个个噤若寒蝉，静得出奇，像是在开追悼会似的。

原来这些人是怕成这个样子的。待久了以后，连我自己也有点怕起来了。原因是那些警察。这里的警察可真多，到处都是：桥上、工厂门口、公共场所……他们可以随时拦路，向你问话、搜查。没人敢说什么，更加不敢提出抗议。沉默的结果，让你觉得全城静得可怕，像是笼上了一层愁云惨雾。

老百姓默默无声，政府却来得个聒噪。口号、标语，到处都是。广播扩音器、布告栏、墙上、屋顶、电灯杆上、电话亭、百货店、旅馆、车站……到处是宣传。

可是，他们的宣传做得并不高明。举个例说。当时东德正在闹粮荒，原因是一般农民对政府的集体生产制度感到非常的不满，以致很多人干脆就不干了。到了秋收的时候，庄稼是有，却是没人来收割。政府大肆宣传，声言要利用机器收割，加紧生产。说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无论如何比个人的好，保证大家不愁没有面包吃。可是用机器收割，得麦子很干才行。偏偏那个时候天天下雨，下个不停。于是，政府出了一个标语：

不靠太阳不靠神，禾穉照样可完成。

这明明是个故意抵挡神的论调，让人看了生反感。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条刺眼的标语。

宣传尽管做，雨还是照样下。麦子终于还是收不成。于是，一夜之间，所有这类的标语都不见了，只剩下零星的几张留在电灯杆上，被雨淋得稀烂。

怎么办?硬着头皮继续穷嚷吧。于是，新的标语又来了，加上收音机里和报纸上的宣传，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以为我们现在在闹面包荒。其实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有的是面包。这再一次证明大自然终究不是社会主义的对手。”

说得好听，可是面包还是没有。

不单铺子里没有，甚至连餐馆里都没有。

没有面包还是小事，最让我难过的是：老百姓明知道政府一手遮天，却是毫无办法，而且还不肯吭声。

以整个东德来说，我对撒逊尼省南部山区一带地方最感兴趣，因为据亨利泰和其他难民说，那边的教会还算活跃。奇怪得很，在我去过的共产国家中，东德虽然在其他方面管制得最严，可是表面上却是宗教活动最自由的一个国家。

经人家介绍，到撒逊尼省找一位名叫威廉的弟兄，他在信义会全时间做青年人的工作。他和他太太住在山区的一个乡下地方，从他们家门口望出去，风景之美，真羨煞了住惯平地的荷兰人。门口停着一辆机器自行车，是他工作上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见面以后，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太太玛尔。我们坐定以后，一面喝咖啡一面由我介绍我在铁幕后的工作。

“我们很高兴你来，”威廉说，停下来重重地咳了一声，“这里的教会实在很需要鼓励。”

“你们要不要圣经？我带来了一些德文圣经。”我说。

“圣经倒不需要，我们这儿很多。”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听了以后起先心里还有点怀疑。可是当他们带我参观书房的时候，我发现书架上摆着的圣经总有十来本之多。顺手拿起一本，看了一下，上面明明印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制”的字样。

“还有，”威廉说，“这儿的神学院也蛮自由，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大规模的布道会经常有。最近信义会正在推动普传，情形我想并不会比西欧国家差。”

“那末，”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说这儿的教会很需要鼓励？”

他听我这么问，一下子把拳头捏得紧紧的，说：“你问得对。其实，这儿教会的处境比什么地方都危险，因为此地共产党用的办法很绝。待会儿希望你能够跟我一道去参加我们的区议事会。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

我说，要去的话，可以坐我的车子一道去。他太太报我以感激的微笑，说：“你看他咳成这副样子，还不是因为驾他那辆机车驾出来的。整天

在外头，风吹雨打，冬寒酷暑，几万里跑下来，怎么受得了？早两年医生就已经叫他不要再到外面吹风了。”“我太太就是这样，”威廉笑着对我说，“可是，此外又有什么办法？我这工作就是要到处跑的嘛。”

后来在车上的时候，威廉又跟我谈起了东德教会的处境。“共产党精得很，尤其是我们德国人。他们知道，对付教会绝不能用强硬的办法。因为历史证明，你越是逼得凶，教会就越站得稳，所以他们采用一种新的办法，尽量不让一般人有机会到教堂去，免得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待会儿开会的时候你注意听好了。”

这次议事会讨论的是所谓假教会的问题。牧师们一个接一个地起来报告，给了一连串的统计数字，例如：“欢迎会百分三十五，少年效忠礼百分五十五，婚礼百分四十五，丧礼百分五十。”我起先听不懂。后来经威廉解释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政府在耍花样，模仿教会的传统，另设了一些以国家意识为中心的礼仪，藉以打击教会在人心中的地位。

譬如说，欢迎会就是模仿的婴孩洗礼。新生婴孩向政府登记了以后，政府请做父母的以及他们的亲友前来参加一个庆祝会。会中有个接纳典礼。做父母的把婴孩抱到典礼官面前，由典礼官按照一定的仪式，代表国家欢迎并接纳这位新生的小公民。这就是所谓的欢迎会。

还有就是婚礼。欧洲一般人的习惯是先到婚姻注册处行过法定的婚礼，然后再到教堂行一次婚礼。可是，如今政府刻意示惠。你参加了法定婚礼之后，它又给你一个免费的招待会。茶点铺张样样俱全，亲戚好友一律欢迎。会里有个隆重的典礼，欢迎新婚夫妇以崭新的姿态加入社会主义的阵容，并勉励他们对社会建设多有贡献。

丧礼也是一样。政府备有免费的丧礼服务。故意跟教会唱对台戏。追悼会里少不了对那位人民阵线里勇敢的战士大加赞扬，歌颂他在解放人类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当然，最厉害的莫过于少年效忠礼。因为那种年纪的孩子们最怕跟不上潮流，让人家笑，所以凡事最容易跟着人家走。政府就趁着这个时候要他们决定，是要国家呢？还是要教会？眼看着同学们大伙儿都准备参加效忠礼，到台前接受国家的祝福，你不去的话，心理上会有一种很大的压力。

牧师们还在报告数字。“……少年效忠礼百分七十，丧礼百分三十……”原来这些数字是代表每一个教区里参加政府那些名堂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里头还不包括那些领过圣礼的人。

“起先，教会的态度很强硬，”威廉告诉我，“譬如说，孩子们要是参加少年效忠礼，教会就不准他们受坚信礼。”

这么一来，弄得孩子们左右为难。对政府说，那是正中下怀。自从官方搞出个效忠礼以后，头一年，参加坚信礼的人就少了百分之四十，第二年少了百分之五十，后来是一年比一年差。结果逼得很多教会只好在这方面让步。规定孩子们在参加了效忠礼一年以后，还照样可以领受坚信礼。不过，在这一点上，天主教还始终没有让步。

“孩子们在学校里，你很难叫他们不跟着大家走。政府跟教会两相争取对象，结果是教会失败了。”

在政府攻势之下，教会节节败退，由外向转为内向，形成了独善其身的局面。

“所以你这次来，我实在很高兴，”他说，“你可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忘了教会比世上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政权都大，让我们不要忘了神在我们这一边，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他说，他每半个月就要到外面走一趟，主领各地的青年聚会。最近他又要去了。“我很想你跟我一道去。不单我可以有个伴，而且，”他笑了笑，“我想我太太一定巴不得我可以坐你的车出去。”

于是，一连十二天，我跟他周游南部各地，向各教会讲道。我所看到的是：这些教会的聚会完全公开；讲道不受拘束；圣经以及各种基督教书刊文字都有得是。然而，这些教会却是我在铁幕后所见到灵性最低沉的一些教会。

我从头到尾只传一个信息，呼请东德的信徒们努力兴起，做一个宣教士。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只有这样，教会才活得起来。

还记得头一个教会的牧师听到我这么说的时侯，急得站了起来，说：“安得烈弟兄，这种话让你说当然容易。你可以到处跑，可是我们呢？我们能跑到哪儿去？”

“慢着，”我说，“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我在此地做神的工作，得千辛万苦冒险，老远地从荷兰跑来，而你们大家就在本地！想想看，你们这一带山区还有多少人没信主？还有，东德境内目前有多少俄罗斯驻军？我想总有五十万吧。这也是个机会。所以说，不要以为你们不能出国就不能做宣教工作！感谢神，你们的工场就在这儿。”

后来，我再以保罗的例子向会众说明。

我说，保罗当初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身体颇不自由，因为他们用链条把他链在两个兵丁之间，须臾不离。“而今只有两种可能，”我说，“要么他就干坐在那儿，长嗟短叹，感慨系之，反正是动不了。还有个办法是，他可以因地制宜，趁机会向兵丁传福音。我想，保罗当时一定很感谢神，给他那么好的机会传福音，因为两个兵跟他链在一起，想不听都不行。等到换班的时候，又来了另外两个兵。就这么两个两个地，保罗把福音传开了。甚至于就在该撒的家里成立了一个教会。我认为今日铁幕里的信徒们正有着同样的处境、同样的使命。”

第 13 章

绕圈子

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我的太太，因为不知道当天她在哪一个难民营工作。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看到她正在替一批五、六岁的孩子们检查头上有没有跳蚤。想不到才不见两三个礼拜，她就累成那副样子，让我看了大吃一惊。她瘦了许多，皮肤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眼圈上带着疲倦的神色。

我再次怪自己不该带她来，更不该留下她一个人在营地，自己往东德跑。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趁在西柏林的时候，再去一次南斯拉夫，给那边的教会带一批圣经去。我尤其忘不了贝尔格莱德那间只有七个人有圣经的大教会。根据上次的经验，我知道由柏林申请比在荷兰申请容易。

话说回来。如今我太太累成这个样子，正需要换个环境调剂一下；而南斯拉夫又是个风景绝佳的国家，如果她能跟我一道去的话，岂不是

一举两得?于是，我再度向南斯拉夫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这次申请的是两个人。结果很顺利，很快就办妥了。

起先，她跟上次一样，还是不肯去。觉得难民营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她帮忙，她上南斯拉夫反而做不了什么。可是，在我坚持之下，她终于答应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终于上路了。这还是我跟她第一次两个人一道进入铁幕。

路上什么都好，就是她的身体还是很弱。入境的时候，他们听说我们是新婚夫妇，还特别介绍些风景名胜给我们。关怀之余，甚至连行李都不查了。写到这儿，我想顺便提供点意见，给将来的同道们做参考:做这种工作，夫妇两个人一起跑比较安全，不像一个男的那么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

又见到了贾秘和尼可拉。他们高兴得眼泪几乎都流出来了。

一連六天，我在各教会传信息，情形非常好，还是由尼可拉替我当传译。虽然上次他为了与我同工曾经受过警告和罚款，但是这次他还是照样来的。我把最近在东德所领受到的异象摆出来，勉励信徒们努力向前完成铁幕后众教会所负的重大使命。会后我把带来的一些新圣经送给他

们。大伙儿乐得什么似的，还几乎不敢当真。我们到处受欢迎。弟兄们热烈地拍我的肩膀。姊妹们拉住可侣，问长问短，亲热得很。

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到了第七天，当我在萨瓦卫豪附近朋友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警察来了。因为来得太突然，我一时没想到他们会是来找我的。当时大家正在吃羊肉饭，只有可侣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床上休息。听到外头有人叩门。进来的是两个穿灰制服的警察。

“你跟我们走，”他们对着我说。“走？上哪儿去？”“你不要多问。现在马上就走。”

同桌的人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正当这个时候，可侣拖着带病的身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是你太太？”“是的。”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

原来我从前在南斯拉夫的底子全让他们给翻出来了。没办法，只好跟着他们去了。

几个经办人的态度还算好。只是他们要我们马上离开南斯拉夫。让我把护照上的签证交给他们盖章作废。

明知这章子盖上去以后，将来向别的国家申请签证，让人家看到了，一定会引起怀疑。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只好把护照给了他们。经过一番审核以后，他们在我的签证上重重地盖上了一个大红印子，正式向我们下逐客令。

也难为了可侣。身体已经不舒服，还要加上这么一个意外的打击。回德国的时候，她一路上对我说：“小安，这次可真把我吓坏了。还说他们这算是客气的呢。”她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常常想吐。一路上我常停车，让她到外头草地上舒畅舒畅。

我准备直接送她回荷兰休息，同时找医生。只预备在柏林停一下子，顺便带两个难民回荷兰去，是我们当初在荷兰的时候替他们申请的。

终于回到了柏林。看到两封信在等着我。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领事馆寄来的。因为我过去申请南斯拉夫签证的时候，发现在柏林申请比在荷兰容易，所以趁在柏林的时候，多申请了几个别的共产国家。没想到现在居然得到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来信叫我去他们的领事馆办手续。

根据各方面的报道，逼迫教会逼迫得最凶的就是这两个国家，加上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看样子神又在开路，使得我这工作的范围能够更深入一层。

但是，我得先送可侣回家休养。还有，我护照上的那个大印子也得先解决，否则人家问起来怎么办？

因此，我决定暂时不管签证的事，先回韦堤再说。到家以后，尽快让可侣躺下休息，然后给她请了一位医生。看病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外头楼底下等着，心里头好焦急。等了好久，医生才出来。

“你太太没有什么毛病，”他说，“我已经给了她药。吃了不会那么想吐。我叫她下个月再来看我。”

“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急着问他。“原因？”他这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很客气地把手伸出来，说：

“恭喜你。你快要做父亲了。”“不过，”他又接下去，“我要求你一件事。以后千万不要再拉着她在外头到处跑了。要尽量让她在家休息。”“哦，还有，”他临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你们房间里的那些旧衣服，你找个时间把它清走吧。别再让她学爬山了。”

我们十一月回来的。她应该是六月生。到了一月的时候，我看她的气色非常好，心里在想也许我可以再出去跑一趟。把可侣留在家里，请洁芝代我照顾一下。去两个国家，每个国家待上三、四个礼拜的话，六月前回到家绝对没有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我护照上的那一页。又不能把它撕下来，因为上头印着有页数的。故意报失，再申请一本新的？这岂是君尊的手法？！大君下的臣仆何须卑躬屈节，与世偃仰！

自己想不通，不如到海牙外交部护照科问一下吧。也许可以问出办法来。

我跟负责审核的一位职员商量这个问题。他倒是很同情我的处境。“我很体会你的困难，”他说，“不过，像这种情形，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很想跟那边的教会有点认识，彼此之间有点交流。”

他想了一下，摇摇头说：“以我们的立场说，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当然，如果你在短期内硬是往附近的国家多跑几次，进出的时候让他们在你的护照上盖章，护照盖满了以后，当然就得换新的喽。不过，像这种话，我们以公家的立场，当然不能说。”

几个礼拜以后，我的问题解决了。我拿到了一本新护照。

可侣很不想我去。她每逢想起南斯拉夫那次麻烦，心中犹有余悸。后来我收到了向伦敦英国圣经公会订的一批保加利亚文和罗马尼亚文圣经。

她帮我一起装车。“协议就是协议，我当然得履行，”她说，“我毕竟已签字作宣教士的太太的。”

临走的那天，我们把车里剩下的空间填满了旧衣服，由我经过奥国的时候，顺便带给那边的难民营。其余的旧衣服，我们遵照医生的嘱咐，统统从房间搬出来，堆在楼下那条公共小走道上，与大家“分享”。

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可侣柔声对我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可不是南斯拉夫！万一搞不好，他们把你关起来的话，我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安得烈，我们等着你回来，你的孩子，还有我。”

我叫她尽可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地回来。虽是这么说，自己的心情却非常沉重。终于，我上了车，发动了引擎。

“你钱带了没有？”她问我。

我摸摸口袋，钱包确是带了。这次我带的钱特别多。不晓得为什么，最近那家杂志社转来的读者奉献特别多。其实我一路上用不了多少

钱。睡，我尽可能睡帐篷。吃，我可以自己做饭。但是，可侣好像预先知道我这回会用钱用得多的似的，一定要我多带点钱。

什么都带齐了。我亲了她一下，又踏上征途。

路过奥国，把旧衣服卸下，然后直奔南斯拉夫。原来去保加利亚得经过南斯拉夫，因为这是最近的一条路。否则的话，取道意大利，一直往南走，然后东渡希腊，再折向北，穿过希腊的马其顿，而后来到了保加利亚。这样走法，当然是远了，所以我决定取道南斯拉夫。虽然我最近刚给他们赶了出来，但是我知道南斯拉夫的牛步公文是出了名的，我那头被驱逐出境，这头到领事馆又可申请签证，果然又让我猜到了。现在我只担心入境的时候可能会有麻烦。

终于到了边境。我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可是，他们只稍微看了一下我的护照，跟我聊了几句，就让我过去了。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外旅名单从边境送到贝尔格莱德对档案总需要有几天的工夫。照我的估计，我在南斯拉夫大概最多只可以逗留四天左右。于是，我先去见了贾秘一面，然后匆匆南行，而后向东，一心想在第五天的早晨离开南

斯拉夫，进入保加利亚。可是，我每次来南斯拉夫总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这次也不例外。贾秘给的那些人名跟教会多到够我忙上一个月的，而且沿途的工作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干涉，因此我决定冒个险，再多留它一天。

最后那个晚上，我在半夜的时候住进了一家旅馆。把护照交给柜台以后，就上楼休息去了。那知道睡到快天亮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我把房门打开，看到外头站着两个便衣人员。

“你穿上衣服跟我们走，”说的是德文，“不要带任何东西。”

他们站在那儿，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看着我穿上衣服，出了房门。天还没亮，旅馆大厅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工人蹲在那儿擦地板。出了大门，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座大石头房子。进到里面，踏上了一条大理石的走道。脚步在空洞的回音中转进了一间办公室。

里面的那个人坐在办公室那头，手里拿着我的护照。“你怎么又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没等我答腔，他又凶巴巴地接下去了：“你这护照怎么又换了一本？看样子，你们荷兰政府倒顶会给你们这些人开方便之门嘛！”

说罢，伸手到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我一看之下，心裏連呼不妙。

原来又是那个大红印子。他在我签证上狠狠地盖了三下，这才放心。

“我限你二十四小时内离境，”他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许你再跟任何人有接触。同时，我们会通知翠丝堤那一边，让他们到时候等着你。”

翠丝堤！他这可是当真的？这地方远在南斯拉夫的西北角，我这次就是从那头来的。好不容易来到现在这个地方，离开保加利亚只有五十英里路，难道他真不让我过去？

“但是，我这回是准备去保加利亚的！你可以不可以让我往那头走？”

不！他说了要我往回走，就得往回走。绝不通融！

带着沉重的心情，我只好那么办了。先向北，离开南斯拉夫，然后从意大利和希腊那边绕过去。本来眼看就要到的地方，现在得多走上一千五百英里！

进了意大利以后，我的情绪越发低落。沿岸人烟稠密，乡镇城市一个接一个的。路上什么车都有。货车、自行车、马车，熙熙攘攘的，你想快都快不了。

三月三十一号是可侣的生日。我给了她一封贺电。这一来又让我想起她跟我之间是隔得那么远。我们结婚以后，这是她的第一个生日，而我却身在异国，离我的目的地还有一大段路，离她却是越来越远。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万一我在保加利亚又让他们找上了麻烦怎么办？还有两个多月她就要生了。会不会到时候我赶不回去？此外，钱可能还成问题。起先我还以为带得太多了。可是，照现在这情形看来，如果能仅仅够我来回的话，就已经是算好的了。

再加上我的护照又背上了那个讨厌的大印子，时刻让我担心。

正当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背痛的毛病又发作了。最近三、四年来，我脊骨上的一个关节常闹毛病，特别是遇到开长途车的时候。

这次在意大利境内走了差不多一半路的时候，它又来了，而且痛得比以往都厉害。到了布尔狄西的时候，我痛得走路得弯着腰，像个大驼背。因为匆匆忙忙赶路，也没时间去找医生。在那儿上了渡船，过了海就是希腊。

到了希腊以后，还不见好。继续开车，几天下来以后，痛得我大吼大叫的。刚捱过了意大利公路上的车水马龙，又碰上了希腊式的路面——大洞小洞，还有大块石头。而且我看不懂那些希腊文的路标，常常辛辛苦苦地跑了一大段路，才发现走错了，又得转回头。

总之，我的情绪坏透了。那种消沉的感觉像慢性毒药似的，不停地在侵蚀着我。里头似乎老是有那么个声音在说：“我说，安得烈呀，南斯拉夫那件事情，你还算是够运气的。碰到他们对你客气，只把你撵出去就算了。其实，他们很可以把你关起来的。多久？五年？十年？等你到了保加利亚就知道了。他们那边常常抓人的，有时候一关进去就出不来了，甚至于音讯全无……”

一路上就这么想七想八的，紧张之至。哪知道最后还有一个打击等着我。原来，当我到了一个名叫西尔瑞的地方，才知道我所要去的那个边防站只准外交官员进出。其余的人根本就无法从希腊这边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再绕上一大段路，从土耳其那边进去。要多走好几天。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走下去。那天早上，我沿着一条石板道颠簸前进。远路茫茫，似乎充满着无限的艰辛。突然间，我看到前面路边竖着一块蓝色的小牌子。上面有两行字。第一行是希腊文，下面还有一行是拉丁文，写着：腓立比。

腓立比？我连忙把车刹住。难道这就是圣经里的腓立比？是保罗和西拉被下到监里，神用地震把监门打开的那个地方？

对了！这正是那个地方！我下了车。看到旁边有一片废墟，四周用金属网围住。里头残垣断柱：街道、神殿、房屋，遗迹依稀可辨。那边有一排房子，只剩下几道墙站在那儿。会不会其中有一间是吕底亚的房子？保罗曾经住过的。

四面都围上了;旁边有个进出口,也上了锁。正是荒郊无人,一片空寂。新建的腓立比在西北那头,离此地有两英里路。

我站在那儿,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有保罗那穿越世纪的呼喊,震动着我的心弦:“信徒们!不要失去了你们的信心!”

保罗在此地受过捆绑。而我如今身心痛苦,无形中也是受了捆绑。保罗和西拉当初跟我一样,在逼迫福音的地方传福音,神当时既然能大行神迹,把他们从捆绑中拯救了出来,他现在也一定会伸出大能的膀臂,除去我的捆绑。

刹那间,我里头那股低落的情绪没有了,就如当初保罗手上的锁链被断开了一般。沉重的心情一扫而光。我这才发觉自己站得笔直,挺胸昂首,了无病态。我身体心灵都蒙了医治,全人充满了无限的喜乐。

我连跑带跳回到车上。发动引擎,向着前面的目标直奔。

第 14 章

巨人斗士

没进保加利亚之前，我还尽担心，怕在入境的时候会出问题。但是结果是意想不到的顺利，一点儿事也没有。检查人员只稍微瞟了一下我的行李，也没叫打开来给他看。至于护照，他在保加利亚签证旁边注上了入境的地点和日期以后，就交还给我，其他那几页根本就没看。

保加利亚的公路比希腊、土耳其的好多了，路面又新又平坦。沿途遇到的人都很友善。孩子们喜欢跟着我的车跑，边跑边嚷。种田的乡下人看到我的车来，常会笑着脸、直起身子、向我挥手打招呼；像这种情景在别的地方从来没见过。

头一天晚上，我离了公路，进了一条上山的小路。在山边找到了一个很清静的地方，支起帐篷，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早起来，从车上各个角落里把带来的圣经搬出来，整理一下，把暂时不用的罗马尼亚文圣经先收起来。然后沿着一条又狭又陡的石子路往山下开，准备回到公路上去。

但是，走呀走的，竟然走昏了向，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小村子的后头。同时，底下的那条烂泥路越来越糟糕。后来又碰到了一条浅水溪。待我过了溪，再多开几步路以后，车轮就深深地陷在泥里，再也动弹不得。

一个人坐在车里，四望无人。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粗犷的歌声。顺着方向望出去，似乎那声音是从村子边上那幢屋子里出来的。我下了车，两只脚马上陷到烂泥里去了。没办法，只好挣扎着向前。终于来到那幢屋子的门口。

原来那是个酒吧。虽然时候才上午十点，可是听声音，好像里头那些人个个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我进去以后，他们马上停止高歌，十几二十个人张大眼睛望着我，奇怪村里怎么忽然来了一个外人。里头乌烟瘴气，空气非常难闻，阵阵烟味比西方国家的酒吧还要浓重。

“请问这儿有哪一位会说英文？”我问。没有反应。“德文？”还是没有反应。“荷兰文？”……

“各位好。”我笑容满面地向他们作敬礼状。然后开始指手划脚，演我的独脚哑巴戏。另又加上怪吼，模拟汽车陷在泥裏，引擎徒然挣扎的声音。

表演了半天，他们仍然莫名其妙。

我又两臂齐伸，作驾驶状。“哦！”酒保点点头，表示这回他懂了。没一会儿工夫，他过来了——端着两大杯啤酒，一手一杯。“哦，不是这个。”我笑了，“是汽车不动了。”我把杯子接过来，放下，作个手势，说：“跟我来。”

终于，有几个人像是懂了似的，嘻嘻哈哈地站了起来，嚷着叫别人也跟他们一道去。于是，一大堆人跟在我后头往外跑，浩浩荡荡的，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游行里带头的小丑似的。

到了车边。“哦！”点头，拍大腿，这下他们全懂了。个个毫不犹豫地往烂泥里踩，准备把车子抬高。好在他们都穿的长统靴，方便得多。

我这头上车，发动引擎，趁几名大汉往上抬的时候，轻轻地就把车带出去了。

在酒吧门口下了车，向他们道谢。同时又有点担心，怕这些人对我车里的东西起疑心。一个荷兰人带了满车的书跑到保加利亚来，这种情形实在很难对他们解释。我赶紧跟他们握手，表示谢意。抓住一只只又大又粗的手，握个不停。

“我实在很感激你们，”我说，“我代表荷兰的同胞们向你们致谢。同时，我主耶稣也必悦纳你们的善行……。”

最後，在一阵欢笑珍重声中，别了他们。带着满车底的烂泥在公路上飞奔。开了足足有大半个钟头，才把外面的那层泥抖掉。

目的地是苏菲亚。因为在南斯拉夫最后的那天晚上认识了一个人，他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住在苏菲亚。

他对我说：“彼得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你想不想去见见他？”我当然是很愿意。我把地址记在心里，因为如果抄下来带在身边的话，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给查出来，那就麻烦了。

来到苏菲亚近郊。把车停下，在山坡上稍事休息。居高临下，全城尽在眼底。远山绵延，近处东正教堂的圆拱在暮日的余晖中闪耀着金光。面对着这一幅美丽的远景，我又想到了神的安排是何等奇妙，在工作的联络上简直不需要我自己操心。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把他住的那条街找出来。南斯拉夫那位朋友曾经关照过我，叫我不要随便向人问路找地址，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很容易引起人家怀疑，对那位弟兄尤其不利。

因此，我找到旅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们要一份地图。“对不起，我们这儿没有。你可以到附近的那家书店问问看。”

跑到书店。书店也没有，卖光了。回到旅馆，再问那个职员。“你这么急着要地图干嘛？”他带着怀疑的眼光。

“哦，就是想知道方向，”我说，“语言不通，走错了路很麻烦。”

他听我这么说，觉得也有道理，就说：“我们这儿只有这么一张小地图。”他指着自已桌上玻璃垫下的一张市街略图。上面只有几条最大的路有街名，其余的都没写出来。不过人家既然好意，也就花几分钟看一下吧。想不到，细看之下，竟然有重大的发现。原来这张图虽然只有大街才有路名，但是在这家旅馆附近不远的地方有那么一条小街特别例外，细线旁边居然标有街名。其余的小街一概没有印名字。而那条有名字的小街不是别的，正是我所要找的那条街！我暗自惊奇，知道这又是神预先就替我安排好的了。

第二天一早就出去找那条街。很快就找到了。于是沿路走下去，找门牌。走了一阵，发现对面远远来了一个人。就在我找到那个门牌的时候，他也正好来到我的面前。那是一幢很大的双层公寓。我转身进了公寓的前院。哪知道，他也进来了！

将近大门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迅速地互相接触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我们感受到了基督徒间常有的那种奇妙而又亲切的默契。

我们一言不发，并肩上了楼梯。这么大的一幢公寓，里面住的也不晓得有多少人。万一认错了人，岂不是很尴尬。

一路来到他的房门口。他掏出钥匙，把门打开。我这头马上跟着不请自进。他也心照不宣，若无其事地顺手把门关上。两个人在暗中面对面站着。

“我是安得烈，从荷兰来的。”我用英文自我介绍。“我是彼得。”他说。

里头只有一个房间。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住。夫妇俩都过了六十五岁，靠政府给的养老金生活。两份加起来也还勉强够用。

介绍过后，三个人一齐跪下祷告，感谢恩主奇妙的带领，用最快捷最妥当的办法把我们聚在一起。

祷告完了以后，开始交谈。我说：“听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圣经非常少，这是不是真的？”

他先不说什么，只把我带到书桌旁边。桌上有一架老爷打字机，上了纸，还没打完。旁边一本圣经，翻开在出埃及记。同时那头小饭桌上另外还有一本。他指着饭桌上的那本说：“那本圣经是我前三个礼拜才买来的。刚好让我碰上，平常根本就买不到。而且价钱很便宜，只花了一个月的养老金。便宜的原因是因为那里头缺了创世记、出埃及记，还有启示录。”

“为什么？”我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人家把它撕下来卖钱，也许有人贪它纸薄，拿来卷纸烟。好在让我看到了，赶紧把它买下来。现在就是要把缺页的部分补进去。我想大概再花上一个月的工夫就可以打完。”

“然后呢？”

“把它送给别人。”

“送给普拉夫提的一个小教会，他们那边没有圣经。”他太太加了一句。

我不太懂。整个教会的人，一本圣经都没有？

“是的，”彼得说，“这种情形多得是。不止是我们这儿如此，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也是一样。古时候圣经很少，只有那些专任圣职的人才有，而且一般信徒也看不懂。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圣经就更形绝迹了。像我这次侥幸找到了一本，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听他这么说，我真巴不得马上把我车里的那些圣经搬出来给他看。

当天夜里，把车开到他公寓门口。看清楚四下无人，然后把一整盒的圣经往他楼上搬。他们看我把一盒东西放在桌子上，夫妇俩睁大眼睛，不晓得里面究竟是什么。

“这是什么？”彼得问我。

我把盖子打开，取出一本圣经交给他。又再拿出一本给他太太。
“那里头还……还有什么？”彼得问。“全是圣经。我车里还有很多。”

彼得双目紧闭，嘴唇因着感情的冲动不住地颤抖着。两行热泪不由已地流个不停，滴落在手里的那本圣经上。

我们立即开始行动。走遍各个地方，把圣经分给那些最有需要的教会。

彼得说：“你晓不晓得政府用什么理由来取缔圣经？他们说我们的圣经用的是古文，对文字教育有不良的影响。”

东正教是保加利亚的国教。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立场，成为政府的工具。现任的这个大主教对保加利亚政府更是极尽讴歌颂赞之能事。

“其实，我们这儿有两种教会，”彼得说，“一种是傀儡教会，只不过是政府的传声筒。还有一种是地下教会。今天晚上我可以带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那天晚上的聚会一共只有十二个人，但是大家得约好分批赴会，陆续于不同的时间抵达，以免引起人家注意。前后花了一个多钟头，所有的人才聚齐。

我跟他两个人的时间是七点半。到时候两个人在路上分开走，装做不认识。进了一幢公寓，上到三楼，到了门口，先环顾左右，然后悄悄地推开虚掩着的房门，进到里面。不由得我想起了从前在家乡韦堤，每逢星期的时候，乡人全体出动上教堂那种招摇过市的景况。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八位弟兄姐妹等在那儿。过后七点四十五分来了一个，七点五十五分又来了一个，房间很黑。只天花板中间亮着一个小灯泡，窗户用毛毯遮住，怕外面的人看到。其实用百叶窗帘最方便，可能是因为他们太穷，买不起。大家围着圆圈坐，静静地低头默祷。准八点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说话，声音放得很低，同时用英文传译给我听。

“今天晚上很高兴有一位从荷兰来的弟兄在我们中间。我准备请他向我们交通一点神的信息。”

他坐下以后，我还等着唱诗。再一想，对了，像这种秘密聚会怎能唱诗？

我讲了大约有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向彼得点头示意。于是，他霍然站了起来，使个招式，把带来的那个纸包打开，再把手往上一举，原来是一本新圣经！

弟兄姊妹们不约而同，一阵惊呼。才发觉声音太大，赶紧把嘴捂住。大家围住我，谢个不停。然后，一手转一手地传阅那本圣经，悉心把玩，视若奇珍。

回去跟来的时候一样，也是一个两个地分批离开。走了一个多钟头才走完。最后祷告完的那一位是个大个子。满面络腮胡子，淡棕色的四方脸，衬着一双忠厚仁慈的蓝眼睛。彼得替我们介绍，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他话不多。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里头那股孩子似的淳朴无邪的气质。他跟彼得一样，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两个人常向那些圣经比较多的教会要(或是买)一两本，分给那些根本没圣经的教会。

彼得告诉我说，亚伯拉罕和他太太两个人住在喽陆山区的一个帐棚里。政府每个月给他二十二块钱，他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他以前自己有地，后来政府认为他有“反動”行为，给没收了。

“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他家里看看，”彼得说，“你就可以体会到，有的人为了神的缘故所付上的代价是多么的大！”据彼得说，他们夫妇经常吃的多是野莓、水果，再加上一点面包而已。

彼得给他起了个绰号，称他为“巨无霸克星”。因为这位老弟兄常常想办法去找那些“歌利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或是军队里的那些人，有机会的时候就向他们作见证。往往一场争战下来，歌利亚赢了，亚伯拉罕就得吃点苦头，甚至于坐牢。也有的时候亚伯拉罕赢了，于是神的国里又多了一个子民。

分手的时候，我把车里所有剩下的保加利亚文圣经统统拿出来交给亚伯拉罕，请他全权统筹分配。

他把那些圣经接过去，小心的像抱婴儿似的。经过彼得的传译，他诚恳地对我说：“弟兄，这是一场长期全面性的战争。在过去，我们有胜利也有失败。可是这一回，我的弟兄，你可真让我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其余的时间大部分用在拜访各处的地下教会。“坚固余民”——神早先给我的那个感动，在我里头越来越迫切。他们这真是一群坚贞的余民，肯牺牲、肯付代价、为了他们所信的不惜摆上一切，在艰苦的环境中孤军奋斗。

一路上认识了好些个牧师。其中有三个给我的印象最深：康坦廷，艾敏还有贝守。

康坦廷为了替一些未成年的信徒施洗，给判了一年半的刑，最近才放出来。他告诉我，他那天一出狱，当天夜里马上就带了二十七少年人跑到郊外的一条河边，暗地里给他们施了洗。

至于艾敏，他自己本来有个教会。只是有一年圣诞的时候，政府派人来听他讲道，听到他在台上对着底下的几个孩子们说了几句话，他说：“孩子们，我们大家在圣诞的时候互相送礼物，你们晓不晓得世界上最宝

贵的礼物是什么?那就是神藉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就为了这几句话，政府传他上法庭，判他触犯了“不准向儿童传教”的条例，因此不让他再担任牧职。

还有就是贝守。人人都知道他跟秘密警察是老搭档。有一次彼得带我上贝守那儿做礼拜，想让我见识一下傀儡教会的情形。聚会前我们跟他先谈了一阵。据他说，自从战后，这个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言下不胜感慨。然后他突然间向我说：“我在想，好不好请你今天下午给我们讲一堂道?”

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明知任何人非经政府注册就不能随便在教堂领会。他这究竟是存的什么心?

“这……这我得祷告一下。”我说。

我可真祷告了。聚会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心里为着这件事情拼命地祷告，他这会不会是想要故意陷害我?会不会是他跟秘密警察同谋，想借故把我驱逐出境?可是，祷告的结果，我里头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说：“没问题。你尽管答应下来吧。”

于是，聚会快完的时候，贝守向底下那寥寥的几个会众宣布当天下午有一堂特别聚会，由荷兰来的一位弟兄讲道。请大家尽可能来，而且最好带些朋友来。

大出我们意料之外，那天下午到会的竟然有两百人。聚会的情形非常好。会后到台前表示决志的有几十个人。

更想不到的是，后来贝守又自动提议说当天晚上再来一个聚会。我跟彼得可真猜不透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机会难得，岂可放过，当然是满口答应了。

晚上那一堂座无虚席，从头到尾满有圣灵的同在。会后又又有几十个人表示决志跟随耶稣。贝守再度宣布第二天晚上还有聚会。

礼拜一晚上全场爆满，两旁走道上站满了人，中间那条走道也坐满了。可是，这一回他局里的那些朋友们来了，有五六个人坐在下面。我们还是照常聚会，只是到了结束的时候，没有邀请决志的人出来，也不敢请他们举手，免得给他们惹麻烦。

散会以后，贝守、彼得和我三个人坐下来共商对策。情势摆明，这聚会是不可能再延下去的了。至于日后官方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得而知。贝守这两天为什么会忽然改变作风？看样子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以后政府会不会找他麻烦？这也是个问题。

可是，过后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来找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我这才明白，原来是神定意拣选贝守做祂的器皿，所以加予他特别的感动。因为，贝守在所谓新时代教会里已经有了地位，高高在上，深获官方的信任，所以也许他们认为他这次这种做法总归有他自己的道理，也就不予追究，反正等那个荷兰传道人走了以后，一切自然而然会恢复原状。

可是，结果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本来一共才不过五十来人的一个小教会，一下子加到了将近四百人。后来当局终于忍不住了，开始采取对策。刚好贝守身体有毛病拖了很久，决定那年秋天去瑞士动手术，等他去了回来的时候，竟然被自己的政府挡驾，不让他入境。他的教会由官方另外找了一个比较“可靠”的牧师来接管。那位仁兄果然“狠”有一手，不到三年工夫就把那教会恢复了原状，一共又剩下那么五十几

个人。但是，我相信其余的那三百多人，就像当初耶路撒冷四散的门徒一样，迟早会把福音的种子撒遍巴尔干半岛。

临走之前和彼得上喽陆山看了一次亚伯拉罕。事先也不知道他的帐篷究竟搭在哪里，只晓得是在某个乡下附近的山里。就这么先去了再说，希望到时候可以找到他。将近那个村子，路越来越不象话，到后来简直就没有了，只好把车停下。面对着那么大的片野地山林，正不晓得要上哪儿去找他，刚好旁边不远有个公共水井，有些人在那儿排队打水，最前面的那个人正弯着腰在喝水。等他喝完了站起来，脸朝这边转，我们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弟兄亚伯拉罕！

他也看到了我们，一双蓝眼睛直乐得像艳阳天似的。飞步迎来，把我们抱得紧紧地，满胡子冰冷的井水尽往我们身上滴。听他说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每隔四天才下山一次，是为了要进村买面包，而且每次一买完就走。所以，我们这次能够这样碰面，实在可以说是太奇妙了。他回到井边，拎起搁在石墙顶上的六块大面包，然后就带我们上山去他家。

这位老人家已经七十五岁，却是健步如飞，一路上跟得我和彼得气喘喘的，还得多次央他停下来，让我们歇歇脚。他说他上个礼拜刚从外

头回来，已经把我交给他的那些圣经全部发光。他一路上把详细的情形都说了。彼得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让我等他到了目的地喘过气以后再慢慢地跟我说一遍。

行行复行行，最后穿过了一道悬崖，来到一排古松的背后。前后走了整整两个钟点，这才见到他的住处，是个山羊皮做的帐棚。相映之下，更让我联想到了旧约里的亚伯拉罕。没一会工夫，他的太太出来了：个子奇小，周身皮肤起皱，精神倒是健旺，两眼蓝而蔼。他们夫妇本来家道相当富裕，如今物质上虽然贫穷，却也能随遇而安，心满意足。

她摆出果子和野蜜款待我们。那果子很小，一粒粒的，蓝颜色，看起来有点像黑莓。我和彼得只吃了一点，因为不知道他们自己还有没有。我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因为怕天黑了以后路不好走。这次见面的时间虽然短，但是却奠定了我们日后那恒久宝贵的友情。

最後，当我正要离开保加利亚去罗马尼亚之前，有一批人跑来见我，想请我去某个地方开一次布道会。这些人以前在贝守那个教会听过我讲道。虽然他们非常诚意，满了传福音的热忱，可惜我分身乏术，心有余而情势不许可，只好予以婉拒。

总而言之，此行多方面都很蒙神的祝福，尤其与当地的信徒们有美好的交通，他们的爱心和见证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第 15 章

房子和菜园

多瑙河那边就是罗马尼亚。过了河，来到边境检查站。看到前面只排了五部车子，以为很快就可以过境。谁知道四十分钟过去了，他们还在查那头一部车子。我心里在想：“可怜的家伙一定有什么问题，否则怎么会查这么久。”

第一部车终于查完了。轮到第二部。哪晓得这一查又是半个钟头。我开始有点慌了。眼看他们把那部车里所有的行李都搬了出来，摊开摆在地上，一件件地查。下面那几辆车也是这么个查法。到了第四辆的时候，竟然查了一个多钟头。他们把那个人请到里面去，然后将他的车子彻底地搜查了一番：撬开轮盖、拆下车座，甚至连机器零件都拆了出来。

终于，前面只剩下了一部车子。我心里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我那些罗马尼亚文圣经怎么能逃得过他们的检查？主啊！这一关靠我自己是绝对过不了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干脆让你显个神迹好了。反正那些圣经总是会让他们给搜出来的，倒不如我现在就拿几本出来，摆明给他们看，也许反而好一点；而且这么一来，我更能够完全死心不靠自己，惟有仰望你的大能。”于是，我从暗处抽出了几本圣经，摆在座位旁边。

轮到我了。我把车子往前开到那个检查员的身边。先把所有的证件递给他，随后准备自动下车。可是他站得太近了，无形中把车门给顶住。他对了对我护照上的照片，简单地划了几个字以后，就把证件统统还给我，然后把手向前一挥，也没说别的。这可把我搞迷糊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前后还不到半分钟，难道这就算查完了？不会吧。可能是他要我先把车开到边上，然后再来查。于是，我先慢慢地向前开，一面狐疑观望，脚底准备随时刹车。开了几步路以后，觉得后头并没有什么动静。再一看望后镜，原来那个检查员已经在向第二部车招手，等他上来以后，马上就叫那个人出来。再过一会儿，我又往后看。那个检查员正在让那个人把车盖打开给他看。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的放心了。像做梦似的，我真的过了。这个时候我的心反而怦怦地跳个不停，不是因为刚才那阵子紧张过度，乃是因为神这次的作为实在是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

起先我还以为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的情形差不多。其实不然。铁幕后的信徒们个个都知道罗马尼亚是个“无神主义的温室”，因为俄罗斯共产党总是把罗马尼亚当作一个反宗教措施的试验场；每逢想出什么新花样的时候，总要先拿到罗马尼亚来试验一下。此地的政府对教会管制得非常严，教会的各种活动都受限制。信徒们在社会上以及经济上还受到政府的歧视与压力。教会以及信徒的财产常被没收。政府甚至于用挑拨离间

的手段暗中破坏教会领袖们之间的感情。这些情形都是别人先告诉我的。

且说我过了关卡以后，一到了里面就觉得那种气氛与别的地方不同。我的印象中几乎每一个乡镇的进出口要道上都有那么一个检查站。所有外人进来，都要先经过警察一番盘问，才可以通行。甚至于像我这个外来的“观光客”也得让他们在签证上注明我所要去的城市，而且指定在哪一天必须向哪一个地方报到。记得有一次我上某一个城市去，来到附近大约五十英里的一个小地方，看看天色已经不早，很想就在那儿先过一夜，第二天再走。于是向当地有关单位征求他们的同意。他们看了看我的证件，觉得好像很奇怪，我为什么想在那个地方过夜。他们对我说：“根据这上头的日程，那边的旅馆今天晚上会等着你去吃晚饭。你现在快一点的话，还可以赶得及。”

我也不想为了这点小事跟他们争，免得惹出麻烦来。他们既然这么说，那我就干脆照办吧。待我匆匆忙忙进了城，找到了那家旅馆，时候已经相当晚了。他们的餐厅再过一会儿就要关门了。我进了餐厅才发现原来他们早就替我摆好了桌子，连四小碟都上好了，桌子中间还插着一支荷兰国旗！

不过有一点还算好，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以后，在当地的范围内倒还可以自由行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早就醒了。外头的天气非常好。我急着要找一间教会做礼拜，问旅馆柜台附近有没有什么教堂。那个职员觉得我问得有点奇怪，他说：“这种地方我们这儿不多，而且我们的话你也听不懂。”

“这倒不成问题，”我说，“也许你不知道，基督徒之间有他们自己的一种共通语言。”

“噢！是种什么话？”

“那种话叫做阿嘎佩(译注：是希腊文，意即“神圣的爱”)。”

“阿嘎佩？从来没听说过。”

“是吗？这种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一种话。我们先不谈这个，你能不能告诉我此地什么地方有教堂？”

我在这儿先谈一点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对付教会的政策。他们想出一个口号，叫做“集中力量”。藉着这个口号把各宗派合并起来：教堂合并，各

种聚会也合并。乡下地方的教堂，如果人不多的话，就合并到别的地方去。多出来的房屋财产尽归政府。这个口号乍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一个大教会岂不是比好几个小教会各自为谋独立苦撑来得好？可是事实不然。因为你关了一个教会以后，那些人也就懒得再跑到别的地方聚会，尤其是乡下地方交通不方便，很少人愿意跑到别的村去做礼拜。

每个星期只准有两次聚会。礼拜六一次，礼拜天一次。可是，在罗马尼亚礼拜六不放假，整天要做工，所以晚上去聚会的人并不多，实际上就剩下礼拜天的那堂崇拜。

话说我那天上午总算找到了一间教堂。去到的时候也不过是十点，可是聚会已经开始了一个钟头。里头坐得满满的。还好他们看我是个外国人，让我坐到讲台上。那个位子正对着风琴的侧面，而且靠得很近，挤得我两条腿能屈而不能伸。这么一坐就是三个钟头。你说这聚会长不长？

到了收奉献的时候，我在盘上放了一张罗马尼亚钞票，折合荷币相当于我平常在荷兰每次聚会的时候所给的。刚好那个奉献盘是从我那儿开始传下去的，所以起先也不晓得别人是怎样给的，等到盘子一路传下去以后，我才发现我给的数目比别人多出了二三十倍。同时又注意到有

不少人先放上一枚辅币，然后还要从盘子里找钱回来。这种情形我以前在某些天主教或是东正教堂里面倒还见过，那是因为他们有所谓收“买座钱”的规矩。可是，基督教会里面，信徒奉献还要找钱，我这倒算是开了一次眼界。显然，对一般人来说，那一枚辅币的数目定规是超过了他们所能负担的。至于我给的那张钞票，很可能他们除掉日用开支以后，每个月所剩下来的钱也不过是那么多。这么一想，我倒真怕他们误会，以为我这个外国人钞票丰富，故意要在他们面前摆阔。其实我们家在韦堤算是最穷的，就这么正在想的时候，收奉献的那个人随着音乐的尾声回到前面来了。想不到他竟然捧着奉献盘来到我的面前！向着我嘴里念念有词，说的是罗马尼亚话。我终于懂了，原来是他要我把该找的钱拿回去！

在他们想，我一定是手边没有零钱，所以才抖出那么一张大钞来，而当时刚好又是从我那儿开始收奉献，所以呢，我现在一定是在等着找钱。

我这该怎么办？为了礼貌起见，就拿它那么一点，意思意思呢？还是跟他解释，我本来就是要给那么多的？

大家都看着我。正感为难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心裏想，我这些钱其实都是读者们的奉献，认真说起来都不是我的。于是，我跟他说：“这

不是我个人的奉献……”我用的是德文。还好这个时候会众里有一个人出来替我传译。我说：“这钱实际上不是我的，而是荷兰弟兄姊妹们的一点心意，表示他们跟贵国的信徒们在主里是合一的。”

趁那个人在替我传译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会众们的表情：半信半疑，却又希望是真的，好像在说：“原来我们并不孤单？原来还有其他国家的弟兄姊妹们关心我们？”

聚会完了以后，我跑去找刚才替我传译的那个人。发现他原来是那个宗派的全国总书记。我表示想跟他单独地谈一谈。可是，他显然不想跟我多打交道。先是闪烁其词，然后尽快找个理由溜之大吉。

我好生奇怪，暗自跟着他出了教堂。他的块头相当大，又要想走快，所以显得非常吃力。我远远地尾随不舍。心里想，他也许是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跟我多说什么，免得惹出麻烦来。我不妨先跟在他后头，看看有什么机会没有。

走呀走的，终于看到他进了一幢私人住宅。我说，这可好了，这下子可以进去好好地跟他谈一下。于是，在附近先待上十五分钟，等到四

下无人的时候，才上去敲门。过了一会儿，觉得里头隐隐地有两道目光在往外探。接着那道门霍地打开。说时迟那时快，里头那个人一伸手就把我拉进去了。

“你是干什么来的？”原来就是他。我给吓了一跳。赶忙堆起笑容，说明来意无他，只不过是再跟他聊聊，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没有。

“帮忙？”

“噢，譬如说圣经，你们这儿圣经够不够？”“你有我们的圣经？！”他张大眼睛看我，“是你带来的？”“我是有那么几本。”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很坚决地对我说：“我们没这个需要！而且我要告诉你，你以后绝对不可以随便跑到我家来，其他教友的家也是一样。”

我没听错吧？也许他口是心非，乖戾中另有隐痛？“那末，我可不可以去你办公的地方找你？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全？”

“这不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我可没那么说。好吧，你明天要是来的话，我可以想法让你见见我们的会督。”

第二天，我上他们的总会找他。拎着一个公文包，里头装着六本罗马尼亚文圣经。

他的神态始终是那么紧张，额头上一直在冒汗。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顾忌似的。他带我去见会督。介绍过后，那位会督问我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忙的没有。我本来想告诉他，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问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但是再一想，如果他真有顾忌的话，我这么说了反而不好；昨天岂不就碰了一个大钉子！于是，我说，我很高兴这次能够有机会访问他们的国家；因为我自己是个基督徒，所以想到也许他对我荷兰同胞们有什么勉励或是问候，我可以替他转达。

他听我这么说了以后，脸上所有的细胞马上从“立正”转入“稍息”。原来如此！这还有什么问题！伟大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对那些在资本主义下被奴役的荷兰人理应寄予万分的同情与关怀。那位总书记的神态也轻松多了，脸上有了笑容，本来一直在拭汗的，现在也不拭了。

“您请坐。”于是，我们开始有一段寒暄。大家尽找些无关紧要不着边际的话来说。谈到罗马尼亚的蕃茄，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蕃

茄，还有，这里的西瓜也不错。后来又说到此地的气候很好，不冷不热，非常适中；会督说，这是由于黑海具有调节气温功能的缘故。

趁着谈话的当儿，我对那个房间略微打量了一番。发现所有的桌子椅子，甚至连墙上挂的画，都编了号。很可能这些都是政府的财产，所以才予以编号管理。

这么谈了大约有十五分钟，我们把所有的大蕃茄以及好天气统统给聊光了。大家开始有点支持不住了。我心里想，不要再憋了，话迟早总是要说的，碰钉子就让它碰吧，说不定还不会呢。

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打开公文包里取出了一本圣经，对他们说：“我这儿有几本圣经，是我……不，我应该说，是荷兰人民送给罗马尼亚人民的一份礼物，好不好请你们代表收下？”

这么一来，可不得了。吓得那两个人的神经细胞再度全体肃立。总书记的额头又开始冒汗了。会督暂且把圣经接过去。就在那瞬间，我从他细腻的动作上似乎瞥见了那深处真情的一现；但那也只是短短的一现，他很快又把窗子给关上了。“我们不需要这个，”他把圣经还给我，“对不起，我今天上午还有很多事要办。恕我不能奉陪了。”

我当然只好走。出大门的时候，询问处的那个女职员拿起笔来，把我的名字从登记簿上给划掉。我心里想，她这倒真有点像在军事机关门口当守卫似的。谁晓得，说不定她就是秘密警察！老实说，在那种政治气氛之下，你会觉得好像什么人都靠不住，也难怪刚才他们两个人会吓成那副样子。

不过，情形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后来我又见到了另一个大宗派的会督和总书记，情形与上次的完全不同。地点也是在总会的办公室，而且里头所有的家具也都编号。墙上挂着三幅画。一幅是罗马尼亚总理像，一幅是罗共第一书记像，还有一幅是传统的耶稣像。

会督进来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不晓得他从哪儿赶来，反正是气喘喘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算定了下来；小个子，身体又不见得怎么好，让我看了真有点替他担心。

会督的名字叫乔治，总书记叫益安。大家坐定以后，才发现事情有点麻烦。原来我们之间语言完全不通，彼此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会督桌上摆着一本圣经，是本已经看得很旧的圣经，边上几乎给翻烂了。我灵机一动，心里想也许我们可以藉着圣经来表达彼此的心意。于是，打大衣口袋里拿出我那本荷兰文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20 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我把那节经文指给他们看。由于圣经书卷名的拼法大家都差不多，章节的写法又是一样，他们看了以后马上搬出他们自己的圣经，找到了那节经文，读了以后非常高兴。接着，乔治也回敬了我一节圣经，是箴言二十五章 25 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接着是我的腓利门书：“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轮到益安了。他倒快得很，就在隔壁几行：“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我们就这么藉着经文谈了大约有半个钟头。灵里非常之通。最后我把带来的几本罗马尼亚文圣经拿出来放在桌上，推到他们面前，打尽手势，表明是送给他们而不是要他们给钱的(他们原先已经伸手到口袋里掏荷包)。终于他们懂了我的意思。既兴奋又感动，两个人把我抱得紧紧的，表示那说不出来无限的谢意。

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传译。使得我们谈话的内容大为开展，平添了几分“属世”的味道。我把带来的圣经全部交给益安，请他视情形代为分发。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熟悉各地教会的情形；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他告诉我说，接触的人越多，危险性也就越大。

晚上我回到旅馆。柜台的那个职员把我叫住。他说：“先生，你还记得你早上对我说的‘阿嘎佩’那个字吧？我翻了一下字典，原来那并不是一种什么语言，而是希腊文‘爱’的意思。”

“对了，”我说，“我今天下午用的就是那种话嘛。”

语言不通的困难终于解决了，他们替我找到了一位非常好的传译，同时为我安排了各地的聚会。前后一共十天，几乎跑遍了整个罗马尼亚。各地的光景不同，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情绪非常低落，也有的士气极端高昂。那些起不来的，若依人之常情，也实在很难怪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嘛？”大家都这么说。很多人只有一个想法：离开罗马尼亚。

可是，也有不少热心的信徒。他们的态度和一般人不同，并不希望就这么一走了之。我在川西弯认识了一家基督徒，以养鸡为业。照理应

该还不错。可是，政府给他们规定了一个最低生产量，超过了他们所能供应的。于是，鸡蛋不够的时候，还得打市场买些回来凑数。经常如此，日子久了以后，当然是吃不消。

“那你们还在这儿待下去干嘛？”我说，“是不是为了这块产业的缘故？”

他们夫妇俩好像觉得我这问得太奇怪了。丈夫回答说：“当然不是。虽然我们一走，这里所有的一切势必归公。不过这还是小事，主要的是因为这一带地方实在是需要神的见证。”

当然，也有的基督徒，信心比较差一点。听说有一家小教会，光景很差。所处的地方很偏僻，对象是那一带的吉普赛人。于是我就跟那位传译的弟兄一道去看看他们。一到了那里，单看四面的环境，就已经让你觉得很不对劲。教堂四周围的草长得不知道有多高；玻璃窗烂了好几道也不修；后院养了些蜂，蜂房也是东倒西歪的。牧师一家住在教堂后面。出来开门的是牧师太太。原来牧师不在家，上布加勒向政府请愿去了。因为本地的共产党头子想占用那间教堂，说是政府要拿它来做招待所。

她说她跟丈夫两个人一向在吉普赛人中间传道，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些吉普赛人的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他们夫妇也一再为这件事情向有关当局请求辅助。最近政府终于在就业方面大开方便之门。可是却附带了一个条件：凡是经常上教会的人，一律不准申请这些工作。

“这么一来，弄得大家都不来教堂了。聚会的人越来越少，政府要房子就更加有话说了。看样子这儿迟早是待不下的了。”她说得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提议大家一齐为这件事情祷告。于是我们低头，把所有的困难交托给神。祷告完了以后，她接下去对我们说：“早些年倒还有些西方国家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可是后来就没有了他们的消息。最后收到的那封信，算算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而我们这儿又没办法给他们去信。日子久了，就觉得他们已经把我们给忘了。”说到这儿，她的眼眶又湿了。

我听了非常感动。向她保证，回去以后一定会把他们的情形告诉那边的教会，让大家在灵里彼此代祷，同负一轭。

时候不多。我的签证就快到期了。其实，到期不到期都一样，反正得早点回去，因为可偌的产期已经近了。

最后那个礼拜天在乔治那个教会做礼拜。聚会从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才完，中间有一段午餐的时间。末了由乔治传了一篇信息。其中有他个人的见证。他说到他本来一直有气喘病，后来经过不断的祷告，终于现在好多了。

临别的时候，乔治打开他的圣经，对我说：“安得烈，我最后想跟你一起看一段圣经。好不好请你打开使徒行传二十章 36 到 38 节？”

他接着把那段圣经读出来：“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你马上就要走了，”他说，“这段圣经最能够代表我此刻的心情。”

我说，要是拿我当保罗的话，我可真没资格，跟他是天差地远，连边都摸不上。

飯後，我們大家一起跪下禱告。眾人都哭了。一一與我擁別，然後送我上了那隻藍色的小船。

第 16 章

新发展

我终于回来了。这次离家前后足足有两个多月，比原定的时间要长。主要是在路上耽搁得太久了。

那天夜里很晚才到家。身子虽然疲惫，心情却是兴奋。冲上楼梯，连跑带喊：“可侣！可侣！我回来了！”

她跑出来，看到我回来，高兴极了。问长问短，话多到好像说不完似的。

“家里一切都很好。各人也都平安。据医生说应该是六月初的。不过，这是头胎，比较难说。对了，你再来一点咖啡怎么样？”

大儿子约彼生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四号。是在家里生的，跟我当初一样。生产的时候，我一直在可侣身边。从前我母亲每次分娩的时候，父亲也总是在旁边陪着她的。

生了约彼以后，我们就更需要有自己的住处了。因为洁芝接着就要生第三个孩子，哥尼流他们也就快有第一个了。我们这幢小房子实在已经到了人口爆满不能再挤的地步，即使在荷兰也不多见。

问题是，要搬到哪儿去？当时是一九五九年，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几年，只是荷兰的元气还是没能够完全恢复过来。住的地方本来就不怎么宽敞，大战以后情形更严重，加之建筑材料供不应求，弄得到处闹屋荒。就拿韦堤来说吧，虽然人口不断地在增加，可是住的地方并没有增加；一九三零年代以来，就再也没有加盖过房子。

为了租房子的事，我跑去见乡长。他只是摇头，说：“安得烈，我最多只能替你登记一下。老实说，最近三年来，名单上只是往后加人，前面的动也不动，一个也没轮到。”

我说：“不管怎样，就请你先替我登记了再说吧。算是尽个人事。”
“不过，要是你想买房子的话，那又不同了。这些登记的只限于租房子。”

“你好说。可是我哪来的钱买房子呀?!”

“其实，”他说，“就我所知道的，目前这一带地方根本就没人卖房子。”

天气热，房间小，再加上满地的旧衣服，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于是我们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每天晚祷的时候总要记念到住的问题。这么一连祷告了一个礼拜。到了第八天早上，我刚出门，准备上邮局去的时候，忽然心有所感，想起了温老头子的那幢房子，目前租给一个小学教员，听说那个人就要搬到哈林去了，他走了以后，房子岂不就空了出来？但是，再一想，这又有什么用？租房子是要依照登记的先后次序来的，我们排在最末了，说什么也轮不到。不过，我总觉得刚才那意念来得很突兀，而且带有一种权威性的催促，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可能这又是神的指示。说不定温老头子想卖那幢房子？反正他自己也不住。至于钱的问题，当时也没去想它。好吧，先去问他一下再说。于是，邮局也不去了，发动车子，朝老温的农场直奔。

“温老伯。”我看到他正在挤牛奶。“安得烈。”他转过头来，脸还挨着牛肚子，“什么风吹来的？听说你最近常在外面跑，是为了神的工作吧？”

“是的。”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

“哦，听说你租给人家的那幢房子最近就要空出来了。不晓得你有没有意思要卖？”

“嘎！你怎么晓得的？”他大为惊奇，“我是昨天晚上才想到要卖的，还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我一鼓作气地接下去：“那你能不能够考虑卖给我？”

他想了一想，说：“这房子我们已经住了好几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实在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若是对主的工作能有帮助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

他既然这么说我也就向他问个价钱。“一万块钱怎么样？”他说。

这可真没想到！满以为他至少会开价两万块钱的。于是，我马上对他说：“温老伯，我们就这么一言为定了。一万块钱，这房子我买了。”

别以为我有钱，其实我是什么也没有。

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给卫先生打了个长途电话，请他想办法。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向人开口借钱，但是内心倒并不觉得这一次做得有什么不对。卫先生当下就答应了，叫我第二天去他那里拿钱。

回到家里，把一切经过告诉了可侣。想不到我们现在居然成了有屋阶级。于是两个人马上跑去看房子。可侣在房子里跑来跑去，东看西看，高兴得什么似的。工具室楼上的那个小房间她也真住够了。现在终于可以有个象样点的地方。

“约彼の床可以放在这儿。那个房间可以放旧衣服，再摆个大洗衣盆。楼上靠那头的那个房间可以给你做书房……”她满脸兴奋，不停地在说她的计划，准备把这幢旧房子大大地整顿一番。

第二天我去阿姆斯特丹见卫老先生。他当面把钱交给我。没写借据，也没提到将来怎么还钱。事后我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然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各方寄来的奉献突然增加。除了经常开支以外，还有多余的钱还债。结果我们在短短的三年里就把欠款全数还清。奇妙得

很，债一清了以后，我的收入马上减少，又只够维持经常的开销。到了以后再有别的需要的时候，钱自然而然又会多起来。多年来信心的生活让我深深地体验到神的信实何其广大，祂的恩典确是永无穷尽。

我们终于搬家了。那幢房子大是大，可就是旧一点。我们荷兰人有句形容旧房子的话，用在这儿最恰当不过——“住够本了”。地板下陷；墙壁天花板东一块西一块的，非重新粉刷不可；屋顶尤其老朽不堪，亟待翻修。因为荷兰平地湿气特别重，再加以年久失修，以至于变成这副样子。话说回来，房子虽然旧，但是究竟还是自己的地方，经过不断的翻新布置以后，就越发觉得它可爱了。

起先的时候，因为湿气的关系，几乎所有的房间都不能住，只有客厅比较好一点，于是只好暂时把客厅当卧房，然后逐样逐处按着次序慢慢修理。因为所有全是自己动手，所以进度很慢。前后一共花了五年工夫才算大功告成，可侣的心愿终于得到了实现，其中还包括了一座新添的花园。

另一方面，我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开展。约彼生下来以后第一年，我又去了好几个国家，有的还不只一次，都是以前曾经去过的共产国家。工作开展了以后，问题也就多起来了。首先就是信件的问题。每次

回到家里，总有那么一大堆信在等着我回。所以只好整天待在书房里，拿着一支老爷钢笔，埋头苦干。但是，信实在是太多了，况且每次在家待不了多久又要往外跑，以至经常拖着信债，怎么也清不了。

还有，我的名字也成了个问题。为了安全以及方便起见，我尽量避免使用全名。在工作以及通信上一律改用“安得烈弟兄”这个称呼，从而隐去了我的本姓。铁幕后的基督徒彼此间大多数只称名而不道姓，我这“安得烈弟兄”起先也是他们叫惯了叫出来的。至于通讯地址，我在弟弟便雅悯住的那个城里开了个邮箱，以便各方的咨询与交通；荷兰，艾美罗，邮箱第四十七号，安得烈弟兄(英文:Brother Andrew, Box 47, Ermelo, Holland)。

虽然我现在用的是安得烈弟兄这个名字，其实也只能够在表面上防一防而已；如果有人真想知道我的底细，他当然还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工作有了开展之后，我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成了个大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单身的时候，你在外头跑久一点倒还无所谓。有了家室以后，情形当然就不同了。记得小约彼出生后的第一年，十二个月里头我就有八个月不在家。他出第一颗牙齿的时候，我不在家；开始会讲话会走路那阵子我又不在家。本来，凌格先生一直都有意思叫

我回他的那间巧克力糖厂工作，这个时候他又自动地向我旧事重提，出价之高，在我跟可侣看来，简直是豪华至极。后来又有海牙的一间教会请我去当牧师。这两次都让我几乎有点心动。

但是每当我认真地朝这方面考虑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封国外的信送上门来。有时候是从保加利亚寄来的，有时候是匈牙利，也有时候是波兰或是别的国家来的。封面上总是没有寄信人地址，而且多半是好几个礼拜以前寄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得出来是被拆开来检查过的。都是些国外信徒们的来信，报道他们的近况，或是有新的难处、新的需要，总之，我又得开始办签证，重整行装，再次往外跑。

就在那一年，当我从波兰和东德回来，路经西德的时候，我的车子抛锚了。那部身经百战的小引擎终因年事已高而溘然长逝。

当时同车的还有两个荷兰学生，他们是利用复活节那一段假期跑到难民营去帮忙的。我经过柏林的时候，顺便带他们回国。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在半路上，忽然听到引擎卡咯的一声，就再也走不动了。车子慢慢地停下来以后，我们跑出来，打开车盖，用尽了方法，还是不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路边正好安着一部公路电话。于是，拿起电话，叫他们派拖车的来。不到二十分钟，车子来了。是那间

车行的老板亲自出动。他先把机件略略地检查了一遍，然后跑到前面看了看里程计。

“九万七千公里。走得也不算少了。不过，”他颇为不解，“除非你一向走的都是顶坏的路……”

看他那副样子，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也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这里程计其实早就已经走到顶了，过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以后，又转回去从零开始。所以这车实际上已经走了十九万七千公里。

“要是这样的话，那你什么本都用够了。老实说，这机器已经没办法再修了。”

“要是换一部新引擎的话，得多少时间？”我问他。他想了一想，说：“我的那些工人马上就要下班了。装新引擎需要一个钟头。你要他们加班的话，得多给点赏钱。”“好吧，你说一共加起来要多少钱？”“五百块钱。”

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好吧，你先做。我要到火车站去换点钱。”

于是，把两个学生留在车行，自己乘电车上火车站去。在车上，我把身边所有的钱数了一遍，才发现加起来怎么也不够五百马克。而那两个学生根本就是一文不名，无能为力。

这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回去，叫他不要再做了?不，我还是先去换了钱再说。因为我一开头就觉得这件事情分明有神的带领。车子是西德制的。它早不坏迟不坏，刚好在经过西德的时候坏了。要是在共产国家境内，事情可就麻烦了。不但修困难，而且，人家问起话来时候，也不容易应付，万一搞不好，就会把身份给暴露了。车坏在西德还不算，而且抛锚的地方正好会有一部公路电话等在那儿让我用。根据个人以往的经验，这明明又是神的带领，绝对错不了。既然如此，钱还有什么问题?因此，心里一点儿也不急，只等着看神怎么处理。

到了车站，把身上所有的荷币都换了马克，加上原有的，一共是四百七十马克。修车要五百马克，路上加油至少也得二十马克，所以算一算还差五十马克。

我心里想：“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在电车上可能会有奇迹出现。”

结果什么也没有。回到车行的时候，那几个工人刚把车修好，正在那儿清理工具。只是不见了那两个学生。修车的告诉我，他们出去了，说是到附近走走。

车子弄好了。下一步当然是轮到我付钱了。看样子，只好硬着头皮据实以告了。

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年轻学生回来了。一看到我，就嚷了起来。“安得烈!”其中一个打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抢着对我说，“你看这妙不妙!刚才走在半路上，忽然来了一个女人，问我们是不是荷兰人。我说，是呀。她一听我说是，马上就把这张钞票塞给我，说是神吩咐她这么做的。”

我仔细一看，钞票的面额正是五十马克!

虽然我有太多这一类的经验，然而我那个时候的眼光只是局限于个别的神迹，那种让我脱离一时的困境、救灾救难式的神迹;而并没有把我整个的需要完全交托给那位富足而满有恩慈的神。

当时家里也有好几笔大的开销。生了约彼一年以后，又接着生馬可，用钱不在话下。于是，无形中，在心理上有了个威胁。在吃的方面，开始减少肉类，而多吃蔬菜，加上菜是自己种的，既经济又方便。少吃肉倒无所谓，反正我们本来就是喜欢吃菜的。只是在心理上，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穷”的感觉里。一直到后来，经过一位主里姊妹点明之后，才知道那实在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跟这位姊妹本来并不认识，到现在也还始终没有见过面。开始的时候，是她先来了一封信，里头有一笔数目相当大的奉献，合美金四十块钱左右。同时附了几个字：“亲爱的安得烈弟兄：这笔钱是给你个人用的，请勿归入事工项内。尚望在主内予以收纳。”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过去，在认识的朋友中间，以金钱资助我个人的，倒还常有；但是，以一个素昧生平的人来说，这种情形还是头一次。我当天就回了一封信多谢她，特别谢谢她关心我个人的经济问题。我说，对于捐款的处理我向来公私分明，所有的收入除了特别指定的以外，一概用于圣工项上。我顺便跟她说，为了节省起见，我们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从难民营那儿分来的。

那晓得她看了以后大不以为然，回了一封信，把我训了一顿。大意是：“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难道你觉得神体恤牛过于体恤祂自己的工人？你要小心，免得嘴上说依靠神而实际上是凭着一种克勤克俭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过日子。最后她说：“神除了供给你工作上所需要的经费以外，也一定会顾念到你们的生活费。我的弟兄，你认识主已经很

久了。主是信实的，这你也不是不晓得；你就尽管信靠祂，向祂支取你所需要的吧！”

我把信里的话慎重地思想了一番，觉得她说的也对。一个基督徒老活在“穷”的感觉里，的确是没什么道理。

后来又加上有一次人家请我们吃饭，约会的时间快到了，还不见我的太太下来。上楼找她，发现她还没有换装。

“我没有衣服穿。”她说。

我听了哈哈大笑，心裏想，女人都是一样，就喜欢来这么一下。

哪知我这无心的一笑竟把她笑哭了。咦，难道她真的没有衣服穿？我静静地对着衣橱，将她所有的衣服仔细地看了一遍。那些难民营里带回来的旧衣服，穿倒是每件都可以穿；可倡的针线相当高明，虽补过，倒也看不出破绽。但是呢，这么多衣服中间就没有一件是好看的，尽显得又土又老气，也难怪她说没有衣服穿。

我忽然间记起以前那位姊妹对我说的话。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的确是有问题。

于是，我们下定决心，在生活的方式上要有点改变。

我们还是很省。这一半也是因为我跟她两个人从小就省惯了，不怎么会花钱。但是，从那以后，我们把那种寒酸的意识给扔掉了。在合理的范围内，享受神在物质上所赐给我们的。不用说，我们有时候也买几件新衣服穿穿。厨房的那道墙也给拆了。我们的厨房在屋子旁边，中间隔了一道墙，每次进出要绕个大圈子，非常不方便。以往为了省钱，也就没去管它。

第二个男孩刚足岁，我们又有了第三个孩子——保罗。这回我们可阔气了，给他买了几件新衣服。结果孩子长得好好的。穿上新衣并无不良影响，头几天连价目牌都没有取下来哩！

贪得无厌、奢侈浪费，神固然不喜欢，但是，过分的穷酸小气也一样的会叫祂伤心。可怜，过去我们就始终没有想到这一点。是的，我们

的神是富足的，是信实的。自从我在生活上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的工作方针也蒙了同样的光照。

这些年来，我一直是单鎗匹马地在那儿奔跑。每年总要跑个八九万公里，三天就有两天不在家。我本想就这么一直下去，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但是，往后越来越发觉到一个人实在不够应付那么多工作。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将要离开保加利亚的时候，婉拒了某地信徒们的邀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当时实在无法抽身去那里开布道会。过了一年，我又回到了保加利亚。可是，情势已经变了，不容许再有那种机会。这让我想到，如果我能有一个同工的话，甚至于两个、三个……八个、十个的，那该多好！不但可以同时好几个地方有工作，而且在内部也可以彼此分工。至于组织方面，会是一个密契的整体，而不是一个机关，因为越机关化，危险性就越大。在铁幕里工作的时候，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能够不牵累到整个团体当然是最好。主要的是大家要有同一个异象、同一个负担，以支持铁幕后的教会为己任。而且每个人都当具有独立开荒的精神，在外工作的手法 and 方式也最好是各异其趣，以免容易被人家认出来。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可侣听。她立刻举双手赞成。

“不瞒你说，我有我自私的想法，”她说，“我是希望你在家的时间多一点。我们母子四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也实在是太少了。”

话方出口，她立时懊悔自己不该这么对我说。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她说的有什么不对。情形实在是如此。每次在外面太久，回来的时候，总会觉得孩子们又长大了一点。假如有同工的话，就不需要我一个人跑得那么厉害。

问题是，要上哪儿找同工去？这倒不是说从来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向我自告奋勇过。在国内或是别的自由国家，常常在聚会完了以后，会有些年青人跑来找我，说：“安得烈弟兄，我也觉得神对我有呼召，要我到铁幕后传福音。很想参加你的工作，如果可能的话。”或是：“听你那么说，这种工作倒真有意思。很希望能够跟着你一起跑，見習見習。”

可是，对于这件事我始终没有说什么。别的先不谈，单入境就是个大问题。虽则我自己曾经去过那么多次，但这并不表示我安得烈在这方面有什么独到的秘诀可以传授于人。至于每次之能以逢凶化吉履险如夷，实际上都不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或是经验。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每天早上在祷告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同时，定意在凡事上寻求他的旨意。所以，我只好对他们说：“也许我们将来会有机会在铁幕后碰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谈吧。”

有一天晚上我跟可侣又谈起这个问题。我说：“如果神真想要我们发展这个工作的话，祂可能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同工。只是不知道人在什么地方。”

“你祷告祷告吧。”

我不禁莞尔。她倒真会说，可又说得对。人选的问题我的确还没有求告过神。于是我们当下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

这人的名字叫古瀚思，在奥国的一个难民营里做事。是个荷兰人，身高六尺七吋，加上过重的体型，予人以大而笨的感觉。他也会德文，只是说的非常糟糕，令人不敢领教。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简直是一无可取。其实不然，他的长处可多着呢。性格好，口才尤佳，说起话来非常有吸引力。在难民营里，他可以对着五百多人演讲，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忘了时间，甚至于天开始下雨他们都不在乎。营里另有两百四十个男孤儿，平常顽皮捣蛋，叫他们安静下来听训更是难乎其难。可是一碰到古瀚思，情形就不同了，个个听得聚精会神，像入了迷似的，而且会后，还会规规矩矩地跟着他到处跑，参加各种活动。

于是，我当天晚上就给他去了一封信，问他有没有意思要参加这个工作。我告诉他，我下一次准备去俄罗斯。因为那阵子报纸上常常提到俄罗斯放宽旅游限制，外来的旅客可以有单独行动的自由，无须像以往那样，一定要跟着官方的向导跑。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多年来的愿望，看样子不久就可以实现了。

过了几天，收到他的回信，反应非常热烈。他说，当他在小学六年级，每逢在地图上看到俄罗斯的时候，心里头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似乎听到神在那儿对他说：“将来有一天，我要差你到俄罗斯去为我工作。”

他说：“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俄文，准备将来有一天可以派得上用场。现在，我的俄文已经说得很不错了，几乎不下于我的德文。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于是乎，我在事奉上有了第一位同工，实力大为加强。

出发之前，有好些个事要准备的。买车就是其一。原有的那部小福士虽然新换了引擎，究竟是太小了一点，像古瀚思那种大个子就很难容得下。因此我们买了一部新的奥普旅行车，既可以睡人，又可以多装点圣经。

他不会开车，所以由我来教他。本来还以为这是件顶简单的事情，可是，几个钟头下来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估计错了。教他学车可不容易。单是换档就把他换得手忙脚乱，几乎不想学了。

临到我们动身的那一天他还是没拿到驾驶执照。好在欧洲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学车的人上路，只要他旁边坐着个有执照的人。所以我想他多少总可以帮点忙。

一切准备妥当。别了妻儿，又再踏上征途。这次带的圣经特别多，加上两个人的露营用具等等，又是满满的一车。

新车的确是不同，好驶得很。到了西德的时候，我说不如我们换个手，由他来开。我是希望趁还没进入铁幕之前让他多有一点练习的机会。那晓得他上手还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后面就已经跟上了一大堆车子，那种单线对开的公路，后头的人想超车都不容易，不得已只好再跟他换回来。

“没关系，”我说，“你只是稍微慢了一点，将来开惯了以后就好了。”

“不行了。我这一辈子是学不会的了。”

“你这是什么话。你还没看到我当年是怎么开车的呢。”于是我把以前在军队里开轻机鎗车的经验说给他听，让他心里好过一点。两个人就这么说说笑笑地来到了柏林。

当天晚上住在朋友家里。他们听说我们要把圣经带到俄罗斯去，大家都很有趣。

“我们教会里刚好有一批俄文圣经，你顺便把它带去怎么样？”老实说，我们行李里头已经塞满了圣经，鼓涨到引人怀疑的地步。

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古弟兄已经先开口了：“没问题，我们给你带去好了。”然后又对我说：“万一给逮到的话，带多带少都是一样，倒不如多带一点。”

于是，我们把那些圣经硬塞进去了。后来，临动身的时候又有人送来了一盒乌克兰文圣经，我向古弟兄示意，希望他不要再答应下来，但是心里早就知道这回又是免不了的了。

车上的确是没有地方了。“不要紧，”古瀚思说。“你以前不是说过，你有时候干脆就把圣经放几本在车座上，让自己死心塌地地依靠神。这一次就让我捧在膝盖上好了。”

路过波兰。我们有三天的过境签证。华沙变了很多，跟我六年前首次见到的有很大的不同。当初住过的那间学校，以及附近的那个军营都还在。只是我遇见小女孩的那块烂地方已经成了个公园。

我们尽量利用那三天的时间在各个地方有点工作。然后往俄罗斯边境直奔。到了离开俄罗斯还不到三十英里路的时候，我才发现先前在华沙换钱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搞的换得太多了，弄得现在身上多出了一大堆波兰钱。

“你能不能到边境的时候再把它换成荷币?”古弟兄这么对我说。“不行。只有在华沙才能够兑换外币。可是现在回去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签证马上就到期了。”

没办法，只好让它去了。

路上的车很少。当时开车的是古弟兄。他跟我说好了，只有在车子很少的地方他才肯开。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是一九六一年，可是波兰仍然还有很多地方公路上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车子。我坐在他旁边，正在为钱的事情懊恼，忽然注意到前面的情况稍微有点变化。原来不远的地方来了那么一条河，上头的那条公路桥正在修理还是什么的，所以得临时改道，沿着堤岸冲下去，然后经过底下的一条临时桥道再往上爬，回到原来的公路上。当时前面有一辆波兰制的瓦萨瓦已经先我们下去，正在慢慢地过那道小桥。

我瞟了古弟兄一眼，见他脸上汗涔涔的、双手紧握方向盘；不过看他的神色，倒像是满有自信的。也好，我心里在想，这样多来几次正可以加强他的自信心。

他开始下坡了。看样子还不错。速度跟平常一样——每小时二十五公里。下坡，過橋，完全是按部就班地来。到了河那边，开始上坡的时候，居然还赶上了前面的那部车。不但赶上了，而且还狠狠地碰了它一屁股！

这下可糟！但见前面的那位老兄气得满脸通红，嘴里叽哩咕噜，来势汹汹地往我们这边跑。

我跟古弟兄说：“让我来。你帮我祷告。”

“您早，”我用的是德文，“今天的天气真不错。”说罢，跟他两个人一起把车子巡视了一遍，发现灾情倒并不严重。亏得古瀚思开得也实在够慢，只把对方的尾灯和车身稍微碰坏了一点，我们自己的车头也略有损伤。

“警察，”他也用德文，“警察，警察。”他的意思是去叫警察来。看样子他的德文可能是一窍不通，偏偏这个词他倒很会。

什么都好办，就是千万不能叫警察！你想想看，这是共产国家的地方，而我们车里有那么多圣经，再加上古弟兄没有驾驶执照，如果真的把警察叫来，那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

突然间，我想起了我们还有大量的波兰钞票。“这样好了，”我说，“你看这车子修一修要多少钱？”他不理，还在那儿“警察，警察”的。我随手捡起了一块尾灯上掉下来的破玻璃，把它安回到原处去，然后耸了一下肩，表示我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六千块钱怎么样？”我说。

他确是懂得我的意思，因为我发觉他的脸色比较好了一点；但是嘴里仍然还在那儿“警察”。

“八千块？九千块？修一修总要不了九千块吧？”

最後，我很爽快地又抽出一张千元大钞，说：“一万块钱总够了吧？”

这回他觉得差不多了，拿了钱就往回跑。临别时还回过头来交待了一声：“不警察。”这才发动引擎，扬尘而去。

“现在我可以松口气了吧？”古弟兄说。“你尽管松好了。”我说。

我们这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换钱的时候会换得那么多，原来是为了解救刚才的那个困境。于是马上在路边低下头来，感谢父神奇妙的安排。

我们在布雷斯特这个地方入境。古弟兄特别兴奋，猛跟那些办事人员说俄文。老实说，看样子他们恐怕十个字还懂不了一个字，不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居然还能说几句洋泾滨俄语，倒也挺欣赏的。换钱的时候，经办人员看到我们给的是美金，表示非常欢迎，而且还幽默了一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虽然是恶劣，不过，看在钱的份上还勉强可以做做朋友。”他把钱接过去，说：“一块美金一个卢布，简单明了。”

最后一步是检查行李。我跟古弟兄已经约好，当每次过关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应对，另外一个人就要不断地在心里祷告，求神施恩保守。这一回那个关员只是象征式地让我们打开了几个箱子，看了一眼随即关上，根本就没查。反而他对我们那部奥普的引擎很感兴趣，问了好些个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后来大概觉得自己问得太多，越出了公事范围，有点不好意思，连忙把车盖关上，带我们回到办公室，在护照上盖了章，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就这么通过了。

第 17 章

初访俄罗斯

其实我一年前已经来过一次俄罗斯。是陪着一批从荷兰、德国以及丹麦来的青年人到莫斯科参加一个青年大会。跟一九五五年我在华沙参加的那次差不多。虽然只去了两个礼拜，而且所有的节目都是他们给安排的，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参考的价值。

从布雷斯特到莫斯科有七百英里路，要走上十几个钟头，趁着在路上的时候，我把我上次来俄罗斯的经历说给古弟兄听：

他们给我安排的那家所谓旅馆其实是个大军营，在离莫斯科八英里路的一个乡下地方。趁着有一天晚上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到乡里走了一个圈，看看有什么教堂没有。

在离公共水井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俄罗斯东正教圆拱式的教堂。但那只是一座荒废了的教堂。四周野草丛生。房子斑剥破落，所有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板。外面地上堆满了装货用的木箱子，看样子这地方现在可能已经成了个货仓。

我在外头漫步绕了两圈，随后发现大门口的钥匙洞上插着一束新鲜的黄花，同时地上也都满了枯干了的残花碎瓣，似乎表示这些花是经常在换的。我在想，说不定每隔那么几天，在深夜人静的时候，会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乡下女人悄然来到，将她的爱心与回忆轻轻地摆上。无论是一是怎样，这幅景象给我的印象太深，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我跑到全莫斯科唯一的一间基督教堂去做礼拜。没去之前，在我的想象中，那地方准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

到了那里，看见门口有一大堆人在排队，心里还以为找错了地方。跟在后头，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用德文向我问话：“请问你是来做礼拜的？”

“这地方是教堂？”我想从他那儿得到证实。“当然。你跟我来。我有特备的外宾席。”

于是，我跟着他从边门进去，穿过一条走道，再上几级楼梯就到了楼上的外宾座。会堂是长形的，楼上两边厢座。前面讲台上有一十二个位

子，旁边是一架很漂亮的风琴。朝东一道五彩的玻璃窗，上头有“神是爱”这几个字。这教堂可以坐一千人左右，但是那天上午参加聚会的人几乎将近两千。我跑过那么多地方，就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做礼拜的。不但座无虚席，连所有的走道也全都站满了人，上上下下挤得水泄不通。

开始唱诗了。两千人齐声同唱，大有天韵歌声响彻云霄之概。我闭目静聆，虽然听不懂歌词，却是深深地受了感动。

收奉献的时候，因为走道上全是人，大家只好把奉献打头顶上一路传到前面去。收完奉献，就开始讲道，一篇信息完了之后，接下去还有一篇，也就等于是听了两堂道。

讲道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怪现象。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听众里面居然有些人在那儿玩纸飞机！有的从后座飞向远前方，有的从楼上放到楼下。而其他的人居然视若等闲，毫不惊动。接到飞机以后，一概往前面传，最后交给讲台上的一个人，由他收集。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刚才带我上楼来的那个人请教原委。

“哦，”他说，“这些都是请求代祷的。由台上的那位牧师负责收集，然后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另一类是一些外地过路的人请求为他们本地的教会代祷。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果然，讲完道以后，那位收纸条的牧师站出来了，先把纸条上各个外地教会的名字念了一遍，然后对大家说：“真高兴有这么多外地来的朋友们在我们中间，可不是吗？”旁边那个人替我传译。

“阿们。”

“我们要不要替他们的教会祷告呀？”

“阿们。”

“这儿有些个人的代祷事项。”他读了几个，又再问大家：“我们要不

要为他们祷告呀？”

“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

于是，大家低头，同时开声祷告。间中会有个声音特别高昂出众，在众人渐渐收敛的声浪中，恳切地代表全体向神祷告。完了以后，大家又恢复各自的祈求，再过一会儿，又有另外的人出来带领祷告，就这么轮着下去。那种气氛实在令人感动。

散会的时候，台上报告说，牧师们特别欢迎这次来莫斯科参加青年大会的那些人，愿意在散会后接见他们，同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请求解答。

到时候，有十来个人留在那儿，连我在内。大家发问得非常踊跃。“这儿附近有没有别的基督教会？离开此地有多远？”“俄罗斯有很多基督教堂，这儿附近的地方还有。”

“有多近？”

“哦，离此地大概有一百八十公里。”“请问俄罗斯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我们有绝对的宗教自由。”

“听说有些牧师们给关起来了，这怎么解释？”

“这我们没听说过。即使有的话，大概也是政治上有问题的。”

“请问俄罗斯的圣经多不多？”这问题是我问的。

“多得很。”说罢，马上有人拿出一本圣经来，请大家传阅，以示無訛。“这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版圣经，质量还蛮高的。”

这我倒没听说过！“一共印了多少？”“相当的多。”

问来问去，硬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第二天，我又到那家教堂去了。目的是希望能够碰巧遇见一两位牧师，跟他们单独地谈一谈。虽然是星期一上午，那地方倒并不闲寂，照样是人来人往的。原来那教堂除了做礼拜以外，同时又是全国浸信联会总部的所在地。

“请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后头有个声音在问。

我回头一看，认得他就是昨天坐在台上那些个牧师中间的一个，后来答复问题的时候他也有份。他自我介绍，名叫艾文豪。他请我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谈谈。我心里尽在想，昨天他们讲得那么天花乱坠，今天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探悉其中的真相。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干脆先告诉他我带来了一些圣经给他们，看他的反应如何。

于是我说：“我这儿有点东西，是我替荷兰的浸信会带来送给俄罗斯浸信会的。”我把一个牛皮纸包放在他桌上。

“是什么?”“圣经。”“俄文圣经?”

“是英国圣经公会印的。不过我已经把封面上那一页给撕掉了。”“可以让我看一下吗?”他勉强保持镇静。

我打开纸包，里头一共有三本圣经。虽然只有三本，但是它的体积已经相当于英文圣经的十本。俄罗斯以及其他很多东欧国家的文字，由

于字母结构不同，写出来要比拉丁语系的文字来得占地方。所以同样的一本书，他们的总是特别厚。

很显然的，他心里早已兴奋得来不及了，可是表面上仍然尽力保持平静。

“你说这是送给我们的？”“对了，”我说，“不过，既然你们最近刚出了一本新版的，我这也许是带多余了。”我半讽刺半试探地加了一句。“哦……”他记起昨天那回事来了，“其实，那些圣经大部分是给运到国外去的，诸如世界博览会啦，这一类的地方。”“告诉我，”他接着问我，“你来俄罗斯到底是做什么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最好是能够引用些圣经里头的话来回答他的问题比较来得婉转。于是，我稍加思索，想到了一段圣经，就对他说，“你记不记得旧约里头说到约瑟在示剑的田野走迷了路，有人遇见他，问了他一句话？你记不记得那个人问的是什麼？”

他想了一会儿，说：“他说：‘你找谁？’”“约瑟怎么说？”我问他。

“他说：‘我找我的兄弟。’”“对了，”我说，“这也正是我的答复。”

第 18 章

再访俄罗斯

我就这么一路述说我的回忆。古弟兄听得很起劲，偶尔也发些问题。末了，他很恳切地做了个祷告，希望神带领我们这次能够再见到艾文豪。

“我们好不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想喝一杯咖啡。”他说。“我也这么想。”

正好前面路边一排小树林后头有块空地，还有个进口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进去了。起先也没注意到里头还停了一部车子，有几个人正在那儿野餐。

我们下来以后，就动手准备烧水。同时渐渐注意到那几个人经常地对着我们这边看，而且嘴里叽哩咕噜的不晓得在说什么。接着，那个男的没好气地把剩下的半杯茶狠狠地往地上一泼，同时那两个女的开始把吃剩的面包、水果以及杯盘餐具等等往篮子里收。

我们对他们这种恶劣的态度正在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外面路上一阵急刹车，然后是重重两下关门的声音，接着进来了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双手叉腰，先站着很快地把我们这些人打量了一番，然后，一个往我们这边跑，一个往他们那边去。

“您好。”古瀚思笑容满面地准备施展他的俄文。

只是对方理都不理，什么也没说。“好吧，不理也罢。”他讨个没趣，回头继续弄他的咖啡去了。

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正在那儿拼命地祷告。我们的车子，这警察可万万不能搜我们的车子。就当我们在默祷的时候，这警察突然间走开，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远处传来一阵龃龉，那几个人先是跟警察理论，继而作无可奈何状，开始把他们车里的东西逐样搬出来摆在地上。等到所有的东西统统清出来以后，那两个警察马上开始查车。引擎、行李厢、车底……里里外外无所不查。这么搞了有二十分钟之久。我们待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捧着杯咖啡，也无心去喝。

又过了十分钟，眼看那两个警察还在那头忙，连瞧都不瞧我们一眼。看样子这也许并不关我们的事。如果可以走的话，倒不如试试看趁现在走吧。于是，勉强喝了几口冷咖啡，就动手把东西往车里收。最后上车的时候，还故意使劲把车门关得又重又响，装出一付走得光明磊落的样子。一直到我们发动了引擎，车子慢慢地往外开的时候，那两个警察还是不闻不问，理也不理我们。

上路以后，古弟兄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两个警察怀疑我们这批人是干走私的，约好了在路边交货还是什么的。幸亏这趟是有惊无险；我在想，将来我们搬圣经的时候，可真要当心一点才好。”

莫斯科那几条大马路可真大，有些地方宽到可以并排走十辆车子。往来的车辆似乎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多。我们经过那家甘恩大百货公司，穿过红场，一路来到宿营的地方。这地方可不是我们自己找的，而是俄罗斯政府预先给我们派定的。到了以后，马上把帐幕给支起来，同时准备把车里头的圣经先搬出来备用。我低着头正忙的时候，忽然听到古弟兄这么说：“你先别紧张，有人在监视我们！”

我尽量保持镇静，头也不抬，顺手拉了一张地图把外头的两本圣经给盖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把四周打量了一眼，果然看到有那么一个穿绿色军便服的人站在不远的地方注意我们。我临急换招，把咖啡壶搬了出来，两个人以煮咖啡为掩饰，静观其变。

这么一来，那个人终于走掉了。

“你看怎么样？”我说。“这蛮讨厌的，”古弟兄说，“得快点想办法把这批圣经送走。”

那天是星期四。刚好莫斯科唯一的那间基督教堂晚上有祷告会。于是我们把车锁上，暂且带了一本俄文圣经，离开营地往公共汽车站走。

参加祷告会的居然有一千两百人左右！聚会的方式跟我上次见到的差不多。只是这次没看到艾文豪。我们来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那批俄文圣经，希望能遇到合适的对象，从而找出条门路来。

散会后，外头大厅里挤满了人。我跟古弟兄两人分头出动，在人堆里挤来挤去，一面观形察色，一面默默地求神指示祂所要我们认识的那个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种情形，虽然双方彼此素昧生平，但只要是神的安排，一旦认识以后必然会一见如故，在事奉上同心配搭，胜似深交。

找呀找的，终于让我发现了一个人——瘦瘦的、秃头、四十五岁上下，靠着墙，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对了，就是他！我里头的感觉非常之强，准备立刻跑过去跟他打招呼，而差一点忘了要先跟古弟兄商量一下。照理，基督徒同工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在工作方面领受到某种特别的启示，他应该同时参照其他同工们的意见，以期获得印证。因此我决定等古弟兄来了再说。

过了一会儿，他来了。我还来不及说什么，他已经先开口了：“告诉你，我看到一个人，觉得很有希望。咯，就在那儿。”当时那地方至少有好几百人，你猜怎么的？他所指的那个人竟然就是我心目中的同一个人！满怀希望地，我们来到他的跟前。

“您好。”古弟兄用俄语向他打招呼。“您好。”那个人答了一句，马上提高警觉。

古弟兄接着向他自我介绍。只是说了半天，对方还是懵然不知所云。幸亏那个人后来总算抓到了“荷兰人……”什么的，这才哈哈大笑，告诉我们说 he 自己是德国人，父母早先从德国移民到俄罗斯，现在他在家里仍然说德文。

于是，我们改用德文，三个人就这么谈将起来。他说，他家在西伯利亚，离开莫斯科有三千多公里。他属于当地的一个小教会，有一百五十位信徒，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有圣经！整个教会连一本圣经都没有！有一天，他在梦里得到一个启示，叫他代表教会上莫斯科去，说是在那儿可以找到一本圣经。他说，他起先有点怀疑，因为谁都知道圣经在俄罗斯稀罕得什么似的，连莫斯科也不例外。

但是他终于还是来了。听他这么说了以后，我们简直有点不敢相信。现在轮到我们的了。于是，由古弟兄开口向他报告一个好消息，说：

“你从东向西跑了三千多公里，为了要找一本圣经，而我们从西向东跑了三千多公里，就是为了要把圣经带给这儿的教会，如今竟然又这么奇妙地在这儿碰面，你说这不是圣灵的带领是什么。”说罢，把我们带来的那本俄文圣经拿出来交给他。

他捧着那本大圣经，端详了好一会儿，再看看我们，又看看圣经，里头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须臾间，那股洪流终于爆发了出来。连连的称谢，不断的握手拥抱，一直到我们发现旁边的人都在注意我们，我这才提高警惕，悄悄地告诉他，我们还有多的圣经，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给他六本，请他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再到这个教堂来会我们。

“不要钱的？”他顿然生疑。

“当然，”我们说，“这是整个教会的事。我们岂不是在主里同为肢体吗？”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车里拿圣经，由古弟兄在附近把风。还没拿完，就听到他在吹口哨，是我们荷兰的国歌。我心里明白——那位穿草绿色军便服的仁兄又来了。他一来，我又得去弄咖啡了。

“咖啡好啦！”我大声嚷。古弟兄应声而来。

“那个人又来啦?”我给了他一杯冷咖啡。“唔，跟昨天一样，鬼鬼祟祟的。我们还是快一点走吧。你这儿弄得怎么样了?”“才拿了四本出来。”“我看也够了。”

由于俄政府禁止黑市买卖圣经，所以我们得格外小心，以免瓜田李下徒生枝节。

暗中把四本圣经用报纸包好，装进旅行用的手提袋里，随即步出营地，登上公共汽车。

到教堂的时候，准十点。进到里面，在大门附近找个地方坐下。谁知等了半个钟头还不见他来，又怕待久了会引起人家注意，心裏好生焦急。

又过了十五分钟，忽然听见身边有人在打招呼说：“弟兄，您好。”我抬头一看，竟然是那位艾文豪牧师。

“你在等人?”

“啊……是的。一位朋友，昨天晚上这儿聚会完了以后才认识的。”

他默然良久：“唔，你是说从西伯利亚来的那个人？我看你不必等他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环顾左右，把声音放低：“不瞒你说，我们这儿每次聚会的时候，总有些个秘密警察在场。昨晚你们跟那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事后他们找他谈过，所以，他大概是不会来的了。你们约他来是……或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他？”

我以眼目征求古弟兄的意见，因为一时很难断定这个牧师究竟是否可靠。古弟兄作莫可如何状，无可无不可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我们这儿有四本圣经，想交给他。”我直截了当地据实以告。“你交给我好了，”他说，“我会替你转交给他。”

我跟古弟兄再次交换了个眼色，可是，最后还是把那几本圣经给了他。这时候，我心里在想，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就信他信到底，干脆告诉他我们还有大批的圣经，看他怎么说，因为此外我们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子。

于是我默默地求神施恩保守，鼓足了勇气，冲口而出，我说：“请问这儿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地方？我们想跟你谈谈。”

“哦？”

“是关于圣经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还有？！”他愣住了，“你声音小点，还有多少？”“有一百多本。”

“你开玩笑！”

“真的，全在我们车上。”

他想了一想，然后一言不发地带我们上了一条长走道，到了一个转角的地方，突然停下来，把手上的一摞圣经放在地下。接着把手掌伸出来，掌心向下。“你们看到没有？我的指甲。”

原来那些指甲长得纹理粗糙，凹凸不平，显然是由于根部受过重创所致。

“为了信仰的缘故我曾在监狱里待过。老实说，一次已经是太够了。你们的那些圣经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记得上次向各国青年代表强调宗教信仰在俄罗斯非常自由的，岂不是这个人？

我很同情他，我说：“你有你的困难，这我们非常了解。不过……也许你有认识的人，愿意冒一次险？”

他考虑了一下，说：“有倒是有的。好吧，我替你们跟马可联络一下，让他租一辆车，今天下午准一点钟的时候在甘恩百货公司门口等你们。”

“但是要很小心。”他加了一句。古弟兄指着地上的那一摞圣经说：“那么这几本呢？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他笑了，但笑不掉眼神里的那股忧郁。“论钱嘛，”他说，“四本圣经值四百卢布，究竟是有限，即使给逮到的话，也不会关太久。最多四个月吧。但是，一百多本就不同了！一百本圣经在莫斯科至少值个一万卢布，在别地方还不止。想想看，这么大笔数目的黄色读物，要是……”

“黄色读物？”我跟古弟兄两个人不约而同嚷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哦，我是说圣经在俄罗斯实际上是禁书，你们这种情形要是给逮到的话，他们就拿你当‘贩卖黄色读物’来办。”说罢，匆匆掠起地下的几本圣经，如鸟惊弓，慌慌张张地离开我们，带着橐橐的步声消失在空廊的那端。

当天下午一点钟，把车开到那家百货公司门口。没一会儿就看到附近停着的一辆车里出来了一个人，朝我们这边走。先从我车旁边经过，看清形势以后才又转回来，贴近车窗问一声：“安得烈弟兄？”

“你是马可？”我说。

“你们现在就开车跟我来，”他说，“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到红场去，就在附近路边把圣经移到我车里。在那种靠近闹市的地方，你越是大大模大样地来，人家倒反而不会怀疑你。怎么样？我这一招还不错吧？”

他这的确是绝招。尤其佩服他的胆量，要是我的话，可绝对不敢这么来。

于是，一路跟着他，来到了一条街，果然就在红场附近。路的这边是一道高墙，另一边可全是窗口朝街的住宅，里头的人随时可以望出来。

下了车，我跟古弟兄说：“圣经我来搬，你负责替我们祷告好了。”

于是，他一边祷告，我一边搬书，把大堆圣经往硬纸盒里放，往布袋里装。那头马可把后车门打开，我们就这么明目张胆，来回跑了几趟，把事情办完。

“你们放心好了，我们会尽快把这些圣经分给各个有需要的教会，地方再远也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事毕，马可向我们匆匆握别，上他的车先走了。

这头我和古弟兄两个人相对作会心的微笑。大功终于告成，如今剩下的只是那一盒乌克兰文圣经，问题简单得多。

后来回去的时候，我们经过乌克兰，亲自把圣经分送给各教会。

到最后剩下两本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教会，其中有位弟兄让我们看了一样好东西，是他家传的一本袖珍型乌克兰文圣经。只有一般圣经四分之一那么大，小巧轻便，可以随身携带。字很小，却是非常清楚，间隔也很合适。我把玩良久，爱不忍释。心想，假如我们带进来的圣经都像这么小的话，那就太好了；不但每次在数量上可以多带个三四倍，而且也便于转运、利于收藏。既然乌克兰文可以印成袖珍本，俄文当然也一样可以，还有其他东欧国家的文字……

我兴奋得迫不及待，连珠炮似地向他发出一大串问题：这小圣经是在哪儿印的？谁出版的？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可是据他说，那上头找不到是什么地方出版的。这圣经当初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也不知道。

他看我对这小圣经的兴趣那么浓厚，就建议说，既然我们还有两部大的圣经，而且有一部本来就是准备要送给他们教会的，何不就索性再多给他们一本，算是跟他交换那本小圣经。那教会的牧师和其他的人听了也都同意。这对我说当然很好，将来可以拿这小圣经做样本，向各圣经公会打听排印的可能性。于是，我把它放进口袋，带着一个理想离开了他们。后来经过三年的筹划，这理想终于得到了实现。

最后那个星期天，我们在一个浸信会做礼拜。是个乡下小地方，离匈牙利不远。崇拜开始，会众唱起诗来，歌声感人，祷告也热切。可是讲道的时候，牧师忽然从台上跑下来，向底下的人要了一本书，带上讲台去。原来他是向那个人借圣经！以前只听说过俄罗斯有的牧师自己没有圣经，这回算是亲眼看到了。

会后，牧师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坐坐，还有其他教会的几个长老也在。同时请了一个会说德文的教友当传译。

一开头，他就给了我们一顿官腔。好在我们早就听说这是俄罗斯牧师们惯用的安全措施，也就不以为怪。由于教会里外耳目众多敌友难分，牧师遇见陌生人的时候多故作忠贞爱国状，以策安全。

“请问你是哪一个工业机构的负责人?”他问我。

“我们不是工商界的人。”我说。

“怎么会不是?”他说,“你们明明有一部汽车停在外头。只有资本家才坐得起私家汽车,劳动阶级只有走路的份儿!”

我连忙告诉他,我安某人正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出身,父亲是个乡下铁匠,自己当年也曾经在工厂里挨过,而今甚且没有固定的收入,还比不上他这当驻堂牧师的。可是无论我怎么说,他总是不信。闹到后来,他总算换了话题,把我放过了。也许是为了礼貌上的关系吧?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装腔已经装够了,足以让人家对他的反资产阶级思想深信不疑吧?

后来我们又谈到基督再来的问题,那是当时俄罗斯最热门的一个神学问题。对话的气氛马上有了好转。我把我的荷兰文圣经拿出来做参考,用完了就摆在桌上。这么一来,我发现他对我们所讨论的那个题目忽然失去了兴趣。原来他的心跑到我那本圣经上去了。他把它拿起来,轻轻地打开边上的拉链,翻来翻去看了好一会儿,又再拉上拉链,把它放回桌上。但是放的时候,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放,而是非常郑重其事地

把书边齐对着桌沿放。然后，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带着苍茫的声调，他说：“弟兄，你知道我是没有圣经的。”

我听了，不由得一阵心酸！身为众人的牧者，竟然会连圣经都没有。

可惜我们带进来的圣经全给光了。但是我猛然想到我们还有一本乌克兰文小圣经！将来见圣经公会的时候，有它做样固然好，没有的话，其实也没多大关系。

“你等一等。”我说完就往外跑。到车里把藏在座位底下的那本小圣经找出来。

“这儿有本圣经，你留着用吧。”我把它塞给他。传译的用俄文说了一遍。可是那位牧师好像还是不懂。

“这是谁的？”他说。“现在是你的了。我们送给你的。”

牧师老人们一再向我们道谢。从今以后那位牧师再也不必每次讲道的时候向人家借圣经了。是的，他终于有了他自己的一本圣经。

我知道前面有个很大的工作在等着我。这次回去以后，一定要开始进行印圣经的事。希望早日能够把大量的圣经运进俄罗斯。

第 19 章

俄文圣经

从那时候起，我整个心思几乎全让印圣经这件事给占据了。回来后，曾经问过好几个圣经公会，可是都没有结果，并不是技术上办不到，而是由于其他方面有种种的困难。先说美国圣经公会吧，我的那些俄文圣经一向都是由他们免费供应的，虽然在理论上很赞成我的计划，但是真要让他们为了我这工作的缘故特地印一种小型圣经，可就感到为难了。英国圣经公会也是同一个态度，至于荷兰圣经公会，他们主要是做印度尼西亚和非洲方面的工作，东欧国家不在他们工作范围之内。

有一天晚上，我跟卫老先生谈起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不自己印呢？”

“你开玩笑。”我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求人不如求己，而且自己印出来的总归比较称心。”“你说得太容易了。照我看，这至少要花个五千块本钱。我哪来的那么多钱？”

“钱！已经这么多年了，你还在说这种话？”他似乎有点可怜我。

是的，如果这件事真是神的旨意的话，那又何必我来担心钱的问题？果则的话，这对我说来又是一项新的使命，一个极其重大的托付、再一次信心上的大考验。这件事情后来经过的时间比较长，详细情形我暂且按下。

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古弟兄是位很好的同工，我们彼此相辅相成，在主里有美好的配搭。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们在保加利亚。有一天晚上，古弟兄突然对我说：“安得烈，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同工。”

“唔。是的。”我漫然以对，当时坐在床上写家书，闷热的天气熬得我汗流浹背。

“就像上次那样，好不容易等到了捷克的签证，偏又碰上你在东德、我在俄罗斯，想去也不成。像这种情形，要是人多的话就好办了。”

“唔。”

“喂，你听到了没有呀？”

“我听到了。”我这才比较留心，“你说得对。这就是所谓的庄稼多任务人少。不过，话说回来，像我们这种机构要是一旦发展得太快的话，可能……”

我的话还没完，他已经忍不住了：“你这六年才加了一个人，还说发展得太快！来，我们祷告吧。”

他后面那句话说得太快，我还来不及弄清楚他的意思，他已经先开始祷告，恳切地求神替我们找一位全时间的好同工。

祷告完以后，我跟他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你觉得罗孚怎么样？”我们异口同声，继而相对而笑。“难道是圣灵的带领？”古弟兄说。

“很可能。”我说。

罗孚是个年轻的神学生，荷兰人，读研究院，专攻系统神学，就快毕业了。这位弟兄不但在神学上有研究，而且办事很有才干。于是，当天晚上我就给他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加入我们的行列。

后来回到荷兰的时候，可真有他的一封信在等着。他说他一向最不感兴趣的就是当宣教士。念了那么多年神学，毕业后，要他来参加我们这种工作，既无需高言大智，又用不上多少神学方面的知识，岂不有点学非所用？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是同时又感觉到圣灵不断地在那儿催迫他，要他接受我们的邀请，以至内心起了很大的挣扎，昼夜不得安宁，终于只好顺服神的旨意，答应了我们。

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工，是让神硬给抓来的。他一来，马上就跟着古弟兄上罗马尼亚见习了一趟。他们那次的经历非常宝贵，不仅与当地的信徒们有美好的交通，而且也看到了余民教会在患难中复兴的光景。在罗马尼亚的时候，虽然受到跟踪监视，却还能够完成任务，把带去的圣经交给那边的教会。

对罗弟兄说，那的确是个新奇又不平凡的经历，深深地让他体会到铁幕后教会的光景和需要。

后来我们跟罗弟兄谈起印圣经的事，说到找圣经公会赞助实际上有种种困难。想不到他跟卫老先生的看法一样，认为这事情可以自己来。

“如果先印五千本的话，要多少钱？”他问。

我老实告诉他，我还从来没打听过的价钱呢。

在他催促之下，我们先后向荷兰、西德以及英国各地方问了价。其中要价最低的是英国的一家印刷厂，印五千本，每本三块钱。接到那封信时，我对罗弟兄、古弟兄和可倡说：“你看，三五一十五，最便宜的也要一万五！”

“看你呀，一想到钱就什么都动不了！”两位同工半开玩笑地，一语道破了我的小信。

当天晚上，我把那本注明“俄文圣经”的专项存折打开。是上次从俄罗斯回来以后开的户头。从一九六一年到现在一九六三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两千块钱。

“你在干嘛?”可侣过来，靠着我坐下。

我把存折递给她看：“已经两年了，才只有这么一点。”

接着心一横，把底下的话也说了：“你看我们这房子可以值多少钱?”

她愣住了。

我继续下去：“这房子我们当初买的时候特别便宜，而且后来还装修过，我看至少可以照原价卖上一万块钱吧?还是一万二?我们总共需要一万五。”

“卖房子?你这说什么?房子卖掉我们上哪儿去住?而且再过一阵子我又要生了。”

“可是印圣经没钱怎么办?”“我看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说不定神本来就没有意思要你印圣经。”“唔。”我没了主意。

但是过了几天，她忽然对我说，房子的事，实在应该让神做主，因为认真说起来房子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神的。她这几天祷告的时候，就一直在求神加强她这个信念。

从那以后，我们晚上祷告的时候就提到卖房子的事，我们说：“神啊，按理说，这房子是你的，祢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我们仍然心里作难，舍不得把它交出来。如果为了印圣经的缘故，祢非要让我们把房子卖掉不可的话，就请祢的灵大大动工，赐给我们一颗乐意的心。”

一连三个男孩，终于生了个女儿，取名史提芬尼。我们将收进来的礼金全部奉献，充作圣经印刷费，但也是杯水车薪，聊尽心意而已。一方面，我们还是继续地祷告。

有一天早祷的时候，我们里头突然之间通了，所有的疑虑全都消失，向着神甘心乐意地把房子交了出来。

“不知道我们将来住什么地方。”接着她又笑着说，“对了，还记得我们的那句话吧？‘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

我替她接下去：“但是，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吧。”当天，我们就请人给房子估了价。加上银行里的存款，刚好是一万五出头一点！

我们认为这已经是个很明显的印证，于是毫不犹豫地将房子公开出售，同时写信给英国的那家印刷厂，请他们准备排版的工作。事情该办的都办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甚至于当天夜里的那一觉都睡得特别甜。

说起来，神的确是信实可靠的，好得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么好！祂所求于我们的只是那么一点点，而祂所赐给我们的却是那么多。虽然当时我们那一带地方屋荒的情形依旧是相当的严重，但是奇怪得很，等了好几天，竟然还连个上门看房子的人都没有。到了星期五，忽然接到个电话。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在家里装部电话。平常事情忙的时候，总是不太喜欢有电话来打岔，可是今天这个电话不同，原来是荷兰圣经公会打来的，想在当天下午找我去谈谈。

我当然去了。见到上头那几位负责人，他们向我表示，虽然荷兰圣经公会有它自己的工作，他们对我印圣经的计划却始终难以忘怀，所以呢，他们在想，假如我这方面能够负责找人印的话，他们就……

哦，已经找到啦？在英国？那更好办了。是这样的，他们建议全部的费用先由他们来付，然后再以半价卖给我，也就是说三块钱的一本圣经我只要付他们一块半，而且是买一次给一次钱，每次随便我买多少。问我可同意这个办法？

我没听错吧？还要问我同不同意。我简直是同意都来不及了！这一来，我可以马上动用俄文圣经存款，先买它六百多本——我们的车子每次只能装这么多。当然，我们也用不着卖房子了！记得可倡说过，想替小女儿的房间做几条粉红色的窗帘，还有，我们准备种莴苣菜的那几块地需要先……我真等不及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她。我们摆上的只是那么一点点顺服的心志，而神所赐下来的却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理想终于实现了。至多再过六个月，也就是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内，我们就可以把新圣经运到俄罗斯去了。

罗孚快要结婚了。我们这种工作对有家室的人而言自有诸多的不便。我跟可侣也就事先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他。但是他认为既然我们可以，他们照理也不应该有问题，况且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伊莲娜还可以跟他一道出去工作，说真的，她还蛮能干的呢。罗弟兄还说，他非常之羡慕我们俩能有这么幸福美满的婚姻，他看在眼里就更加急着要结婚了。

他们结婚那天，由我跟可侣当宾相。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向英国订的第一批圣经已经印好了，于是这一对新婚夫妇就借着这个机会开车去英国，共渡了一个出差式的蜜月，或者说是出了一次蜜月式的工差，把圣经给带回来。

除了原有的那部奥普以外，我们现在还多了一辆小型货车。只有车头两边有窗，其余四周密不通风，容积比奥普大多了，而且有很多装备是特别为长途旅行设计的。他们夫妇俩就开了这部车跑到英国，把那批圣经给带了回来。他们回来的那天可真是个大日子！两个人兴高采烈地打外头冲进来，亮出一本新出版的袖珍型俄文圣经。

想想看，是我们自己出版的！我一手托着这本圣经，另一手托着一本普通的俄文圣经，大小轻重简直是不能比！好了，这下我们得尽快行动了！终于决定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号起程。这会我可真需要一位得力的

助手。当时古弟兄正在匈牙利。不得已，只好把新婚的罗弟兄给拉去了。

又来到了莫斯科，带着整车的圣经到处跑，心里可真有点害怕。当时俄罗斯一般行情是一本圣经一头牛。六百五十本圣经就相当于六百五十头牛的价值。虽然我们不是要卖钱，但若是一旦出了事，你说也没用。圣经的案子常有，当时就有一个人被政府控以危害国家经济罪。不久以前还有一个人因同样的罪名被枪决。万一我们给逮到的话……还是不要去想它。

星期天上午，又是做礼拜的时候了。来到教堂，上楼找个位子坐下。台上照常有好些牧师坐着，艾文豪也在其中。当他几次往上看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看到了我，也认得我，只是脸上不露形色而已。过了一会儿，但见他悄然离座，打后头跑掉，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散会后，忽然听到背后有人打招呼：“安得烈，好久不见了！”回头一看，原来是马可。

我把他介绍给罗孚。

“我们带来了一些礼物。”我说。

“好极了。”他的声音特别大。我知道他是故意这样的。声音大，人家反而不会生疑。

“附近有什么值得观光的的地方？”我说。“还是上次那地方怎么样？”

老地方！我可没他那么大胆。“我想还是换个地方走走吧。”

他这才把声音压低：“也好。这样吧，你们去往思茂简的那条公路，不久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路牌，蓝颜色，上头写着‘莫斯科’。我们今天下午准五点钟在那儿会齐，然后我再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礼物要分包，到时候搬起来方便。”

于是，我们暂时分头各走己路。目前唯一的问题是上哪儿去包装。那么多圣经分开来装，至少要半个钟头以上，更是绝对需要有个安全的地方。

“对了，”我跟罗孚说，“我们可以把车开出去兜风。你在前面开，我躲在后头打包。”

就这么办吧。上路才不久，他忽然把车停下。这是干嘛？我扒在后头，透过缝隙向前窥探。不得了！怎么那边来了一个警察！“快祷告！”罗孚轻促地关照了一声，就忙着应付警察去了。“请问是什么事？长官。”他把头伸出去，说的是荷兰话。

那个警察先是用俄文狠狠地训了几句，然后再加上些个洋泾滨英文：“禁止转弯，路牌上写明的，禁止转弯。”

“原来是转错啦？”罗弟兄仍然是满口荷兰话，“抱歉，抱歉，在莫斯科这种大城市开车可真不容易啊。”

警察还在唠叨。我尽量打侧，紧贴住车身的一边，拚命祷告，希望他不要往里看。这样过了像是有一世纪之久。才听到那警察的声调有了好转，最后说了一句什么的，接着是罗弟兄的荷兰话：“谢谢你。愿神眷顾你。”

车子开动了。过了好一会儿我那口气才松了下来，我说：“老弟，这种玩笑可不能再开了。我吃不消！”

想找个地方停下来，包完了再走，可是绕来绕去就是遇不到合适的场所。已经四点钟，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只好先去了再说罢。一路上天气很好，阳光普照，只是我们的心情正相反，一点儿也不开朗。

“其实失去又何必担心呢？”罗弟兄说，“这是神的事情，祂自然会想办法。”说罢，轻松地唱起歌来，以示完全的交托。

奇怪，我们的心情好转，上头的天色反倒变坏了。先是阴霾四起，继而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我们这头还是一面开车一路唱歌。

终于下雨了。好大的雨！这些年在外面跑过那么多地方，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雨。真是名副其实的倾盆大雨，那水就像是从天崩开了的水库里倾泻下来一般。前后左右什么都看不到。只好把车开出路面，停了下来。其他的车辆也都停了下来。

“你看……”

“我知道……”“这简直是神替我们施的隐身术嘛。”罗孚说。

两个人一面赞美神一面爬到后头去，慢条斯理地把全部圣经分装妥当。事情办完，回到前面，优哉悠哉地才坐了不久，外面已然是雨过天晴，可以上路了。

准五点钟的时候，来到路牌那地方。马可的车打后头跟着上来。雨方停，他的车灯还亮着。他一灭一明给个信号，然后跑到前面去。我们跟在后头，走了十分钟，来到一个像购物中心的地方，外头有很多车在装货卸货。我们还不到五分钟就办完了。宿愿三年，终于在今天开始兑现了。

第 20 章

巨龙苏醒

飞机快降落了。底下就是香港，紧接着的是一望无际的中国大陆。展向远方的那片地土，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高墙四筑、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禁区。我一向所跑的只是东欧一带的共产国家，其中有一部分对宗教的管辖比较松，有的比较严。至于中国大陆，我早先根本就没考虑过。在我看来，它门户森严、自成一个世界，福音的工作想要打进去，实在比欧洲任何一个共产国家都要难。

后来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搭公共汽车，碰到隔邻坐的是个中国人。当时莫斯科的中国人很多，街上常看到，但是坐我旁边的那位先生与众不同，在胸口上别了个小十字架。结果我们谈起来了，彼此用英文。他告诉我，他是上海男青年会的干事。这我倒没想到。上海的青年会居然还在？据他说，青年会不但有，而且工作还挺忙的呢。最后他还给了我一张名片，请我有机会的时候看他，从那天起，有一粒很小很小的希望种子在我心里逐渐萌芽。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够与独处在中国大陆上的基督徒们有点交通。

当然，我得先知道一点基督教目前在大陆上的情形。譬如说，大陆上目前究竟还有多少基督徒？虽然说基督徒在中国本来就不多，然而过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究竟是有过一番苦干，所付上的代价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所付上的都大。他们当初所结的果子如今的光景如何？还站得住吗？是否受逼迫？那边有没有地下教会？如果还有基督徒的话，他们是否缺乏圣经、渴慕圣经，像东欧的那些教会一样？

一九六五年我去美国讲道，一路来到西岸加利福尼亚州。我心里想，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不如就趁现在到远东一趟。于是打定主意，先到台湾，与当地的人士有点交通。同时也了解一点大陆上的情形，然后再去香港，看有没有办法再去大陆一趟。当时在某些情形之下，荷兰护照在中国大陆还是吃得开，所以我起先还抱着蛮大的希望。可是，等到从台湾上了飞机以后，才发现事情并不乐观。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香港银行界人士，他听说我要到大陆去，觉得非常奇怪。

“你不是从台湾上机的吗？”他说。“是呀，我在那儿待了十天。”“唔，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护照？”

我让他看了。他逐页翻下去，想要找出台湾的那个签证，好替我研究一下。才翻了一半。他就叫起来了：“美国！”原来前面还有美国的签证。

“是呀，我这一路先到美国的。”“老天，你用这种护照还想去什么大陆！”

我当下听了，也没拿它当一回事。过去，人家越是讲这种话，我就越发觉它有意思，因为觉得事情看起来越难，就越能够让我体验到神奇的作为。

下機後，住进九龙青年会。

多方打听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确没有那么简单。原本当时也不晓得有多少外国传教士想从香港申请到大陆去，结果全给挡驾了。有的过去曾经多年在中国做医生或是教过书的，如今再要想进去，可不行了。以往的资历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了阻碍。

一次、两次、三次，以至于无数次，听了又听，听多了以后我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原护照既然有问题，看样子得想办法弄一本新的才行。于是从九龙渡海到香港，找到荷兰领事馆想办法去。

领事嘴里叼着根长烟斗，正在吞云吐雾。浓烈的烟草味，一阵阵的直把我熏回荷兰去。我告诉他我想去大陆。他听了之后，取下烟斗，微微地笑了。我说我是个传道人。他更加笑了。我很坦白地告诉他，我去大陆的目的是希望能认识些中国基督徒，看将来有没有办法给他们运些圣经去。这一说，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让我看看你的护照。”他把我的护照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你这情形绝对没有希望。”他看了直摇头，用烟斗柄点着我那本破旧的护照。

“所以我才来找你嘛。我想换本新护照，”我说。

不行。据他说，申请护照得经过印度尼西亚荷兰大使馆的批准，而我这情形根本就拿不出个理由来，谈何申请？说罢，仰天喷了一大口烟，把我的希望给吹了。

此路不通，心里颇为失望。可是再一想，这样倒反而好，这件事既不能靠自己的聪明，就得完全交托给神，让祂去想办法。这么一来，我

何必伤脑筋呢?只要明天上午直接跑到中共办事处去申请就行了嘛。如果神真要我去中国大陆的话，还怕拿不到签证?

有了主意之后，倒想先去看看办签证的那个地方，就好像乔舒亚进军迦南地之前先派几个探子过去侦察一番。当时天已经黑了，所有的机关及部分商店早就关了门。来到中国旅行社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了铁闸。我在外头人行道上，一面徘徊一面祷告。求神为我除去一切的拦阻，深知主耶稣基督一次得胜就永远得胜，好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在旅行社门口就这么走来走去，一连祷告了两个钟头才回去。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这回当然是准备好办签证去的。上了楼梯，门口坐着个卫兵，里面那个大房间挤满了人。我一边排队一边默祷，为那些办事人员祷告，也为千万的中国人民祷告，求神多方开路，让他们有机会得着福音的好处。

轮到我了。穿浅蓝色人民装的办事员在等着我开口。

“我想申请去中国的入境证。”我用英文。

“你有没有到过美国?或是台湾?”

“我最近去过。”

“那就不行了。”他笑了一下，“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国。”

“他们是你的敌国，可不是我的敌国。”我还他一笑，“好不好请你给我一份申请表?”

他没吭声，两眼直瞪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对方毫无表情，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呢?我在祷告。

“好吧。老实说，你这种情形就是申请了也没有用。”他终于给了我一份表格。

我当下填好，连护照一起交给他。据他说，这些东西要送到广州，所以要三天后才能给我回音。

那天晚上，有一位年长的传教士请我吃饭。他从前是在中国大陆传道的。我告诉他，我已经办了申请去大陆的手续，据经办人说，三天后会有消息，言下不胜兴奋。

他听了狂笑不已，说：“你太天真了！三天！三天我看可能就是永远的意思。”

人家怎么说，我决心一概不理。那三天里，我不断地禁食祷告，同时还上街买了些中文圣经，准备带到大陆去。

到了第三天，旅行社果然打电话到青年会找我，刚好我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张字条，叫我回他们一个电话，我电话也没打，就直接跑去了。

进门后，开始排队，还是上次的那个人，他也看到了我，当时很想根据对方的表情来推测一下我申请的结果，无奈他脸部讳莫如深，让你怎也猜不透。

终于来到他面前。他什么也没说，一伸手就把护照还给我，上头附了一张纸条，正是我所想望的那张通行证。

第二天上午八点从尖沙咀坐了两个钟头的火车来到罗湖。边界是条小河，火车桥这边是英界，那头就是华界。英国这边只有一个检查站和一家小餐馆。等久了有点不耐烦，不如起来到外头走走吧。信步来到桥头，正好有一列从大陆来的货车打桥上经过，装满了一笼笼的鸡，还有毛猪，以及其他不同种类的产品，都是销香港的。

桥头上有个英兵在站岗，跟他聊了一阵。他告诉我这条桥本地人管它叫“哭桥”，又称“心震橋”（“深圳桥”粤语谐音）。因为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难民从对岸偷渡过来，有的不幸被英方抓到，就得被送回去。他们苦苦哀求，声泪俱下，有的甚至抓住桥旁的栏杆不肯走。

“主啊，”我默默地祷告，“巴不得祢早日除去世上所有的哭桥。愿万人都归向祢，同蒙祢的大爱。”

终于我们可以过桥了。大伙儿小心翼翼地鱼贯而行。西方人之间大部分是英、法以及加拿大来的商人。走到了一半的时候，桥的那片绿颜色稍微有点变了，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华界。

那边的规模比较大，有好几幢房子，都很整洁，只是外观单调了一点。好在有遍地的天竺葵，平添了些许热闹的气氛。检查员是位非常年青的女孩子，带着礼貌的笑容叫我把箱子打开给她看。

我心跳得很厉害，因为里头一大堆圣经。装箱的时候，觉得反正藏也没用，就干脆摆明给他们看，至少可以试探一下他们对外来传道人的态度如何。真不知道这个女职员看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把箱子打开。一摞摞的圣经历然在目。可是，奇怪得很，她连碰都没有碰我的行李。那些圣经她也看到了，却竟然视若无睹。“谢谢，”她依旧满面笑容，“请问有没有手表、照相机这一类的东西？”

就这么通过了。可真让我想不通。这女孩子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难道她从来就没有见过圣经，不知其为何物？

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车厢古老，倒非常干净。窗几上的小花瓶里还插满了鲜花。女服务员给我们端上热茶。开车了，我看了一下表，非常准时。她笑着对我说：“我们的火车很准时的。”

这是我在大陆上第一次领教到“我们的”这个字眼。往后还多着呢：“我们的”革命，“我们”中国自制的第一辆汽车，我们的……到了广州，看到车站里到处摆的是宣传品，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全是免费的。我这才开始明白，那种全国性“我们的”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我住的那家旅馆里头也是到处摆满宣传品，而且用的是德、英、法三种文字，这当然是给外国人看的。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中文。所有的报纸、书刊以及电影、戏剧，在题材上总少不了对伟大革命的歌功颂德，再加上对“美帝”的深恶痛绝。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家戏院参观一个儿童杂技团表演。其中有一场小丑戏，那个坏蛋小丑老喜欢用鞭炮捉弄人，不巧碰上了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每当那小家伙把点着火的鞭炮扔在地上，眼看就要炸开来的时候，我们的“英雄”忽然出现，三下两下就把鞭炮给灭了，起先那鞭炮很小，往后越来越大，最后竟变成了一个原子弹，上面还罩着一面美国旗。正当千钧一发的时候，不用说，我们的那位“英雄”又出现了，一举手就把原子弹毁掉。至此全场观众雀跃欢呼，人心大快不已。

宣传的另一主题——对人民革命的歌功颂德——也是照样搞得有声有色，煞有介事。在广州的时候参观了一间养老院。若是以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看，那地方的设备简直是什么也谈不上。那些老人家看起来倒也安然自得。有的在织布、有的在打扫环境……生产劳动的份儿，每个人都少不了。

领头的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婆婆。她通过传译员向我说了一番话。主要的意思是说，“解放後”老年人个个身心愉快，同时也能够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她说，“解放前”老年人常被弃置田野，任其自生自灭；“解放後”大大不同，什么都好了。

她跟我讲话的时候，其余的老人家照常工作，好像对我们漠不关心。可是，每当她提到“解放後”这三个字的时候，像按了电钮似的，所有的人立即齐作欣慰状，同时大伙儿还来个集体鼓掌。完了以后，又再继续工作，恢复他们各人脸上原有的那种茫茫然的神情。

老年人的态度如此，年青人却似乎不然。后来我在上海，那位年轻的向导看起来倒是满腔热忱，劲头十足。据他说，“解放前”上海妓女之多出了名的，“解放後”政府把这些人统统送去进训练营，让她们学习各种手工艺，成为有用之材。“解放前”中国文盲比率之高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的。“解放後”文盲比率直線下降，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前”……“解放後”……

当然，那些向导都是政府特别训练出来的，他说他的，你就听听算了吧。我倒反而很想参观几处人民公社，说不定一般工人阶级对“解放後”的情形会有不同的看法？

先后参观了六个人民公社。最先参观的那个公社有一万多人口。我随便选了一个人家，进去访问。开门的是一位老先生。他跟他太太一起招呼我，带我看他们的家。他俩兴高采烈，颇为这个家感到自豪。他们有个圆柱形的粮仓，是用竹做的，里头装满了麦子。我问他们这儿可闹耗子？传译员用中文向他们说了一遍。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老鼠倒是有。不过这不成问题，我们的麦子太多了，就让牠们吃一点也无所谓。要是在‘解放前’呀，可没这么好喽。”

“解放前”，“解放後”，我可惜就没亲眼看到过“解放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再怎样说，我也无从比较。

后来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公社，他们带我参观里头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啊，要是在荷兰的话，恐怕一辈子也轮不到让外国人参观的份儿。

手术室里既没有照灯，也没有消毒盘。药剂室里几乎是空空如也。很多病床不但没有床单，而且连床垫都没有。他们之所以带我参观这个公社，很明显的是为了想要在宣传上给我一个好印象，可是现在竟然把我带到这样的地方来，难道他们真的认为这已经算是“进步”了？！

去上海主要的目的是想见见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那位先生。我在旅馆里问了一下，知道青年会的确还在，当下心里非常高兴。可是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里面的情形让我大大地失望了，里头尽是一些老太婆在那儿下棋消闲，此外什么也没有。既无“青年”亦无“男”，“基督教”更谈不上，剩下的只是个“会”字。

一问之下，居然回说没这个人。“能不能麻烦你到里头查一下？”我说。她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跑出来，说是的确没有这个人。“这怎么会！”我说，“他明明告诉我，他是此地的干事。我相信你们这儿一定会有人认识他的。好不好请你再查一次？”

她又进去了。这一趟在里头待好久才出来，脸上陪着笑说：“真对不起，他这几天正好到别的地方去了。”

“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句话很通用。后来我有过好几次这种经验。每次找人找不到，都是刚好“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位干事怎么会不见了？我猜他大概真是去了“别的地方”，不会再回来的了。今日大陆上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到“别的地方”去了？

记得当初在莫斯科的时候，那位青年会干事曾经提到上海有一间专卖圣经的基督教书局。他说的可对，真有这么一个地方。虽然地点偏僻了一点，门面也不大，不过里头的圣经倒蛮多。想想看，在东欧的那些共产国家，圣经罕似凤毛麟角，而此地居然有得是，你随时可以买到。

书店经理陪我参观那地方。他会英文。里头墙上挂着一幅画——一群小孩围着耶稣，个个是金发碧眼的洋孩子。

顺手拿起一本圣经。里面有一行英文：“上海印制”。这倒颇出我意料之外。

“是这儿印的呀？”我说，“不是香港来的？”经理一副得意的样子：“是中国印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制的。”

我问他生意怎么样。这一问，他可没那么乐了。我在那家店里已经待了一个钟头之久，竟然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儿，没看到有任何人进来。

“买的人不多。”他说。我问他每个月可以卖出多少圣经。

“不多。”他说。原来如此！既然不会有人来买，还怕什么？小小的一间“古董店”，就让它开着做做样子吧！

这让我想起在广州的时候，有一次我想送一本中文圣经给那位传译员。她不要，说是太忙，没工夫看。我心里想，她这大概是怕给人家看到，对她不利。后来有好几次住旅馆，临走的时候故意在房间留下一本中文圣经，结果总是不得其计。“请你等一等，”才走了一半，就让服务生给赶上了，“这本书是不是你的？”

急起来，干脆就拿到街上去发。那些向导们胸有成竹，也没有反对。你要发就发吧。无奈往来的行人一看我给的是圣经，就都走掉了。没有一个人感兴趣的，结果是一本也给不出去。

如今这家书店也是一样。虽然摆满了圣经，可是“买的人不多”。临走的时候，我的心沉痛极了。历代以来，教会曾经过各种各样的逼迫，而今面临的却是另一种“冷式”的威胁，其凶险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迫害，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神学院，听说的确还有几间，按理说这应该是个好现象，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

曾经拜访过南京近郊的一间神学院。见到院长以及一位教授，他们两位都会说英语，所以无须传译员在场。我认为这是个大好机会，可以单独地跟中国基督徒们有点敞开的交通。坐定以后，大家先喝几口茶，话不多。再喝几口茶，话还是不多。喝到后来，茶杯都快见底了，三个人依然面面相觑，无话可说。终于我决定打破僵局，先向他们说到我自己是个宣教士。不料他们一听到“宣教士”这个名词，竟然神色骤变，就像在教堂里听见有人说话的时候用了个什么低级的字眼似的。

“过去在中国那些宣教士实际上都是干情报的。”院长这么对我说。然后又私下用中文向那位教授吩咐了几句什么的。但见那位教授站起来匆匆往外跑，没一会儿工夫又急急忙忙地从外头进来，手里捧着一本很

大很厚的书。上头打开的那一页早就划满了线，是一个宣教士跟他本国的政府官员间的来往书信，里头牵涉中国的资源状况，粮食供应，以及人心的趋向等等。

往后那十几二十分钟里头，我们那位小个子穿蓝制服的教授就那么跑进跑出，从图书馆里弄来一本又一本的参考书，每次都是预早就把书打开在某一个地方，而且上头总是密密麻麻的划定了线。所有的书可都是西方国家出的，而且全是些知名的出版社。看起来倒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也许当初有些宣教士认为只是把他们日常的活动转告给本国的使馆，在道义上并不违反基督教的原则，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给了人家一个坏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且不去管他。反正那次我们所谈的，从头到尾都离不开政治。院长本身就是党里头的什么委员，而且非常活跃。学校里到处可以看到反美的宣传画——跟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总是“美帝”抱着颗原子弹在前面逃，中国人在后头紧追。

至于神学院里头教的是什么神学，我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免不了的：那极端反美反西方的政治色彩。这一点也是当时整个大陆的教育方针之一。

老实说，像我这样走马看花，再加上语言不通，还要处处跟着向导跑，所得到的最多只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印象而已，何况他们还总是挑最好的地方让你看。印象中有好有坏。好的，比方说：环境清洁、没有乞丐、没有黄包车、民风淳朴。坏的方面，譬如说：餐馆生意清淡，门可罗雀，市街上汽车稀少，难得一见。

此外还有些景象让你看了浑身不自在。记得离开南京那天，我一清早起来，准备去飞机场。正在穿衣服的时候，听到外面街上传来一阵阵的呐喊。从窗口往下瞧，看见附近广场上有好几百男女老少正在做军事体操。后来我坐出租车从那儿经过，刚好遇到一个口令让大家保持原姿势，所有的人立时呆住：大跨步、臂前后伸，一动也不动。众手所指、众目所视，杀气腾腾地正对着我这个方向。这印象太深，我怎么也抖不掉。甚至于在飞机上，先前的那些眼睛还像是老盯住我似的。难道我们西方传教士在他们心目中真是那么坏？难道我们真的没有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若是因我们的过失而让他们反对真神，那更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记得有一次参观一个公社，当我表示想看看他们教堂的时候，公社里的一位领导人说了一句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我们人民公社里面没有教堂，也不需要教堂。只有无依无靠的人才需要宗教。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因此也没有这个需要。”

有个星期天，我在北京。一清早就对那个向导说：“我今天上午想去教堂做礼拜。”

“教堂！”他觉得很奇怪。据他说，北京的教堂非常少，尤其是基督教的。不过他总算答应替我找找看。

坐在旅馆房间里等他。从八点钟等起，到了将近九点的时候，他回来了。喜形于色，像替我找到了什么奇珍异物似的，嚷着说：“找到了，找到了，你跟我来。”

到了以后，我请他跟我一起进去，他不肯。原来那是一间又小又破的教堂，外表极其不象样，让人看了倒足胃口；也难怪他不想进去。穿过一道生了锈的铁门，再走几步路，进去里面是个大房间，空洞而单调，除了有一个女人身上穿的一件红色外套以及讲台边那支红色的国旗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比较鲜明的颜色了。

在后头找个位子坐下。过了一会儿，前面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司琴。弹的是一首古老的西方圣诗。钢琴小而旧，甚至已经走了调。聚会的人不多，我数了一下，一共五十六人。除了我自己以外，其

他的人看起来个个都有六十岁以上。讲道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胡子飘飘、眼睛蒙蒙的。底下的人，认真在听的没有几个，打瞌睡的倒不少。

我的心难过极了。难道这就是今日大陆上一般教会的光景？基督教被视为历史的遗迹、老年人的宗教。长此以往，她的前途安在？

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中国大陆。不过我当时在失望中还存着一线希望。因为圣经在大陆上似乎没有受到禁止(一九六五年)，这可能是由于中共政府低估了这部书的威力。然而只要圣灵动工，祂随时随地可以藉着圣经里的话语把神的道传开。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主要也是因为当初读了圣经的缘故。

此外，神在大陆上还需要有祂自己的工人——一些热心、肯奉献、有异象的基督精兵。然而这再也不可能是西方人的工作，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绝对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向中国人传福音。

于是我们同工们又多了一项祷告：希望能有中国基督徒参加我们的行列，在大陆上做传福音的工作。

第 21 章

十二位同工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工，不只是在中国有这个需要，在别的地方也一样。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共产国家，而且每个国家你总不能只去一两次以后就不去了。我们是希望至少能够每年去一次，能够多去当然更好。同时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是希望每次去的时候最好有两个人一起去比较好。可是我们哪来的那么多人？

每次讲完道以后，常常会有人自告奋勇，想要参加我们的工作。问题是，你很难知道这究竟是不是神的意思，为了慎重起见，我通常总是这么对他们说：“你不妨自己先到铁幕后试试看，然后再跟我们联络，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吧。”

后来果然有那么一次，一位年轻的荷兰人名叫马可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当初你在英国韦尔斯双西圣经学院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要我先到铁幕后试试看，然后再跟你商量。现在我已经来了，好不好让我们谈谈？”信封上贴的是南斯拉夫的邮票。

“你看。”我把信递给可侣。难道这真是神的旨意?如果他下次继续来信的话，我们可要认真地考虑考虑。

过了几个月，他真的又来信了。那是他第二次去南斯拉夫。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信上说：“现在大概可以了吧?什么时候可以来看看你们?”

有一天，我在书房里正忙着写信，大儿子约彼跑进来说：“爸爸，马可叔叔来了。”

我飞身下楼，大家一见如故。他跟我们谈起在南斯拉夫的经历。譬如，他常把带去的福音书刊单张放在百货公司的柜台上或是公园里的长凳上，然后站在远处，让人家自己去拿。

“不如你先跟罗孚一起出去一趟。”我对他说，“让他介绍些教会里头的人给你认识，多知道些他们的情形，然后你再做决定吧。”

他们在外头三个礼拜，去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回来的时候，我一看他样子就知道他还是想参加我们的工作。

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没问题。”

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工。

他来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也忽然间忙了起来，大家在外头的时间越来越多。

过了两个月，我跟古弟兄出了一次远门。这回是美洲的一个共产国家，也是那边唯一的一个共产国家——古巴。签证下来的时候，我们人在捷克，所以就直接从布拉格飞去了。这是古弟兄第一次到美洲。我除了美国以外，别的美洲国家也都还没去过。

蓝色的海湾托起一片白色的建筑，在艳阳天下两相辉映。比起那冷面灰的布拉格，哈瓦那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当地人的性情也比较开朗，而且衣着鲜艳入时。我们从飞机场坐公共汽车进市区，才走了不到五分钟，车里的人就相逢何必曾相识地大伙儿唱起歌来了。

我跟古弟兄暂时分手，他去东岸，我留在首都哈瓦那。我住的那家旅馆是以前的希尔顿，现在叫做自由哈瓦那。来个通知，说是要向当地的警察局报到。去了，一等就是大半天。这对我说，一点都不稀奇。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政权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警官始终对我抱着怀疑的态度。“你来了以后一切都好？”他的英文很不灵光。

“我是来讲道的。”我说。他看了我的护照，上头盖满了各国的签证。很显然的，他还不怎么放心，继续问了我一堆问题，而且还加以记录，然后才让我走。后来他们又找我问话，先后有四次之多。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一家教会讲道。那间教堂相当大，里外都还不错。除了牧师以外还有两位教友(正式登记在案的教友)。听说从前有很多教友，自从有一次反宗教运动以后，就少成这副样子。那次几乎近于暴动。聚会的时候，反对的人在外头用扩音器大声干扰，甚至把教堂门口的路面捣坏。此外还有秘密警察在暗中监视。

我那次讲道，头一天晚上来了三十五个古巴人。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来了。到了第三、四天，增加到六十人。后来继续加到一百多人。我在

台上绝口不谈政治，只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听众里头当然有的是秘密警察。不过这也好，可以给他们一个听信福音的机会。

虽然如此，比起欧洲的那些共产国家，古巴还算是自由的了。

我们在那儿待了好几个礼拜。我自己一直在哈瓦那附近一带地方工作，去过很多教会，常常一天里头要讲好几次道。听的人越来越多，多的时候每次有五六百人。我用英文讲，传译当然不成问题。古弟兄在东岸，我们常用电话保持联络。那边因为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古巴政府特别怀戒心，在各方面都控制得比较严。

当时政府积极发动全面反美宣传，弄得一般老百姓对美国的印象多少受到影响，甚至于在教会里也免不了。偏偏古巴有一大部分基督教会原先都是美国人办的，政府就加以渲染，藉以打击教会。为了避免人家误会，我跟古兄弟每次见到人的时候，总要先表明一下自己是荷兰人。这么一来，的确给了我们不少方便。

古巴赤化以后，教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但是基督教，连天主教也一样。最苦的是那些牧师和神甫，他们被视为社会的废物，连一般的

食物和衣物配给都拿不到;而且常常被送到劳工队里去,与犯人、吸毒者、同性恋者为伍。政府认为这批人不适于当兵,就把他们统统编在一起。

虽然如此,大部分牧师都还能坚守岗位,继续看顾他们的教会。饥渴慕义的人还是很多。我们每次讲道的时候,来的人都不少。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用教堂更方便。记得有一次在海滨的一座山头上聚会,参加的有五十几位大学生。

当地人对外界教会的情形相当关心,常向我们问起其他共产国家里信徒们的光景以及欧美教会的近况。他们对美国的情形并不陌生。譬如魏克逊的青年工作,葛培理的工作,“神死了”邪说等等,他们都蛮熟悉。这主要是因为外地的宗教刊物,甚至于美国的,都还可以进口的缘故。

在我们到古巴之前几个月,卡斯特罗宣布容许人民申请出国。结果登记的人将近一百万,但是政府限定每天只准一百九十人出境。换句话说,即使所有的人都批准了,也还得有十几年工夫才能够全部走光。虽然如此,大家还是照样等下去,希望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甚至于因此牺牲了自己的职业和房地产也在所不惜。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基督徒,其中也有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结果我们所传的信息在他们的心里头起了

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讲到了信徒们在他们本国情况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在东欧那边我们也常谈到这个问题。当时古巴的情形也的确很差，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也正是神特别需要他尽职的时候。如果大家跑掉了，那祂要找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当我在一个聚会里头向众人这么呼吁的时候，底下有个衣冠楚楚，留着两撇浓黑胡须的壮汉站起来说：“我本来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可是从去年开始我就离开教会，跑去当理发师去了。今天晚上我觉得神在向我说话，要我回头看顾我曾经离弃过的羊群。因此我决定回转，尽我当尽的责任。”

会众听了大受感动，全场欢呼雀跃，继而群起向他握手庆贺。感谢赞美之声不绝于口。

还有一次，有一对夫妇来我们的聚会。他们本来一早就准备离开古巴，等了很久，终于拿到机票，只要再过两个礼拜就可以动身。结果听完以后，很受感动，决定退票不走了。“从今以后，”他们说，“古巴就是我们的工场。”

像这一类的决志，在我们的聚会里常常可以看到。

总之，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工场——古巴。目前，这个国家对于圣经以及宗教书刊的进口倒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外旅申请入境也并不太难，除了少数的几个国家以外。同时一般的古巴人具有豪爽奔放的拉丁民族性情，信徒的心容易被圣灵挑旺。但愿神的道因着他们的爱心和奉献得以发扬光大。

现在要说到另外一个共产国家。这国家很小，却是管制最严。外人很难进得去，而且即使能够进去也很难有所作为。虽然如此，我们凭着信心始终没有对它放弃希望。我说的是阿尔巴尼亚。

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机会来了。有一家法国旅行社首创纪录，办了一个两星期的阿尔巴尼亚旅行团。当时我在西伯利亚，于是由罗孚和马可以“教师”身份报名参加。

这国家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说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方言，向来就没有一种统一的国语。至于圣经，天主教他们用拉丁文圣经，而东正教用的是希腊文，此外就没有别的了。据美国圣经公会说，早在一八二四

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种阿尔巴尼亚方言的新约圣经译本，目前除了他们图书馆里头还存着一部以外，别的地方大概就没有了。

到了大革命以后，阿尔巴尼亚才开始致力于国语的发展。至于用新的国语来翻译圣经，我们认为不会有那么快。

罗孚和马可去的时候，海关人员居然连箱子都没有打开就让他们通过了。那些单张小册要是给看到的话，准是没收了，因为该国严禁书刊进口，不论其内容如何，一律视为外来宣传品而予以没收。罗孚、马可原先也不过是带去试试看，并没有存着太大的希望，想不到竟然会这么幸运地通过了。

单张小册带是带进去了，但是结果还是没用；原来那些阿尔巴尼亚人像是个个都受过训练似的，你每次给他，他总是不要，不但不要，而且连碰都不敢碰。甚至于有一次罗孚在天主教堂里头想送一本约翰福音给一位主教的时候，对方的态度也是如此，就像看到了什么毒蛇猛兽似的，一转身就跑掉了。

结果他们实在没办法，有一次急了，索性把一叠单张放在闹市路边的一道窗台上，盼望路过的人自己会去拿。摆下以后，两个人当时就走掉了，也没什么。第二天，他们随着观光团去到另一个地方，离开先前那个城市有九十公里。正当大家在吃中饭的时候，突然来了两个警察，向众人追究是谁把那些单张摆在街上的。这可把他们两个吓坏了！好厉害的情报系统！怎么一下就查到了？为了不让整个团体受累起见，两位弟兄只好承认事情是他们做的，并且保证今后不再从事这一类的“政治活动”。后来才晓得，原来他们这个观光团是当时阿尔巴尼亚国内唯一的一批外国旅客，因此很容易就被警方怀疑上了。至于那些单张，一张都不缺，根本没人动过。

照这样看，将来若是想要在阿尔巴尼亚做文字工作，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小国家在历史上向来是列强争战之地，曾经受治于土耳其、意大利诸国。一直到最近在安弗·霍斯卡领导下的政府才算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霍氏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颇得人民的爱戴。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非常团结友爱，可是对外人则常怀戒备。罗孚、马可多次有机会与当地入接触，尤其马可会说几句意大利话，而阿尔巴尼亚人也

有部分会意大利文的，因此可以免了政府传译员在中间的诸多不便，可是结果总是一问三不知，怎么也谈不起来。

譬如说，你在工厂的走道上遇见一个工人，刚好四下无人，你就趁机跟他打招呼：“朋友，你好。在这儿工作很久了吧？”

对方耸耸肩膀，笑着说：“啊，这很难说，看你怎么个看法。”“你每天工作的时间怎么样？”

“啊，这不一定，每天都不一样。”“哦，还有……你们此地一共有多少员工？”

他又笑了，笑得更加客气；肩膀又动了，这回可动得厉害；说：“没去数过，说不上究竟有多少。”

总之，在一种共同的意识之下，他们对外人的问话多是避而不答，惟恐会惹上什么祸似的。

此外还跟一些牧师神甫们谈过。这些人的态度比较好一点，但是在话语上仍然是非常谨慎，而且有时候暗示的比正面的答复说得更明白。有个年轻的天主教神甫对罗孚、马可两位弟兄显得特别欢迎，他关心西方的情形，也透露了点他自己的景况。他自己的教会本属于梵蒂冈的罗马天主教会，后来由于亲霍派的压力，不得不与外界断绝关系，自成一个独立的教会，改称国家天主教会。

“那末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怎么样？”马可问。“我们的政府在明文是不干预宗教事务的。”“这么说，你们是有宗教自由喽？”“在成文法上，可以这么说。”“譬如说，你在教堂的讲坛上是否有言论的自由？”“这个问题，我最好还是用‘是的’来回答你。”

就这么转弯抹角地，他回答了他们所问的各种问题。关于圣经的国语新译本，听他说了才晓得原来在一间希腊东正教堂里面有那么一本存在。

马可、罗孚马上请向导带他们去那间教堂。那里的神甫告诉他们说，教堂的圣坛上的确有一本崭新的国语圣经。想看看吗？当然可以。于是，带他们去了。走在正堂的走道上老远就看到那本书摆在正中间，是一本巨型圣经，外头还镶着珠宝。走到三、四公尺开外的時候，那位神

甫突然停下来。大家就站在那儿，静静地观赏一番。最后，那位神甫转身准备回头走。罗孚急着说：“还没看完嘛。我们可不可以站近一点把圣经翻开来看看？”神甫听了，睁大眼睛，一副吃惊的表情。站近一点？除了按立过的圣职人员以外，其他的人一概不能近过三公尺半！

既然如此，这种新译本有什么用？一般人不准看，而神甫们平常用的又是希腊文圣经，那么这部圣经摆在这儿干嘛？

可想而知，不外是在礼拜仪式中亮亮相，让会众们景仰景仰。而且可以让大家知道神也曾经藉着阿尔巴尼亚伟大人民的新国语向众圣徒们说过话，心岂不慰藉？！

只看到一部书的外壳，也只瞥见一国一民的外表，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之行的感受。

我们在欧洲的工作越来越多，旅行的次数也随着增加，给人家认出来的机会也就大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施行轮番更换的办法，不让同一组的人连续两次进入同一个国家。

一九六六年，罗孚夫妇去了一趟俄罗斯。那次入境的经过最惊险，差一点出了毛病。由于近年旅俄人数激增，走私的案子也跟着多起来，以至于边境上的驻防人员较以往增加了三倍。俄罗斯的报纸上常可以看到因走私而被捕、罚款，或是判徒刑的消息。那次他们带的圣经特别多，开的是那部奥普旅行车。临走前，我和太太与他们夫妇俩在一起彻夜祷告。求神保守旅途的平安。

我说：“那些走私的过不了关，是因为他们光知道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有，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贪财或是其他恶念。但是我们不同，我们的出发点是爱。况且，一旦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凭自己的这一点小聪明也实在无能为力。人再聪明也是有限，我们一定要完全依靠神的大能……”

事后罗孚回来的时候把他们路上的经过说给我们听，就更加证明了我的那番话是对的。

话说他们一路来到了俄罗斯边界，远远看到那边已经出来了好几个保安人员在等着他们。一个、两个、三个……乖乖，一共有六个之多！“你快祷告。”罗孚说，“求主混乱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在检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什么也找不到。你得连续不停地祷告，一直到神把我们带过去为止。”

说着，这头罗孚已经把车停下，向那班人热烈地打个招呼。自己先下去，把证件交给他们，然后再绕到那边侍候太座下车。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谈起这一路在东欧的那几个国家玩得好开心，难得现在又有机会来俄罗斯观光……

“你上次刚来过，现在又来啦？”是其中一个关员，说罢，照着手上一份档案把罗孚和我上次来俄罗斯的时候所到过的城市一个个读出来。

这对罗孚说，不啻一记当头棒喝！于是马上开始查车。两个人专查车里，三个人负责车外。马达、轮胎、轮盖、车窗、车身……没有一处不查的。“迷糊，迷糊，主啊，让他们全都迷糊了吧……”伊莲娜不停地在默祷。

对方有六个人。五个人在忙着查车，还剩下一个人。这人倒也厉害，他虽然不动手，却目不转睛地死盯住罗弟兄夫妇俩，静静地在哪儿察颜观色——搞心理战。

“来来来，我来帮你忙。”罗孚看到其中一个正在死命地把塞在车尾的那堆露营帐篷往外拉。

啊，对了，还有这样，还有这样……罗弟兄竟然自动帮起忙来了。那头伊莲娜在祷告，继续不停地祷告。

时间过得好慢。终于他们什么都查遍了，结果是一无所获，只好宣告罢手。

先前说话的那个家伙走过来，对罗孚说：“你前几个礼拜才来过俄罗斯，现在又来了。请问你为什么来得这么勤？”

罗孚正在那儿叠帐篷，听他这样问，随手拍了拍帐篷，说：“对嘛！上次我跟朋友来过，玩得好开心，所以这次陪着太太又来了。但是，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们俄罗斯人有特别的感情，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

那个人两眼直射罗孚，像是想要看透他的心思似的。无奈当下找不到凭据，怀疑也没用，只好把证件发还，下令放行。

夫妇俩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关以后，两个人不禁喜极而泣，车后头那几百本圣经照理是一下子就可以查出来的，而那些人竟然会找不到。是什么道理？那还用说！

那个时候我们一共有七位同工：我和可倡，罗孚和伊莲娜，马可和他的新婚太太皮拉，再加上单身的古瀚思弟兄。后来又添了克拉斯夫妇和艾德华夫妇，总共是十一个人。

克拉斯和艾德华原是荷兰南部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员；前者教法文，后者教数学。有一次他们来我们的聚会，知道我们工作的情形，后来又一起来我家，问了很多问题。当时他们心里已经有意思想要参加这个工作，只是没有立时表示出来，为的是要等待神更进一步的带领。

同时我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感觉。一见到这两对夫妇就觉得他们很适合与我们同工。但是人家目前教书教得好好的，而我们这工作既危险又没固定的薪水，还要常离开家，除非的确知道神要他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否则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因此，除了可倡以外，我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

双方都在为着同一件事情祷告，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彼此都没有把心意告诉对方。

过了几个月，神的旨意终于向我们显明了。祂用的方法很特别，以至于我们差点没领悟到。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同时收到校方寄来的挂号信，说他们不应该利用教课时间向学生传道，也不该请学生去他们家里参加晚祷会，假如再继续这样的话，学期完了以后就要请他们走。

起先他们很为这事情烦心。部分学生家长也都很替他们不平，因为他们一向很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当我收到他们的信，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心里也很那个。所谓的利用教课时间向学生传道，其实只不过是让学生知道在他们家里有那个聚会而已。如今校方竟然板起脸来干涉，也实在是过分了点。但是，忽然间我懂了！

“可侣，快来看，这儿有条头号新闻！”

“什么新闻？”她从厨房里跑出来。

“克拉斯、爱德华他们有信。说是学校找他们麻烦，下学期可能待不住了。”

可侣起先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是过了一会儿，她也懂了。可不是吗?这很可能就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于是，隔了几天我们开车到学校找他们，把我们这一向的心意向他们说明白了。

他们两个人听了以后，不禁相对而笑。原来大家几个月来都在为同一件事情祷告神，寻求祂的旨意。现在终于得到了答案。

“对了，还有一件事想问你。”爱德华说。

“啊，什么事?”

“我在想，你们那儿来往的信件一定多，还有各种行政上的事，我这个人做事还算细心，对这方面的工作也蛮感兴趣的，就不知道你们办公室里是否需要人?”他说的很迫切，就怕我不肯似的。

我望了可侣一眼，她其实已经乐不可支，却还强作镇静。原来我们的信的确是多，经常堆积如山，忙得她气都喘不过来。前些日子她的一只咖啡杯不见了，过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是给压在信堆底下。想不到现在神竟然自动地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可以考虑，我想应该是没问题吧。”我说。此外还有一位同工——我们的第十二位同工。这位同工很特别，他的身份常常在变。

在欧美各地讲道的时候，常有人表示愿意以客串身份跟我们去某一个共产国家跑一趟。我们也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考虑是否可以纳用部分时间同工。

终于我们试了几次，发现效果奇佳。一方面可以让参予的人与我们共享学习信心的功课；另一方面大家在事后仍然可以在祷告里面互相纪念。还有一点更重要，是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那些人回去以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也兴起了同样的组织。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这个组织不应该再大下去。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机构，乃是个有机体。大家彼此同心，彼此了解，互相关怀尊重，因此

也不需要有什么组织规条那一套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因为人不多，大家的关系反而密切，可以每天在祷告里一一提名互相纪念，記念各人的需要，也为各人的工作代祷。如果世界各地都有类似这样的团体，同蒙主的呼召，为着同一的目标共同努力，那将会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

部分时间的同工们对这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苏格兰圣经学院的一个学生跟我们去了一趟共产国家，回去以后来了一封信，说：“回到学校以后，一连两个月不停地在那儿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人家。现在已经有三位同学对这工作发生兴趣。我们准备今年暑假去一趟南斯拉夫。”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也带有训练性质，训练出更多的宣教士到铁幕后做传福音的工作。在人选方面，我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参加的人必须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凡事顺从圣灵的带领，依靠圣灵的大能。第二，他必须以宣扬神的公义慈爱为己任，绝不能因为共产主义的邪恶而影响到他对任何丧失的灵魂所应当具有的爱心。

我们的工作就这么一路继续下去，而且常在更新变化。目前南斯拉夫已经改变策略，准许圣经自由进口，基督教书店又开门了，圣经的销路很好，因此也无须我们像从前那样想办法从外头带进去。现在我们改

作经济援助。去年给了贾秘一千块钱，请他就地购买圣经，送给那些经济上特别穷困的教会。时间过得真快，我认识贾秘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

还有保加利亚的那位亚伯拉罕弟兄，仍然不减当年雄风，继续与他的歌利亚周旋对抗。只是如今他的机弦配有更犀利的石子:袖珍型圣经。

我们计划在两年完成大部分共产国家文字的袖珍型圣经(包括阿尔巴尼亚国语圣经)。有了圣经以后，神必然会指示我们所当行的。

东德的情势也似乎比较好了一点。我们在那边开了几次大规模的布道会，有一次来了四千人。那个大礼堂只能坐两千人，其余的人只好站在后头，或是留在外面听扩音器转播。

自从克拉斯和爱德华两对夫妇加入阵容以后，我们终于达到了原先的目标:每个共产国家至少一年要去一次。今年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古巴。神许可的话，准备在一九六七年底之前到北韩或北越走一趟。有些共产国家进出比较容易，我们去的次数当然就多一点，有时候一年可以去十几次。我们经常换人，以免启人疑窦。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工作最近又增加一项：以汽车供应铁幕后的传道人。有些地方平常很少有什么聚会，而由于交通不便或地点偏僻，外界的传道人也很难得进去。传道人有了车以后就方便多了，不但可以到处去，而且可以促进各地信徒间彼此的联系。

最先的时候我们送了一部汽车给东德南部的威廉弟兄夫妇。因为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聚会里头提起了这位弟兄，说他整年骑着摩托车到处为主做工，结果风吹雨打下来，患上了久咳之疾。后来有几位国人集资送来一张支票。说真的，我还从来没收过这么大的一笔奉献。

“这是个特别奉献。”他们说，“我们认为威廉弟兄实在需要一部汽车。好不好请你代我们买一部送给他？”

当我重回那美丽的撒逊尼山区，进入他们的家门，把新车钥匙交给威廉弟兄的时候，他还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他太太最近来信说他的咳嗽几乎已经完全好了。后来那部车跑旧了，那几位荷兰人又送给他第二辆。有了车后，威廉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布道团，时常跑到波兰和捷克做青年人的工作。

这是个好现象:铁幕后某一个国家的信徒对另一个国家灵性上的需要有负担、有行动。我深信这是神一向的心愿，要让那些散布在各个共产国家里的信徒们——也就是祂教会里那些忠贞的余民——大家团结起来，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彼此坚固，互相帮助。那些铁幕后的宣教士们，在经济上处处需要外界的援助，这我们可以帮助;除此以外，事情让他们来做当然要比我们外面的人去做容易得多。单是出入境，他们就比我们方便。此外，在聚会、通讯各方面他们也都比我们自由。举例说，在捷克就有我们认识的一个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各国去，甚至连巴西和韩国都有他们的人。

各个国家的宗教政策时常有变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变动都是朝好的方向走。有时候这个国家放宽一点，而那个国家又揪紧那么几分。譬如说，当南斯拉夫对圣经买卖采取放任政策的时候，那头匈牙利却天天加紧对基督徒的逼迫。最近中国大陆上在闹红卫兵，烧掉了不计其数的圣经圣诗。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看来似乎是在变本加厉，至于将来会演变到什么个地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

世人尽管怎样敌挡祂、攻击祂，可是最后的胜利终归是属于神的。事实无时无刻不在证明：无论是善是恶，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些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

我们认识一位罗马尼亚传道人，常常帮他买圣经以及别的用品。有一次他开车从维也纳带了一大批圣经回国，在入境的时候被扣留住了。当时他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从前已经坐过一次牢，罪名是屯积居奇，虽然那次是被政府冤枉的。这一次他带进来的东西可的确是违禁品，而且数量很大。当时一本圣经在罗马尼亚要卖到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薪水那么高。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辆车子进来。车里出来了一位做生意的商人，满面春风地跟那三个检查员一一打过招呼，而且还是称名道姓的，熟得很。他一眼就看到了摆在柜台上的那一大堆圣经。

“圣经？”他说，“先让我说个价钱给你听。”“是充公的。但是公家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卖。”其中一个检查员说。“你来，”商家扮个鬼脸，“先让我说个价钱给你听。”说罢，就着那个检查员的耳边低声地出了个价。“哦？值那么多钱呀？”对方瞪大眼。“那么样？可以考虑考虑吧？”

对方想了一想，说：“让我跟几位同志们商量一下。”

商量之后，结论是：“奉公”诚可贵，“金钱”价更高。

于是马上来个现金交易。银货两讫之后，商家在传道人协助之下把全部圣经搬上车，开走了。

这头剩下传道人站在那儿等候发落。可是过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终于忍不住问那个检查员：“请问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办？还算不算走私圣经？”

“圣经？这儿哪还有什么圣经？你可以走啦。”至于那些圣经，虽然是进了黑市，但总比被没收好。信徒们只要有钱，至少还可以买得到。

近来大部分的共产国家正在放宽旅客入境的限制，西方国家的人跑到共产地区访问游览的越来越多。如果其中有基督徒的话，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替神做点工作。就拿圣经来说吧。如果你一整车地运进去，当然是非常危险，但是如果每人只带一本的话，入境的时候通常是不会有

问题的。你要哪一国文字的圣经，可以事先向自由世界各地的圣经公会去要。

除了参观工厂、浏览博物馆等等之外，基督徒还可以设法找机会与当地的信徒们联络交通，甚至于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在主里互相关怀，彼此勉励。

“像我们这种工作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呀？”有一天我跟可侣这么说。

“我不知道，”她说。接着她笑了，“还记得那句话吗？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那条路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但是不论怎么样，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吧。”我替她接下去了。

对！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前走吧。我们两个人，十二个人，以及千千万万爱主的信徒们！让我们凭着信心一起向前走吧！

第 22 章

后记:新禧年之旅

二零零一年五月，安得烈弟兄再次莅临纽约州查巴克市舍下。此时小儿二人，还有小女莉丝已成家立室，轮到我几个孙儿在跟英语拼字搏斗。

自从《奉天承运》写成后，世界变了许多。俄罗斯共产党倒台，柏林围墙倒下。承继安得烈弟兄使命，专门服侍铁幕后信徒的〈敞开的门〉发展也越广，目前在四十个国家有逾三百名全时间同工，还有数以千百计半职同工和义工。〈敞开的门〉致力帮助殉道者家属，给有需要的神学生发奖学金，给资金紧绌的牧者买代步工具，为重新开放的国家提供印刷服务，让他们可以自己印圣经。支持事工的钱几乎都来自小额奉献，来自像安得烈弟兄那样的平信徒。

安得烈弟兄也有点不一样了。他和妻子可侣已当了祖父母。虽然弟兄与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高瘦依然，但也架起老花镜，两鬓斑斑了。

但他的心还没有变。如果小女莉丝的小女儿莎拉住在我们附近的话，安得烈弟兄大概也会把我们大人搁在一旁，和小朋友出去散步。还有事事亲力亲为的性格仍在，他和可侣至今仍不肯买洗碗机。安得烈的私人办公室就在他家旁边，忙完公事踏出门口就可以整理花圃；偶尔他也会走路到荷兰〈敞开的门〉办公室使用那里各种现代科技，因为他的私人办公室没有互联网，连传真机、电话答录机都没有。

“我连来电等候都不想安装，”他说，“喏，就是中断这一头对话转过去跟另一头讲的那种。”安得烈弟兄说，科技令人太在意应付当下压力。“我们应该有耐性、安静聆听神的声音，以此为优先。”

怀着祷告与期待的心聆听神，是弟兄处事的诀窍。这也正带领他往新的事奉方向——接触伊斯兰世界。

不过，让我们先来看看安得烈弟兄近数十年来的新经历，比如说，他的背痛怎样了？还有谣传最近公开的前苏联国安委员会记录上竟有他的名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意外

“我最近去看了医生，”安得烈说，“他说我不应再到处走动了。‘不过你大概不会听我的，对吧?’医生说，我摇摇头。‘那样，背再痛也别来了。’”他说时笑笑，我们知道他又想起神“一手造成”的那次“意外”。

安得烈弟兄进格拉斯高环球福音会宣教士学院念书第一天就开始背痛，因为好几节椎间盘突出，痛到一个地步，院长太太曾发现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试过吃药，做运动，却都没用。毕业时院长跟他说，还是别申请当宣教士了，他身体弱，要远行很难。

但安得烈还是当了宣教士，且没有机构资助。他也常常远行，开一辆残破的福特，背上发疼，有时痛得要别人来帮他穿外套，才能出门去讲道。讲的时候必须靠着椅背，或是倚着讲坛边，才能直着身子讲。

后来有兄弟奉献，够他买一辆有避震功能的雪铁龙汽车，开起车来才舒服一点。一次我们往匈牙利和捷克为弟兄的传记做资料搜集，他把那辆车子借我们开过去，我们这才体验到开长途车的滋味。

安得烈的背痛虽然纾缓了点，却没有痊愈，发作起来还是痛得厉害。书出版后几年，一次他往美国西部，回荷前打算来纽约州一趟，在我家小住几天，顺便谈谈，好让我们在《路标》更新他的事工通讯。

我们往拉瓜迪亚机场接机。最后一位乘客出来了，仍不见安得烈。打电话回家才知道，在我们出门不久，小儿司各就接到从科罗拉多州打来的电话，安得烈弟兄坐飞机遇上意外了。他坐一架小型螺旋桨内陆机往地区机场，再转飞纽约，怎料内陆机引擎发动不起来，機頭着地。“快跳下去！快跑！”机长喊道，怕飞机着火。安得烈跳下去了，却跑不动，原来脊骨受伤了。

他在瑟莱达住院了，上半身打了石膏，终于石膏拆下来……真真奇妙，几十年的背痛竟然消失！最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只小心翼翼地做有限度活动，背痛却没有回来。看来飞机猛烈碰撞那一下修正了他多年的脊骨移位。

椎间盘突出问题自此以后都没发作。“当然，”他对我们说：“坐长途机还是会背痛，却只是一般人都会有的那种背痛，医生正是为此骂我。不过嘛，既然更厉害的背痛都试过了……”

今天安得烈可以打理花圃、打网球，甚至偶尔打一下高尔夫哩。

前苏联国安委员会档案

安得烈也不知道，他在俄罗斯及周边共产国家的活动，俄国究竟知道多少？直至经济改革后，他才知道答案。

东西德统一后，德国通过一道法案，类似美国的信息自由法，让人查阅过去的档案数据。安得烈给我们看他从苏联秘密警察东德支部复印的文件，这些国安委员会记录竟有他的荷语全名，称他为“有钱牧师”，因为他给人送车子。更要命的是，里面详细记录他接触当地信徒的活动，名字、地址都有。

前苏联国安委员会之无孔不入，后来得到再次证实。安得烈最近参加某个人权会议，也有俄罗斯代表参加，他有机会和一个前秘密警察谈话，打算送对方一册《奉天承运》。“谢谢，不过不用了，”那位前警察说，“《奉天承运》在我们国安人员必读书籍之列，几乎人手一本，你做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惊讶，问安得烈：“秘密警察既然知道那么多，为何不阻止你？”我们问，“是不是你太勤快了，且常常转换方法？”

安得烈同意道，这是原因之一。“但回想起来，我相信真正原因是，秘密警察根本阻止不来，真的没可能阻止。神自会施障眼法、障耳法，令孤立无援的信徒得到鼓励，有力前行。”

我们追问，但秘密警察如何搜集到那么多数据呢？这下安得烈弟兄欲言又止，原来情报员中不少是他信任的朋友。这些经验令他学会宽恕，对所有信徒而言，这都是一门宝贵功课。

是这样的，当安得烈知道谁是情报员时，他感到很失望，觉得被出卖，但同时也开始想到对方的灵命。沉重的内疚感，他们大概要背负许多年吧？他曾好几次去探望他们，宽恕他们，但对方避而不见。

“他们根本不要被宽恕，”安得烈说，“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祂的祷告，也是为那些从没求饶的人而说的。”

安得烈坚持找那些情报员，终于见着了，他说 he 都知道了，愿意宽恕他们。但对方不接受。“这可是他们的问题了。”安得烈说，他的心倒轻

省，做了该做的事。这次经历令他明白到，我们的责任很简单，就是宽恕，不要计较结果，虽然这样很难。

传道人与主教

安得烈曾经偷运数十万本圣经往共产国家。苏维埃政权倒台后，他看准机会，把新约圣经连同诗篇、箴言合成一册送进去，这次是合法的，不用再偷偷摸摸了。〈敞开的门〉开始用航运方式，每次运十万本，刚好装满一货柜车。一年后，安得烈随十辆货柜车一起抵达莫斯科主教官邸，和俄罗斯东正教主教阿克列谢会面，送出一百万本圣经。

安得烈是荷兰新教徒，自小受教不应接受任何形式的教阶与礼仪，现在竟要跟教阶、教仪最严的教会领袖会面。

“我一见面就喜欢他了，”弟兄说，“他有一把又长又白的胡子，披着黑长袍，白礼帽，为人大方又友善。我送他两种书，首先交给他那百万本新约圣经，再送一册《奉天承运》。我们都会说德语，我说，希望以后再没有人要偷运圣经进俄罗斯。”

主教衷心说阿们。

“弟兄若愿意到我的私人小礼堂一起祷告，实不胜荣幸。”主教说。于是由他引路，到一所美丽的小教堂，里面有一幅屏幕分隔内外殿，挂满圣像，闪闪发亮。“我们来念主祷文吧，”主教提议，“用自己的母语。”

于是二人在一所金碧辉煌的东正教堂里祷告，一位是全俄罗斯的主教，一位是乡村铁匠的儿子。

“这件事本身，”安得烈弟兄说，“一定已令天上欢喜不已。但接下来发生的事，直教我心底里乐起来。主教开始用俄语，我用荷语祷告。Onze Vader……就在我说出‘我们在天上的父’一瞬间，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我们真有同一位父，而阿克列谢真是我的弟兄。我们用不同方式表达对父神的爱，都是祂的爱儿，在主的大家庭里永远联系在一起。”

许多世纪以来，基督身体让教会战争与分裂弄得伤痕累累，在这一刻都愈合起来了。

我们深爱这故事，是有私人理由的。虽然我们和小安都是老朋友了，但偶尔会因敬拜方式不同而引发讨论。跟我们参加圣公会崇拜，他

觉得拘紧，常说“不够从心而发”；我们跟他参加福音派祷告会呢，又觉得“历史感不够”。

至一九九零年代初，安得烈接受按立为巴基斯坦圣公会主教，我们自以为胜了一仗。可是他坚持看法说，那只是权宜之计，当地信徒为他方便事奉才想出来的办法。不过往后几个月我们都拿他开玩笑，喊他安得烈神父。

但这次与俄罗斯主教会面却不一样。看见安得烈说这故事的时候两眼发亮，我们知道，这就是真正的教会合一，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数小时仍惦念着祈求的。信仰不在乎形式，却在乎实质。“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

珍珠计划

但主耶稣曾用“重价珍珠”比喻天国，计划因此命名为珍珠。目标是，一次过将一百万本圣经偷运进中国。

〈敞开的门〉开始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两种教会，一种受政府认可管束；安得烈首次往北京时就探访这种官方教会。第二种是家庭教会(他最初几次进中国都没发现)，要秘密聚会，但信仰自由。

几代宣教士播下的道种的确在中国生根了，并不如安得烈首次往访时以为那么荒芜。尽管历史上，西方在东方犯下种种劣行，许多中国人也往往将基督教和剥削者联想到一起，但福音的普世信息仍然在那里生根了。〈敞开的门〉最初在这里那儿偷运几本圣经，渐渐地每次偷运一千，然后一万，送给家庭教会。

我们会问，安得烈弟兄初进中国时，不是看见书店有圣经可买吗？为甚么还要偷运进去呢？他后来经深入了解才知道，中国信徒虽然可以走进书店买圣经，却必须登记，看他属于哪个“官方”教会，但没有人会想登记的，因为料不到迫害佛教徒、基督徒或其他宗教徒的下一场运动何时来临，谁也不想被视为“反革命分子”。

渐渐地，家庭教会的圣经愈来愈少，甚至他们得把圣经撕开几份，轮流传阅背记。很明显地下教会需要更多圣经。然而要多少呢？安得烈探得惊人数字，反映中国地下信徒为数实在不少。“我们最少需要一百万。”

中国信徒倒自己想出了偷运办法。他们在汕头附近物色一个无人沙滩，货船将圣经卸下驳船，再分批运上岸，再让弟兄姊妹散往不同地方。

“于是我们开始计划一次大型偷运行动。”安得烈先选好了印刷厂，是田纳西州什维尔市的汤玛士·尼尔森公司(Thomas Nelson, Nashville)，再买一艘驳船，取名加百列，另买一艘拖船名叫米迦勒，以两位天使命名。“我们知道这次行动惟赖神助。”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晚上九时，当时汕头涨潮，驳船将 232 包防潮包装的圣经运往沙滩，每包重达一吨。包装在沙滩上拆开，早已有成千弟兄姊妹在那里候命。解放军意识到船只在沿岸活动，赶到那里时，大部分圣经已运走了。余下的给解放军扔进了大海。

两日后，有人看见数以千计黑皮书在汕头许多房顶上晾晒。

钱从何来

珍珠计划花钱不少，光运费就要“七百万”。从小穷大的安得烈，怎么筹得那么多钱。这样的计划，他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就开展，因为他深信只要顺服履行使命，神自会供应。

“记得一年夏天，”我们一起想当年时他说，“我开福士载一箱圣经出去，身上带着四十块钱。那不仅是我带出门的钱，而且是我家所有积蓄。可侣坚持要我带着，路上买汽油和吃的，说家里用的她会弄妥。‘神自有供应嘛。’此话不假。我们的基本需用总是一无所缺。”

只满足“基本需用”，至今仍是安得烈的用钱准则。他和可侣的生活方式，与新婚时差不多，有一所房子，一个菜园，一辆能跑的车子，有够吃的，有工作。五个孩子和四个孙儿都住家附近，往返只需走路。

“我们还冀求什么呢？”安得烈说，“钱留在手上难道我们会更满足吗？”

犹幸安得烈不贪。利用别人的恐惧感而致富，这样的机会多得是。冷战时期许多机构都藉此募款，最后不少都进了私人口袋。然而安得烈早在一九五五年就立志按此原则办事——撇弃所有，单单跟随耶稣。

“一次我向诺曼·皮尔博士 (Norman Vincent Peale) 提起这事，他问：‘假如一个有势力的反共组织给你一百万，你怎么办？’我说第二天马上把钱退回去。”事实上，安得烈一旦怀疑奉献者动机就把钱退回，这样的事发生不止一次。

前面最大挑战

活到一把年纪，安得烈见过不少风浪，多少挑战都跨过了，再难的目标都达到了。“但到现在为止，那最大的挑战还在前头，”他说，“就是伊斯兰教的问题。”

半世纪前当安得烈弟兄还在宣教学院念书时，他在报刊上读到，全球有九千六百万青年人在共产党旗帜下大串连。今天，伊斯兰教同样吸引着青年人。在当今世上任何地方，伊斯兰都是增长最快的宗教，包括美国。美国穆斯林人数已超越犹太人。

在好些大城市，清真寺被挤得水泄不通。笔者写作本章时，全球大概有二百三十万所清真寺，每天做一千二百万次祷告，宣拜塔的唤拜之声一响穆斯林就跑来。开罗的清真寺人挤到一个地步，警方得封锁街

道，让成千上万的人进寺祷告。安得烈不禁问，这种盛况，今日基督教可及得上？

“伊斯兰教有许多值得欣赏的地方，这么有吸引力的宗教，你不容忽视。伊斯兰教吸引人之处，譬如亲密群体支持，能响应经济与社会问题，强调端庄生活，不吸毒，不喝酒，群体以祷告为中心，家庭尊父亲为一家之主等。”

“想想看，全世界有上亿穆斯林，大部份都是热爱和平、勤劳，重视家庭的人，都不是恐怖分子。也有许多穆斯林在贫民区服侍吸毒者、流浪汉、受虐者——教会往往忽略的人。全球大概有六分之一人口信伊斯兰教，据我的经验，他们大部分都温文有礼，沾手恐怖活动的只属少数。”

问题是，伊斯兰教里的极端派，特别是他们的领袖，要求信众在各方面顺从，在这点上，倒与共产主义相类。当然，两者都并非铁板一块，世上有自由派穆斯林和共产党员，也有教义派、极权派的。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原属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基要派伊斯兰正力争上游；在阿富汗他们已站稳阵脚，以神学独裁手段全面地控制人们的灵、魂、体，无异于共产主义。

安得烈告诉我们：“这些共和国里也有基督徒，但为数不多，从前共产党掌权他们也熬过了。但伊斯兰基要派一得势，就马上攻击基督徒，甚至置诸死地。我觉得前面摆着的这个挑战，比共产党还厉害；极权主义一旦结合宗教，操控就更彻底。我知道必须面对这挑战，问题在于怎样做。”

我们看着安得烈弟兄，名副其实地屏息静气，等他说话。面对如此严峻挑战，他一贯“往好处看”的原则管用吗？

还幸这位老朋友的话，仍让人满有盼望：“当然，靠宣传恐惧和仇恨的话，能筹得不少钱。但我不会这样做，我不是反伊斯兰，而是挺耶稣。”

可惜这种话，人都听不进去。

“情况正像我最初在铁幕国家事奉那个时候，教会普遍存有无助、没盼望的情绪。许多人以为穆斯林全是恐怖分子，他们自成一国，与世隔绝……”弟兄的声音渐渐低沉，似乎在回想那段日子。进共产国家传

福音，当时大家连想也不敢想，总觉得这些国家都谢绝探访，里面信徒都躲着。

果然，安得烈弟兄开始谈到，两种情况有相似之处。“你记得我说过，第一次往共产国家的情形吗，当时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正是那次波兰之旅的经历，令我看清现今伊斯兰世界事工的方向。”

安得烈当时在华沙，透过传译在一家浸信会讲了一篇道，是他第一次在铁幕国家讲道。“那篇道不是重点，讲完道，牧师说的那句话才是。”

“小伙子，光是看到你，我们就会觉得是够宝贵的了。”

“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能改变你一生。”安得烈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的使命，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呼召会带我到哪里去。呼召很简单，就是：置身当地，与他们同在。”

华沙那位牧师的话，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成为弟兄今天事奉穆斯林的座右铭：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35-36, 40)

弟兄背诵这段经文时，看得出他很感动。“你们明白吗？”他对我们说，“你不在那里的话，就不能给他吃，给他衣服穿，不能问病，不能探监，除非你在那里。”

安得烈从开始在穆斯林中间工作的时候，就按这种在场原则服侍，既服侍基要派，也服侍温和派。“主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弟兄说。同一句话，几十年前他在我们这个客厅也说过。

爱仇敌，讲的可非滥情的爱、泛泛之爱。提及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安得烈难掩悲伤。“但耶稣说要爱那些逼迫我们的，祂不是建议我们这样做，而是命令。”

弟兄更把伊斯兰的英文 Islam，拆成藏头语句:I Sincerely Love All Muslim，我真诚地爱所有的穆斯林。

《敞开的门》的事工很清晰。“我们要往穆斯林所到之处，回应他们的需要。如果无法向他们传基督的话，就把基督活出来。”

“目前还没有伊斯兰国家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想事奉的话，上哪里都行。可以进学校，进水利公司，在银行、医院、科技界等。我们要迎接伊斯兰挑战，实践‘在场’宣教。今天全球有数以万计基督徒服侍穆斯林，就这样默默在场，履行传福音给万民的大使命，代表主耶稣进到地上受伤的人中间。”

“你甚至不必远行，”弟兄说：“穆斯林人口正不断增长，在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不少传福音机会就在我们家后院。”

《敞开的门》与其他社会工作的分别在哪？我们觉得，就在于安得烈弟兄的那种领导方式，其主要作用，就是让圣灵成为工作关键。安得烈活得简朴，自然有更多时间默想异象，向主求问，并细心聆听。

“当然，我有时间做这些，背后有赖整个团队负责打电话、覆电邮，”安得烈说，“我很感激他们。因为同工甘心委身工作，我才能免去繁琐事务，专心寻求。”

展望将来

“目前情况大概是这样吧。”安得烈说着，一边把行李推进车子里，准备开往机场。他要去俄罗斯，中途只能短暂停留老家荷兰和机构整个大家庭一聚，为他庆祝七十三岁生日。

“明天会更令人兴奋。我们不断训练‘在场’宣教士，人数越来越多。藉身在其中以作见证，这可是种艺术啊。”

了解当地情况，也是种技艺。在某些国家，〈敞开的门〉得谨慎点，只能活出基督以作见证。在另一些地方则自由度较大，可以办学、开孤儿院、办识字班、做医疗服务、教授耕种技巧等。

“我们会与其他宣教组织合作，网罗各方技能人士，如营养师、懂轮耕种植的、会炼食油的、会净化食水的、懂修车的。只要那专业是伊斯兰世界需要的都行，管他是身处海外的伊斯兰国家，或是置身纽约街头的穆斯林群体。”

安得烈说，今天许多人以短宣形式参与海外工作，到印度尼西亚或北非等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小住。“先吸引他们注意，再介绍主耶稣，未必要用口说的，但常常要以行动表明。”

“基督徒的心若放对了地方，就会开展一场精彩历险，”弟兄说，“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主耶稣也必在那里。”

Open Doors
PO Box 6237
Frenchs Forest NSW 2086
AUSTRALIA
www.opendoors.org.au

Missão Portas Abertas
CP 55055
Cep 04733-970
São Paulo-SP
BRAZIL
www.portasabertas.org.br

Open Doors
8-19 Brownridge Road
Halton Hills, ON
L7G 0C6
CANADA
www.opendoorsca.org

Åbne Døre Danmark
PO Box 1062
DK-7500 Holstebro
DENMARK
www.forfulgt.dk

Portes Ouvertes France
BP 40139
F-67833 Tanneries
Cedex (Lingolsheim)
FRANCE
www.portesouvertes.fr

Open Doors Germany
Postfach 1142
DE-65761 Kelkheim
GERMANY
www.opendoors.de

Porte Aperte
CP45
37063 Isola Della Scala, VR
ITALY
www.porteaperteitalia.org

Open Doors
32-22 Sang-do
2 Dong Dong Jag-Gu
Seoul 156-831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www.opendoors.or.kr

Open Doors
PO Box 47
3850 AA Ermelo
THE NETHERLANDS
www.opendoors.nl

Open Doors
P O Box 302 445
North Harbour
Auckland 0751
NEW ZEALAND
www.opendoors.org.nz

Åbne Dører
Magnus Barfotsvei 7
4633 Kristiansand
NORWAY
www.opendoors.no

Open Doors
PO Box 1573
QCCPO
1155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http://ph.od.org/index.php>

Open Doors
8 Sin Ming Road
#02-06 Sin Ming Centre
Singapore 575628
REPUBLIC OF SINGAPORE
www.opendoors.org/ODS/

Open Doors
PO Box 1771
Cresta Gautang, 2118
SOUTH AFRICA
www.opendoors.org.za

Puertas Abiertas
Apdo 49
18100 Armilla (Granada)
SPAIN
www.puertasabiertas.org

Open Doors
PO Box 48
701 40 Orebro
SWEDEN
www.open-doors.se

Portes Ouvertes
Praz-Roussy 4 bis
Postfach 147
CH-1032 Romanel-s-Lausanne
SWITZERLAND
www.portesouvertes.ch

www.opendoors.ch

Open Doors
UK & Ireland
PO Box 6
Witney
Oxon OX29 6WG
UNITED KINGDOM
www.opendoorsuk.org

Open Doors
PO Box 27001
Santa Ana, CA 92799
USA
www.odusa.org



敞开的门
期待全球汉语的福音